

**TIME
LIFE**

LOST CIVILIZATIONS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失落的文明

CHINA'S
BURIED
KINGDOMS

古代中国

尘封的王朝

主编：威尔·杜兰特
翻译：倪慧宇



华夏出版社
广西人民出版社



LOST CIVILIZATIONS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失 落 的 文 明

古代中国 尘封的王朝

CHINA'S BURIED KINGDOMS

主编：戴尔·布朗

翻译：贺慧宇

华夏出版社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中国：尘封的王朝 / (美) 布朗主编；贺慧宇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
(失落的文明)

ISBN 7-5080-2616-0

I. 古… II. ①布… ②贺… III. 中国 - 古代史 - 普及读物 IV. K2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2437 号

“Copyright © 2002 by Time-Life Inc. Published under agreement with Time Life Books B.V.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 2000 Hua Xia Publishing House and Gu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devices or systems,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except that brief passages may be quoted for review.

Time Life is a trademark of Time Warner Inc.”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01-0154

项目策划 王 进 彭庆国
版权代理 段长城 周 莉
美术编辑 李筱茜
文字编辑 张 红
装帧设计 李筱茜
封面设计 晓霞工作室
责任印制 郭宝恩
责任校对 李秀清 丁 华

华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编：530028)
新华书店经销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1/16开本 13印张 100千字 2插页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80-2616-0/G·1198

定价：6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华夏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本书所有文字和图片均由美国时代生活公司独家授权，翻印必究。

《失落的文明》中译本序

李学勤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

不久以前，电视系列片《失落的文明》曾成为广大观众关注的一大热点，至今仍在不少人口边时时称道。这样一部介绍外国考古文化的片子，能在这里博得公众的欢迎，说明大家对人类遥远的过去普遍怀有特殊的好奇心理。

其实同样的情愫在世界各地人们的心底都存在。记得日本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俳句：“在盛唐的时候，漫步于夜晚的长安市。”已消逝的古代文明，尽管是异国的，仍然能吸引后世的怀念与憧憬。

戴尔·布朗(Dale M. Brown)主编的这套《失落的文明》丛书，与同标题的电视系列片有密切关系。丛书英文标题为 Lost Civilizations，共有24卷，系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出版。由于这套丛书真正做到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在英语世界非常流行。相信以同样的理由，中译本也会为我国读者所喜爱。

《失落的文明》英文版每卷扉页上都有一段话，标明书的性质是“探索过去的世界，以考古学家与其他科学家的发现，把古代人及其文化生动地重现出来”。



考古学发现和研究的巨大成果，是这套丛书的主要基础。然而在这里，考古学不再是报告、简报的堆积和一般人读不懂的论文，而是丰富深刻又不枯燥烦琐，贴近人们的真实生活，适合大多数读者的需要。作为科学普及读物，应当说是十分成功的。

就我们这里的实际情况来说，这套丛书不只有益于非专业的读者们。现在国内还没有外国考古文物的博物馆，大学中外国考古的课程也较薄弱。《失落的文明》所包含的知识和材料，一些考古、历史、文博工作者也是不容易接触到的。试加浏览，一定有所收获。

最近我在一篇小稿里，讨论过我们为什么有必要了解外国考古学的问题。有一种看法以为，中国历史悠久，遗存丰富，已经研究不完，中国人做中国考古就够了。窃以为这是不妥当的。中国的古代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是将中国文明放到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背景去考察，对中国本身的历史文化也很难真正有深入透彻的理解（《外国考古文化名著译丛》总序）。只有扩大我们的视野，才能认识中国文明的固有价值，才能阐述我们先民对整个人类的巨大贡献。

对古代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探索，是极为重要的科学研究课题。大家知道，人类是分别在世界若干不同的地区，先后跨进文明的门槛的，而构成文明的种种因素，其萌现要更早得多。这些因素逐渐产生、聚合，推动文明的形成，究竟有着哪些条件，走了怎样道路，其间人类同其环境如何互动等等，都是饶有兴趣的争论中心。《失落的文明》各卷所展示的，正是文明肇端及其早期嬗变的轨迹，是后世人们久已淡忘了的，读

起来就像成人重看儿童时期的老照片一样，每幅图景都会唤起一丝渺茫的追忆。

文明发展的进程，绝不是简单直线的。历史上没有一种古代文明，不曾经历多次曲折，甚至倒退。有的文明，最后竟归于中断和湮没。相当多的文明创造，在时间的长流中又消失了，等到不少世代以后，才重新出现。人们称考古学是在寻找失落的文明，即是出于这样的缘故，在考古学家的锄头、手铲下，不知有多少次意外惊喜。传统上被认为只属于近世的好多事物，其实有着古远的源头。这自然不是《圣经》上讲的太阳底下并无新事，只是证明古代人的才能、力量不可低估，文明的历史比我们想像的更加复杂。

如果从艺术的角度去观察，古代文明的光彩就益为辉煌。翻阅《失落的文明》各卷，很容易看到各种古代文明均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创作出令人惊异的大量珍品。许多杰作具有永恒魅力，后来者无法企及。在这里，考古学同艺术史会合起来，密不可分。

这套丛书可以作为艺术图集来欣赏，同时也可供前往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参考，了解那里不可错过的古迹名胜。书的各卷皆有地图和年表，与论介、考古遗址、文物相配合，还介绍了自然景观与一般人文风光。在有越来越多机会踏出国门的今天，更多地知道异国有哪些珍贵的古代文明财富，无疑会大为提高人们的游览兴致。

《失落的文明》这套丛书的整体设计较好，古代世界的各种文明，包括新旧大陆，基本都已覆盖。各卷呼应配合，但均有独立性，便于单独阅读。卷的编排灵活，比如庞贝就自成一卷，使重点突出了。多数卷

的选材、论述是适当的。难免的是,《古代中国——尘封的王朝》一卷在中国学者看来,尚有不足之处。这反映中外学术界仍有必要进一步交流沟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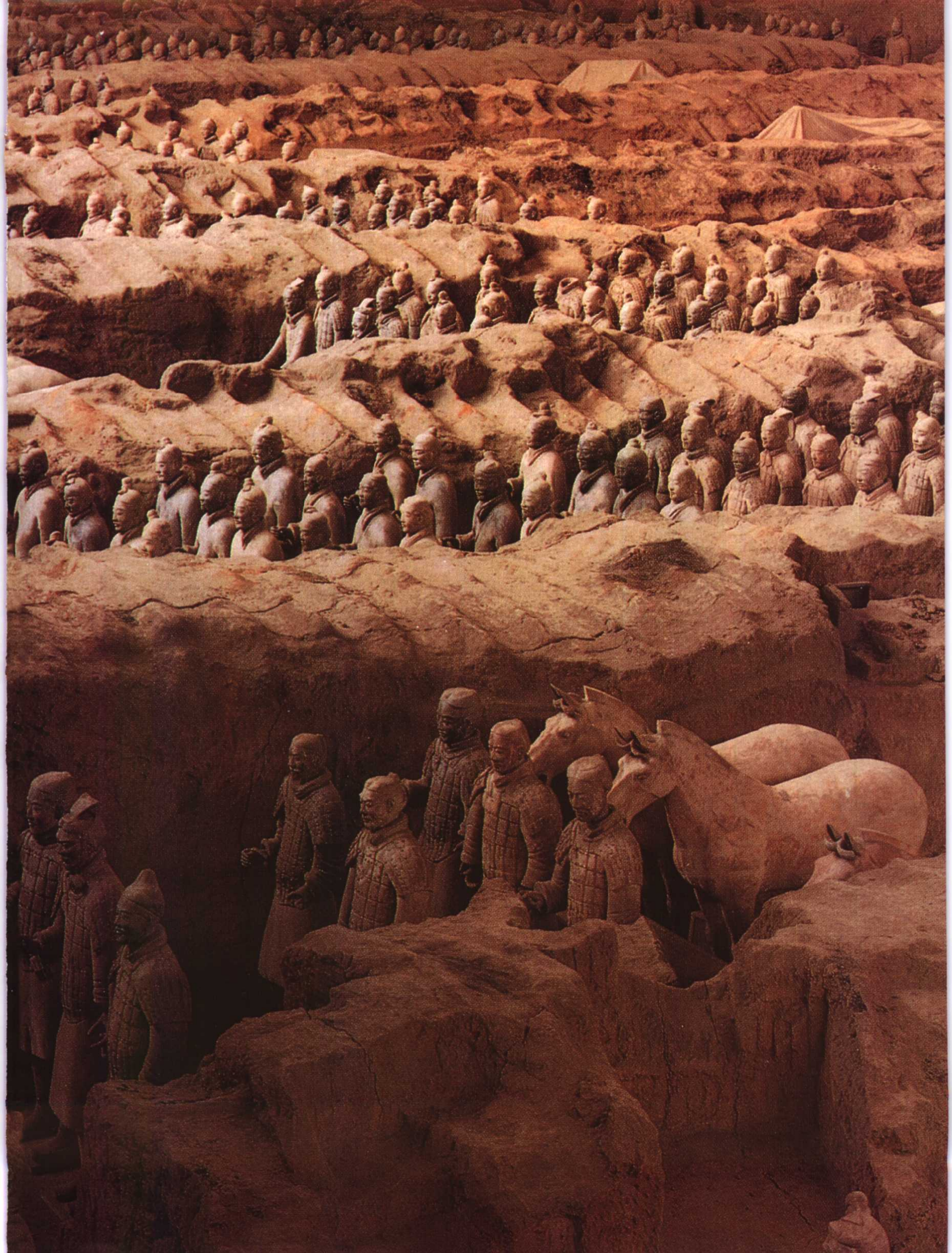
美国时代生活公司的《失落的文明》丛书是普及性读物,但其内容终究有其专业性,尤其是翻译成中文,殊非易事,复制书内这么多的图片也有难度。华夏出版社和广西人民出版社费尽心力,在不长的时间里组织推出了这套中译本,实在值得赞赏和感谢。

2001年12月1日





■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考古发现——秦始皇兵马俑。位于中国北部陕西省西安临潼县秦始皇陵东侧，占地 5.5 公顷，其中许多地方仍在挖掘之中。出土文物最多的一号坑约 16 英尺深，近 760 英尺长，逾 200 英尺宽。图中展示的是从泥土中解放出来的 1100 件陶俑和 32 匹陶马，仅占一号坑东边的三分之一。专家们估计，至少有 5000 兵马俑仍然埋藏在一号坑的西边。





目 录

第一章 从历史空白中走来的商朝 /1

THE SHANG: A PEOPLE RESCUED FROM OBLIVION

祭祀仪式 /36

HOMAGE TO ANCESTORS

第二章 战事频仍的东周 /45

THE EASTERN ZHOU: AN AGE OF CONTRADICTIONS

沙漠中的考古 /76

CHINA'S DESERT TIME CAPSULE

第三章 大一统的秦朝 /93

THE QIN: ONE TIME IN TEN THOUSAND GENERATIONS

被埋葬的军队 /125

THE BURIED ARMY

第四章 汉朝历史的考古发掘 /137

THE HAN: FLESH ON THE BONES OF HISTORY

历史上的一位女性 /171

A WOMAN OUT OF THE PAST

年表：中国历代文物 /192

AN UNBROKEN CHINA OF TRADITION AND INVENTION

从历史空白中 走来的商朝

THE SHANG: A PEOPLE
RESCUED FROM OBLIVION

春天，当庄稼开始在肥沃的土地上萌芽，宽广平缓的洹河河谷披上绿装；夏季，在华北似火骄阳的烘烤下，大地干涸。安阳就凛然安坐在洹河南岸。这座中等的城镇虽然有一个火车站，但它并不能够吸引世界各地游客成为旅游热点。但是，每年仍有成百上千的游客怀着同样的目的来到这儿——领略中国古代文明的遗迹，这座位于安阳西北不到两公里的3000多年前古老的商朝都城。

关于商朝的一切几乎都是那么扑朔迷离，包括它的名称，在古籍中，它既指青铜器时代，也指商统治时期所创造的高度文明。据记载，商朝的统治大约持续了650年，自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1050年，它的都城在初期曾经历过五次搬迁，直到第19位国王定都于殷，即今天的安阳附近。这块地方在差不多3000多年的岁月里都被称为殷墟，因为这片废墟在过去是、至今也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考古地之一，也是出土文物最多的地方之一。

20世纪20年代末期起，几乎有半个世纪，安阳曾

■ 早期玉雕艺术的样品，此长尾玉凤凰在公元前13世纪的商王配偶墓中发现，可能为佩饰。



被连续不断地开掘。1976年春天，安阳考古队进行更深入的考古时，有的队员甚至思忖，这块土地是否还有任何有重要意义的东西等待发掘？在这块已被挖掘过的土地上，沟壑纵横，百孔千疮。一支考古队伍在一片略高于四周的原野上开始了考古发掘工作。在此之前的冬季，当地农民已经发掘出了许多商代文物。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展开，队员们的兴奋与日俱增，他们发现了一系列的地下建筑，包括约12所房屋的地基，80个地下贮藏库以及超过一打以上的墓穴。这些墓穴均按中国古代传统的建筑方式建成，用夯实的泥土筑成墓墙和天花板。

在考古队引起轰动的发现是标为5号墓的挖掘。当他们挖向距地表24英尺的贮藏库底部时，一切都显示这并非一个普普通通的陵墓。它的规模胜过那个季节发掘的所有墓穴，而且工艺更精巧。很有可能，它不仅是一座皇室陵墓，而且是惟一一座历经3000多年且未被盗墓者染指过的商代皇陵。

在丰富多彩、令人叹为观止的随葬品中，有440件青铜器，590件玉器，560件骨制品，大量象牙制品，一些陶器以及约7000件来自中国东海和南海的贝壳制品，这些贝壳在当时有可能被收集起来当作流通的货币。从5号墓出土的青铜器，比考古队在过去10年里从安阳科考地发掘出来的青铜器要多两倍——镜子、祭祀器皿、钟和武器都

工艺精致，设计精湛。一件精美的青铜炊具静静地立在那儿，它的支脚上还有明显的烟熏痕迹，与之相伴的有三个蒸锅，这样成套的器具在中国是首次发现。在玉器中，有祭祀器皿和个人饰物，包括人物小雕像和栩栩如生的动物造型，如盘曲的蛟龙，蹲伏的熊，怒吼的大象。

考古学家们对于墓穴中另一种类型的发现不以为怪：16具遗骸——男人、女人和小孩，还有6只狗，他们都是陵墓主人的殉葬品。在商代，以人作为殉葬品是司空见惯的。

5号墓壮观的陪葬品表明墓穴的主人是商朝皇族。墓穴里的遗体已荡然无存，因为在埋葬了3000多年后已被风化。但是，墓碑记载的内容使墓主人的身份确定无疑。在安阳其他遗址发现的龟甲兽骨上也刻有她的名字。

这位值得纪念的贵妇正是妇好，她是商朝君王武丁最宠爱的王妃之一，也是武丁的妻妾中最具影响力的。武丁执掌了公元前13世纪大半个世纪商朝朝政。在武丁统治的59年里，他大肆扩张统治版图，在这些战争中，至少有两次可能由妇好率领，并在她的指挥下取得了胜利。根据其他的史料记载，这位卓越的女性率领13000人的军队与商的宿敌羌族在西边对峙，并且领军抵抗西北方土方的侵略。作为奴隶主阶级的一名女性，妇好也执掌着商代先祖祭祀礼仪（一种皇族内部最尊贵的人承担的职责）。妇好去世时，武丁悲痛欲绝。据说，武丁在妇好的葬礼上泪如泉涌，还经常梦到她。

神秘莫测的商朝千百年来激起了中国考古界的无穷想像和猜测。公元前6世纪的中国古代哲人孔丘这样描述商朝：“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以徵也。文献不足故也。”20世纪初的历史学家更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商是中国古代黄金时代（夏、商和周三代）之一的古代记载只是传说。许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常常忽略夏和商，认为中国古代历史始于周朝。



这种怀疑论之所以被广泛认同，原因之一是缺乏确凿的实物证据。夏和商的庙宇宫殿无一留存。毋庸置疑，我们可以想像得到所有新建的朝代都会如风卷残云一般摧毁前朝的大厦，并在其废墟上迅速建立起新的王朝。商代所遭遇的劫难，包括公元前1050年周征服商都城时，对文字记录的销毁及一些资料的流失。直到考古学家认真地对中国古代的东西进行挖掘，长期以来模糊不清的中国古代历史概才开始引人注目。

随着考古的进程加快，详细情况日趋明朗。今天，

■ 包括23个省、3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的当代中国地图。尽管本书的主题——古代中国，并不是如此划分的，但把中国今天的疆域和省份名称列出来，可帮助读者了解书中提到的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的重要考古发现。

数千个中国古代文化遗址都正在被考察。如果在几年以前，要写出一本像本书一样附有图例、勾勒中国古代发展的轮廓——中国上下5000年的古代文明的书恐非易事，从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至公元220年强盛汉朝的倾颓，难以述说。但是，由于有为数众多的考古新发现，本书才能考证新石器时代与商代，也才能深层次地研究西周历史——一个能透视商代精美文化的时代；研究东周，一个充满思辩、革新和战争的时代；研究如昙花一现的秦，当年秦始皇在与现在中国大部分版图相同的面积上，纵横驰骋，实行中央集权统治；研究辉煌的汉朝，一个充满精妙复杂文化的朝代，它的繁荣昌盛得益于对前代的继承及自身丰硕的发明。

考古学家们常常情不自禁地惊叹中国古代先祖们在步入坟墓时，从日常生活中带去的各种随葬品。在古代中国，即使是最穷的人，也要带着几吊钱去买来生及在阴间的特殊待遇。这两种动机刺激了大量随葬品的出现。最重要的是，古人认为先祖们生活在阴间，如果生者继续保持他们对逝者的崇敬，逝者就会保佑生者。商代以后，人们相信，因为有随葬品，已经逝去的亲人在死后才会过得很好；后人们确信，只有这样，先人们才会恩宠和保佑他们。

中国庞大的地下遗产被长时间地保护着，在一些例子中，由于对先人的敬仰和有关的禁忌，使得人们不忍去惊扰陵墓中的死者。然而，总有一些不计后果的人，他们冒着触犯死者灵魂安宁的危险，将黑手伸向墓穴中的珍宝。

盗墓者们可是一点儿也不尊敬先人。公元281年，当盗墓者闯入公元前3世纪时的一个王墓时，他们发现了堆集在一起的，看起来毫无价值的写着字的薄竹片。当它们被细丝缎带绑成书的形式，并卷成一捆捆，就成了历史上用作记录的竹简。盗墓者将散落的竹简点燃，握在手中作照明用，以便他们细细地在墓穴里搜

寻“更有价值”的财物。那些记载着过去信息的无价之宝顷刻间化为灰烬。后来证实，那些从劫难中幸存下来的竹简叫“汲冢竹书”，它们包括一张至今存疑的商王朝世系表。

这里有其他两个关于商朝变更的古代文献为证。一个是《国语》，该书描述了商被周灭亡的情形；另一个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史记》，它是司马迁于公元前1世纪撰写的史学巨著，记载了汉朝的伟大历史，上迄传说中的黄帝，下至司马迁所在的汉代。司马迁根据所掌握的资料，记叙了商代皇室的世系及一些事情，并列出了商王朝更替的次序。而关于接下来的1000年的中国历史，司马迁的著作、竹简，都是研究商代的最主要的资料。

在宋朝(公元960年-1279年)，学者们热衷于考察古史上所记录的陵墓所在地，也热衷于收集一些商、周时代用来祭祀及陪葬的青铜器。现在，他们大多已被农民和盗墓者挖掘出来，并且为商人和鉴赏者们所拥有。除了破译墓碑内容，学者们还在发掘点做上些标记——包括以前的庙宇、附近的墓碑以及对地形地势进行的描绘。记载这些历史事件的目录都被编纂出来，直到今天，这些目录仍是研究这一领域的重要资料。

12世纪的中国皇帝宋徽宗对这些古代文物十分感兴趣，沉溺于收集和研究之中。据与宋徽宗同时代的人估计，这位皇帝的文物贮藏大约有1万件。这位皇帝的兴趣集中在先祖们的祭祀仪式方面，因为那些青铜器上的铭文被认为直接传递着过去的信息。这些铭文镌刻在金属上，留下难以磨灭的印痕，虽历经岁月沧桑仍不湮灭，因而免除了后人因誊写而产生的错误。

■ 新石器时代，早期仰韶文化的代表——彩陶壶，壶上展示的是典型的波网纹。这种文化在中国中部和西北部地区盛行了3000多年直到约公元前2000年。



随着宋朝的衰落，蒙古游牧部落开始扫荡中原，因而有关青铜器的研究告一段落。在后来的18世纪中叶，人们的兴趣重新回到了考古学上，对碑拓和历史文献进行研究。又一个世纪以后，尽管中国的历史仍在地下酣睡，另一种研究古代中国器物的趋势开始形成，他们是来自遥远大陆的陌生人群。

19世纪末期，几位西方探险家开始沿着古丝绸之路探险。2000多年以前，丝绸及其他令人心动的物件，从唐朝的长安(今陕西西安附近)出发，穿过中亚沙漠绿洲到达波斯，最后来到罗马(第140-141页)。中国甘肃省西部最大的戈壁滩罗布泊和塔克拉玛干沙漠曾有几个被遗弃的定居点被埋葬在沙漠中。来自欧洲的猎宝队怀着极大的热忱来到那里，希望能在现代边境线上干燥的沙漠中找到中国古代文化遗迹。果然如他们所料。

在穿越荒漠之旅中，点燃第一缕火焰的是瑞典旅游者斯文·赫登，他曾在1895年至1926年间穿越荒漠进入中亚。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他发现了在新石器时代崛起的楼兰族定居的绿洲。在这个部族衰亡之前，自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他们在丝绸之路上曾兴盛一时(第76-91页)。继赫登之后的是德国的探险家艾



■从良渚文化墓地出土的约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的玉琮，提供了中国早期玉文化的线索。该物由一片片的玉包围着，圆盘似的璧和四方形的琮，这也许与保护力量相联系。在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良渚文化时的琮，如上图所示。玉琮展示出来的完整的图案包括如右下图所示的神人兽面图案。

伯特·冯·利，他们用骆驼载着古代的文件及一些文物和恃强凌弱的名声，开始了探险历程。

下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是英国东方学研究家奥里·斯坦，他曾在1899年至1915年挖掘过中亚沙漠中的绿洲城市及边境要塞，以搜寻手稿。斯坦不论在赤日炎炎的盛夏，还是在钢笔中的墨水被冻住的严冬，都坚持考古。最终，在1907年，在大漠深处的敦煌，他做出了被西方称之为最伟大的发现，而中国则谴责他掠夺了中国的遗产。

曾经是中世纪佛教交流圣地的绿洲仍有居民。悬崖峭壁上布



满了蜂窝状的洞穴，这就是著名的有成千上万个佛洞的敦煌。斯坦参观了一个贮藏有大量古代纸张和丝卷的密室，有的注明时间是公元5世纪。他用欺骗加行贿的手段，说服看守这批稀世珍宝的人，让他挑选了许多丝卷——整整29箱，并将它们带到新德里，然后运到了伦敦英国博物馆。斯坦挑剩下来的很大一部分则被跟随他的法国东方研究学者保罗·佩利特和其他人盗走了。

在奥里·斯坦之后，热切的考古学家和探险家怀着能发现重大和有价值的古玩、文物的希望，相继从外国来到中国。他们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因为当时一场席卷全中国的政治运动使他们有机可乘。19世纪末，中国的主要地区被欧洲、俄国和日本瓜分了势力范围。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殖民统治导致了义和团的兴起。义和团是1900年兴起的抵抗外国侵略的武装组织，但它后来被八国联军给镇压了。在随后的10年时间里，内忧外患使中国民众觉醒，到1911年，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给中国的帝制划上了句号，并建立了共和政府。

新政府怀着发展落后经济的急切心情，着手一项雄心勃勃的修筑铁路的计划。修筑铁路的资金、技术和材料绝大部分要依靠外国的公司。这些工程中，有一条线路向西，经河南洛阳至陕西西安，穿过许多皇族墓葬群，在这些墓葬群中发掘出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玉器和陶器。那些外国工程师开始将这些文物运到欧洲，很快，一个宝物市场应运而生。同时，当地的盗墓者在商人和收藏者的怂恿、支持下，聚集在每一个著名的地点搜掠宝物，并且在北京和上海的古玩市场兜售。从事中国古代文物的国际贸易如此有利可图，以至于大量的

中部地区的 考古活动

DIGGING IN THE MIDST OF DANGER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之间，被史前遗址的报告而吸引到中国来的考古学家们的工作由于中国内战的影响而倍受挫折。华盛顿特区弗里尔艺术馆画廊的美国考古学家卡尔·威廷·毕晓普对此段经历作了令任何人都望尘莫及的最生动的记载。

自1923至1934年，毕晓普领导了中国北部和中部地区的考古活动，他克服了所有困难，收集自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考古资料。出于个人兴趣，他还写了不少旅游笔记，拍了许多照片，生动地描绘了中国这一动乱时期的历史风貌。

毕晓普1881年出生于东京，当他16岁时与任外交官的父母到美国继续完成他的学业，并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硕士学位。自1914年至1918年，他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东方艺术馆副馆长。1915年，他开始第一次中国考古之行。1918年，毕晓普加入美国海军，并且一直作为助理海军大使随员在中国呆到1920年。1922年，他任弗里尔艺术馆副馆长，并于次年领导了赴



中国的第一次考古行动，也是两次主要考古活动中的第一次。

在山西，毕晓普专注于研究一条宽1公里、长7公里的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据那里的农民说，在此发现了大量的陶器。仅仅在一个寒冬到酷暑的时间内，毕晓普的队伍就在平原上挖掘出了彩陶、石器、骨器、圆井遗址及人的头盖骨，据现在估计，它们是公元前2500年和公元前2000年的遗物。

毕晓普小心翼翼的考古行动与河南周代墓的草率考古行动形成鲜明对照。在那儿，挖掘者打碎和抢掠了难以计数的青铜器和其他随葬物品，并且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政局动荡使毕晓普的任务显得更加艰巨，限期一个月的考古活动因政权更迭而随之中断。由于害怕斑疹伤寒、成队的溃逃士兵和成群的劫匪——他们以“骇人听闻的抢劫和暴力横行”

著称，毕晓普记录说，很难留住考古工作人员，这使挖掘工作更加艰难。本地的迷信传言也吓跑了另外一些队员，毕晓普写道：“没有人愿意在墓地里过夜，因为有人说那儿闹鬼。”

1934年，鉴于当时中国国内不稳定的政局，华盛顿特区弗里尔艺术馆画廊将毕晓普召回家。毕晓普死于1942年，他将自己在中国搜集来的文物献给了该馆。

■ 中国分崩离析的混乱局面似乎迫近，卡尔·威廷·毕晓普(右边稍远)在山西云岗两位当地官员的陪同下，摆姿势照相。





■ (上图)1924年,被奴役的中国工人在考古队的指挥下,从河南如和镇(音译)坑内向外运土。在这儿的一座东汉墓中,毕晓普发掘出公元1世纪和2世纪的陶砖、陶器。墓室有士兵守卫,以防匪徒。

■ (中图):1931年,骡车小心翼翼地由约30公里外的弯川(音译)运送考古文物至云江(音译),许多文物被装船运往华盛顿特区。弗里尔艺术馆画廊收集并对这些文物进行研究。

■ (下图):1931年,准备用于展览的新石器时代的文物被陈列在陕西省一个图书馆的一层。墙上的“义”字可以解释为“洁身自爱”。

赝品充斥市场,并流入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有的文物甚至至今不能鉴定其真伪。

当深埋地下的宝物在工地不断被发掘出来后,修筑铁路的外国工程技术人员也对中国的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瑞典地质学家J·冈纳·安特生为中国政府进行矿产储量调查,他身材魁梧、个性刚强,曾广泛游历,在中国各地四处勘探矿藏。1921年,安特生发现了两处著名的古遗址:在距北京西南26英里的周口店,他偶然发现了被认为是猎人杀死后留存下来的动物骨骼化石。他认为,该地曾是古代人类的遗址之一。8年后,中国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循着这条线索,发现了50万年前古人类化石——北京猿人(第16-17页)。安特生第二个引人注目的发现是在河南省的黄河南岸仰韶村。他确认了中国第一个被发掘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

以首先发现地点命名的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2000年),与在此发现的彩陶有关联,也与从甘肃省至山东省沿着渭河和黄河流域几百个地点所发现的彩陶联系在一起。10年后,中国考古学家发现了第二个新石器文化遗迹——龙山文化(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700年),这是山东省一个村庄的名称。安特生的发现揭开了中国那谜一般的过去的面纱,激起了中国科学界的极大兴趣。安特生以其高效的野外调查工作证明,中国的考古工作能向前进一步发展,在中国考古界激起了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他们认为自己也能在考古研究领域取得飞速发展。

到1930年,一群受过西方培训的考古人员带着他们政府的合作计划,加入到考古行列,使迅速发展起来的外国考古探险活动拉上了制动闸。当时,奥里·斯坦的中

鉴别真伪

NOT ALL THAT
MEETS THE EYE

因为它们美丽的外型和奇特的纹饰,中国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皿是收藏家热切搜求的文物。岁月给它们留下的印痕便是披上一层绿锈。青铜器是如此妙不可言,使得那些搜求者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因此,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不乏盗墓者从墓穴中偷窃大量的青铜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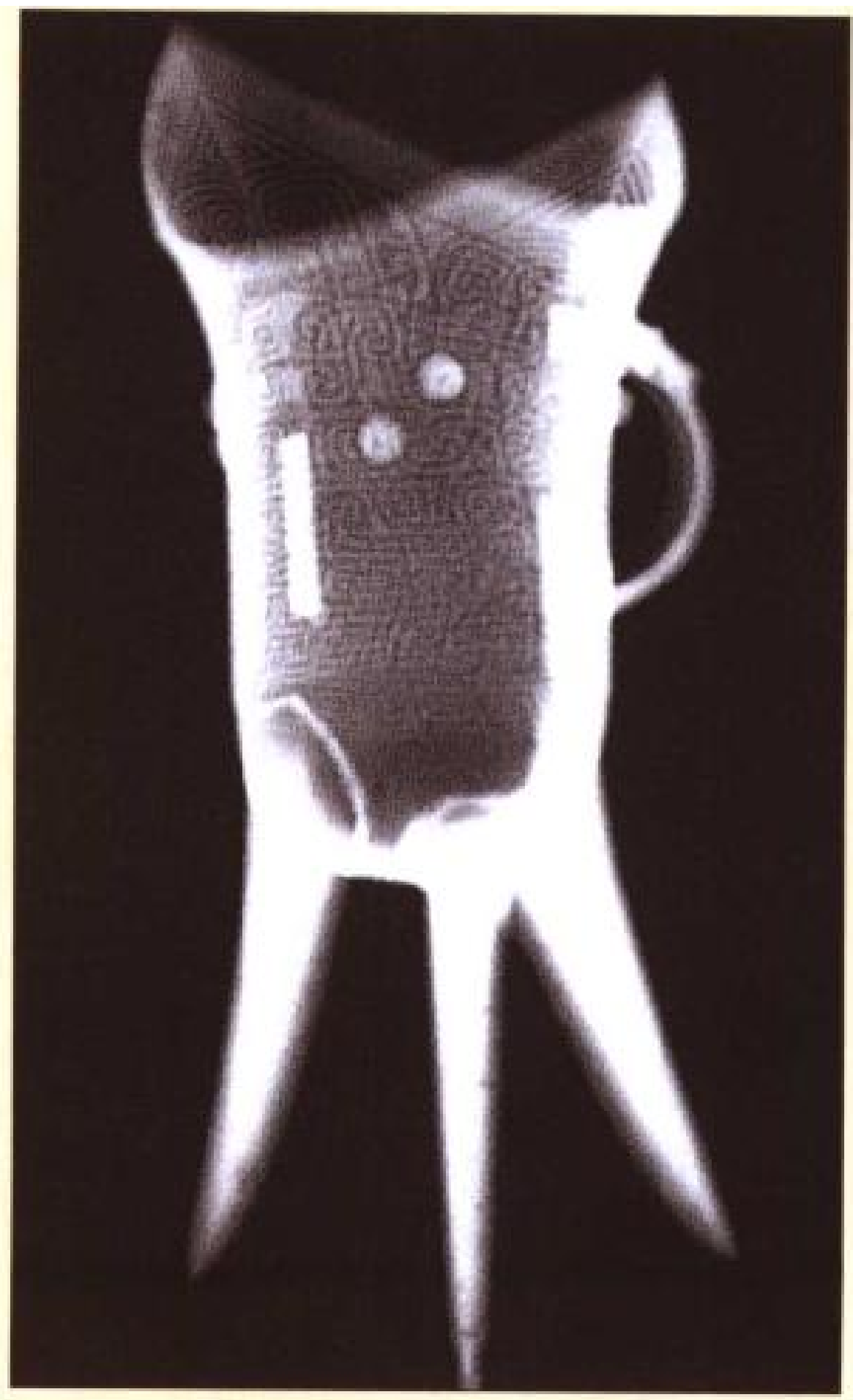
为了满足20世纪人们对青铜器的需求,伪造者生产出大量“古代”青铜器,用伪造的绿锈证明青铜器物的古老。另一些人在出售青铜器之前,都要先对严

重损毁和腐蚀的青铜器进行大面积的修补。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聪明的商人利用收藏者的无知,以赝品、掺假或修补品愚弄收藏者,甚至有的博物馆也成了此类骗局的牺牲者。现在,现代科技能揭示出青铜器的真伪了。

例如,将青铜器放置在显微镜下检查,伪饰的绿锈一般有无可遁形的粒子结构或形态。物理、化学实验、放射性碳素断代和热释光断代、全息照相技术能全方位地鉴别出古代文物中的

“嫌疑犯”。但是,智慧的头脑和敏锐的眼光在鉴别真伪方面仍然能起作用,美国华盛顿特区弗里尔画廊艺术馆的一位成员所经历的一件事即为佐证。他注意到一件淡绿色的展品,与照片上擦光了黑色表面的另一件器皿很相近,于是,他对这件展品稍微进行了科学检测,便确认出它的确与照片上的器皿是同一物,只不过在出售之前被人工涂上了绿锈。他猜想,这样做也许是想增添展品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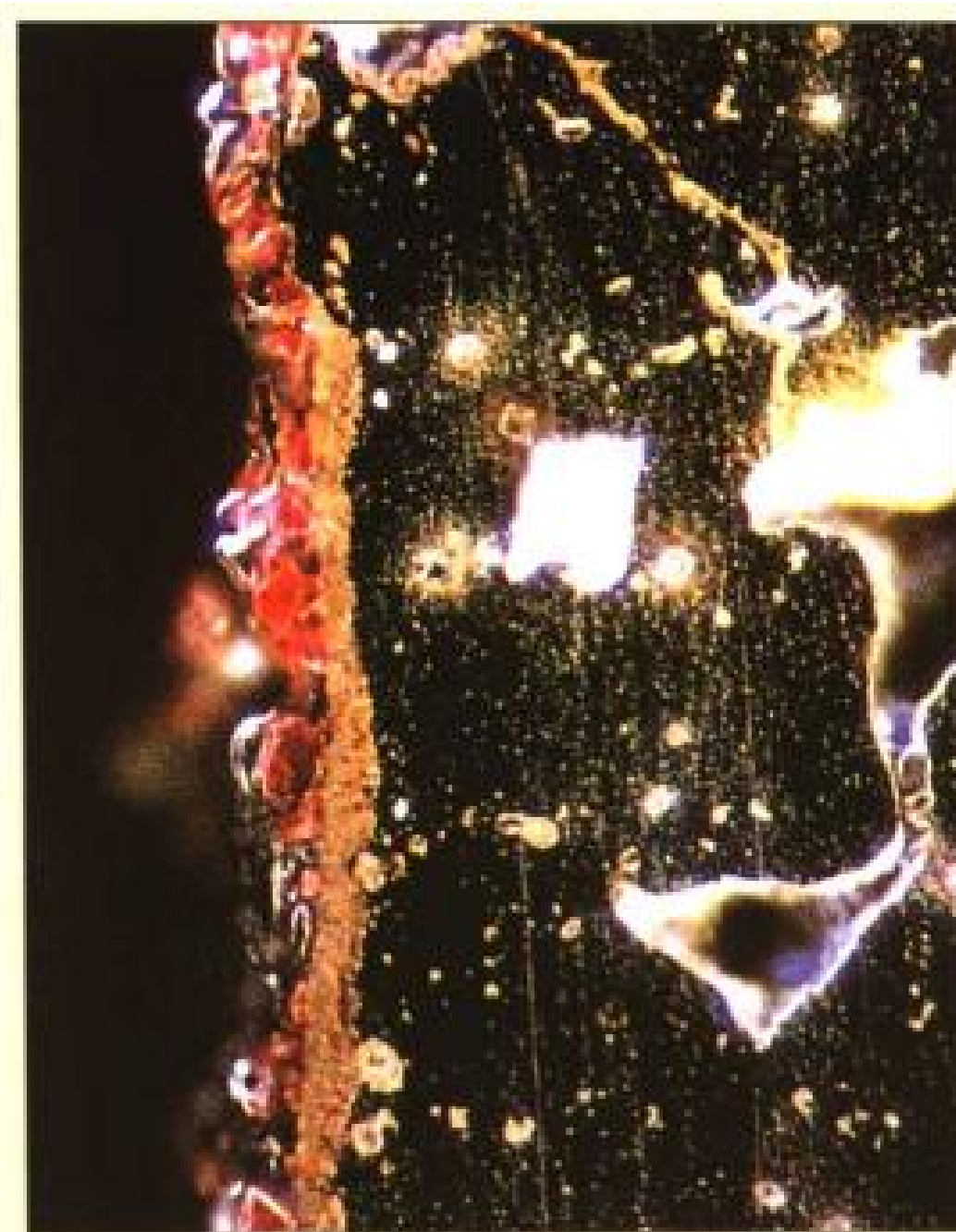


■ 全息照相技术显示,揭示了这尊青铜酒器断了的两条腿是怎样被出卖该酒器的人重新粘贴上去的,绘上的绿锈与原始绿锈一致,掩饰了修复的痕迹。



■ 显微镜下人造(仿造)青铜器物上的绿锈呈现出来的红色与橙色的粒子。自然生成的绿锈嵌入青铜器物内部,而不像图示只浮于表面。

■ 下图: 这尊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的青铜器, 看起来保存得十分完好, 直到最近一条裂缝出现, 暴露出人们用铜覆盖蜡和焊接的痕迹。逐渐被腐蚀的青铜器斑点十分明显, 用砂砾和胶漆的混和物造成的伪装表面, 与青铜器没有剥落的另一半相对照, 仍可看出伪装的绿锈。





亚考古队企图用船运走另一些丰富的文物。由于中国政府已经颁布实施了限制没有经过检查和批准的中国货物离境的法律, 尽管斯坦经过三番五次的争取, 但他还是被迫将这批珍贵的文物留在了中国。

尽管这些年这类严禁文物走私的法律执行得更严格, 也更为有效, 中国仍然必须和这种顶风作案的文物走私潮作斗争。盗贼们冒着性命之忧, 在最近两年时间里仍劫掠了4万座古墓。此外, 由于缺乏资金进行警卫、防范, 博物馆也成为盗贼们光顾的地方。特别是在一些小县城的展览会上, 经常陈列着在附近发掘的文物。小偷们甚至接到专偷某一特殊物品的指令, 这类“顾客”有时就在准备逃离中国海岸的船舶上等待交易赃物。

19世纪后期, 当欧洲人急匆匆从中亚沙漠中运走手稿和艺术品时, 一位中国学者怀着对祖国灿烂古代文明的景仰之心, 在无意之中发现了一个考古奇迹。这一发现在中国学术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受到了广泛关注。故事发生在1899年的一天, 翰林院的王懿荣疟疾发作, 他喝的中药必须用“陈年龟甲”作药引子。王懿荣正将龟甲碾碎放入药中, 这时, 另一位学者刘铁云刚好来探望他。令人惊奇的是, 刘铁云发现这些王懿荣作药引子的龟甲上依稀有些像中国古代文字的符号, 但由于它实在太古老, 根本让人难以解读。王懿荣曾研究过青铜器上的铭文, 使他惊奇的是, 他发现这些龟甲上的文字与青铜器上的铭文十分相似。

这激起了王懿荣和刘铁云的好奇心, 他们俩专程寻访药材商。药材商告诉他们说, 这些龟甲来自河南某地。药材商没告诉他们确切的地点, 但很显然就是安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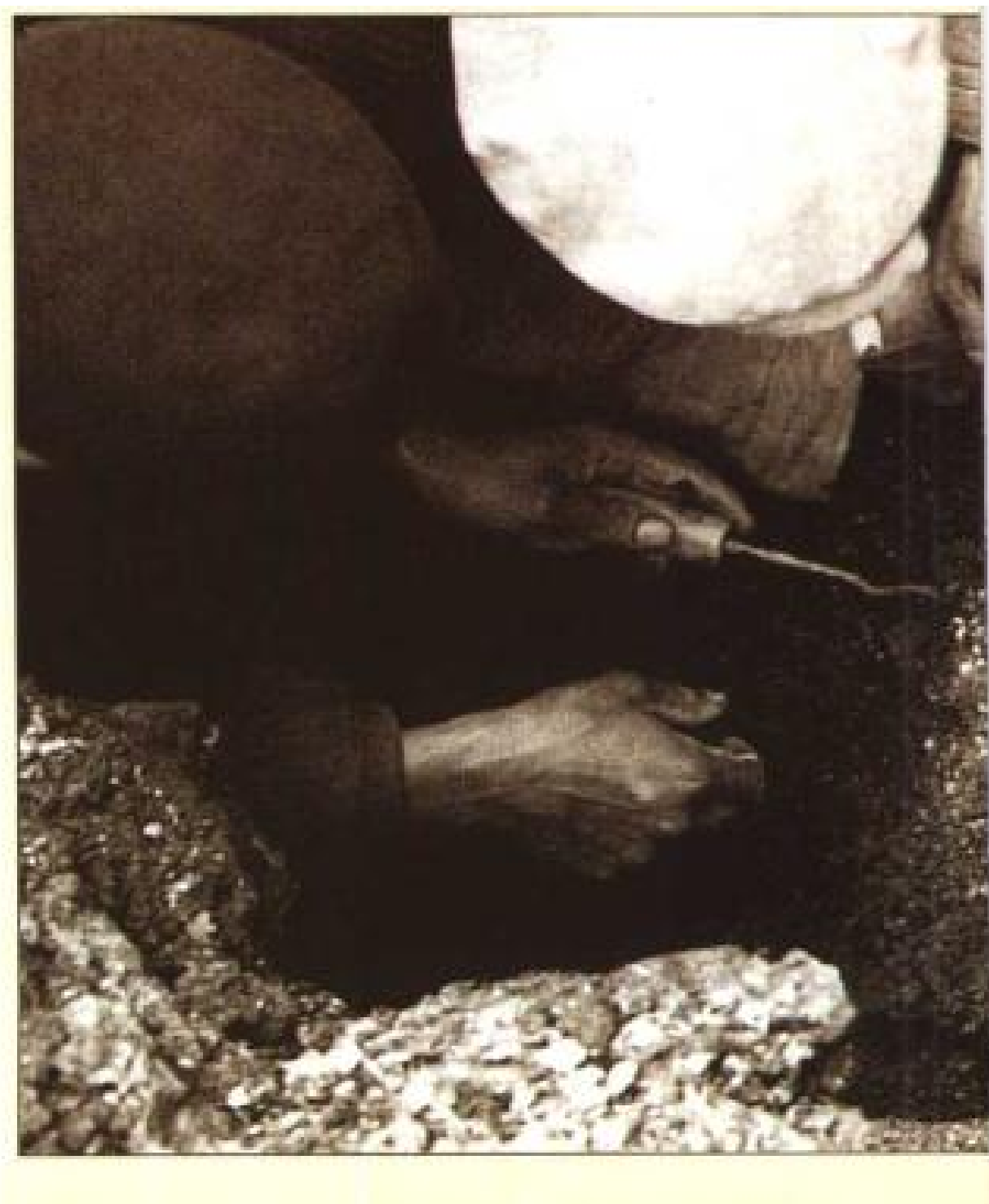
失踪的古人类化石

THE CASE OF THE MISSING BONES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 世界惊讶于中国伟大的古代文明之根追溯得如此之远。北京附近周口店挖掘出40个古人类化石遗迹(如下)。化石骨骼证明河姆渡人有近50万年的历史, 是人类的先驱。

日本入侵中国及抗日战争爆发, 使挖掘工作无法深入开展。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当时的中国政府为了保全“北京猿人”化石, 以防被日本人抢掠, 曾请求美国大使馆运走该化石。

装箱后, 这批珍贵的货物被小心翼翼地由火车运至一艘轮船上, 准备存放在9艘军舰上。但是,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



战爆发，运送北京猿人化石的人员和化石不翼而飞。关于此事，有几种传说：一种说法认为，化石装在一艘驳船上，在航行时沉没；另一种说法是，这批化石在火车上就被扣押了，并且被碾碎作为药用。20世纪50年代，曾有人认为美国将化石藏匿在纽约国家历史博物馆，而那些“化石”后来被证明是石膏。

这么多年过去了，仍然有无数人声称知道北京猿人化石身在何处。一位美国妇女坚持说，她从她的海军丈夫那儿继承了北京猿人化石，并将其藏在纽约帝国大厦顶层。但是，在开价50万美元出售化石后，她被两位携相机的游客惊吓而变得神经质，最后由于提供不出拥有化石的确切证据，她逃之夭夭了。

附近的某个小镇。当地的农民不时地将挖掘出来的龟甲和兽骨作为“龙骨”卖给药材商，药材商再将这些“龙骨”研成粉末，希望会有奇迹出现，至少有利可图。因为龙在中国民间是一种吉祥的动物，而且具有某种不可思议的魔力。刘铁云走访了镇上所有的药材商，将他所能发现的每一块龟甲都买下来。

王懿荣收集了药材商手头所拥有的带有记号的兽骨和龟甲。但是在1900年，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他遭受灾难，英年早逝。当王懿荣听到西方列强镇压义和团运动，并紧接着进犯北京这一令人羞愤的消息时，他自杀了。刘铁云接手了朋友的收藏，并扩大收购。1903年，刘铁云将1000余块龟骨上的文字用拓版印出来。

刘铁云印制的书籍引起了中国杰出的学者、朴学大师孙诒让的注意。孙诒让运用他对古代青铜铭文的知识来破解这些符号的涵义。他在1917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谈到，这些“龙骨”其实是甲骨，是商王用来预测未来的。这些铭文是皇室占卜者对神灵的语言的记录。使他意想不到的是，与商代这些文物接触激起了他的热情，他将这沉迷的热情描述为“在我的有生之年，能见到这些神奇的古文字，真是不可思议”。

学术界日益增长的收集和研究龟甲兽骨的兴趣，使安阳附近出现更多被古董商雇来掘宝的当地农民。同时，学者们继续对刘铁云的拓片进行研究。例如，据称，罗振玉为了研究甲骨文上的文字，将自己锁在房中达40余日。在这段时间里，他成功地将甲骨按内容分类，比如人名和地名。罗振玉还推测出当时占卜的方法：关于一个主题的描述刻在兽骨上，如牛的肩胛骨或龟甲，而凹陷的小圆点则被刻在另一侧。占卜者用加热



的刺针指向小圆点凹陷处，引起敲击龟甲或兽骨的反面破裂。占卜者根据裂缝的模式“读出”所要询问的事情的答案。有时，占卜者仅仅将占卜的主题刻下来；有时也将占卜所得出的结果添加其中；偶尔，求证结果的过程也会被记录下来。

仅仅只有国王才卜卦，他也许是询问所做的一个梦、一场疾病、将要出生的子嗣，甚至是牙痛。但更多的

时候占卜的内容为祭祀、战争、出行、狩猎、天气和收成——统治者的公共利益高于私人行为。古代皇室先人之所以占卜，是为了求得皇室祖先的保护和力量。尽管占卜者已解释出占卜的意义，但有时国王自己也作出预测。根据对占卜者姓名的分析，在整个商代，国王们共雇用了至少120名占卜者。

在武丁统治的时代，发现了一些占卜的兽骨上记载着有关妇好的内容，包括她的战斗经历。有一则这样的记载：“今年，国王将统领着他的军队与妇好一道抗击土方，神灵会保佑他吗？”

古董商们决定使他们保存的龟甲兽骨来源成为一个秘密。罗振玉坚持不懈地努力，继续询问他们有关



■ 所谓的与商代狩猎有关的兽骨（右上）。兽骨背面火烧的痕迹（左上）揭示出怎样加热一点来钻孔，反面的裂痕则是卜筮之人的答复。



龟甲兽骨的情况。经过孜孜不倦地调查和推论，罗振玉终于确定了出土龟甲兽骨的具体位置——安阳附近的小屯村。这个地方一直被称作“殷墟”。

罗振玉年轻而才华横溢的助手王国维为解决这一疑难问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试图以龟甲兽骨上的内容为证据来再现商王的历史。王国维在1917年出版的学术著作中列出的商王朝的更迭目录，与2000多年前的史学家司马迁所列的历史完全一致——最后的证据表明，真正的有确切记载的中国历史早于周朝。1926年10月，中国学术界的圭臬梁启超在北京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说：“中国考古学的根基被这令人吃惊的革命动摇了。”他说，对于龟甲兽骨的全新研究，使许多在古籍中记载的，我们认为难以理解，或毫无根据，甚或是牵强的重大历史事件昭然若揭。

两年以后，中国建立了第一个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并将对龟甲兽骨的全面调查研究作为其早期任务之一。于是，中央研究院派一位名叫董作宾的研究人员去安阳探明龟甲兽骨的确切出处。董作宾在报告中声称，洹河两岸所有的村民都曾挖出过龟甲兽骨，并且村里家家户户都有收藏。

董作宾在笔记中写道：到达安阳两天后，他雇请了一个“小孩”领他去看大人们不愿让他看到的東西，那小孩指着一处沙滩说，龟甲兽骨就埋在下面。这个位于小屯村之北的巨大山体，其东面斜坡耸起于河岸，山顶长满萋萋黄草。董作宾的调查证实了小孩的述说，他写道：“在仔细考察了沙滩西面之后，在靠近棉花地的地方，我发现了10个新开挖又被重新填满的坑。”在当地农民和6个同事的协助下，董作宾整个秋天都在挖掘。当他和同伴们在冬季停止挖掘时，他们共挖出了784件刻有文字的龟甲兽骨，并且确信那儿还能发现更多更重要的文物。根据竹简和司马迁的史料记载，此地曾是商代的都城。尽管没有确凿的史料记载，但董作宾认为有理由推断大批的龟甲兽骨集中埋在商统治的中心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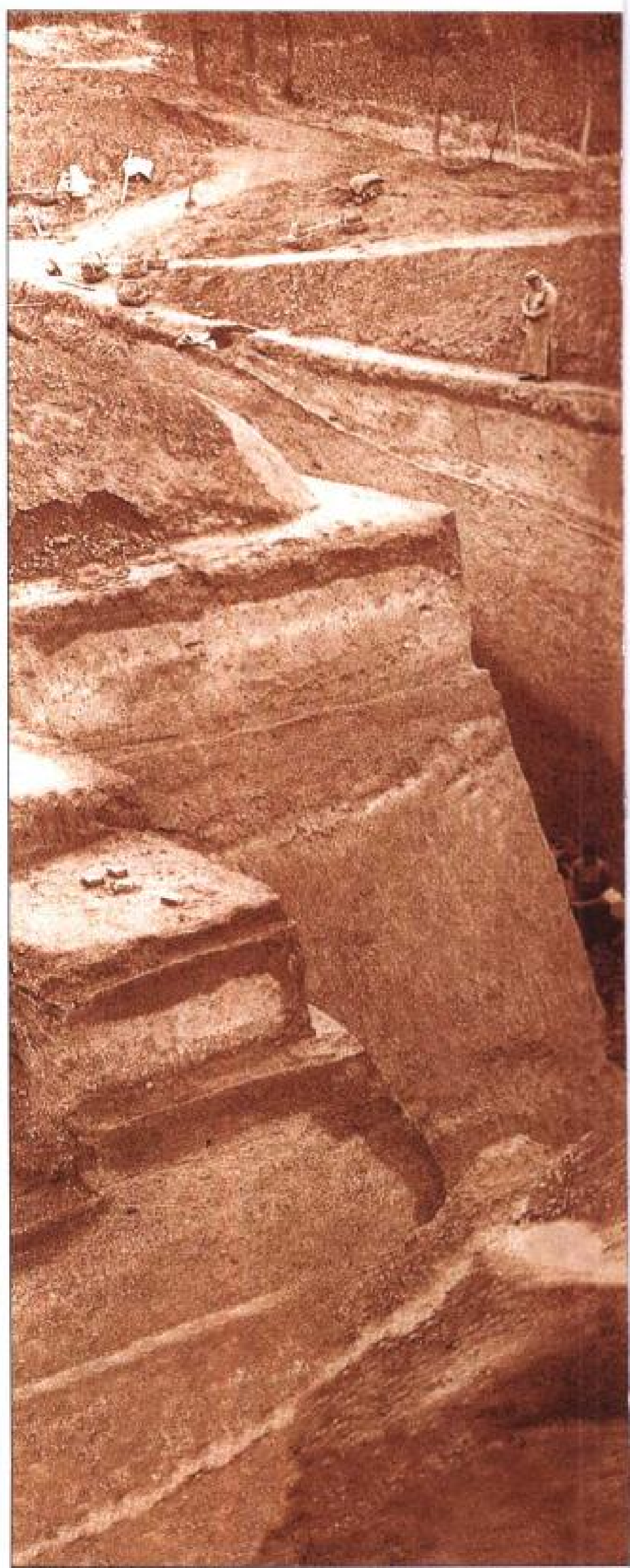


域，他的报告促进了考古学家们继续进行下一步的考古发掘，因为董作宾在报告中以这样的话结尾：“国家学术机构必须刻不容缓地进行科学挖掘。”随后，董作宾将他的精力转向回收和分析龟甲兽骨，并希望成为此领域的先行者。经过日积月累，他个人在安阳地区收集了近10万片龟甲兽骨中的28574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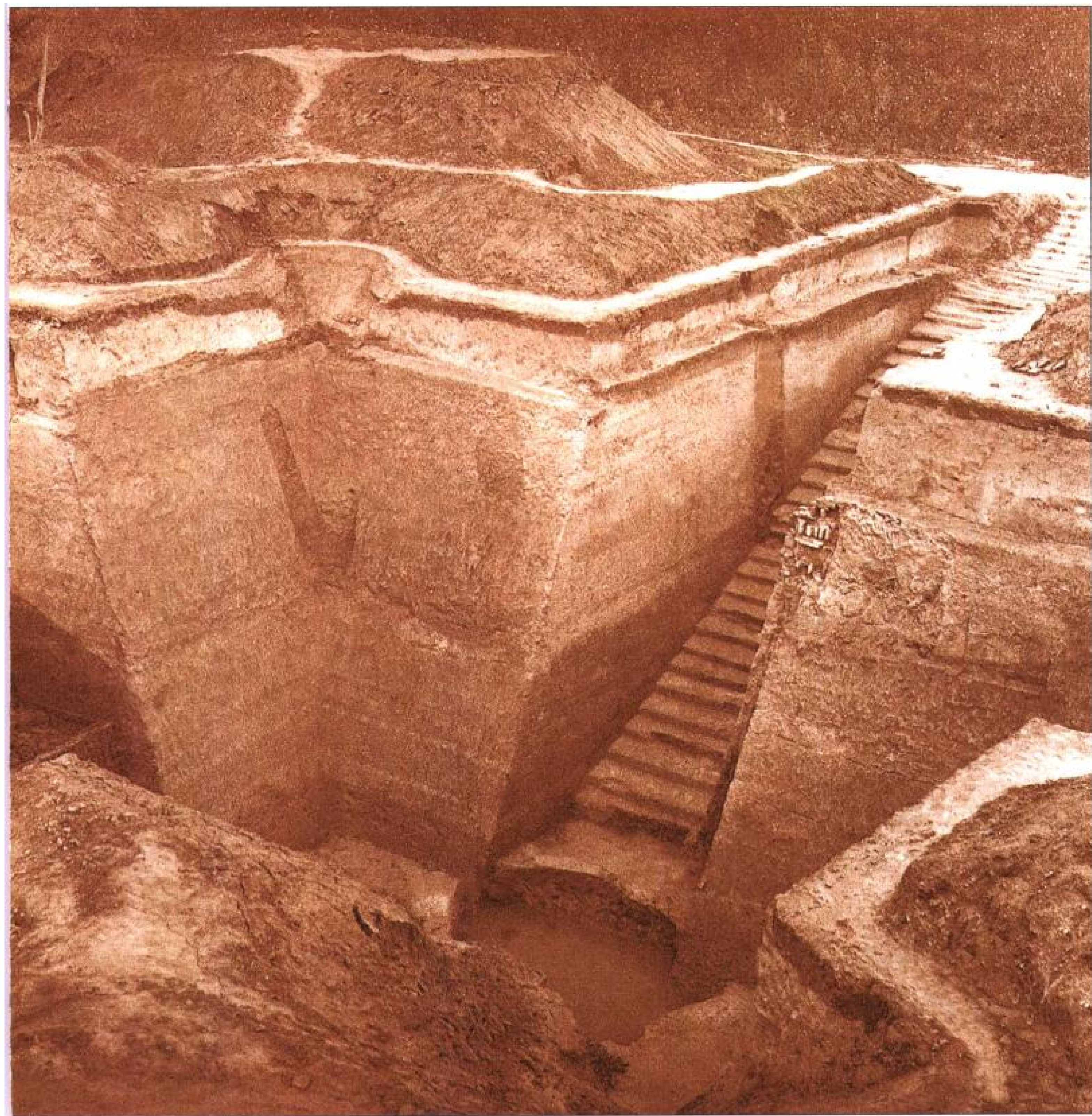
继董作宾的挖掘之后，1928年12月，中央历史哲学研究所成立了在李济领导下的考古专门部门。李济年方33，是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中国人人类学家，曾参与指导在安阳的挖掘活动。1929年春秋两季，李济率领两支由美国华盛顿特区弗里尔艺术画廊研究中心提供经费的考古队进驻安阳，并且运用了现已为全世界广为采用的考古方法进行挖掘。在开始每一次重大挖掘行动之前，李济与他的16个队员必须先勘察地形、地势，这些成员中有些后来成为了考古界的权威。1930年，挖掘行动进展顺利。

但是，在安阳的挖掘行动仍存在着不少难题。那儿的寒冬酷暑使得挖掘行动不得不在多风的春、秋两季进行。一位参观安阳考古队的美国人顾立雅写道：在强烈的季风影响下，“厚厚的黄尘飞扬，以至于人们甚至看不清10英尺以外的距离，必须戴护目镜。即使戴上护目镜，肆虐的狂风有时甚至将人们抛进30英尺的壕沟内。在这样的条件下，既要指导一些工人的行动，又要根据科考工作做好考古发掘备忘录，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来自附近贫困地区的农民土匪是另一种威胁。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富起来了，他们的发迹主要不是得益于挖掘龟甲兽骨，而是靠偷盗精美的商代青铜器。顾立



■ 20世纪30年代一帧揭示一座商代皇室墓穴被挖掘时的照片(下图)。在发掘地工作的考古学家们发现,殉葬者的遗迹被葬在旁道处,坑的底部则埋藏着骨、石头、贝壳、鹿角、牙齿、青铜器和皇族的棺椁。



雅说道：“其中一件被北京古董商买走的青铜器价值5万美元，这在1935年是个天文数字。”顾立雅观察那些农民后说：“财富带来的是危险，而不是快乐。”他写道，通过挖掘而一夜暴富的农民们“因为害怕被绑架及支付巨额赎金，他们甚至在白天也不敢出门”。

警察和士兵们巡逻的地点仅限于在当地激起了民怨的地方。那些地方的农民认为，本该属于他们的利益被考古学家们剥夺了。顾立雅告诫说，据传，当地已经形成了一个秘密会社，他们要刺杀指挥发掘工作的头头。不仅如此，考古学家们还因为挖掘行动打扰了墓穴中的先人这一与中国礼仪背道而驰的行为，而必须面对当地农民的反抗怒潮，而不管墓穴距今年代有多久远。顾立雅抱怨道，一位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曾电示“强烈抗议挖掘古墓”。

即使有这些障碍，但考古队还是继续工作，一直到1931年，一个有重大突破的时节到来。这时，考古学家们开始发掘到一个由三个主要的复杂建筑构成的墓基。最北的建筑后来被看作是皇族的外围墓室，它坐落于河流流经之地，并由15所坚实的长方形或正方形居室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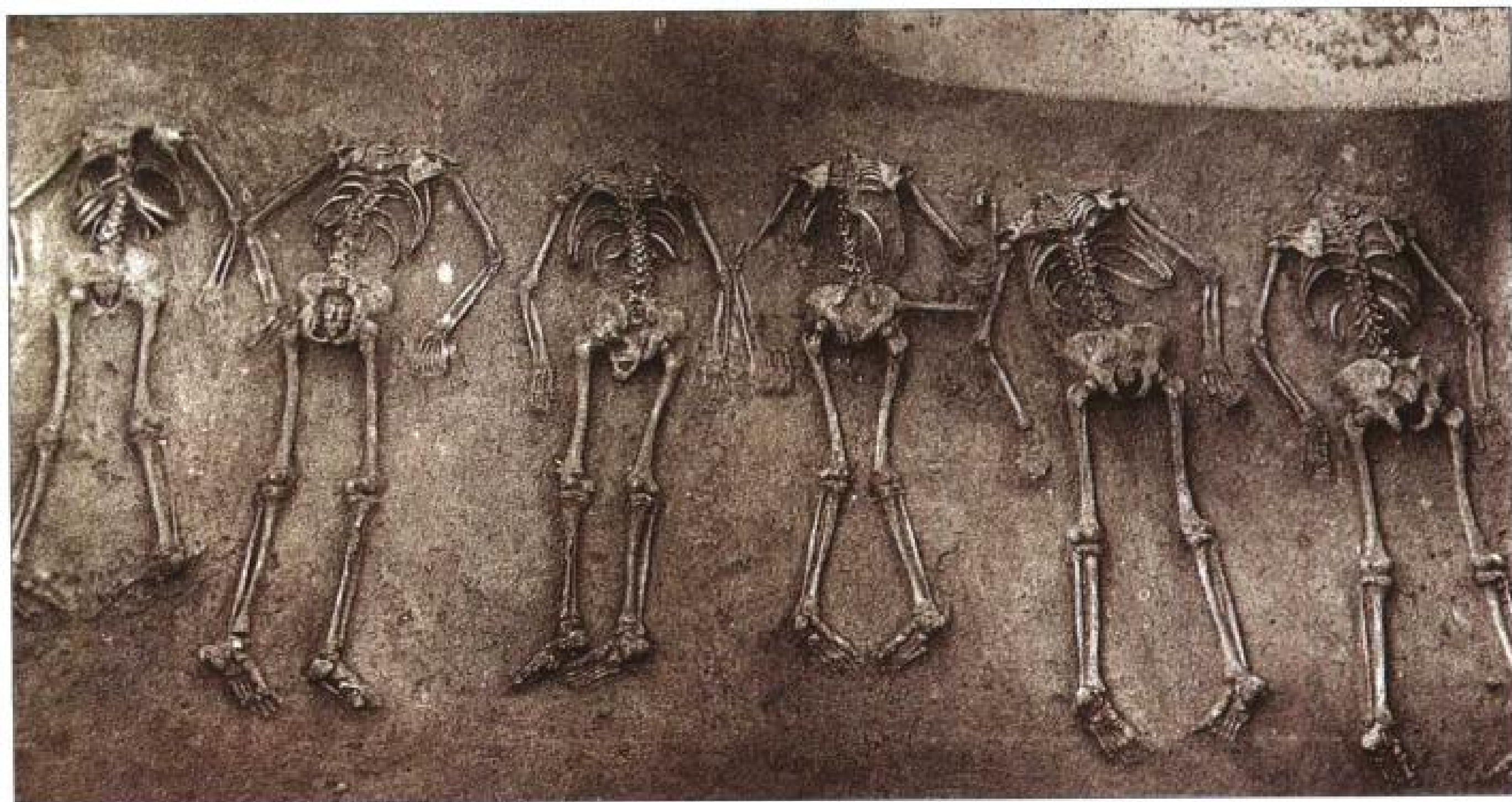
它们的基础都是由土夯实、厚达10英尺的平台。一排排的砾石镶嵌在土壤中，表明那些木柱子、支撑屋顶的梁都曾经立在这些石头上。这些建筑物的规模让人惊讶。有证据表明，一栋长280英尺、宽近50英尺的墓室建筑曾经壮观地雄踞在安阳的平原上。而那些分散在周围的正方形或圆形土制建筑则可能埋葬着那座主墓室建筑主人的奴仆。

经过几个季节的挖掘后，考古学家们遇到了一个令他们惊讶而困惑的景象，那就是被证实为殉葬的人牲排列在土壤中的累累白骨。根据李济的记载，这是科学家们第一次“证实了这种惨无人道的风俗”。

最重大的挖掘行动始于1934年秋天。这是一次在安阳西北部跨越河流的挖掘行动，由李济的一位助手——梁思永指导。梁思



■ 商代青铜斧顶上装饰的镂空脸与斧这种器具的可怕使命相谐。SHANTUNG 一墓地的坡道被重新覆盖，该斧是用来砍死48位殉葬者的两把斧头之一。安阳墓葬处也有类似的仪式，在该墓葬处有如上所示的6具无头骨骼。



永得知盗墓贼们最近在那儿挖走了丰富的墓葬品，便决定将那儿作为主攻方向。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李济记录下了这个转变。在1934年这一年里，有4个巨大的墓穴被挖掘；在随后的3年时间里，又发现了另外6个大的墓穴及1000多个小型墓葬。所有这10个巨大的墓穴都被证实是属于皇族的。

除了规模大小各异外，这些墓穴都挖掘得很深，呈长方形，并建有通往北面和南面的通道，其中一些通道伸展成十字架形状。尽管所有有价值的陪葬品都已被洗劫一空，墓本身却丝毫未损，这使得考古学家们能研究葬仪的细节。

每一位准备死后葬在这里的国王去世时，就挖好了一个巨大的坑；其中规模最大的入口为58英尺长、52英尺宽、39英尺深。从这些坑中挖出的泥土则沿着旁边已挖好的通道被运出去。在坑穴的底部，有一个从泥土中开掘出的小坑，四周是筑牢的土壁，一间高8英尺的木质“卧房”就建于其上，装着国王遗体的棺柩则放置在这间“卧房”中，在他周围放着各种皇族物件。然后将顶部装饰着精美雕刻和木绘的房间封闭，再在屋顶上面填埋泥土。建造规模如此宏大的建筑需要强征大量的劳动力。

当他们挖掘到每一座皇族墓穴的底部时，考古学家们发现有殉葬的人和动物。考古学家们从这些殉葬品能够推断出国王们被安葬之后的情景。例如，1950年，在武官村附近发掘的第11号，即最后一座皇族墓穴内，有41具殉葬者骨骸被放在棺木内，葬在通往国王墓室的通道中。其中24位女性殉葬者葬在西侧，17位男性殉葬者埋于东侧。另有8只殉葬的狗，4只用来在每一个通道较低的一端作护卫。在通道的上面有8辆由两匹马拉着的战车埋在3个坑内，每辆车上有两个全副武装的驭车手。随着一层层泥土被筑进坟墓，要埋进更多殉葬的牺牲，主要是猴和鹿，此外，殉葬的人数也需增加，34具男性头盖骨被脸朝墓穴中心放置着。在皇族墓地的南边是17座大的墓穴群，里面有160具已被砍去头颅



的骨骼，其头颅无法找到，也许这些殉葬者中一部分人的头颅已被放在墓穴里面。这种现象并非个例，在开挖其他的墓穴过程中，也同样发现了众多的头盖骨和骨骼。

数十年来，学者们都在研究一位国王死后为什么要屠杀如此多的生命——仆人和陪葬者的数目已远远超出了国王在来生需要陪伴的数目。发掘出的殉葬者骨骼揭示，用人牲是在特殊场合，而非皇族的葬礼上。据安阳许多碑铭记载，殉葬的人牲大多是在战争中俘获的，包括人和各种各样的牲畜，甚至包括大象和犀牛，都被用来祭祀祖先和山神、河神。在一次这样的祭祀仪式上，曾有1000多人被用作人牲。

为了了解中国用人牲殉葬的习俗，必先知晓中国古代对国王及先祖魂灵的态度。今天的学者提出，先民们相信，已逝的皇族祖先是联系商代社会和被称作帝或上帝的最高神祇之间的纽带。这些祖先所拥有的力量使得他们有能力代表王国的利益，尤其是保证战争的胜利，而这一切皆源于后人对先祖们的祭祀。祭祀的内容通常包括酒祭，如从墓穴中发掘出数量众多的巨大祭祀容器，可以作为明证(第30-31页)。但是，先祖的灵魂也渴望用鲜活的血肉之躯来祭奠。因此，已故的国王由于死亡而提升到先祖的地位，也不得不用一些人牲来殉葬。

1936年旺季的最后一天，安阳考古队终于迎来了伟大的发现。6月12日下午4点，在小屯的一个墓穴里，H127号墓的位置，考古队的日志记载：“为数众多的龟甲一下子出现在H127号墓穴。当我们在下午5点30分结束挖掘时，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只清理出了二分之一立方米的龟甲。”挖掘工作又继续了一天，正如考古日志所述，这样一来挖掘者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挖掘及清理这一“令人吃惊的成就”。

但是，要将这些龟甲一片片地运走显然会耗日持久，因为它们以一种有序的方式堆积在一起，而且经过地下3000年的埋藏，

已凝结在一起成了坚实的整体，必须将它们整个地挖掘出来。经过4天4晚夜以继日的工作，考古队最终从泥土中清理出了这堆逾3吨重的龟甲兽骨。

考古队员用了数月的时间，才耐心、细致地分离和检查完这些龟甲兽骨。最后，计算出H127号墓共发掘出17096片刻有文字的龟甲兽骨，除8块外，其他都是龟甲。看起来，大部分文物都葬于武丁统治时期，并保存完好。因为一些龟甲上仍保留有在镌刻之前用朱红色颜料所写的文字。李济认为，除了龟甲所传递的信息，此次文物挖掘的成就在于“给予我们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享受”。

精湛的铸造技术

AN INGENUOUS CASTING METHOD

生产青铜器，尤其是生产商朝时人们用来炫耀的青铜器要求有精湛的生产技术。这一生产过程要求匠人们生产出所有的东西，从小巧的祭祀器皿到近一吨重的青铜器。所谓的铸模，就是为了确保细枝末节的准确，用极薄的壁保护珍贵的金属。

铸模可以用许多部件组成，在这儿将最简单的一套铸造方法演示出来。首先是制作瓶状的铸模，在模上画成各种装饰花纹。再用粘土附在胎的外面，使之成器形(花瓶状)，这就是外模，并



且将它分成两部分。边缘制作成三角形的榫，使内模与外模更好地吻合。将内外两部分加热，并粘贴在一起，这样粘土就能被浇注到里面中空部分而形成器物的中心部分。中心部分被削平，这样在它和模之间形成空隙。独立

的部分，如器物的底部的制作，则是以倾注的方法制成，并且有一个排气孔。现在，各部分模被粘在一起，并且间隔段被加入到中心部分与模之间确保形成统一的厚厚的器皿。在各部分的外模再用粘土加固，并且倒置过来



这一发现所带来的快乐很快就烟消云散了。1937年，日本人侵中国华北，中国在安阳的发掘工作中止了。在接踵而至的战乱岁月里，许多中央研究院的考古学者们带着考古笔记和照片在中国西部的偏僻地区寻找安全的栖身之所。在那儿，他们克服长期的艰难困苦和疾病的困扰，研究这些年在安阳发现的成果，并将其著述出来。

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未给人们带来渴望的稳定。中国国内战争又开始了。4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些曾经在安阳考古的人员离开了中国大陆。董作宾和李济去了台湾。李济在台湾大学创立了考古系，他继续进行有关安阳考古发现的研究，并将其



(见交错部分)，这时铜汁就可以浇注到模子里面了。不到一个小时，金属冷却，模就可以打破，而容器露出来。取出中心部分，并最后对器物表面打磨后，青铜器铸造便完成了。

- ①外模
- ②中心部分
- ③底部
- ④组装后的模
- ⑤青铜器皿

令人称奇的 商朝文物

STARTLING DISCOVERIES OF A WIDER SHANG WORLD

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似乎都播种着过去，与不期而遇的发现相联结，而且经常是连续不断的重大而有意义的发现。1986年7月，当工人在距商都城安阳600公里远的四川挖掘时，他们用铲子挖掘出了一些古代玉器。这碰撞到了10年里最令人惊讶的发现。考古学家们将这一古迹的发掘地命名为三星堆。开始挖掘出了一个长方形的坑，坑内有约300件黄金、青铜、玉器和公元前13或12世纪的石器，与商安阳文化同期。但是，许多遗迹，包括一些与真人大小的动人心弦、风格质朴的青铜头像，都是以前从未发掘过的。另外，三星堆发现了13枚象牙和大量破损和被烧过的兽骨，这使调查者们猜测，这个坑与某种祭祀仪式有关。

在坑附近，考古学家们产生了大量奇怪的疑问：一棵青铜“精灵树”上面挂有装饰品；41具大小各异的青铜头像；60多枚烧焦的象牙；并且令绝大多数人料想不到的是，一尊8.5英尺的人物塑像站在高高的基

础上(左)。像别的坑一样，这个坑也位于土城墙外，建于一个世纪前或更早，围绕着遗迹的是各种各样的建筑物。

当研究人员仍在搜寻人性坑成因的线索及其主人时，研究结果使一个事实更加清晰，那就是学者们过低地估计了商代的疆域及其复杂性。三星堆，与安阳相距遥遥且文化相异，显然，是安阳西边的一个主要城市，在北面和东面与安阳遥相连接，已被证实在青铜祭器的规模上与之相似。人们普遍认为，安阳是一个孤立的文化中心，被许多待改造的野蛮民族包围着。实际上，一些人认为，有许多与安阳同时期的商代重要文化中心仍尘封于地下，等待发掘。

■ 就像挖掘出来的商代塑像，从三星堆人殉坑中出土的近9英尺的塑像，姿势夸张，着装，强有力地立于基座上。





■ 上面这三个青铜头像尺寸从5英寸至18英寸，显示出夸张的角形，且冠戴各异。一些学者推测，这些头像作为斩首之刑的替代品被埋葬起来。



■ 三星堆二号殉葬坑(左上)挖掘出被打碎的象牙，这些象牙撒落在青铜人像附近所谓的精灵树周围。在另一个地方(右上)，考古学家们辛勤地挖掘出了大量的青铜面具，头下面伸出的手是上一页所见的青铜人像的。眼睛凸出，造形奇特、鲜明是右边青铜脸的特色，据测量，其高2英尺，宽逾4英尺。



研究成果著述出版。在李济及其同事20年考古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大陆的考古发掘工作也进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崭新时期。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考古工作取得了质的飞跃，步入果实累累的新纪元。1950年5月24日，国务院颁布了保护文化遗产和遗迹的新法律。该法律禁止出口历史文化艺术品，重新调整部署了全国所有的考古行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考古事业被当作一项国家大事。考古研究在中国曾一度湮灭，现在某些大学也开设了考古研究课程。中国的考古研究不再局限于



■ 如图是过去一隆重祭祀典礼的痕迹，这套有12个酒器的祭祀用品所处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11世纪晚期周征服商以后。1901年，这套酒器在一个墓中被发现。这套酒器直到1911年初被送往纽约市博物馆之前，一直为总督端方所有（右边照片居左者）。在它们一直放置的祭坛上，左边的轮廓显示出被腐蚀的痕迹，在如下图所示的位置中，一些酒器所居之位置是它们当初祭祀时所处的位置。



研究那些王公贵族的墓穴，同时也将研究的焦点投向古代贫民的墓穴。全国大规模的群众性农业大生产和工业建设，发掘出了许多新坟墓，使出土文物数量巨增。

1950年，安阳的考古工作继续展开，并持续至今。随着1976年妇好墓这一引人注目的考古发现的出现，中国新一代考古工作者在对安阳地区方圆9平方英里的地方进行详细勘察，非常谨慎、细心地研究了该区域内每一细小的、尚未发掘过的地方。从安阳出土的大量商代文物，是今天的人们了解商代风貌的基础。

农业是商代的主要生产部门，以种植农作物粟为主，使用木制工具和骨器。但是，这一时期的人们也发展了一些对后来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重要技术和技能。青铜冶炼技术——用木炭作为燃料和粘土造型制成礼器和兵器——已发展成为商代主要的手工业部门(P26-27)。商代制作玉器，利用坚硬的矿石生产出精美的器具，从商代青铜器上附有丝织物的痕迹这一证据看来，商代人已知道怎样养蚕及纺织。在观测天象方面，商代已有根据月亮盈亏变化及太阳年位置编制成的日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书面语言作为文字标刻在龟甲和青铜器上，这些符号代表完整的单字，也是中国文字的基础。

商代的国王们认为，用武力征服对其边境构成威

■(右图)1990年-1991年，从三门峡出土的西周后期一葬礼盾牌上的玉片，这些玉片很可能先缝在一丝织物上，然后盖在死者脸上，希望他能在死后的岁月里好好享用这些玉。

■(下图)证据显示，铁器最早在中国开始制造比人们猜测的还要早一个世纪，这柄从三门峡出土的铁剑，长度超过一尺，有嵌玉和宝石的青铜手柄。





胁的国家是必要之举。龟甲兽骨上通常记载着用兵方略、武器装备。如，步兵和骑兵组合成队，左、右、中各为100人。殉葬的战车和驭车手表明，有5个骑兵队相伴，每队有5辆战车。战车上装备了成套的武器，每一套武器装备包括与人等高的、用牛犍和牛角制成的弓，以及用羽毛、木制杆制成的只有弓的尺寸一半的箭，箭的前端是锋利的石头、骨、鹿角、龟甲、青铜器。此外，还有一把小的青铜刀、一块锋利的石头、一码长的木柄青铜戟，装饰着老虎图案的木框蒙皮盾。

考古学家们思索公元前1300年左右的青铜时期文化，何以能在短时间内繁荣起来。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找到了部分答案，两个以前被发掘的主要的安阳史前遗址证明，商文化根基颇深：其一是河南省郑州附近的一段城墙。经过集中挖掘，一些学者推断，这是器——商早期都城。商朝也许就是从这儿迁都安阳的。在现代城市偃师附近，向西70公里，一些古遗址揭示出更古老的二里头文化。1976年，在二里头发现的一座古宫殿遗址像是宫殿，使许多学者认为，这儿就是古书上记载的亳，即商朝五个都城之首。因为在这里发现的许多文化遗址与在安阳发现的极其相似，于是学者们认为二里头、郑州和安阳各自分别代表了商朝文明的早、中、晚三个阶段。

通过测量物质中放射性碳元素含量，最早时期的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应该介于公元前3000年末与公元前2000年初之间，即传统年代表上归于夏朝的一段时间。商朝建立要晚几百年，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二里头早期文化是否代表夏朝——中国古代三个青铜时代王朝历史的最开端，一直有争论。

曾被认为自公元前22世纪至公元前18世纪就已存在的夏朝，以现代的眼光看披上了朦胧的面纱，正如商朝前一个世纪的情形一样。关于夏朝是否存在的推测，只有当夏朝的文字记载开始累积——如果夏朝有书面语言的话，才能彻底解决争议。



如果夏朝确实存在，它也许与商朝有时间的交迭，就像周朝与商朝一样——周文化与商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是商西部的毗邻。毋庸置疑，周至少有一段时间存在于商朝的后期。

在公元前11世纪中期，周强大起来，并入侵商，攻陷商都城安阳，建立了一个新的朝代——周朝。征服者们在今陕西省西安附近建立了都城。因为其都城位于西边，为了与后来迁都洛阳的周朝相区别，这个时期被称为西周，而迁都洛阳的周朝则被称为东周。西周王国拥有中国的广大版图——北至内蒙古，南到长江，西达甘肃，东濒东海。

西周进一步发展了商代已发达的技术与工艺。农业上，开始种植大豆，通过土地轮植休耕恢复土地的生产力，使其产量不断提高。因为和祖先一样有祭祀嗜好，周统治者继续用青铜铸造礼器。许多刻着文字的青铜器和一些龟甲兽骨在西周时期幸存下来。青铜器上的铭文往往较长，记载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和记载战争的内容一样，周王还喜欢将王命镌刻在青铜器物上。这一时期，青铜器铸造技术显然已经运用到铁矿石的冶炼中，人们已生产出铁制品，如最近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发现的铁剑即是明证。(第33页)

总之，西周统治者强化和改进了一套类似军队和经济制度的复杂的行政结构，为以后的社会政体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新国君们用千百年来构成中国政府基础的意识形态来统治其王朝这一方法被证明是正确的，这种意识形态既是封建统治者统治的根基，也是农民起义的原因。这种观念即是至高无上的神赋予执政者神圣的职责，允许以德治民，如果不得民心，这种“天命”便会被农民起义，或外族的军事干涉所推翻。

在周朝，冶炼、农业、武器制造、艺术、书法和其他文化现象都蓬勃发展起来。至公元前771年西周迁都洛阳时，已经为下一个辉煌的中国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祭祀仪式

HOMAGE TO ANCESTORS

古老中国最瑰丽的珍宝是青铜祭器。从墓穴中出土的这类文物是3000年以前在家庭祭祀仪式上用来祭祀祖先的。在商朝约650年的统治里，青铜祭器的制造艺术达到了巅峰，只有那些有权势和富裕的人才能买得起这些精美的工艺品。

尽管商朝的传统冶炼技术集中于简单造型，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承继了新石器时代的简单陶制工艺，商朝后期的艺术家们通过对艺术品进行花纹装饰，增加了它们的艺术价值。右图祭祀盘上的奇特图案显示了艺术家的技艺。当祭祀者行沃盥之礼时，他们可凝视到水中蜷曲在盆底的龙的大而微凸的双眼。学者们对盘上的龙是否只限于纯粹装饰功能产生了分歧。有一种理论认为，这种动物图案有助于巫师与逝去的先人进行交流。

周朝统治时期，青铜逐渐形成自己的特点。工匠们喜欢生产出铸有纪念战争与狩猎胜利内容的青铜器，而不是单纯刻上先人们的名字。西周后期，完全不同的装饰风格出现了，这使商朝后期最精美的青铜器皿保持了其独特性，因而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



美丽而神秘的祭器

RITUALS OF BEAUTY AND MYSTERY

青铜食器和酒器在商、周两代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古籍记载了古代家庭成员在跪祭时，根据各人的年龄及等级而陈列的祭器。供奉谷物和其他食品均有特定的祭器。祭祀等级因祭器内所

装食物的品种和祭器的质量不同而区别开来。此鼎背景上的饕餮纹是当时许多青铜器上的主要花纹。以图案中巨大的眼睛为特征，象征着想象中的某种兽的形象。

■ 鼎四面神秘的方脸、饕餮纹饰及动物图案，使之从众多此类器皿中脱颖而出。此鼎很可能是作烹煮肉食之用的。





■ 此簋柄上部的兽头嘴里含着鸟儿，每只鸟的身体缠在柄外部，它们的爪和尾巴则刻在柄上长方形的延伸部位。碗内一处特别的细节显示，它是为祭祀第四代商王之妻所用。



■ 有着爪形脚和棘状突出物，三只浇铸的龙张大着嘴支撑着鼎的碗。每只柄上饰有虎的图案，饕餮纹饰则环绕着碗（图中能看见饕餮纹饰之一）。

商代的酒文化

SPIRITS FOR THE SPIRITS

丰富的证据表明,商朝已开始酿酒、饮酒,并且将酒用于祭祀。事实上,他们用来装酒(用粟和其他谷物酿制的酒)的器皿多于盛装食物的。一般来说,商朝祭祀所用的酒器比其他器皿更为精美。

商朝人酷爱温酒,并将酒盛在有足够长的腿的容器里,用木炭加热。周朝人认为,商朝人耽于饮酒,以至于法纪不严。周征服商后,饮酒有度的周朝人扔掉了许多酒器。

■ 图中的酒器方角,有一只盖,由两只鸟图案组成环状手柄,还雕有饕餮纹、鹰纹、龙纹和螺纹。与一面相连的是用来将温酒器皿提离炭火的把手。





■ 1970年，曾为酒器的卣出土时，装有320多件玉器。在此之前发现的两件卣内亦装有玉器。此卣以其清晰而突显的铸造，以及其表面图案优雅、复杂而为人们所称道。



■ 用于斟酒，或者是曾用来温酒的青铜器物。一根短链连接着手柄和盖，其表面布满风格独特的龙和饕餮纹。



■ 像觚(高脚杯)和角一类的酒器,大量出现在商代的墓穴中,而且往往是在一起被发现的,它们多于其他类型的祭祀器具。此处的觚表现为典型的宽嘴设计,已使用了500多年。觚的上半部装饰限于龙,像倒装的剑叶。角有三个呈三角形的脚,尖形延长物为倒酒嘴提供平衡作用。





■ 一个带爪的人被野兽抓住，构成此卣装饰的一部分。他也许代表巫师，需要猛兽帮助从生界进入死界。商代青铜器中人物形象罕见，这使此卣成为无价之宝。



第二章

战事频仍的东周

THE EASTERN ZHOU:
AN AGE OF CONTRADICTIONS

有时偶然的一件文物发掘，能使考古学家以独特的方式与过去的历史相接触。如在埃及法老杜唐卡门墓中发现的银喇叭和从马雅人墓中发掘的陶制吹奏乐器——洋埙，当你重新吹奏它们，乐器又恢复了生机。它们清晰的乐音穿越千万年的时空隧道向你走来。而1979年在中国河南省一座有2400年历史的古墓中发现的一套由26件乐器组成的编钟亦是一例。这些乐器上装饰着龙的图案，钟上独特的铭文盛赞它们优美的乐音。(每个钟都能奏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当用小音槌敲击乐器嘴的边缘或中间与边缘的交界处时，它们便会发出流畅的音符以娱贵族之耳。

曾有这样一件事。1988年7月，一次中国艺术品的巡回展出计划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开幕，并且有杰出的编钟合奏。有人建议这套乐器应在开幕式上演奏，但是，馆长非常清楚，连续敲击编钟将会对它们造成损害。问题最终迎刃而解：这套编钟曾一度在中国演奏，并且它们的声音都被仔细地录了下来。没人能猜出贵族们的宴会上演奏的音乐究竟是怎样的，但是，展览

■ “曾侯乙永远使用”，这是青铜器鹿角立鹤的鹤嘴上镶嵌的文字，这只与曾侯乙一起随葬的4英尺高的神奇动物，也许是用来对付恶魔的看护者。

的组织者委托美国作曲家诺曼·德基在乐器的音域范围内特意为此套乐器谱曲。诺曼作了曲子，这首编钟音乐在名为“样品”的电子琴上用编钟的复音试演，并将其录制好用于展览会上欢迎来宾，动听的音乐与所见的艺术珍宝一样成为人们记忆中的珍藏。参观者听到的是流畅的现代音乐，20世纪的电子乐器使从古老、神奇的乐器中流淌出的乐音重新焕发了生机。

许多其他古代中国贵族拥有类似的乐器，用来在宗庙祭祀仪式上或宴请宾客时演奏。1978年，在湖北擂鼓墩发掘的一座公元前5世纪的巨大古墓——“四寝”陵中(第46-47页)，一套更为神奇的乐器重见光明。这套青铜编钟共计64件——它们高从8英寸至5英寸不等，重477磅——按形制之不同，全部编钟以大小和音高为序编成8组。每一件乐器与在西雅图展览的一样，有两个不同的乐音。绝大部分钟上刻有铭文，精确地载明相应的音键，指出声音的高低在青铜器铸造之前已进行了校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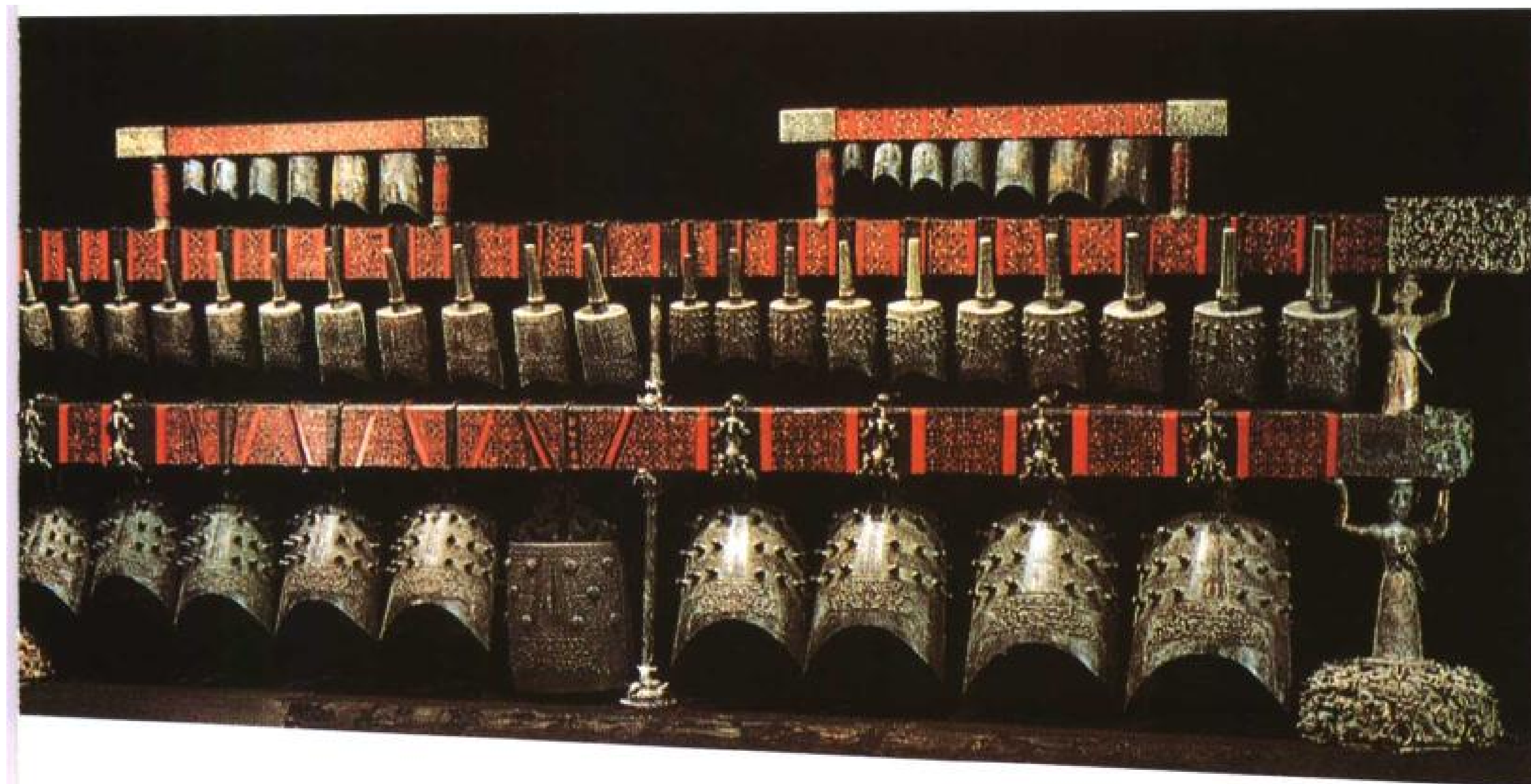
这套编钟属于曾国国王曾侯乙，曾国位于楚的南方，与强大的楚国有密切联系。编钟于公元前433年作为曾侯乙的随葬品埋入地下，而令人不可置信的是，当墓被打开时，编钟仍在它们原来的位置——钟朝下悬挂在由6位佩剑青铜人的手托着的华丽T形木质横梁上，排成三排。坚固的木质构架支撑近3吨的重量逾2000年。不远处发现的木质打击器具说明一些音乐家曾演奏过这些乐器。

编钟并不是曾侯乙惟一的随葬乐器。在他的墓穴出土的7000件文物中，有鼓、琴、排箫、口琴和笛等27件乐器，是周朝时一个乐队的典型乐器。乐器的附近，考古学家们进一步获得了更多的曾侯乙生前喜爱音乐的证据——21具年轻妇女的遗体，其中一些很可能是在曾侯乙生前为他表演的乐师和舞女。她们生前取悦于曾侯乙，在曾侯乙死后显然也成为了殉葬品，这样，曾侯乙在来世也能够继续欣赏她们的表演了。





■ 在齐脚踝深的泥泞中，考古学家正在为1978年在曾侯乙墓穴中发掘的64件青铜编钟取证(右上)。这些编钟令人吃惊地保存完整，编钟(下)在展出之前只要再造一件漆绘木制横梁。演奏时，第二排编钟主奏，底部较大编钟伴奏。





亦有证据表明,当有战事时,曾侯乙不是一个无所作为的人,在其中一间寝陵中有大量的军用钺、矛、戟、梭镖、弓、箭、盾、盔甲和3000余个青铜箭头。

很显然,曾侯乙是他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他生活在东周(公元前771年—公元前221年),以此名称区别于在它之前的周——西周(公元前1050年—公元前771年)。历史学家用公元前771年作为两个时代的分界线,因为这一年周朝国王将都城从西边的西安迁往东面的洛阳,以图摆脱西边野蛮人入侵的压力。在东周统治的550年间,技术、艺术和文化都发生了巨变,这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但它仍然是一个政局动荡、战争频繁,并且破坏性很大的时期。学者们估计,在这一朝代中只有五分之一的的时间没有战争。因此,当时不断的大规模野蛮战争和霸权强兵成为主宰,约有170个诸侯国陷入战争中。

历史学家将东周分成两个部分:春秋时期(公元前771年—公元前481年)和战国时期(公元前481年—公元前221年),它们的名称来源于两本书——《春秋传》和《战国策》。前者指的是一部关于鲁国的简明编年史,它记载了从公元前2世纪中期以前至公元前481年间的鲁国历史。当时历经百余年的东周被更强大的邻国并吞,只有7个主要的诸侯国和一些小的王国幸存。《战国策》是一本轶事和寓言集,叙说随后几十年间7个大诸侯国以前所未有规模的战争相互吞并。秦灭六国后,绝大多数国家的历史记录都被毁坏了。但是,在公元前2世纪早期,一些学者开始凭记忆重新修史,并且将动荡岁月里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最杰出的一位儒家学者左丘明广泛收集东周时期历史事件,向他的女儿口

曾国国王 曾侯乙之墓

HOUSE OF
ETERNITY FOR
A MARQUIS,
RULER OF
THE LOST STATE
OF ZENG

历经千年,曾国的具体位置仍困惑着学者们。在中国历史记载中,曾国与其他两个国家联盟推翻了东周。1978年,在湖北省擂鼓墩,考古学家们不仅确定了曾国的具体位置,而且发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随葬品及结构复杂的墓穴。

巨大的墓穴长68英尺、宽54英尺,有15404件文物。在这些珍贵文物中,包括兽形青铜器物和图案独特的祭器;装饰玉器、碗、杯、匙、金扣、木制和竹制漆器;整排的武器和乐器。

从青铜器铭文可以明确地判断,墓主人为曾国国王曾侯乙,逝于公元前433年。墓内的竹简和用丝线串成卷的木简上,记载了日期、祭祀仪式和随葬物品清单,这些都是曾国国王墓穴中的典型物件。一件漆器盖子主要部分上的图案和文字表明了早期中国人对天国场景的想像。

围绕确定曾侯乙身份的努力并没有白费。4间木制陵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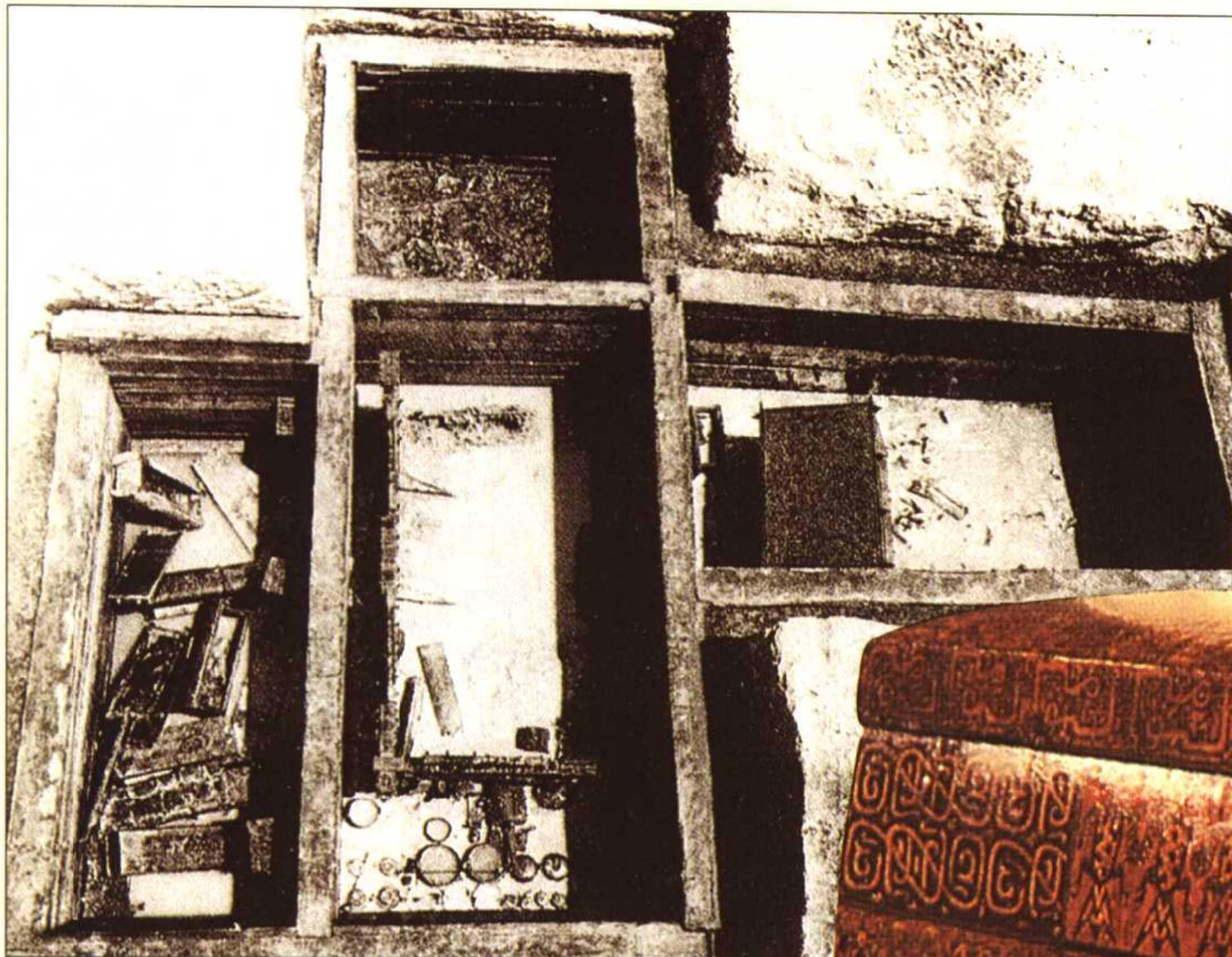
表明这些房间为宫殿，曾侯乙的遗体被放置在这里，并有8位女性和一只狗作为陪葬。中央大厅放置了用于演奏音乐的全套乐器及祭祀用的器皿、盆、碗及装酒和食物的篮子。它们像是为准备一场宴会而排列有序。邻近正厅的寝室有更多的殉葬者——13位年龄在15至25岁之间的女性。考古学家们推测，她们中的一些人至少精通音乐，并曾为曾侯乙演奏过。

■ 一件盛有食物和汤的金铸器皿——有盘纹的碗和盖，是曾侯乙的陪葬品。勺子的透雕细工表明它曾用来捞起汤中的食物。



■ 盘旋弯曲的龙装饰着这个精美的青铜尊盆，在曾侯乙的礼器中，这是一件用中国古老的失蜡法铸造器皿的典型物件。它将中国使用这一技术的时间提早了32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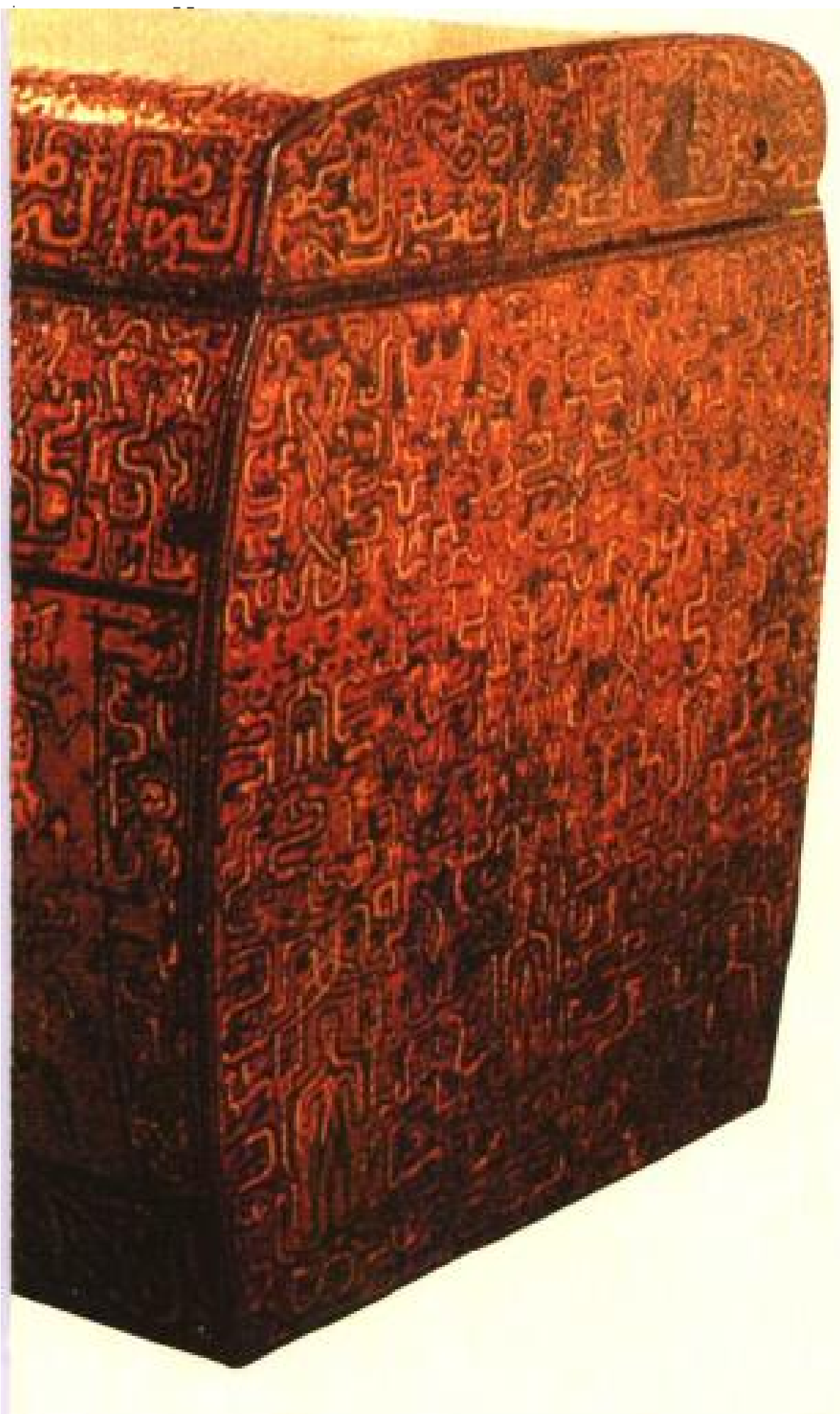




■ 这件漆衣的主要部分展示了中国最早的天文地图、28 星宿的名称围绕着大北斗七星这几个字。四个动物中的两个是所谓的定向的青龙主东，白虎主西，位于此图之侧。



■ 曾侯乙的陵墓由4间陵寝组成。右边的房间收藏他的陪葬品，邻近的寝室储藏的是乐器，下一个门边立着13位妇女的棺柩，最小的房间是武器库。两具棺柩装着身着丝绸衣服的曾侯乙，外棺由木材和青铜制成，内棺(如下)纯由木材制成。两具棺柩都有精美的漆绘。



述，并让她作记录，写成了不朽的著作《国语》。

其他伟大的著作，包括《诗经》，该诗集收录了从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反映悲欢离合的诗歌。稍后，公元前1世纪初，记载东周时期丰富历史的《史记》出现了。这本影响深远的著作的作者，是汉代伟大的史官司马迁。该书记录的历史上迄东周，甚至更早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书中的赞(作者的评议)和表(按时代顺序记录历史的图表)及传(伟大历史人物的传记)都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当时的历史。最近几十年考古学家扩充了书面记录，从大量的古墓中复原的证据和有关战争、祭祀、狩猎场面描写的文物，帮助20世纪的学者们补充了以前历史资料中缺省的历史细节。

除却动乱，东周统治维持了近830年，长于中国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朝代。然而，由于王朝命运的改变，国家发展缓慢。在春秋时期，周王的统治力量被削弱，他的势力范围仅及于王城附近的极小区域，即在今河南洛阳附近的都城。由于此时周王的实际统治版图极度缩小，影响力也极度衰微，被认为是一个傀儡，但他仍然从祖先那里世袭了天子之名，并且获得了属下侯国形式上的尊重。在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771年，曾一度为拥有最大版图的周帝国的统治者。

到了东周时，其统治范围日益缩小。春秋初期，有大约170个诸侯国，传统上仍在东周辖下。其中一些诸侯国疆域宽广，而其他许多国家仅只拥有弹丸之地。随着周王朝统治政权日渐势微，这些诸侯国要求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历代国王将土地分封给他们的子孙、亲属以及大臣，这些受封的人作为封地的所有人，成为了封建地主。在这种封建体系初创的全盛时期，拥有爵位



继承权的主人们又将土地分封给他们的亲属和属下，并以领主的身份树立个人权威。他们的属下又以相同的方式把土地分给他们的部属。周朝统治者为了显示他们的权威，给其辖下的有影响的属国统治者分封了不同的爵位——公、侯、伯、子、男。由于分权过多，这些属国之间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争斗，权谋之争随之而起。

从曾国国王侯乙墓中发现的文物，揭示出最高统治阶层之间的这种利益之争。它们显示地位较卑微的封地统治者也能过显赫的生活，并得到非凡的尊重。虽然如此，曾侯乙陪葬的青铜器上的铭文仍暗示出旧的统治秩序正在迅速改变，周王不再是最高统治者。事实上，曾国也许是其强邻楚的附属国。公元前433年曾侯乙逝世时，楚国的统治者已获得王的称号很久了，其他主要诸侯国的统治者在一个世纪内也相继获得了王的称号。

春秋时期，独立的小国不断地减少，强大的王国征服弱国，并使之成为附属国。取得各国联盟领导地位的统治者被称为霸主(盟主)。地处山东的齐国国王齐桓公就是以这一方式取得了霸权。齐桓公率领盟国击退了游牧民族的侵略之后，接受了盟主的称号。此后，齐桓公拥有了调解盟国之间争端、命令盟国共同抵抗野蛮民族入侵的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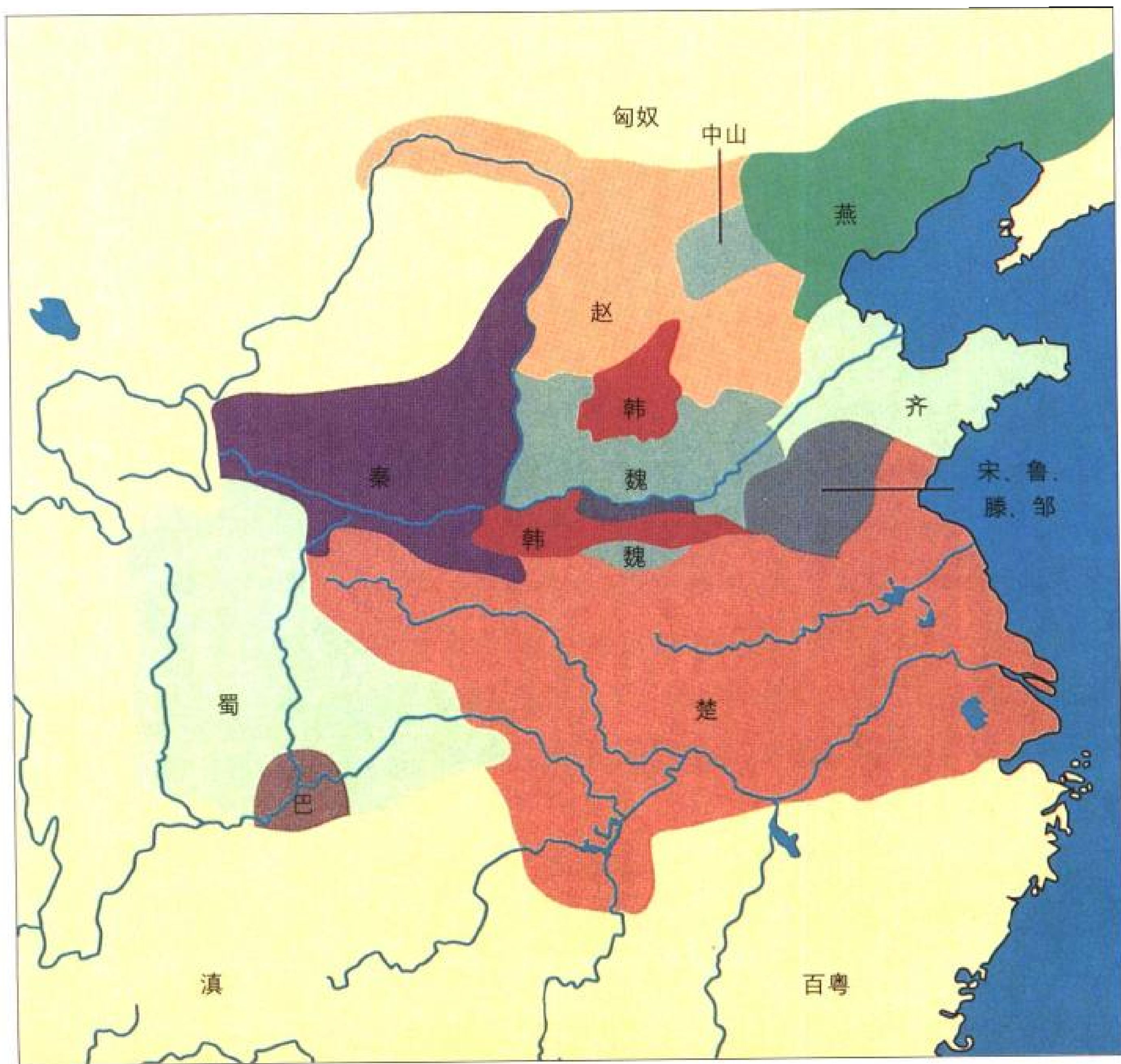
在齐桓公较长的统治期间(公元前685~公元前643年)，他发动了至少28次战争。公元前656年，齐桓公成功地率领盟国对抗南边的楚国。他率盟国定期向周王朝贡，以此削弱楚国的力量。显然，齐桓公只是将这种朝贡当成一种形式，而这种形式使得周王仍存天子之名，而齐桓公看起来是他最亲近的臣下。

就这样，周王仍维持着他的天子之礼，盟主继续在分封及礼仪方面征询他的意见。如果有朝一日其中的一个侯国强大到能对抗所有的国家，齐桓公想像自己就是那位主宰者，事事以盟主身份行事。这种梦想因为他的去世而化成泡影。自此，齐国丧失了

盟主的统治地位，而新一轮争夺盟主之位的斗争开始了。直到公元前5世纪，主要诸侯国不再维持对中央政权形式上的尊敬，纷纷卷入争霸的斗争旋涡中。

随着周朝统治的土崩瓦解，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地主阶级之下产生了一个叫“士”的新阶层，其成员由小地主的后裔或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管家、小官吏或职业武士组成。春秋末期，各诸侯国依赖于这一统治阶层，逐渐变得强大，而其中一些士人则通过进入权力中心获得权势，成为了文臣武将。随

■ 在变化无常的东周时期，各国间的版图经常改变。此图大致为公元前4至3世纪战国时期17个主要诸侯国的疆域图。秦于公元前221年成为胜利者，将所有的小诸侯国组成统一的政权。



着各诸侯国的迅速发展，急需更多的管理人才，这一形势为许多有能力的士人提供了机会，使他们成为新政权统治的中流砥柱。

与此同时，各诸侯国军队的组成人员也在缓慢地发生变化。在春秋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参加战斗的主要是下层贵族，他们不像平民那样受过剑术、箭术、驾车的训练。从农民中征召的士兵主要充当步兵。

贵族们注重战争中的指挥礼仪。一场凶残恶斗的战争是野蛮战争的标志。在“文明”的中国，战争被视为大规模的绅士决斗，是忠诚、性格、技能的考验。从士人中涌现出的大批人物将战争中的这些贵族观念日益冲淡，士人们被教导坚持适当的礼仪以实践贵族的决斗艺术。战争开始前，双方的指挥官礼尚往来。例如，据载公元前632年，一位楚国将军是这样挑战秦统治者的：“阁下愿意(允许)我们的骑兵和你们的骑兵展开一场游戏吗？”

在近两个世纪的时期，这种文明战争的主角是战车，每一辆车由二至四匹马组成，并且由三名战士驾驭，包括一名驾车手和两位射手，这种车一般有十名步兵掩护。随着诸侯国的强大和数量的减少，战车的规模不断增大。公元前589年，晋国曾为了一场较小的战斗，配备了800辆战车，共出动2400名战车手以及8000名步兵。

最近几十年，考古学家们在东周贵族葬地发掘了大量的士兵及马的骸骨。20世纪30年代在琉璃阁发掘卫墓时取得了重大的发现。挖掘者发现了装有19辆战车的大坑。大部分制品都腐烂了，但是金属和结构配件仍原封不动地躺在原处，使战车能精确地复原。

通过考古发掘，表明战国时期的战车在图案、配件和机械部分有了很大提高。老式战车的车轮沉重而笨拙，新战车有26根轮辐，圆形轮子，提高了它们向旁边挺进的能力。战车中的马仍使用不会使其窒息的颈项与铠甲。周主要诸侯国的多数军队整齐肃



穆，成千上万的战车整齐地排列在战场，青铜配件和装饰图案熠熠生辉。少数车辆的青铜部分装饰着金银和木制彩色漆绘。

由于战车越来越难以应付日益激烈的战斗，而且战车造价昂贵、作战效能低，这使其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分量越来越轻。到公元前6世纪，战争环境使得战争开始向技术方面转变。战斗移至人口众多、战车适应的黄河沿岸的中央平原和中低山谷。不断扩张的国家日益发现，他们的战场逐渐向完全不适合战车的山谷和沼泽地带转移，他们在战场上需要一种全新的力量。公元前6世纪，战争开始转向单一的步兵作战。终于，所有的主要诸侯国都建立了几乎全是从平民中征召的步兵，这些步兵装备有双刃剑和矛等兵器。

到公元前5世纪，骑兵作为一个兵种进入战争，较

■ 一件青铜容器的盖子上显示的是战争中梳顶髻的战士击败了有辫子的对手。脚掌大的盖子上反映出新式战争的功绩，如骑兵和箭弩在战国时期的发展。此容器过去常用来装贝壳类的货币。



之战车更加迅速和自由，其作战效能在战争中贡献极大。北方诸国，包括秦、燕和赵，吸收游牧民族的骑兵战术，甚至改穿了欧亚大草原野蛮的西西里亚骑兵的着装——束腰、裤子和尖顶的骑兵帽，这些诸侯国也因此迅速变得强大起来。

至公元前290年的春秋时期，不少于110个诸侯国被消灭或吞并。结果，许多贵族失掉了贵族地位。但是，这一时期较之后来的两个半世纪仍相对安稳平和，早期战争经常只涉及单一的主要军事力量，战争也常常以失败一方的聚会和商议休战而迅速结束。至战国时期，虽然战争数量减少，22个诸侯国的势力仍在削弱，但冲突加剧，持续的时间更长。这一时期的战争不再是弱国之间的对抗，而是强国之间的吞并与反吞并。强国拥有的强大武装力量，使战争的相持时间延长，常年不息。

对步兵的大量需求第一次为下层阶级冲破旧的社会障碍，进入统治阶层打开了大门。职业军人在社会阶层中迅速崛起。同时，没落的贵族因为无能其社会地位逐渐降低，许多贵族在战争中被俘虏后，就失去了他们所拥有的社会地位。胜者为王，因为战争是事关生存与权利的你死我活的战斗。那些在战争中表现突出的人不论其原来社会地位如何，都能获得财富。国王们赐予“士”广袤的土地，赐予平民一官半职，赐予奴隶以自由，奖励那些在战斗中有突出贡献的人。

在一些国家，许多籍籍无名之辈开始出将入相。最高的军事准则以军事家孙子的经验为标准，他也被称为孙臆。因为某种莫须有的罪名，这位出身低贱的魏国人被施以锯掉双脚的刑罚。后来，他因卓越的军事才能被齐国征召，成为战国时期最重要的军事家之一。尽管新兴的社会阶层挑战贵族世袭制的根基，但仍加强了集权统治。在第一个主要的诸侯国只有一个主要的朝廷，被它承认的国王能够提升或贬罚官吏(不管他是否愿意)，打破世袭权利，将刚夺来的土地划分成行政单元，由指定的官吏管辖。最

后，甚至连世袭的领地也被重新划分为这样的行政单元。

这种变化对农民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毫不奇怪的。农民被征召到军队里，这对他们的家庭来说意味着劳动力的丧失，他们甚至得负担军队里的衣服开销。而那些仍在后方劳作的人则为了支付因战争和修筑城墙、道路、运河而带来的沉重负担。古老的封建制为农民提供了少许的保障：如果农民在收成好的年份向地主交了租，在收成不好的年份，他租种的土地将不会被地主收回。在不能上缴赋税及高利贷的情况下农民将失掉租种的土地。由于战争不断升级，战争也许持续一星期多，攻打一座城池将持续数月，战国时期没有相关的伤亡统计，但人们确信，获胜的军队不是将战俘带回国，而是代之以大批杀戮时，有数百万的人死于战争。例如，《史记》记载，公元前260年，秦国在征服赵国的长平之战中，大约有45万战俘被埋葬在大坑里。

证明这种大屠杀的证据尚未出现。尽管一位中国考古学家指出，20世纪30年代可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大墓穴，当人们挖开辉县地区琉璃阁的魏墓时，他们在那儿发现一个浅壕沟里有60具全部被斩首的尸骨；一些射中肋骨的箭头表明他们是大批被埋葬的俘虏。

尽管人们憎恶战争，但它提供了一种创新刺激的原动力。在春秋时期，战争防御需要建造高大坚实的城墙和烽火台。这种城墙常常由装入巨大木制框的夯实的干土或粘土建成，至今仍存的木框痕迹证明了这种建筑方法。公元前684年丹被齐征服，其都城与国名相同。在丹国的遗址上，考古挖掘表明，在那里曾挖有一条浅壕沟，并且用坚实的粘土夯实作为城墙。其城墙的基础约有12英尺厚，不断升高的城墙由泥土和大量的石头混和夯实而成。每增高一层，都有一定的倾斜度，这样城墙越往上就越窄。

至春秋后期，许多城市修筑得越来越大，以至于需筑第二道

遥远的问候

RESPECTFUL
GREETINGS
FROM LONG,
LONG AGO

20世纪40年代中期，河北省平山县一位农民发现了一块古老的、刻着怪异符号的石头。出于好奇，他将这块3英尺长、2.5英尺宽的花岗岩从河边搬回家，并放在屋檐下。35年后，他将这难得一见的文物交给正在当地考察的考古学家。结果，考古学家发现，这块被河水冲刷了几十个世纪、边缘平整光滑的石头上的符号，记载的是有关战国时代(公元前481—公元前221年)的内容。这使得这块古老的石头成为中国古代历史最古老的纪念物。它两边文字的大意是：皇家鱼池的看守者和墓的监工向后人致以亲切的问候。长期存疑的当地墓穴被证实是战国贵族之墓。

随后，从此地挖掘出的30处墓葬不仅揭示了石头上标识的时期是战国时期，而且更精确地确定了此处是中山王国的都城灵寿所在地。这儿共挖掘出了2000多件青铜器，其中的90件上面有后代在柄上刻上的历代君王的名单，供将来的各代君主处理外交事务参考。

公元前414年北方少数民族国家白狄建立，与中山国发

外城墙作为防御。同样地，领土的扩张使得更大的诸侯国开始修建长城来保护他们的新边防。楚和齐率先行动。现存最长的齐长城从黄河南岸至东边济南海滨，蜿蜒达260里。后来，随着游牧民族日益威胁北边的国家，这些国家用更为复杂的方法修建的长城延伸到了丘陵地带。对现存燕城墙的研究表明，位于今河北与辽宁的东北方国家，在山区用石头修建长城，且烽火台分布得极有规律，士兵们能以此相互通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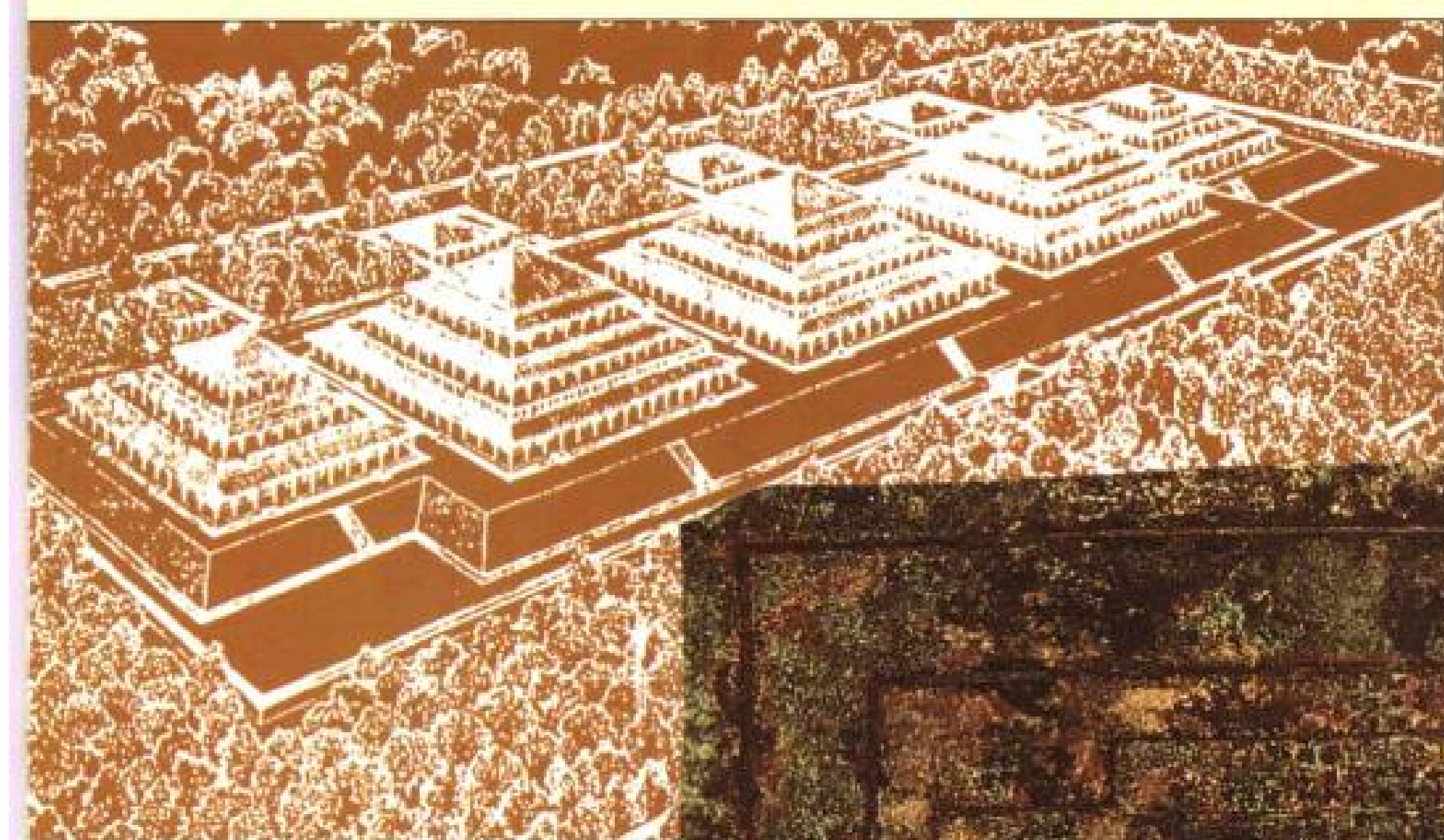
为了满足日益激烈的战争的需要，在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有了很大的发展。传统的武器，如斧、戟、矛、刀、弓、箭都被重新设计或改进，使之更具威力。剑也第一次开始有了大规模的生产。周朝以前，剑在中国并未被广泛应用。那时的剑用青铜铸成，也没有完整的柄。但是，到了公元前7世纪，剑被安上了木头或象牙制成的柄，剑柄缠着丝线或丝带，这样更有助于握剑。剑的护档位于剑柄和剑锋之间。

在周朝后期的墓中可以发现，剑常常镶着玉、金和银。有的剑的护档由玉制成，剑也被装入漆绘的竹、皮革或象牙制成的剑鞘中。

步兵和驭车手使用的钺，出现的年代久远，这时也被重新设计。在战争场景中被叙述的青铜器械钺，现在有了三种型号：最长的一种型号，它的长度几乎是战士身高的两倍，用来攻击战车和战舰；较短的一种，则在短兵相接时使用；另一种是在原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精巧的改进，在柄较低的位置装上了钩状的叶片。这种钺用途多样，在战场上可以四面出击——既可向前刺，又可向左或向右砍，能够抵御来自身前和身后敌人的进攻。



■ 罍王墓坟墩、储藏室、陵寝遗迹。中山国的征服者在该墓室建成几年后，即打开并抢掠了此墓。



■ 一件镶金、银的青铜饰物上绘制的罍王陵墓详图(下)，这使重建其墓上瓦顶的墓庙宇成为可能。此草图画出了有五个围墙的展示馆，相伴的铭文上刻有其名称、大小和房屋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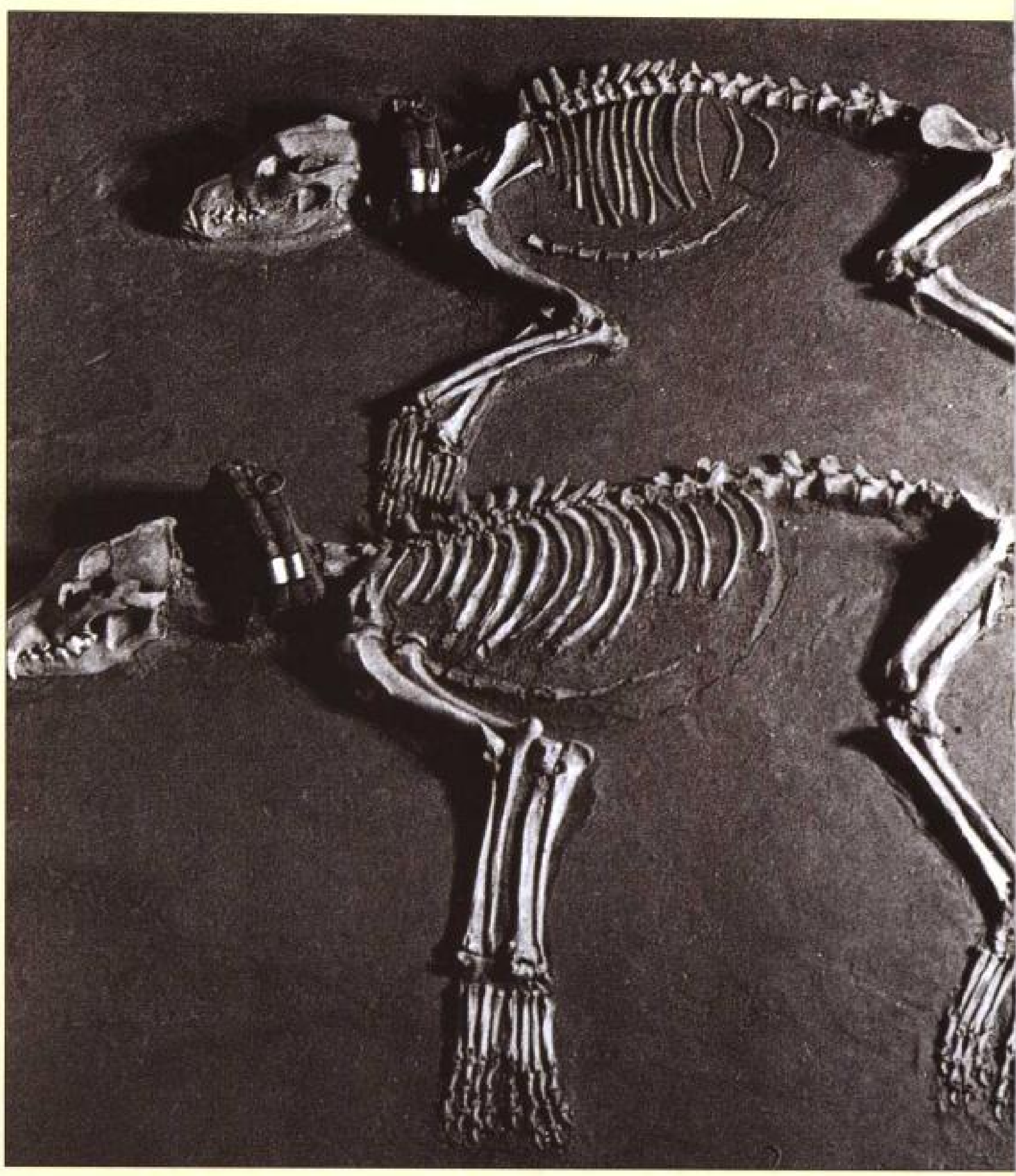




生了激烈的权力之争。曾经为游牧民族的狄，定居于中央平原，并且开始在农业和工业生产方面占据优势。他们的王国强盛起来，并最终以“千骑之国”著称。

其中一座墓穴是轘王的墓穴，他是公元前323年至公元前311年中山国的统治者。挖掘出的证据表明，陪葬的有他的两个王后和一些家臣、马、马车和小舟。在其墓上堆成了一座120码长的坟墩，在坟墩之上是阶梯状的葬礼庙宇。尽管该墓很久以前曾被盗过，但仍从轘王的储藏室发现了不少珍贵的历史文物。其一为雕刻着复杂建筑图案的青铜盘，尽管其比例不十分精确，但它仍为2300年前的墓碑提供了精确的测量方法。

尽管狄族已与中原大地的人们融合在一起，但他们仍保留了游牧民族过去的一些独特习俗。徽章的形状为三叉形的，也许象征山，大量存在于工具、青铜器、陶器中。在传统习俗上，狄族崇拜西边的、作为他们发祥地的山，并将这种山当作防御抵抗敌人的天然屏障。边境上的城墙对于有吞并野心的邻国赵国毫无作用，赵国在公元前296年征服了中山。



■ 沉重的金银项圈戴在两只巨大的像狼一样的“北方狗”骸骨的脖子上，狄人饲养它们用于打猎。在轘王墓旁边发现一辆马车和马，这些狗是在一种集体活动中用来作追逐游戏的，可以想见，当时的统治者过着何等穷奢极欲的生活。

■ 设计成“山”形的青铜徽章散落在国王陵墓附近。放置在木杵顶上,56 英寸高的标志物也许是用来放在宫殿或皇家马车上的装饰物。



在这种致命的军械系列中(第 58 页)还有弩,它在公元前 5 世纪成为兵器的代表,并大约在 13 世纪传入欧洲。根据现存部分再造出来的东周时期的弩,由以下部分组成:带柄的木桩,薄竹片制成的弓,青铜铸成、由四个部分组成的扳机。用脚发射的弩,由于能以非凡的速度发射小而尖锐的金属箭头,因而它很快就成为整个东周军械库中最致命的武器。

当军队被更好地装备起来后,为了满足军队增长的需求,冶金业和农业供给也随之发展了。经济增长也

和加强军事力量一样重要,因此,这一时期在自然资源开发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技术进步。

战国早期,中国已大量使用铁器。有一些证据表明,公元前 11 世纪的商朝就已经开始使用一定数量的小型铁器,但与贵族钟爱的青铜器相比,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认为是丑陋的金属。一些学者认为,公元前 6 世纪,铸造青铜器的原料——铜和锡的短缺,促使周朝开始在一些重要领域里使用铁器。周朝人已经掌握了冶炼铁的技术,包括曾用来铸过青铜器的高效率密封

炉和减压舱，这使得他们能够成功获得熔化铁矿石所需的高温——大约华氏 2800 度。他们从熔炉表面掠去矿渣，然后把熔化的铁灌注到模子里。在西方，直到 1800 年以后，铁器才开始被广泛应用。

最近几十年，许多战国时期诸侯国的铁器得以重见天日。1965 年，在河北省，原燕国的首都下都，一座战国晚期的墓中不仅出土了大量铁制武器，而且出土了铁制盔甲，它由 89 块小铁块组合而成。从这座墓室以及其他的墓室发现的器物显示，那时的人们已能生产高碳铁；当然，其数量并不多，只是用于制造矛

■从中山王𦉑墓出土的一件青铜器酒具，已有 2300 年历史。器皿中甚至还残留有液体，滤掉其中的矿物质后，呈绿色。通过对这种芬芳液体（量杯内，右）的分析，它的成份为酒精、糖和油脂，与今天的饮料成份十分相似。



和戟。

铁除了用来制造武器之外，更重要的影响就是在农业上的运用。在许多铸铁工厂的遗迹和铁器中的发现表明，到了公元前4世纪，铁被用来铸成犁、锄、鹤嘴锄、铁锹、耙、镰刀和斧子。1954年，在河北省兴隆燕国的废址上发现了一个制造农业用具的铸造厂。工厂建在两座铁矿附近，占地近36000平方米，包括用来生产铁制农具的48套铸模。国家控制下的巨大铸铁厂，使中国古代铁器制造向大规模生产又迈进了一步。

因为铁比青铜更脆硬，所以它不需要进行改良。而且铁的价格更低廉，大型铸铁厂能够生产大量的农用工具，这些工具可以代替许多当时仍在使用的木头、石头和贝壳制成的农具。铁制农具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使耕作变得更容易了，农民不但能耕种更多的土地，并且在春天耕地犁田时，能够对土地进行深耕。铁制农具的使用使农作物产量显著上升。

除了使用铁制农具，战国时期还修建了众多的堰堤、排水系统，并开挖了运河，这些农业设施的修建，使摧毁性很大的洪水对农作物和田地的危害减小了。同时，这些灌溉设施使农业生产扩大到以前不可能进行耕种的地区。当然，这些工程大多是因为军事急需而修建的。例如，公元前486年，吴王为了进攻北方的诸侯国宋和鲁，命令修建一条连接淮河和长江的运河，用来运送军队和给养。近100里长的韩国渠应运而生。直至今日，韩国渠仍然是杭州和北京之间的大运河的组成部分。

公元前250年左右，水利工程的技术水平已经发展到了较高级的阶段。这一年，蜀国委派李冰建成了一项水利工程，即都江堰。李冰建成的这个灌溉网络给成都地区带来了极大的繁荣。该项水利工程穿透了厚厚的岩层，切穿了一条约130英尺的峡谷，使岷江转向，并且利用堰堤、运河和水闸构筑成复杂的系统工程，控制其流速，这使得成都平原大面积的农业耕作成为可能，其面积



大约达6200平方公里。李冰建成的灌溉系统设计非常完美，即使到今天，四川省还在使用都江堰的部分灌溉系统。该工程即使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只是在某种程度进行了一些修建，仍在发挥作用。

据《史记》记载，与此同时，一个类似的工程因政治原因而修建：韩王为了实现向西扩张至秦的雄心，不断进行工程建设。结果，他派遣水利专家郑国去劝说秦的统治者开凿一条连接秦地泾水和洛河的水道。当秦王知道了韩王的阴谋后，水道已完成过半。但是，郑国很自信，最终说服秦王，允许他继续修筑水道。

当这条水渠在公元前246年开通时，它迅速改变了当地的面貌，使之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经济中心。灌溉系统使农业产量增加了五倍，经由水道，可以向急速发展的秦的心脏地带输送大量谷物。

如此巨大的工程产生的社会影响已远远超过那时服务于军事的直接目的。正如人们所想像的，农作物产量的增长，直接导致了人口的增长。尽管当时没有人口调查，但后来的统计数据表明，东周时期人口数从1000万迅速增长至5000万。这种增长是随着开始作为军事要塞、而后又具有了商业意义的大城市的生长而增长的。

战国时期，人口约为10万的大城市很普遍，甚至有的城市人口数比这更多。据说，在公元前4世纪，位于山东北部的齐国都城临淄的居民数约为35万。到公元前3世纪末，与今天的洛阳相距不远的周都城王城，有居民25万。

使人奇怪的是，数个世纪的残酷战争并没有使急剧发展的城市旅游和贸易缩减；实际上，旅游和贸易因

■ 金和银线及镶嵌装扮出生动形象、个性化的中山青铜虎正在吞食小鹿的场景。这是一件非凡的艺术品典范，蹲伏的兽也许是作为一件在很久以前就已腐烂了的木制家具的支脚。



军事需要发展起来的陆路和水路交通而得到了发展。当各诸侯国相互之间不交战时，他们在争夺别国的官员、技术人员、学者以及重要的矿产资源、商品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种高价值体现在商贸方面就是即使国家之间在交战，他们也会达成允许商人过境的协议。而且，随着国家数目的减少，那些强盛的国家能使商旅们在他们自己控制的区域内安全过境，这也意味着商人、技术人员和学者能迅速地在国都与国都之间自由地行动。

货物交换、思想交流也更加频繁。一种日益增长的、最终超越了地区差别的大一统观念开始在各国间形成。

从都城洛阳的大量考古发现证实，这时的都市已成为大规模



永恒的文字

COMMUNICATIONS
ACROSS THE
CENTURIES:
CHINA'S
A GELESS WRITTEN
LANGUAGE

中国传统认为能说会写的人是值得尊敬的，这就像演说技能在希腊、罗马的地位一样。实际上，中国词语里的“文”字，即表示“文明”或“文字”。

尽管汉字复杂的写作系统令人望而生畏，甚至对于一个操本国语的人来说，平均也得花上10年时间才能熟练掌握。但熟悉之后，得到的文化回报是十分丰厚的。丰富的知识通过每一本伟大的中国古代著作向你走来。令人称奇的是，中国文字在2500年内改变甚少，就是现代人读《孔子》，也不会难于读现代的古体诗。

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文字标准化在许多阶段中来源于交流的需要。书写的特点体现于字符，所传导的信息胜于声音，读者不必与作者说同一种方言就能看懂所写的内容。在任何时间内，这种特点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的方言甚至超过100种。事实上，现代读者读古代的文章时，并不知晓古代作者当时的语音。

生产的中心，工厂生产从青铜器到织物等各种物品。有8000件石器被发掘，包括战国时期的各种雕饰和玉器等，它们显然来自同一个作坊。在侯马，一个位于今山西省的晋国大城市，有大量青铜铸器，包括超过3万件的艺术品铸模和数以万计的坩锅碎片及铸造工具、器皿、武器和钱币的模子。

承继商朝的传统，东周艺术家铸造的青铜器物做工十分复杂，而且装饰精美。约在公元前550年，他们开始运用失蜡工艺，一种不同于传统铸模方法生产单个艺术品的精细工艺。运用失蜡技术，他们制造蜡模，并在蜡模里面精心雕刻。然后，以湿粘土完全盖住，做成上面留有小洞的铸模。接着，他们烘烤铸模，使蜡熔化，或从小洞中溢出。把熔化的青铜汁浇注在曾有蜡的模具空隙处。这样，他们就铸造了一件与模的形状一样的青铜器，但最初的蜡模却因此消失了。

艺术家们在金、银艺术品的制造方面同样有着较为高超的技艺，这些金、银制品包括食器、酒器、项链、耳环和皮带扣环，还有做成人、鸟、兽形状的各种装饰品证明了这一切。这些属于上流社会的豪华饰品很少被发现。对于贵族们来说，玉



■ 刺绣着龙、虎、凤凰等图案，装饰在有2300年之久的丝织薄袍上非常完美地保存着，埋在楚王墓葬里的35件衣服和被褥，揭示了战国时期高超的纺织技术和手工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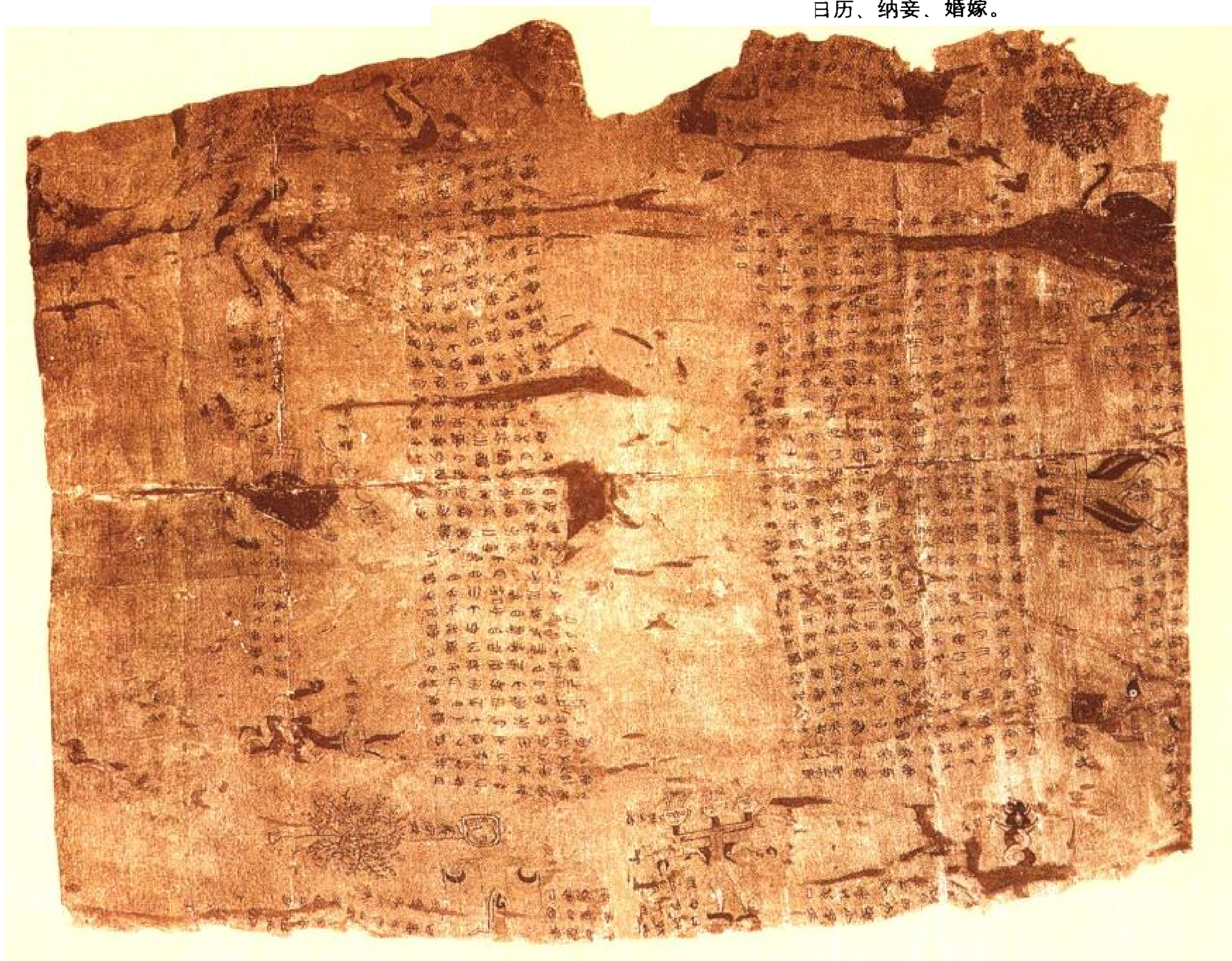
中国文字的起源至今朦胧不清。最早的图形符号出现在公元前5000年或4000年前陶碳纪年的新石器时代。这些中国古代先祖书写的文字显然是世界最早的文字之一，它们与随后出现的商、周时期镌刻在龟甲骨及青铜器皿上的文字特点有着承传关系。

尽管这些例子只相隔几个

世纪的时间。用尖笔刻的铭文产生一种相似的多角形。后来，随着东周时用毛笔、墨水在竹简、木简、丝绸上书写的推广，字体呈现出更多的流线型。

“鱼”字的进化过程表明、解释了书写工具是如何影响行文的(如下页上图所示)，公元前3世纪秦朝的统治者秦始皇对文字书写形式进行了最深刻的改革，使

■ 环绕在柱状物上的奇异神祷文字迹，来自于战国时期一块丝绸原稿。最古老的文字书写例证在丝绸上，它距今2500年，18英寸长、15英寸宽的原稿内容有关日历、纳妾、婚嫁。



𩺰 𩺱 𩺲 𩺳 魚 魚 魚 魚

文字绝对标准化,以便实行中央集权制。这种文字流传至今,只作了些许的改动。

在一定程度上,文字的发展有赖于其职能的改变。古代书写常用于占卜(刻在龟甲兽骨上)、王位承传、墓葬名录,后来逐渐开始容纳更多的内容。符号开始向复合形式发展,其组成是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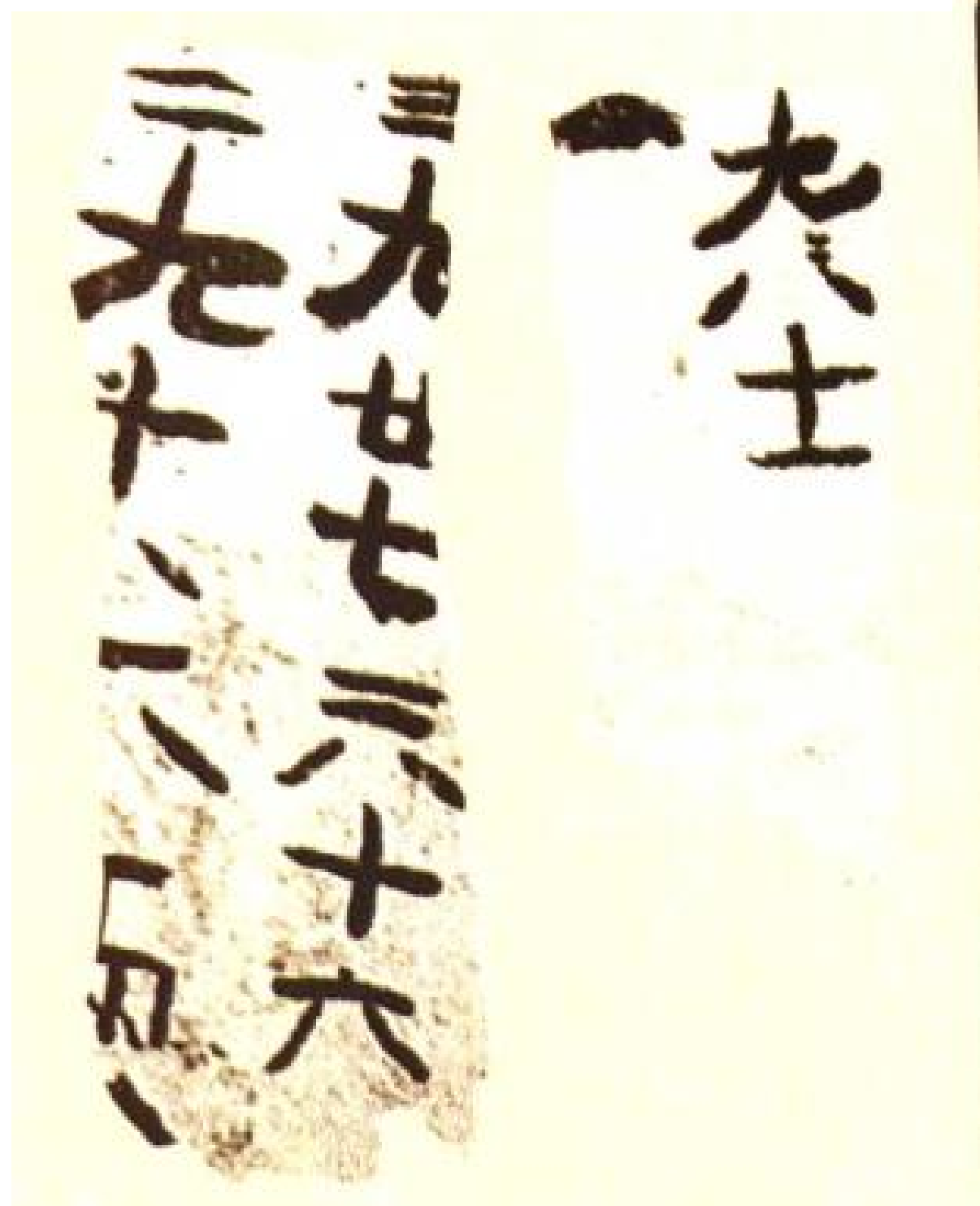
独体字和修饰部分或两个独体并排。例如,“妇”和“孩”的特点都有“好”或“可爱”的意思。今天,新的概念“激光”,来源于“刺激的——光——管”,因为这种构词方式,中国字典条目由古代的2500条发展到现代超过50000条。

尽管只有5000个字在日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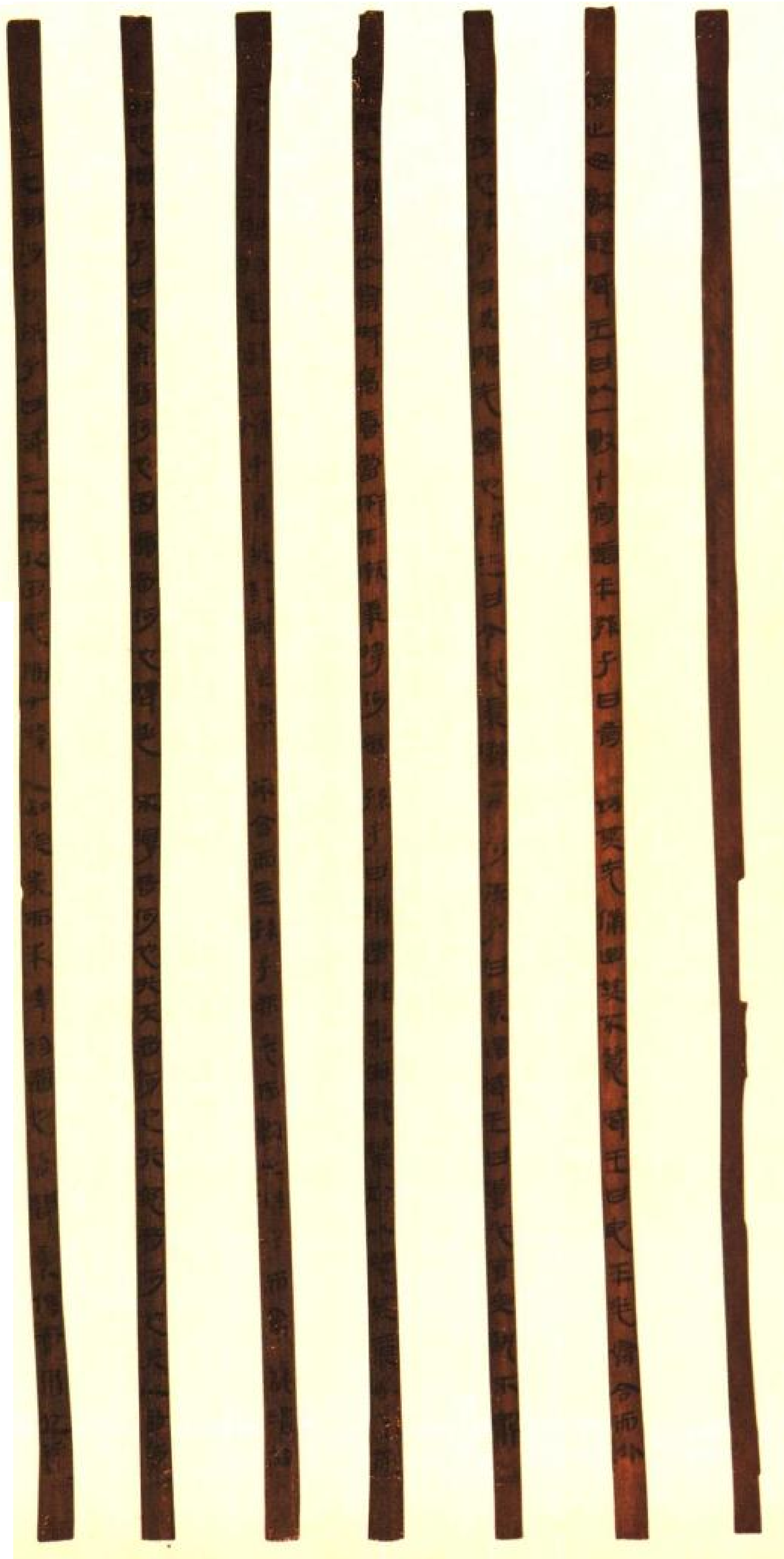
读写中是必需的,改革派仍抱怨对大多数人来说,复杂的文字使人不能快捷交流。在数千年后,人们已开始试图简化文字,对于儒家理想“普天之下,车同轨,书同形,行同伦”的威胁已初露端倪。

■ 用于书写的度量衡、毛笔、墨和空白竹片装在书写箱里,至今发现的最古老的、距今2500年的毛笔,由兔毛绑在木竿上做成,并且带有丝线,涂上了油漆





■一段公元前400年至300年的原文涵括了最早的乘法和除法表。图示算出了人们熟知的 $2 \times 9 = 18$ 和 $3 \times 9 = 27$ 。



■书写在竹筒上的秀丽文字，出土于山东省的西汉墓。竹筒上所示内容涉及战争的艺术。尽管提供了一些具体的战争策略，该文总结出预防、阻止战争的最好方式是“永守诺言，永保国昌”。



被雕琢成项链、头饰、皮带饰物及鸟、动物、几何图形，是最自然的选择。这类制品，不管它们曾是多么小，都凝聚着匠人们长时间的劳动。

晶莹连结的玉石使得艺术家不能用普通的工具雕刻；他们得去掉玉石的外表，将它们磨碎成粉末状，或打磨成深褐色。

漆艺在商周年间也已趋熟练。东周时期，漆艺被更广泛地运用，技术有了进一步提高。漆艺被运用于木质材料、金属，甚至在皮革上。例如，盾牌是用展开的皮革固定在木板上，并且用松脂一层层将其拉紧。

复杂的图案来自于基本图式，如动物、龙纹，或云气纹，然后以黑、黄、褐、红等色油漆到盾牌上。

一些发掘出的丝织品证明，东周时期纺织技术是相当高超的。现存的这一时期的这类文物上都刺绣或织成各种装饰图案，包括连结在各种方式及几何图案中的神化的动物龙和凤。这个时期留存下来的任何丝织品都是一个奇迹。

1982年，考古学家在麻山，即现在的江陵西北发现了一座位于砖瓦作坊上的楚墓。打开棺木，赫然发现一位裹着13层、有着复杂图案、色彩鲜艳的丝绸衣服和彩色被子，用9根丝带系住的妇人。这位妇人穿着一件衬袄，锦缎裤子，一条裙子和两件丝织袍子。她的脸上覆盖着梯形的丝绸手帕，拇指和手臂系着丝质带子。

尽管丝绸首先是作衣服和家用，如被子和包，但它有时也用于书写。丝绸具有质轻易卷、便于携带的优点。但是，它不易保存，并且价格昂贵，还没有被广泛应用。所以，仅只一件这个时期有书写内容的丝绸被发现——1940年手稿在湖南长沙子弹库一座楚墓里被发

百家争鸣

ONE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尽管战争纷纭，社会动乱，东周时期在人类历史上仍然是一个充满活力与智慧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哲学流派激增，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这个时期诞生的最有名望的哲学家是孔子，后来被尊为孔夫子。17世纪，孔子的有关著述被后来的基督教传教士译成拉丁文。有感于社会动乱、礼教的没落，孔子寻求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良方。通过自学，孔子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能量，遵循周早期的传统礼仪，长幼有序。中庸和责任感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他主张：“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作为一个实践主义者，孔子以有教无类实施他的教育理想。在他大约50岁时，出任鲁国行政长官中都宰，在他的任期内，犯罪率降低，而且据说到了路不拾遗的程度。但政治争斗最终迫使他离开了这一职位，孔子将他以后的岁月都献给了教育和写作。

《论语》是一部收集其言论的著作，成书于孔子死后。它系统地论述了伦理、政治和个人行为规范，并且描绘出遵循这些规范能实现的个人和社

会的理想蓝图。

道家，是在动荡不安的周朝应运而生的另一个哲学派别。

其创始人老子，据说其母怀胎62年后才生出他来，出生时已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老子的著作《道德经》，反映了道家的哲学理念：无为。他主张的“无为”就是“无不为”。《道德经》是被翻译得最多的中国著作，它在其出现2000多年后，被译成多种文字风靡世界。

■ 孔夫子



现，随后其成为了私人收藏。

正如战争和统一鼓励技术发展，它也刺激智力活动。学者们转向研究哲学，以重新审视自然和人性，为了和平、稳定的社会，追寻全新的信条，统治者们觉得为了战争和促进经济，以及建立一个更加稳定、高效的社会，必须树立具有新思想的思想体系。他们为了规范人们的基本行为，也必须寻求这样的思想家。他们希望由这样的思想家来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准。在统治者的支持和鼓励下，中国的哲学蓬勃发展起来。例如，公元前4世纪晚期的齐宣王采取了一项重大的举措，邀请本国国内的1000名知识渊博的人士到首都定居。对这些学者不加限制，以便他们能在空闲时间里无拘无束地谈论哲学问题。

新的学者主要来自于士阶层。许多士人在各国间漫游，为那些愿意听取他们意见的统治者服务。哲学家开始崭露头角，有一部分开始关注抽象的哲学问题，如生命的意义等主题。但是，绝大部分东周哲学家对普遍渴望的和平作出回应。他们系统地论述、构建理想社会的伦理、政治、经济问题。

这些学者中的佼佼者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在今天仍广为人知。继孔子之后，荀子（公元前298年—公元前230年）主张性恶论，认



为必须通过后天的教育、伦理训练和严格的社会规范来改造。因为自身所处时代礼法崩溃、充斥暴力，故而人性必须经过严格而规范的礼仪来引导和塑造，性格必须以良好的习俗来规范。

荀子门徒中的一些最终成为鼓吹学院哲学的法家学者。他们认为，改造人们的行为不仅需要依赖于教育，亦需要由严格的法律规范来控制，并且严厉制裁违法者，奖励顺从者。更为激进的是，他们反对儒家的君主继承权。相反，他们信奉国家权力与法纪，提倡绝对服从中央政权。而且，他们认为，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廩实而知礼节。用此方法，他们认为国家会变得强大起来，并且能征服所有的反对派，统一中国，结束混乱，构建法制与有序的社会。

以法治国的极端哲学流派法家出现了，公元前361年，秦国全方位地实施了商鞅的法家思想。商鞅曾是秦的宿敌卫国的官吏，处在不能成功实现他理想的职位上，他将他的忠诚献给了秦国国王秦孝公，并且助其收复了早些年丧失给卫国的领土。

商鞅帮助秦孝公以法治国后，很快获得提升，并在公元前359年至公元前338年任左庶长。在他的指导下，秦国实行酷法治国，在农业生产和经济上也取得了成功。最终，秦国所有的男性公民都被组织起来，接受良好的军事训练，成为在有战争需要时能被征召的农民士兵。

在秦孝公统治下，商鞅成功地保持了大量军队，他也是一位在对抗卫国的战争中取胜的人。但是，当秦孝公在公元前338年逝世时，这位强人的法学家的劫数已到。早些年，商鞅曾招致王位继承人的嫉恨，新王继位后，他被诬叛国。商鞅为此逃亡，但未获成功，后被车裂而死。

战国时期，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冲突后，除了一些次要的小国，到公元前403年仅保留下7个主要的诸侯国：韩、魏和赵，三个位于中心的诸侯国在公元前5世纪末瓜分了位于今陕西、河北和

河南省的晋；富有和古老的齐国雄踞山东半岛东北部；都城靠近今天北京的燕；还有强大的楚国和秦国。

楚，占据着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的南方中心王国，吞灭了春秋时期近40个小国，成为公元前6世纪中国南部最强大的国家。在为数众多的楚墓里，充斥了豪华而价值不菲的高级工艺品，仅在湖北省，就有2000多座墓穴被发掘，并且在湖北和湖南发现有大型的楚墓。这些墓中不仅有丰富、精美的青铜器皿、漆器和玉制饰物，而且还有珍稀的丝织物、帛画和竹简，仅在一个缸中就有392枚金币。

除了这些珍贵的文物，楚国文化亦闻名遐迩。楚国最著名的人物是诗人屈原，他在战国末期曾担任过楚国的左徒。楚国一度是秦国唯一的竞争对手。屈原曾警告楚国统治者，提防秦国的外交侵略。古老的民谚说：“将领土拱手送给秦以求和，无异于引火自焚。”

屈原的反对无济于事，并且因此被削掉官职。在被放逐中，他写下了最著名的诗篇《离骚》，其中有这样的诗句：“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但是，屈原放弃了，世人皆醉而独醒的屈原自沉汨罗江而死。直到今天，中国仍在农历五月五日以每年一度的龙舟赛来纪念他。

在当时，楚国和秦国都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半野蛮地区。秦横跨在中国和中亚主要贸易线上。公元前771年，周王曾征召秦国协助抵御历史上曾迫使周王东迁洛阳的野蛮民族的进攻。秦国在有名的撤退中大获全胜。作为补偿，周王赏给秦国陕西省渭河流域大片肥沃的土地。土地的重新分配改变了诸侯国的命运。自此以后，秦的扩张野心不可遏止。到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秦国成为中国最强大的国家。

也许，秦的崛起应归功于西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入侵。为了抵御他们，秦国在战争之后组建了精锐的骑兵以及强有力的中央政



■ 中国最早的帛画，画面上有一位贵族，也可能是墓主。画面反映了想象中的升天情景。此画表现技巧上线条雅致，画中人物高冠长袍，腰间佩剑，驾驭飞龙，两侧有神鹤与鲤鱼引导。

权。但秦国同时拥有大量步兵，因而与楚国对峙时形成了这种局面：秦国和楚国最终都拥有百万步兵，这使得战争中战线有时绵延达数百公里。

短时间内，六国的反秦联盟阻止了秦的东进。令人遗憾的是，各国联盟仅维持了15年。因为六国虽然嫉恨秦国，但它们互相间更加猜忌。根据《战国策》，每个国家都犯了为求休战而贿赂、取悦秦国的致命错误。最终，六国联盟土崩瓦解。

公元前256年，战国时期剧变时刻到来。秦军横扫中国大部分中心平原地区，征服了衰败的周王朝，结束了周朝名存实亡的统治。然后，秦军向南、北、东进军，征服一个又一个的大诸侯国。古老的封建帝国周朝寿终正寝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一个主要的政权控制了全中国，它的版图从长江流域直至北方大草原，与中亚和东海接壤。未来已成定局，一个有着良好农业和工业基础，带有显著中国文化特色的统一的中国很快就将出现。

沙漠中的考古

CHINA'S DESERT TIME CAPSULE

世界上最非凡的考古区域往往不为人知，且人们很少造访。偏僻的中国西北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此。但是，它的被发现应回溯到20世纪初，瑞典探险家和地理学家斯文·赫丁和他的五位同事依靠一张勘察地图，开始探察广袤、危险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偶然发现了孤寂的废墟。这使赫丁相信传说中这一地区毁灭的城市和埋葬的珍宝也许确有其事，并且在这些日子以前，他将调查重点放在已堆满了沙子的建筑物上。

1900年3月28日下午，赫丁观察到9英尺高的木制房子，部分被侵蚀的土堆。他们检查了木屋，移开一些中国古代钱币和工具，然后匆忙赶回大本营，将锄头留下。到达废墟遗址后，一场猛烈的沙暴袭来，一座巨大的干砖房暴露出来。这就是1500年前埋在风沙中的楼兰要塞——一个曾经繁荣的绿洲。

楼兰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中丝绸之路上繁荣的商旅驿站和贸易中心之一。在它的全盛时期，该地有邮政点、医院、学校和中央政府。到了它全盛的顶峰期——汉代和其后的两个世纪，楼兰和其他绿洲城市及居民点拥有比赫丁想象的更为悠久的历史。

从罗布泊沙漠地带发掘的新石器时代工具和器皿，揭示公元前8000年的气候比今天更适合人类生活，猎人们聚居于此。另外的证据表明，该地区自青铜器时代就已发展得较为繁荣。

尽管塔克拉玛干沙漠曾有数千年作为人类的定居点，但当这



■ 1915年，探险家奥拉尔·斯坦发掘了一具被中空的柏杨棺木环绕着、身着寿衣的男性木乃伊，这是沙漠地带能够完好保存尸体的良好例证。斯坦写道：“尸体全身的皮肤紧紧贴在身上，尸体散发的气味仍然刺鼻。”



一地区变得日益干燥时，那里的生活条件亦日趋艰难。“沙漠”一词的维吾尔语意为“进去了就出不来”，是许多到过该地的人的共同记忆。赫丁认为，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上最恶劣、最危险的沙漠”。传说许多整队商旅被英国外交官所说的“大洋里的惊涛骇浪”所吞噬——黄色流沙达300英尺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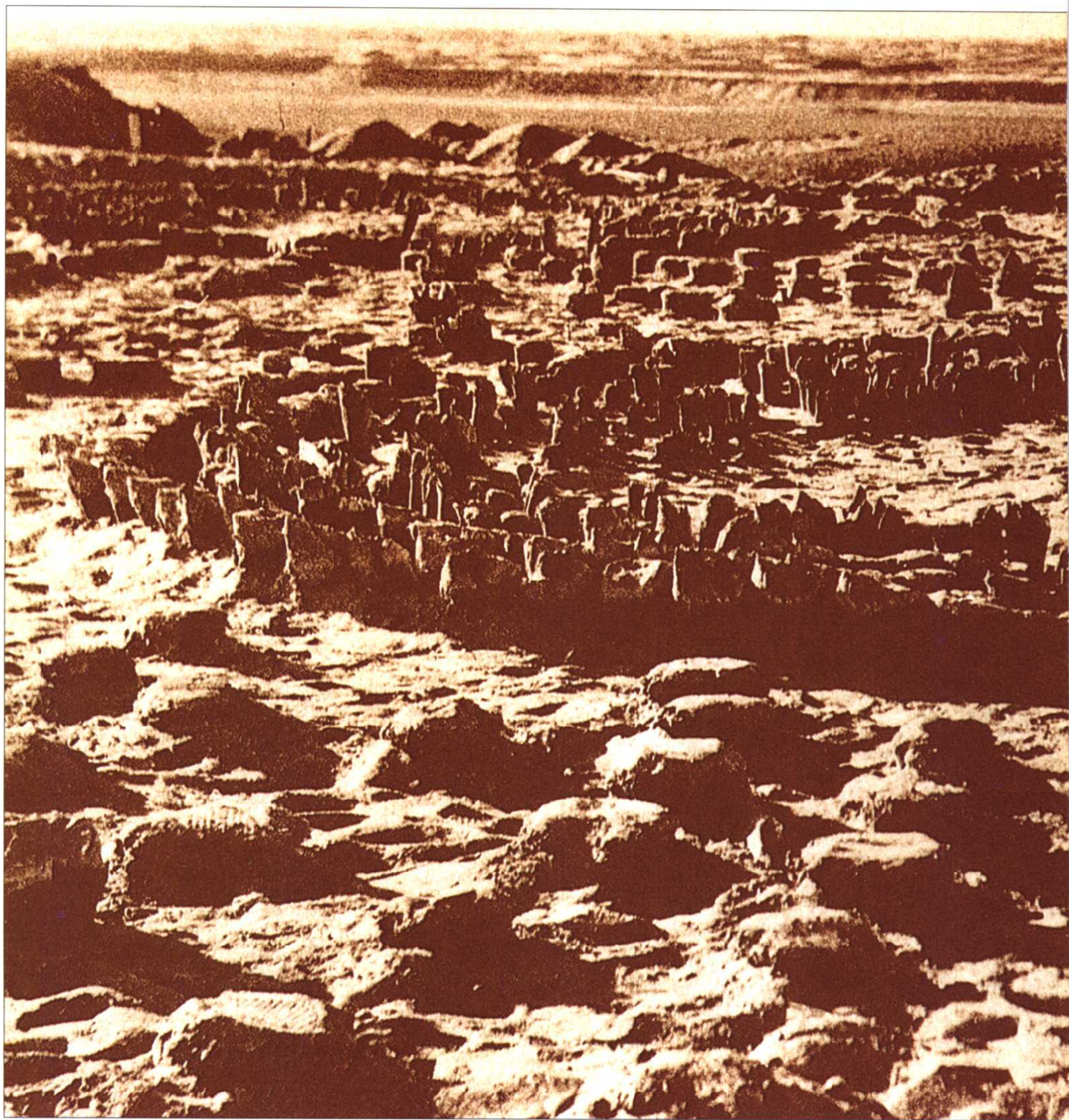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塔克拉玛干沙漠发掘出的精美的艺术品的湮灭，也正如沙漠恶劣的天气吞噬人类和村庄一样。沙漠十分干燥，这使得葬在沙漠里的尸体保存得十分完整(如第77页图)。埋葬的货物在别的地方会分解，而在这里，像丝织物、木制工具、篮艺等都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也许最重要的发现是20世纪初由英国探险家奥拉尔·斯坦发现的文件。这些写在木片和纸张上的中文、印度文，几乎有1500年至1700年的信件和法律记录，是沉默的过去的回声，它们所传达出的信息，即使是最纯粹的艺术品亦无法提供。

■ 1980年，一支中国考古队艰辛发掘出的楼兰据点。空中遥感调查显示，这一据点曾坐落在位于已消失的一条长河的支流上的小岛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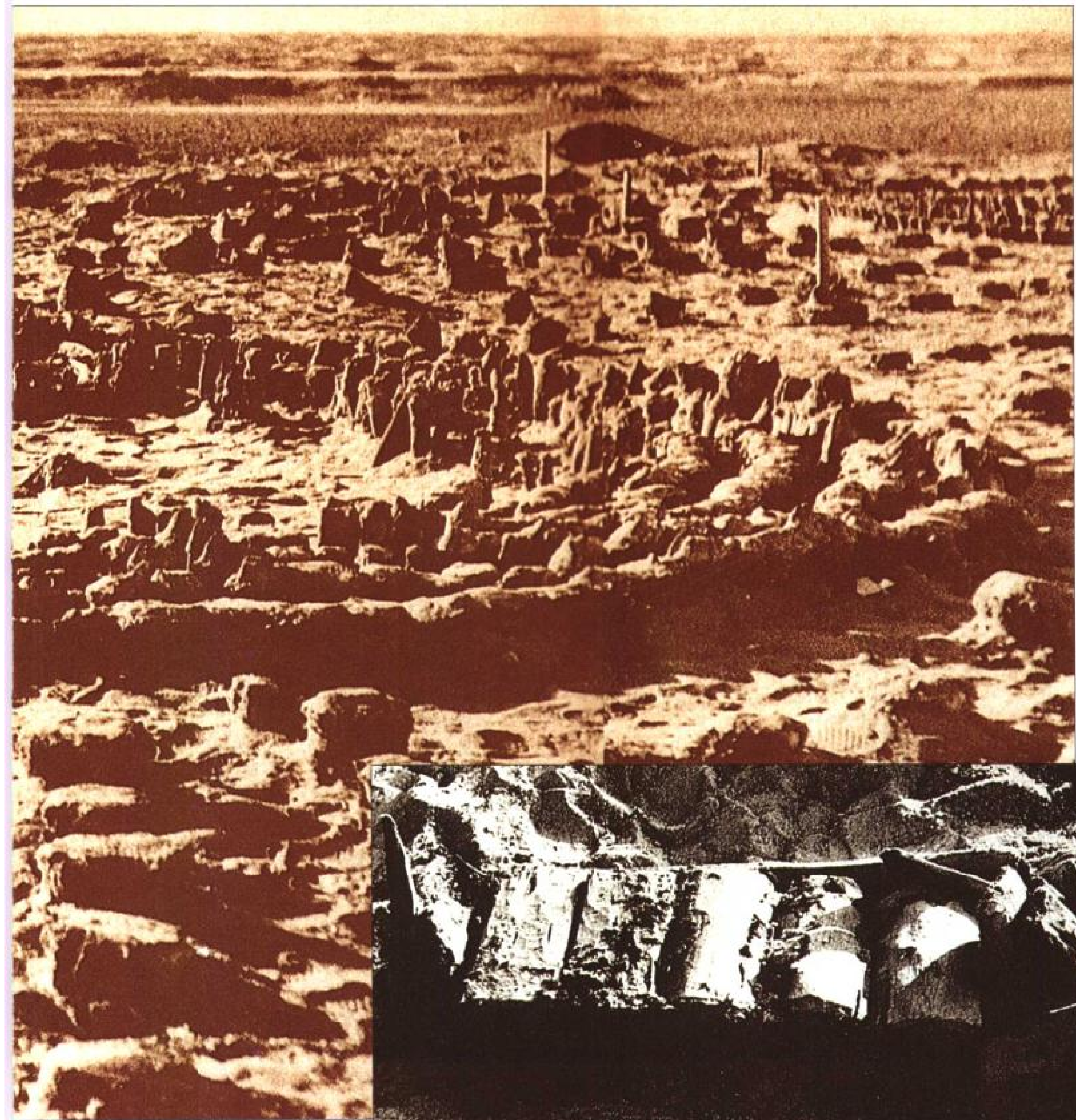


生死边缘

LIFE AND DEATH AT THE FRINGE



■ 环形木桩中心围绕着现已干涸的孔雀河北岸的墓穴，里面埋葬着6位古代男性。圣圈外围呈放射状的附属木桩成排立着，标示出四个主要方位。



死神在塔克拉玛干和罗布泊沙漠边缘游走。沙漠有4000年历史，装载了古代居民日常生活的瑰丽遗迹，从羊毛毯、羊皮衣和皮革鞋，到木制器皿、编织篮子这一切体现出来。但是，所谓的圣圈(SocredCircle)和孔雀河埋葬的古墓，1979年发掘了42个墓群，也揭示出信仰系统，中心的麦粒和女神塑像显示出人们死后所关注的。墓穴本身则为东西向，尸体被小心而安稳地放置。

朴实的地下埋葬物揭示出当时沙漠中的人们为生存而斗争。很长时间内，他们以聪明才智应付挑战。狩猎和采集逐渐为农业和日益发展的畜牧业取代。后来，大规模的灌溉系统为绝大部分缺水地区提供水源。冰川期的淡水和河流发源于周围的山区。沙漠的侵蚀是不屈不挠的，干涸的冰川甚至使沙漠中的绿洲干旱，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完整的城镇被放弃，而后被沙漠吞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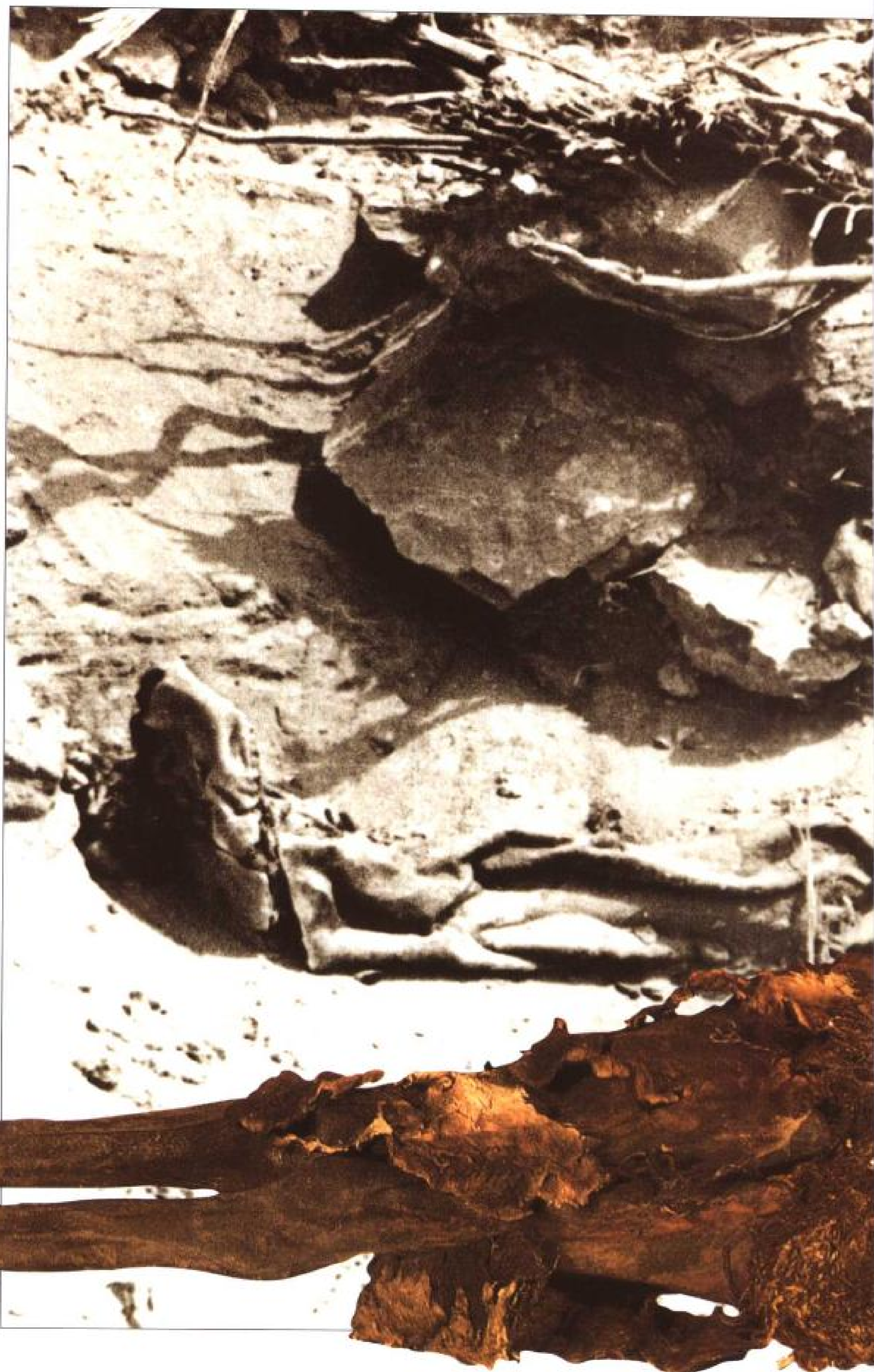
■ 在许多葬在孔雀河畔的死者手中都握着光滑多彩的岩石，它们或许是通往天国之旅的护身符。





■ 裹着一条有16枚木制别针的羊毛毯，左边这具在坟墓里躺了4000年的4~5岁的木乃伊仍安睡着。一只装满谷物的篮子陪伴着夭折的小孩。

■ 下面这具女性木乃伊是从一座城市的墓穴中发掘出来的，至今已有3800年的历史。她有着永远的楼兰美人之称，具有迷人的白种人特征，身着羊皮衣服和鞋子，头戴装饰着鹅羽的羊毛帽子。对这具有着4英尺9英寸高、40岁-45岁左右的女性尸体检查表明，她的肺部被沙漠风尘和煤烟侵入，头发上生着虱子，但死因不明。





丝绸之路上丰富的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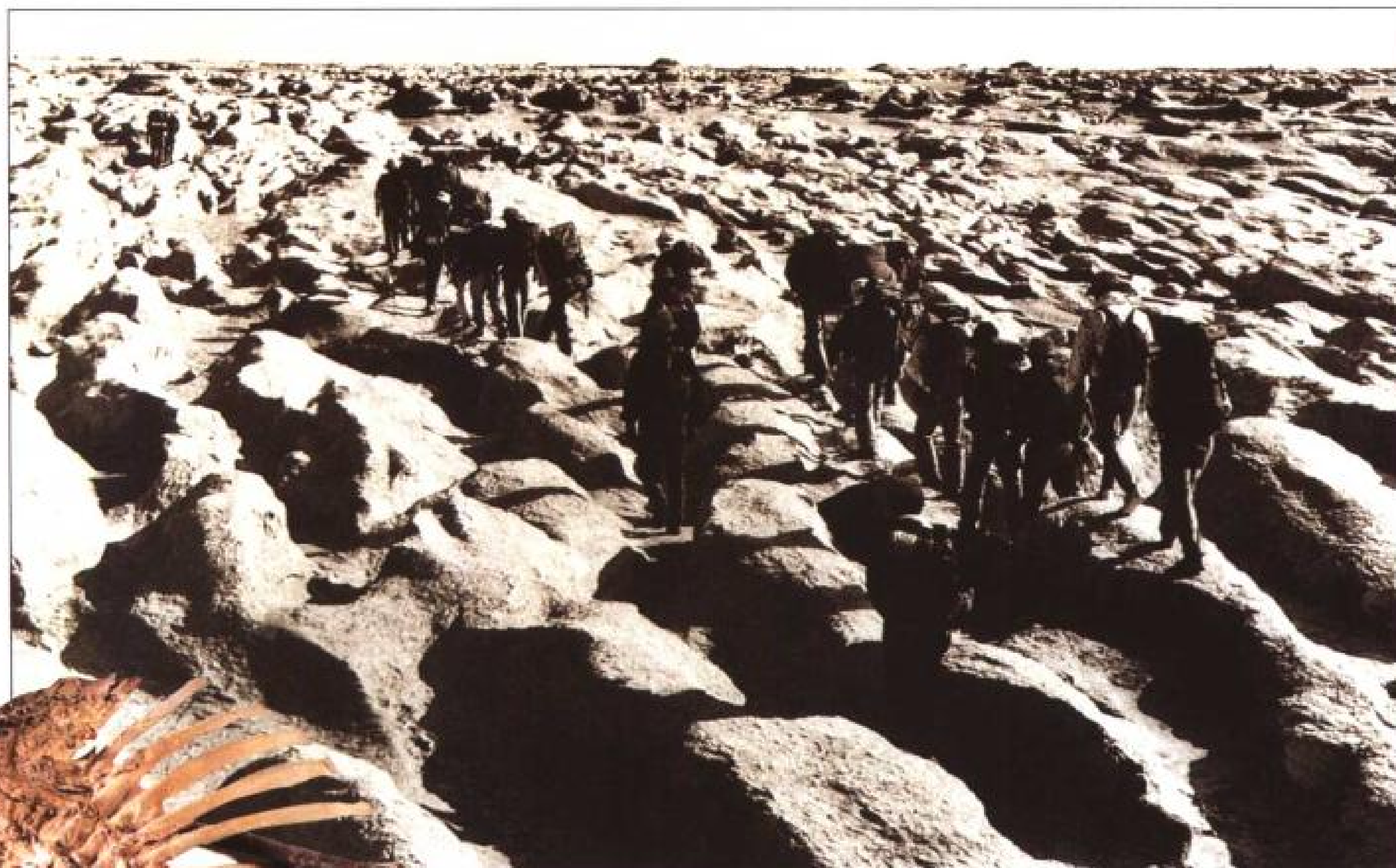
RELICS OF SILK ROAD PROSPERITY

尽管塔克拉玛干和罗布泊沙漠在今天看来显得非常偏远，当年它们却是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汇中心，中西方文化思想在那里撞击，货物在那里交易。但是，它所有的活力都随着因为自然环境恶化变成了无人区而消失，成为一片人们不顾一切逃离的灾难之地。印度的一份政府文档记载了1875年一位牧羊人曾在罗布诺盐湖沼泽见到一座衰败的城市。这位牧羊人并没有踏入城市，像其他人一样，他害怕死亡降临到自己头上，即使是曾在13世纪晚期路过这座被沙尘覆盖的楼兰古城的马可·波罗也认为，此地是食尸鬼出没之地。

斯文·赫丁和奥拉尔·斯坦并没有被这些迷信传说所吓倒。他们和那些接踵而至的人最终将成吨的文物运往世界各地。因为这个原因，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禁止在这一区域进行任何考古和探险活动，直到1979年才有大规模的考古活动继续。中日学者联合考察队惊讶于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为中心辐射四周的贸易和交流活动，如孔雀、尼雅和且末等地都曾一度是丝绸之路上的绿洲。



■ 中日联合探险队队员肩背器材，正在穿过半月形的罗布泊沙漠地带，该探险队成员包括中国政府允许在这一地区进行考古的外国人。



■ 从且末墓穴中出土的一串2800年前挂在一根19英寸长的木制棍子上的未经烧烤的羊肉，说明了公元前9世纪，当时的人们是怎样为死者提供食物及当时的烧烤方法。

■ 从且末出土的一顶黑色编织羊毛帽，分成四个区域，帽子上突出的一根草茎宛如帽针。这顶中国最古老的编织帽的边缘仍保留有一些弹性。



■ 尽管泛着岁月的黄色，一件从且末出土的羊毛针织编织衫似的大衣完好地保存着。这件衣物由五片独立的织物组成。



■ 一双牛皮鞋，它是1986年从且末出土的许多非凡出土物之一。该鞋制作精良，其底部和边缝工艺精湛。



■ 一根人工装饰的日用木头针仍插在轴上，上面的红色毛线仿佛在向您诉说数千年以前它曾被一位且末编织工灵巧的双手旋转着。



■ 一件装饰壁挂的边缘上有着汉代人首马身的怪物作为其图案。这是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马之物，也许这是从西方引进的，这从下面部分英俊人物画像上蓝眼这一细节可以体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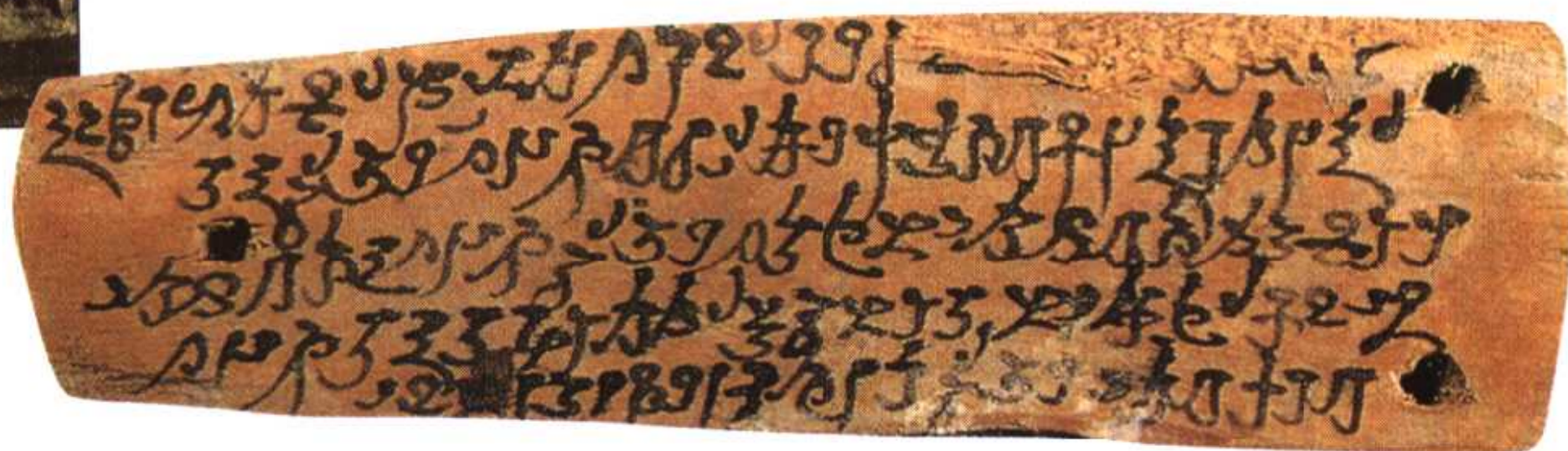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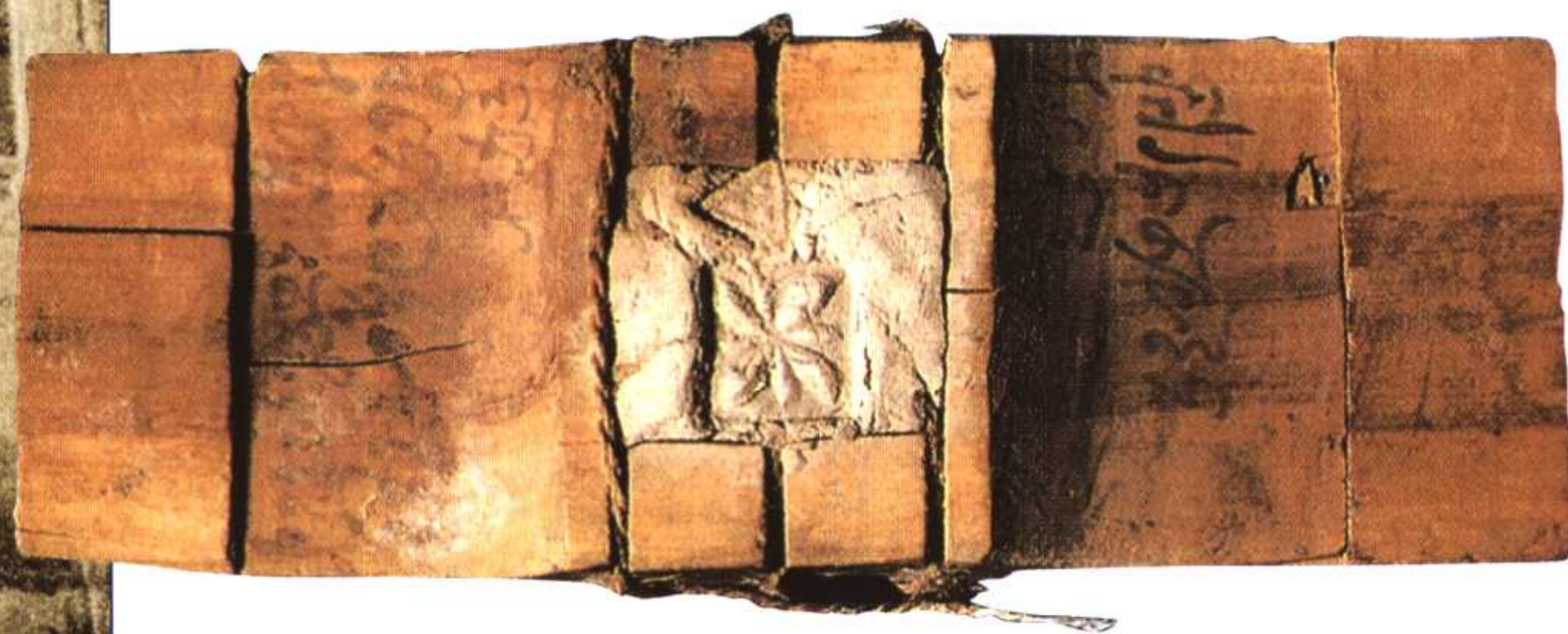
■ 这件汉代的羊毛鞍垫所用的编织方法体现出浓厚的土耳其风格，这块有着2000年历史、曾作为马鞍垫或代替马鞍的物品，令人称奇地保存得十分完好。

■ 奥拉尔·斯坦在希腊展出的从尼雅的木头房子发掘出的雕刻着装饰波斯和印度图案的柱子。1960年的照片包括一根如斯坦描述的具有地中海风格的“印度-科斯特”神兽的横梁。





■ 汉朝时期一封写在木板上的印度手写体书信(如下,底)。为了保密,用两个木头信封装着这块木片,再用绳子系上,并且盖有发送人的泥印章(如下,顶)。从尼雅发掘的文件内容包括征税的重要内容及税收官利培亚的印章。





大一统的秦朝

THE QIN: ONE TIME
IN TEN THOUSAND
GENERATIONS

一位农民和他10岁的儿子在中国北部陕西省西安东边的一座150英尺高的古墓，即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的墓东面约一公里的地方掘井时，遇到了又大又硬的东西，因为井底的黄泥水，他们最初未能发现那是什么物件。当他们挖通隧道时，一座真人大小，着古代士兵装束的陶俑出现了。父子俩很兴奋，他们继续挖掘，坑道里的水突然神秘地排干了。面对这些情况，这位父亲认为那座被半埋着的塑像是妖魔，将惩罚他们，所以他把塑像全部挖出，并将它放在烈日下曝晒。这次发现没有被记录。

60年过去了，1974年3月，在相同的地方又有了相似的发现，这次是公社社员挖井。他们的工具在地下约13英尺的地方意想不到地遇到了陶俑块，使他们感到惊异的是，那些碎片经证实是与真人一般大小、身着制服的兵马俑。

掘井者们立即停止了挖掘，并将他们的发现报告给当地的权威——政府派来了考古学家。专家们将壕沟扩大，通过掘测试洞，使之伸展成扇形。结果令人目

■ 这位神色刚毅的男孩是公元前3世纪初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墓中陪葬的数千陶俑之一。此陶俑是考古学家们1976年从一处6英尺深的壕沟中发掘出来的。

瞪口呆。农民们挖井的地方是一个巨大长方形坑的一部分，它南北宽 200 多英尺，东西长 760 英尺。

初步的挖掘表明，10 英尺宽的夯实土墙围绕着地下被泥土覆盖顶部的寝陵，该寝陵曾在一场大火中塌陷。墙壁将壕沟分成 11 段通道。每一段通道内有 12 个陶俑，他们均装备了三面是青铜的箭头、“T”形的戟头、剑或其他武器。这些武器在地下埋藏了几十个世纪后，仍然光亮如故，锋利无比。6 个通道中的陶制马匹都是四匹并驰。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木制马车两个轱辘碾过的痕迹。

1976 年 5 月和 6 月，调查人员又发现了两个附属壕沟。挖掘记载显示，一号坑位于最初的墓穴北边 65 英尺处的东边尽头，有一排一排掩蔽着的马拉四轮战车、骑兵、跪着的弓箭手和昂首阔步的步兵。小小的三号坑呈“V”字型，在第二个坑西边 400 英尺处，它里面仅有一辆马车和 64 位兵俑，包括 30 名先头部队，鹿角、兽骨以及窗帘上的青铜小圈。位于二号和三号坑之间的第四号坑已证实被挖掘过，空无一物，故中断了对它的挖掘工作。

兵马俑的发掘意义在于印证了《史记》上所记载的中国第一位皇帝墓葬所在。在秦始皇于公元前 210 年逝世后一个世纪写出的《史记》是这样详细描述：“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尽管在那个时代皇帝的宠臣和继任者也与他葬在一起，以便皇帝死后能继续享受这些人的服侍，但《史记》并没有提到兵马俑。然而《史记》给考古学家们提供了线索。史书记载，当秦始皇知道工匠们将要修筑好陵墓的时候，便命令将所有参加修筑陵墓的工匠埋葬在陵墓的周围，距巍峨、复杂的陵墓 3000 英尺远。因此，新发现的坑是秦始皇墓地的一部分，他们埋藏的大多数陶俑据说是代表秦始皇的先锋队。



■秦始皇(公元1609年一幅据想像而成的木雕画,如下)。到公元前246年秦始皇13岁登上王位,他父亲的军队已占领了周的侯国——邻国蜀和巴,建立了一种使这位年轻的继任者效仿的模式,就是使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归于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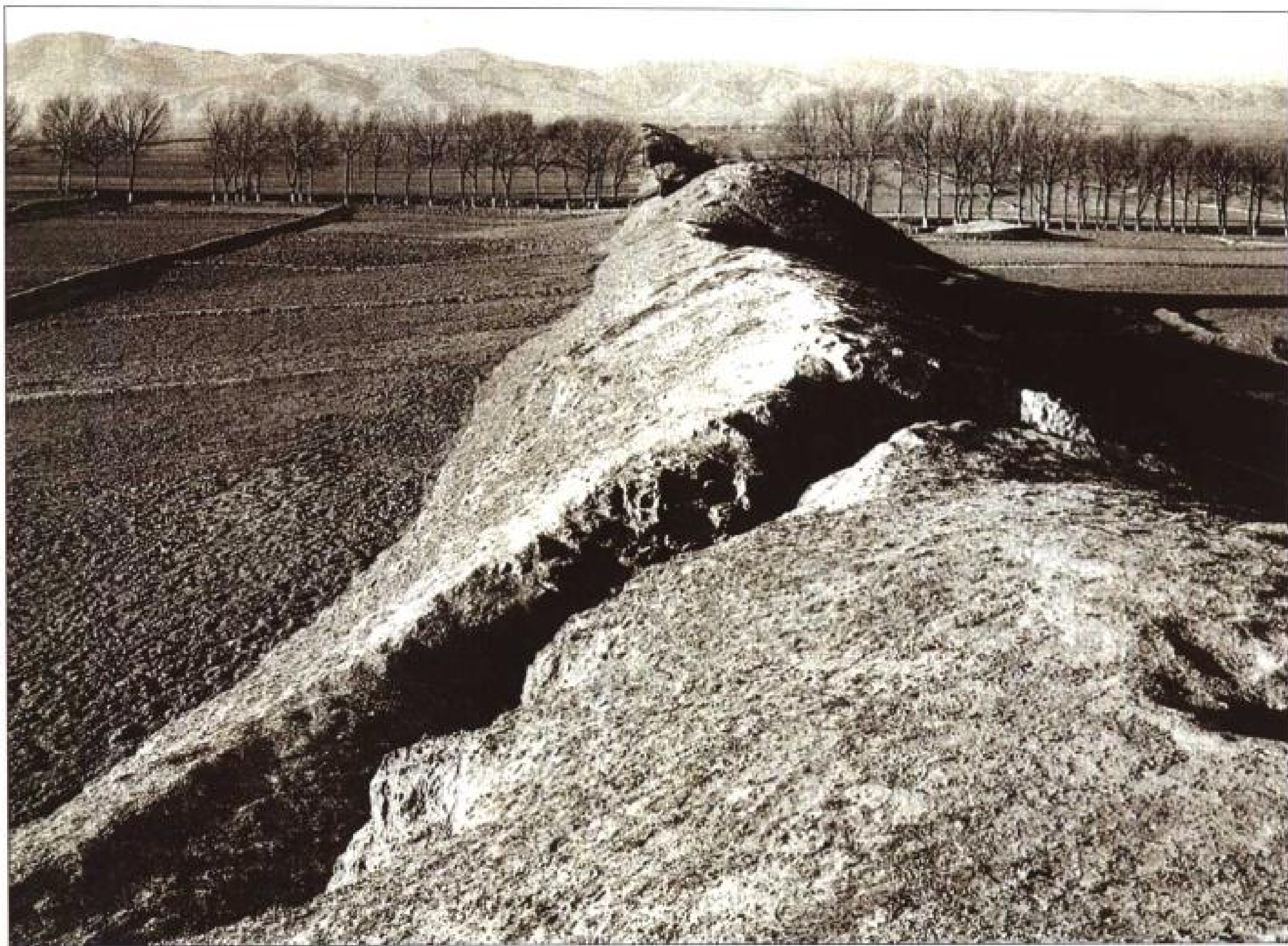


这是一些最终能与古籍校核的实物证据。尽管这些古籍中的绝大多数是秦始皇的对手所写或很久之后对重大事件的叙述，但有些古籍或许是粉饰事实，歪曲历史，谎言虚构。现在，考古学家们注视着这些给秦始皇——中国的第一位皇帝——既带来荣耀，也留下骂名，却令人叹为观止的兵马俑。在他们的眼前，一排排的弓箭手、骑兵、步兵和驭车手是秦始皇的精锐部队，是他们统一了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战国时期群雄争霸的局面。规模宏大、制作精美的兵马俑带给人们的不仅是惊叹，而且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所拥有的财富和权力。秦始皇死后，他的亲信大臣李斯和太监赵高与始皇另一个儿子胡亥密谋，逼死皇太子篡位。其后，为了争权夺利，李斯和赵高之间又展开了一幕幕的争斗。仅仅过了15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便土崩瓦解了。在中国历朝风云变幻的2000年里，极少数朝代，如秦朝，虽是昙花一现，但对后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公元前266年，秦始皇出生前7年，秦国东边的竞争对手——魏国的一位贵族曾写道：“秦有虎狼之心。”

不管这位魏国贵族的评议是否准确，秦国显然不像他所描绘的那样。约在100年前咸阳成为秦国首都时，有一部分土地并没有像传统那样分配给世袭贵族，而是分配给31位由中央政府委派、控制的长官（县长）。秦国还在咸阳树起特殊的柱子，上面颁布有新编纂的法律，以这些法律、法规和严酷的刑罚代替习俗，这些酷刑包括鞭打、断肢、劳役、宫刑、斩首以及其他痛苦的刑罚。无论人们的出身和社会地位如何，只要犯了秦国的法律，都会受到惩罚。有一部古籍这样记载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这些客观、公正的政府理念后来被称为法家思想。这是从商鞅鼓吹的理论中提炼出来的。商鞅原来是魏国的官员，于公元前359年成为秦国官员。因为深得秦的统治者孝公的信任，商鞅推行的深刻改革为秦国从一个地处西边的诸侯国转变成中轴国铺平



■ 一条当今农民挖的沟，将土夯城墙一分为二。该墙为中国第一个皇帝命令建成，用以抵抗北面侵略及作为统一王国边境的标志。古籍说，此防御工事绵延2600公里，自秦都城咸阳西部的临洮至黄海以北的辽东半岛，但现代学者认为这是夸大其辞。

了道路。其中最重要的改革是改革世袭土地制。地主权利被不断削弱，而别国富有的农民源源不断地涌入到秦国，因为土地买卖在这里第一次成为合法。

逐渐地，古老贵族家庭衰落了，一些来自底层的人的地位上升了。最著名的例子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名叫李斯的官员。当李斯在南方的中心国——楚国任库房小吏时，他观察到生活在库房近旁厕所里的老鼠只要有人来了便四散惊逃；而那些出没在库房附近的成群老鼠则胆大无比，既不怕人，也不怕狗。对此，他感叹道：“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这种观念根植于李斯心中，他以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学者荀卿为师，学习治国之道，使国家兴盛。

作为明智的人，李斯显然将入秦作为实现其抱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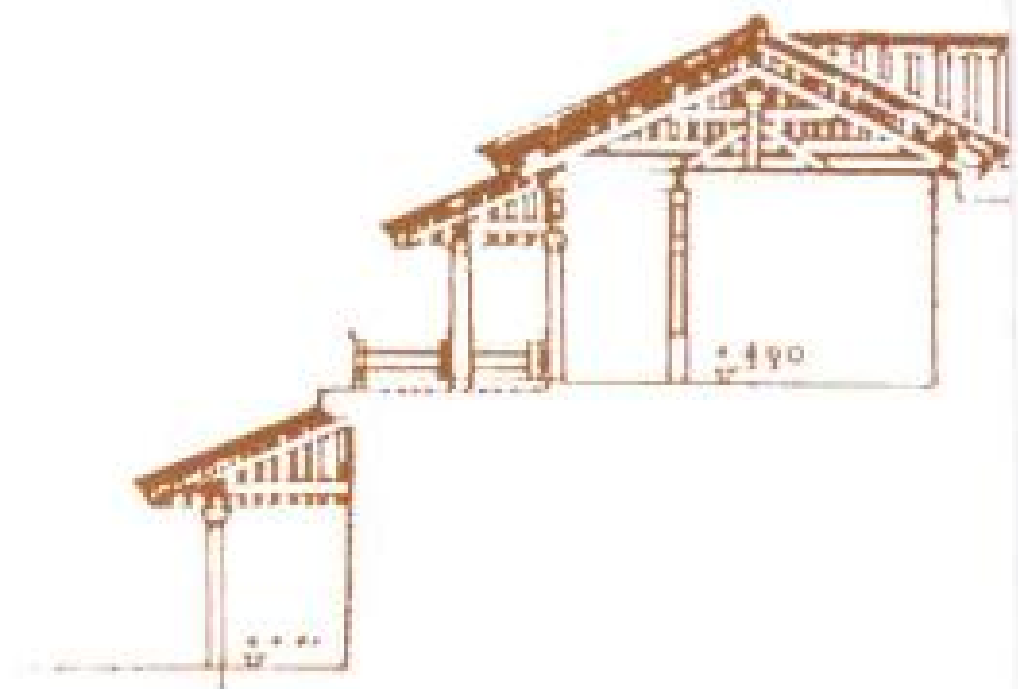


的最好选择。荀卿说：“其（秦）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并且秦“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

李斯清楚，数个世纪的边境交战使得那些居住在秦国北边和西边的农民，对秦国军队和练兵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对于在马背上战斗的部族来说，马车在崎岖和险峻的边境是很不适用的。于是，秦国军队开始练习在马上射箭，以对付游牧民族。此外，中原的封建军队，注意到这些游牧部族具有骑士精神，并不因循守旧。因此，秦国派职业的将领来训练这样的军队，不从封建地主阶层提升将领，而是从对方叛逃的将领中提拔。

“其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荀卿总结说，“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

■ 像这样的铁项圈，是1973年在秦始皇墓中出土的。这些项圈作为有罪的标记戴在修筑秦始皇墓、长城及其他工程的劳役身上。项圈近1磅重，打开时的宽度不足4英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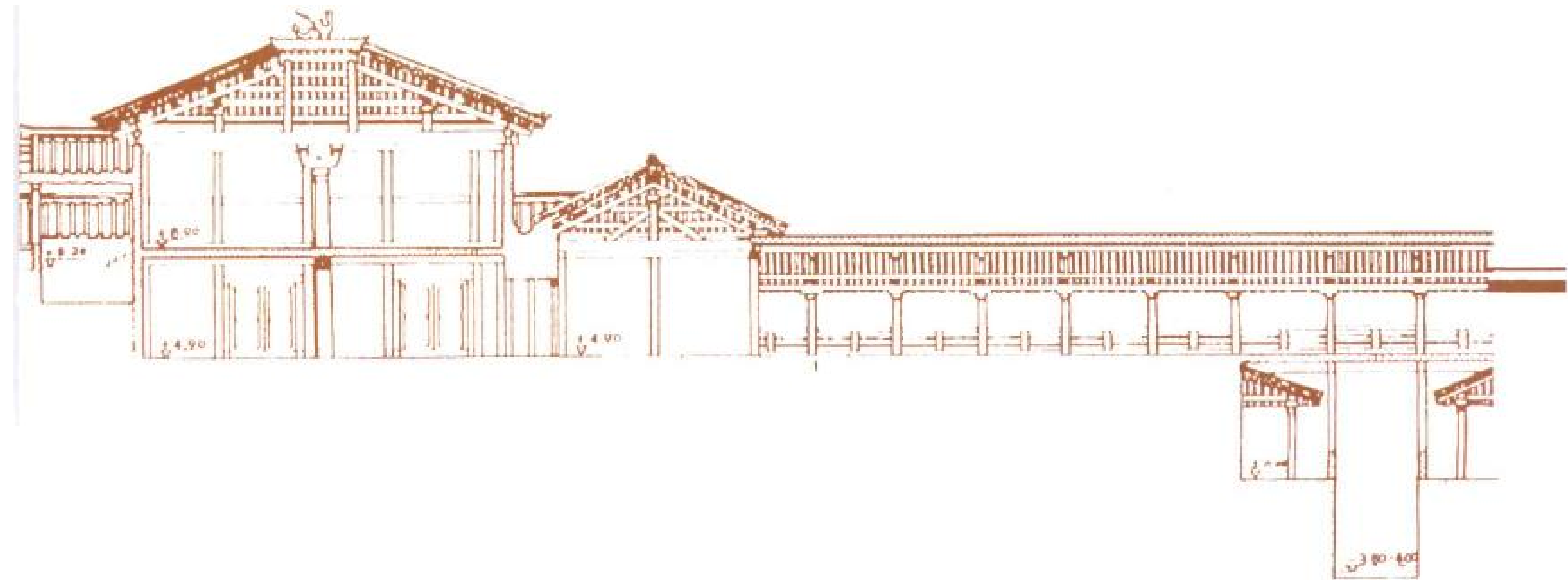
李斯决心游秦，他认为：“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鹜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逝世，李斯也于同年抵秦，并成功地接近了吕不韦。当时吕不韦任13岁王太子嬴政的谋士。后来嬴政继承了王位。

在李斯的第一次演说中，他就劝秦王嬴政追寻打造帝国的梦想。他说：“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统一，此万世之一时也。”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李斯不断地得到了秦王的厚爱，但也一直处于吕不韦的阴影下，直到公元前238年嬴政牢牢掌握了政权。那一年，吕不韦卷入到一场与秦王嬴政的寡母通奸的事件及嫪毐反叛案中。吕不韦被放逐，稍后即被赐饮毒酒自尽。

李斯被任命为宰相后，继续推行大一统的思想。秦王嬴政听取他的进言，接受了李斯大胆的设想，并在17年的时间里将其作为行动指南。“就像蚕食桑叶。”《史记》这样叙说，年轻的国王征服了其他6个诸侯国。韩国于公元前230年沦陷，接下来是赵国于公元前228年、魏国于公元前225年、楚国于公元前223年相继被秦国

■ 在建筑师的复原下，咸阳渭河畔绝壁俯瞰渭河的宫殿，它曾是秦始皇的寝宫之一。但是，从该建筑重复的图案及多次修复和刷新来看，考古学家们认为，该宫殿实际建造的时间应为战国时期的秦王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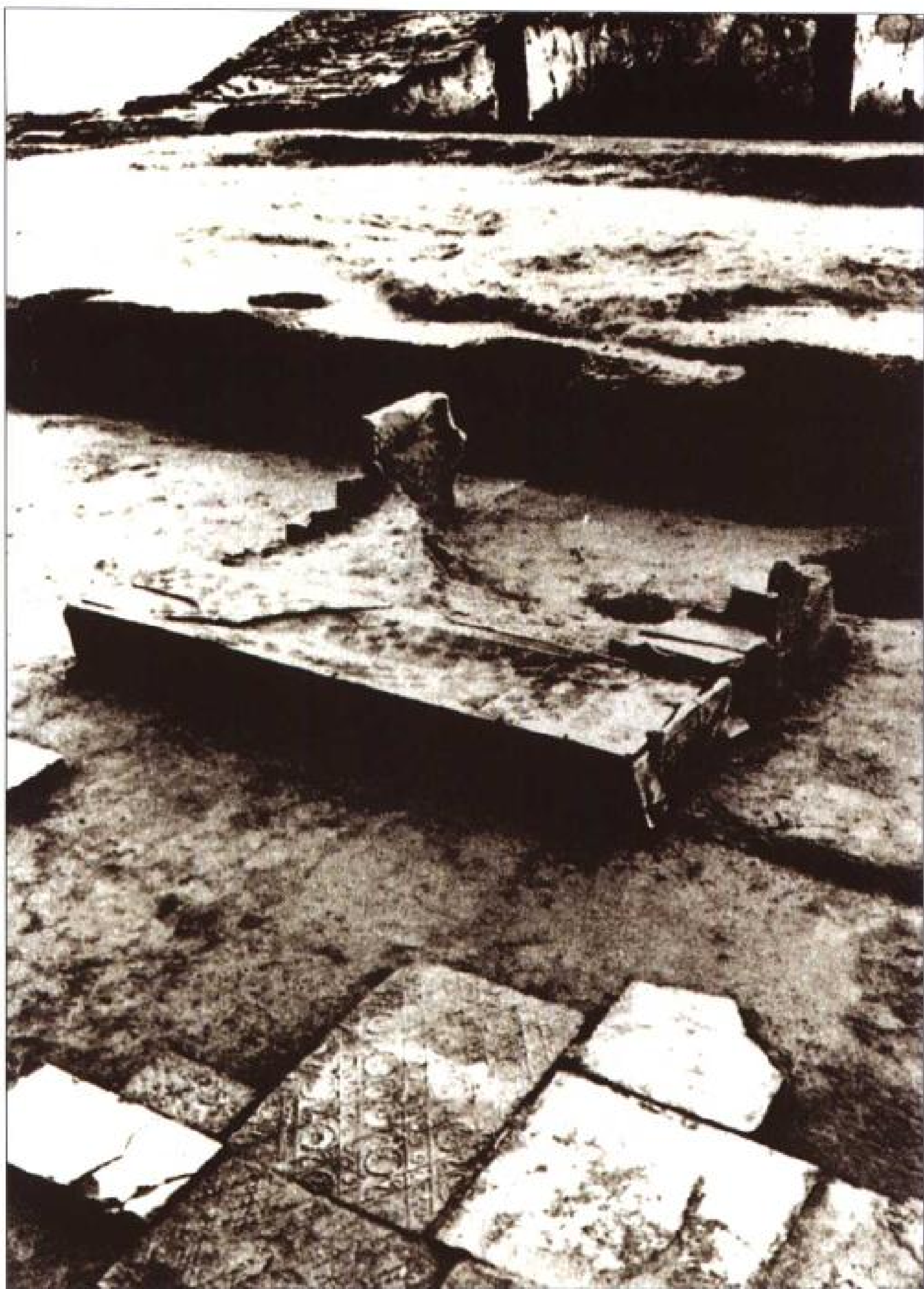


灭亡。遥远的东北方向的燕国也于公元前222年被秦征服，然后，在公元前221年，秦军征服了最后一个诸侯国齐。一些史学家深信，在这些战斗中，无数人丧生或沦为囚徒。秦国的版图也扩展到从西部高原至东边沿海，绵延1200公里，这使得他成为统一中国的第一个统治者。

秦王嬴政虚伪地宣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根据臣子们的进言，嬴政采纳了“皇”的头衔，即威风凛凛的君主，为了显示他的权势不仅仅是王，他又加了一个“始”（即“第一”之意）和一个“帝”字，“帝”意味着数千年以来最神圣的统治，或最高的神。

为此，他将自己比作中国古代传统神话中有着卓越能力的伟人——黄帝。据传说记载，在很久以前的夏、商、周时期之前，黄帝成功地统治了史前时期的中国。在那时，黄帝建立了理想的政权，发明了文字，制造了



■ 带有圆环图案和双螺旋形线的粘土砖，它们曾铺在第99页所示的建筑的人行道上，背景上城墙清晰可见，考古学家们认为其中一些墙上的壁画碎片是中国最古老的。

第一枚钱币。然后，据说他死后进入天界成了神仙。

自命不凡的秦始皇帝相信，等待他和他的继任者的命运也像黄帝的伟大命运一样。他大胆地宣称：“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万世，传之无穷。”

统一以后，秦始皇迅速削弱了以前与之竞争的封建地主的势力。公元前221年，在李斯策划下，秦帝国被划分为36个郡，并且委派了郡行政、军事和中央政府特派长官，分别进行管理。

“加强中央，削弱地方”的中央集权统治极大地加强了秦政府的统治，削弱了地方贵族世袭的权利。

据《史记》记载：秦有“十二万户富之家”，被迫从祖先的封地迁往咸阳，这样，秦政府就能监视他们，并且为他们特地建造了一些宫殿。在各诸侯国的力量被削弱以后，古籍记载，秦始皇令将战败各国的宫殿摹拟建造在咸阳渭河边的绝壁上——现代考古学家们显然也持此观点，对该城市附近的调查表明，有27处宽大的土夯基础，这个数量足以建造一所宫殿，而从那带来的瓦片表明它们至少代表了两个战国时期的诸侯王国：楚和李斯的祖国——魏。

同时，秦始皇下令将各城市及各诸侯国之间的防御城墙拆除，没收市民们的武器。据说全国各地的兵器都被运往咸阳熔化，然后将它们铸成12个超过32吨重的巨大雕像。因为塑像规模庞大，象征意义丰富，它们被矗立在宫殿前，但是考古学家们仍在寻找塑像是否真的存在的证据。

秦始皇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如在公元前221年，为了消除秦帝国范围内的地区差距，如果中国作为统一的国家，在一个法律体系及相同的法律标准统治下，规范化的法律将支撑秦的大一统思想。结果，统一的帝国采用单一的货币——小的青铜铸的圆形方孔钱在全国流通（第104-105页）。

此外，秦始皇统一全国的书写文字，以小篆作为官府通行的

文字，消除了中国 25% 的地方的文字差别（第 66-69 页）。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场为后来朝代所继承的改革是文字史上最坚决的改革，它阻止了文字以各自为政的形式发展，这似乎是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在长期的统一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

经过数个世纪集中力量的挖掘、考察，学者们确信秦始皇还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挖掘出的青铜和赤陶量杯就好像青铜秤和铁秤用来称量一样，常常被用来分配谷物和酒。

在秦始皇统治的 26 年间，典籍所载秦帝国所颁布的诏令说：“普天之下，抃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

绝大多数的称量工具都是金属铃状，并且顶部有一圈圈的环，上面刻有政府的条令，小一些的则有特殊的边缘以刻写文告，一些轻的、中空的两边有大量的空间刻印着文字。这些有关称量的介绍毫无疑问地说明秦国的法令已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就像秦帝国所厉行的其他改革。直到 1975 年 12 月，当工人们在湖北中部城市云梦附近挖掘一条排水沟时，取得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它才大白于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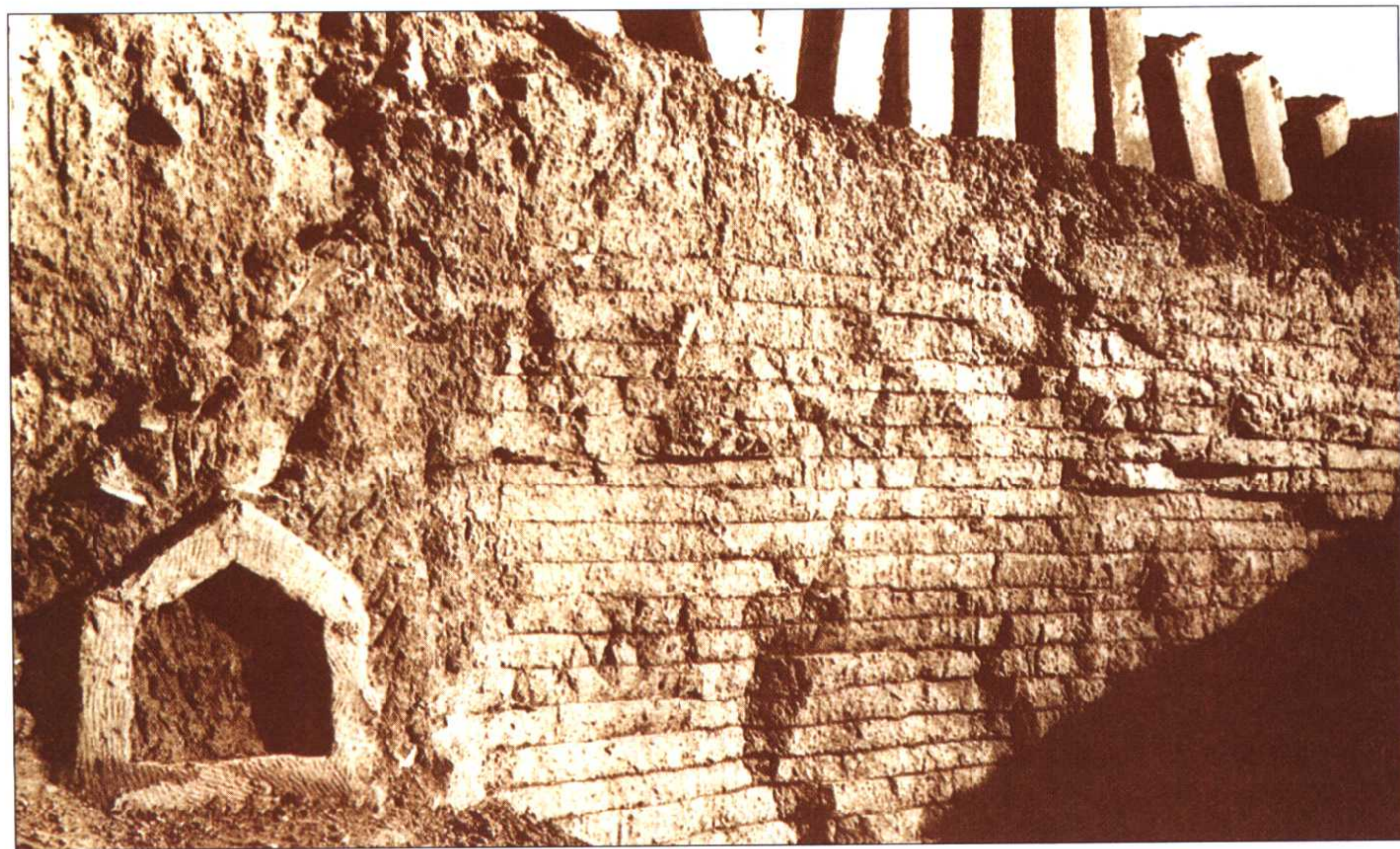
工人们偶然发现了一组墓群，考古学家说，其中之一是一位男性的遗体，他是秦国统一 4 年后，即公元前 217 年被埋在这里的。棺材中，在他的胸部和大腿骨边，头的旁边，腰的下面，散放着 1155 根 9 英寸长的竹片。

这些竹片的顶部、中部及底部的裂口表明，有三条细绳最初将这些竹片绑在一起组成一部书。每一竹筒上写有 40 个文字符号，它们是用一管黑色、松油墨的兔毛笔写的。

古籍记载，该墓墓主是一位秦的下级官员，他在公元前 244 年任秦的书记官，并在 3 年后升任为县书记员。他一直担任政府下层官员职务，直到公元前 235 年去世。作为负责管理、控制政府谷物储存和分配的官员，他也处理一些案件，体察民情，赈济穷苦百姓。考古学家们相信，他带到地下的竹筒，有一半上都



■ 位于基础层之间、西面尽头秦始皇葬处复杂夯土上面的排水管，是用来为供奉食物的建筑物导水的。水管由2英尺长的陶管组成，就像上图的一节，每根管道在地下约3英尺处，首尾相接。





是他处理公务时用来查询的管理和法律文件。

尽管这些竹简只是秦朝庞大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分，但竹简所记载的内容仍能使我们管中窥豹，了解到像他这样一位中国第一个帝国的政府官员的生活。这些竹简还表明，大量严格的法律法规已在全国颁布实施，并且进行了有效管理。例如，标有“紧急”字样的政府诏令和公文必须刻不容缓地送达。秦朝有一条法律规定，所有的文件都必须标明月、日和送达的时间，以便能得到及时的反馈。

在这个墓穴中发现的另一些法令法规，则显示了秦朝特别关注农业生产。法律要求地方政府关心、支援农民，关心家畜的健康以及马匹死亡情况，对于那些不保护自然所施恩惠的人则予以重罚。其中一条法令具体规定：擅自开启谷仓，使谷物腐烂，或堆积谷物使之被抢劫，或食用部分不超过100石，监守仓库的官员须受惩罚。如果被抢、被毁的谷物总量超过100石，那么罚金就不是少量现金，而是一套盔甲的价钱了。

其他资料表明，谁没有遵守度量衡方面的法律也将受到严格的责罚。许多违法的人被押送去修筑咸阳城内或附近的宫殿，或者充当更大规模建筑的苦力，如连接秦帝国遥远的前哨基地的新公路网。自公元前220年开始，数以千计的犯人和被强迫劳役的人被迫从咸阳出发，在由西向北，向东北、东边和东南边的通衢大道上夯土。这些修筑的道路有38英尺宽，延绵近5000公里。

往北的主要公路叫作驰道，绵延500公里，它的遗迹至今犹存。据《史记》记载，这条路凝聚了不少于30万苦力的血汗。公元前221年，在曾率军征服齐国的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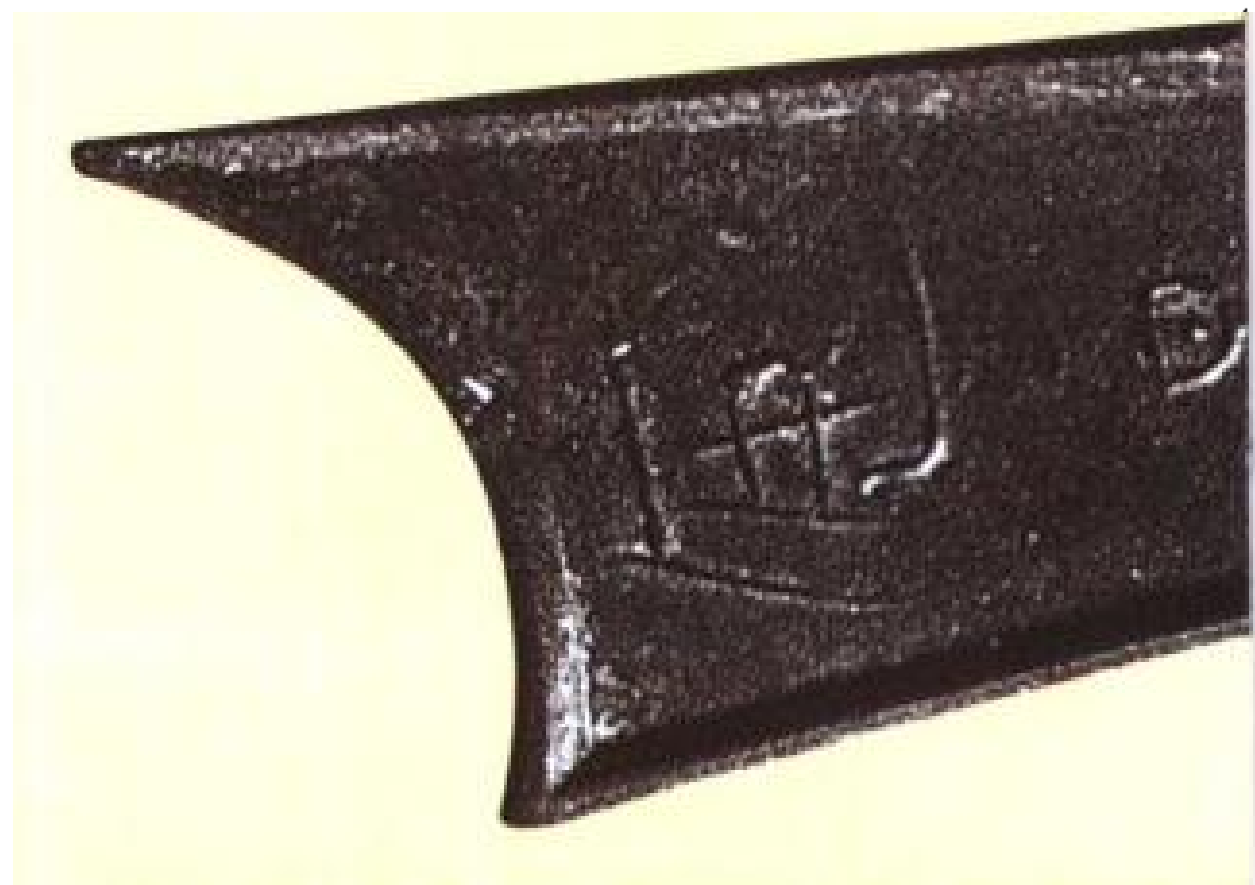
形状奇异的钱币

SURPRISING SHAPES FOR MONEY

远在铸币出现之前，中国便使用谷物、布匹、贝壳和其他有价值的物品交换货物和劳动力。在古代，谷物常常被用来支付劳动力的报酬。但是到了公元前4世纪，由于商业迅速发展，所有的诸侯国开始使用在自己国内流通的货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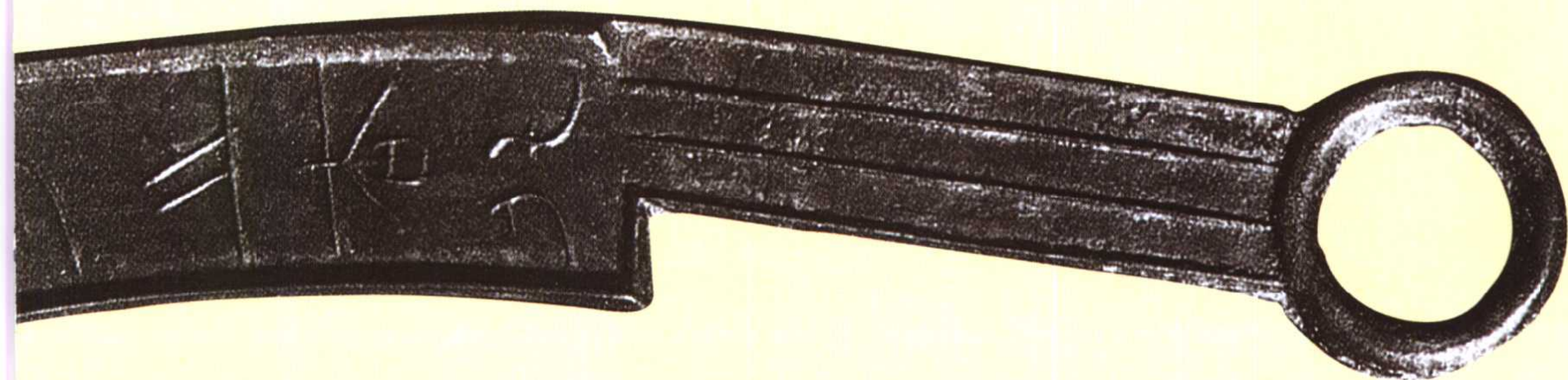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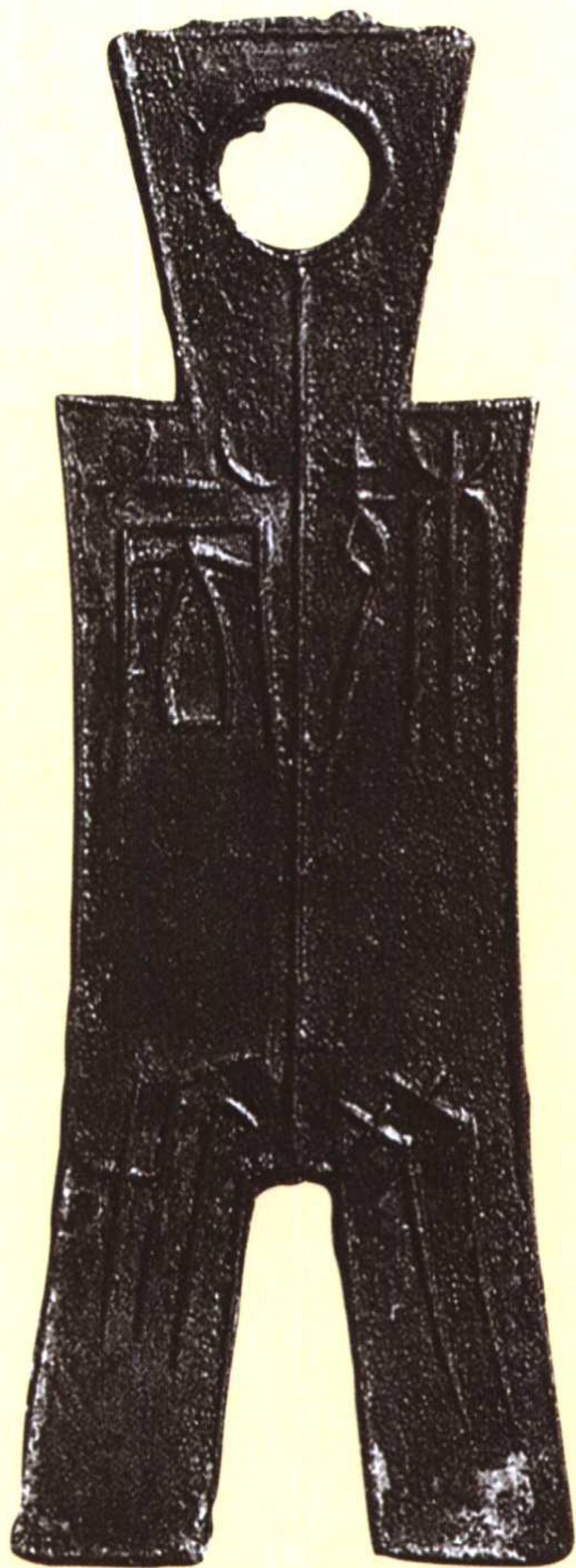
这些钱币的中央通常有孔，这是为了便于用线将它们串起来，或用带子悬挂起来。20世纪70年代发掘出土了一个坛子，里面的贮藏物表明，这样的钱币流通很广，在那时，这种钱几乎是所有诸侯国的流通货币。

这种早期的钱币一般用青铜铸成，形状各异，其中一些钱币的形状是对日常生活物品的模拟。赵国的货币，形状设计成铲形；楚国的货币也与铲形相似；但是7英寸长的青铜刀在三个相邻的国家间流通，



刀面上刻有“安阳铸造的宝货”字样。还有的钱甚至被称作“蚁鼻钱”，它是仿照贝壳制成的。

秦国统一中国后，开始征收统一的税收，此举既鼓励了贸易往来，又极大地促进了国内经济发展。圆形的“半两钱”，经实践证明已成为当时中国的标准货币——而且一直运用到现代。





军蒙恬的严格督促下，修路劳力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放下筑路的工具：一是拿起武器，抵抗少数民族戎的进攻；二是修筑长城（第97页）——将军的第三大工程。它将以前魏、赵、燕和其他各国在数年内建的边界城墙连到一起。这一防御工事几乎绵亘在整个中国北方的边界线上。

据古籍记载，在秦国动工修筑的跨纪元工程中，惟一能与蒙恬的筑城大军在规模上相抗衡的，是动用了70万劳力修筑的巨大而壮丽的秦始皇墓。他们于公元前246年开始动工，当时只是个孩子的嬴政继承了秦国国君的宝座，但直到36年后嬴政逝世，这一复杂的工程还未完工。考古学家们推测，修筑陵墓的苦力被允许用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工程，但人们确信，他们实际上是在创造世界上的伟大奇迹——兵马俑。

直到1974年，陵墓所在地被正式公开，考古学家们一直忙于挖掘、取证，艰辛地保护兵马俑。该项工作远未完成，并且在一些方面，它几乎仅仅是开始。有的学者已将其研究的眼光投向了秦始皇的军队和武器及其战略。

考古学家们最初进入的一号坑呈长方形，也是被研究最多的墓穴。包括主要的地下军队——估计至少有6000件陶俑，有200多人的先头部队。这些陶俑穿着统一的战斗服饰，着轻便的鞋，系绑腿，没有穿盔甲。这类部队被部署在坑内东边，肩并肩站成三排。

从其附近挖掘的弓箭手的模型和发射弓箭的青铜弩和青铜箭头来看，科学家们估计每一个弓箭手都有一个用于发射的弩：4.5英尺长的木制弓缠着皮革，并漆有油漆，附加上木制狭槽。弩的射程超过半公里。书面资料称，弩张开时，能产生800磅的张力，足可以穿透敌人的盔甲。实际上，有一些历史学家持这样一种观点：制弩技术第一次引入西方，使箭从类似弩的武器中射出，能轻而易举地将敌人的臂膀刺穿。第一次使用这一武器是在公元前36年，在中亚士兵与罗马士兵的交战中。进攻中，弓箭手也需要

保持远距离，这有点像现代战争中的远程火炮，把第一帝国皇帝的敌人淹没在箭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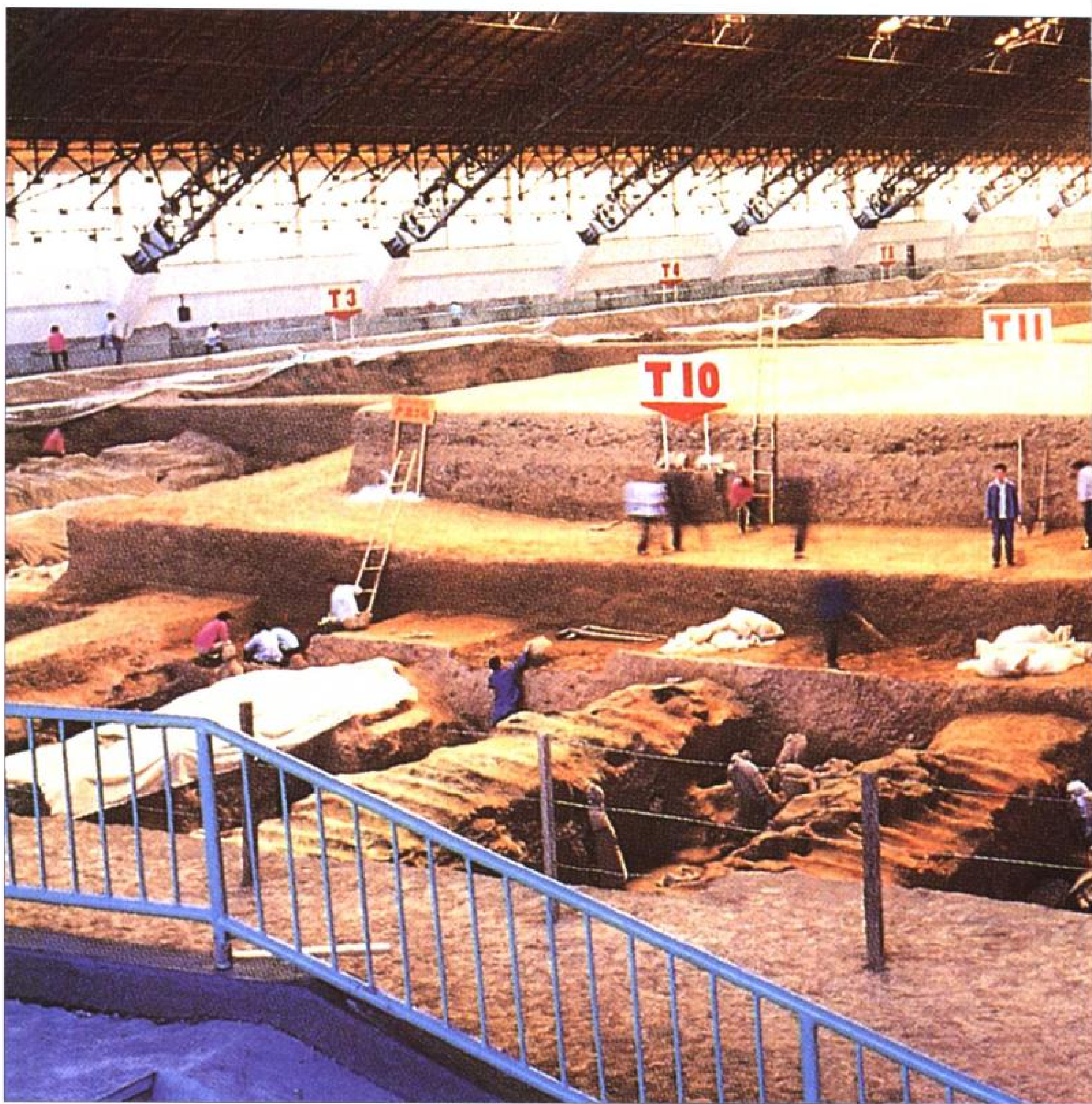
在这些先锋队的后面，有11条走廊一直延绵向西。其中6条走廊上的战士掩护木制的战车以及一小群先遣步兵。在两辆轻便马车附近，发现了一对7磅重的青铜钟和鼓。考古界权威人士根据历史遗迹推论，轻便马车作为战车使用，大车则用来搞运输。例如，在中国古代，第一次击鼓表示军队准备进攻，第二次击鼓表示进攻；相反地，当钟声响起时，士兵们就停止战斗，当钟声又响起时，士兵们便撤退。

从陶俑的姿势可以看出，轻装上阵的步兵配备的是剑、矛和斧子。在兵力图中，通过布兵的数量显示出：他们在3条廊道内的马车后站成4排，并且位于成队的持矛但未穿盔甲的士兵身后。尽管现在陶俑显示的只是单调的浅黄色——暗灰色，但陶俑身上东一片西一片地粘着的小斑块暗示出它们的制服颜色曾经是明丽多彩的（第135页）——红色腰带束着褐色盔甲，绿色或紫色的束腰带和绑腿，有着红色或紫色吊带的褐色或白色的帽子。

在墓坑最北边和最南边的走道里，挖掘出两长列作好战斗准备的弓箭手。通过研究显示：3排射箭高手位于西面；在各边中，射手们面向外站立着，使内部大群的士兵和马匹在各个方向都无懈可击。但示意图显示不出这一布阵的优点。军事历史学家断言：这种军事布阵不仅有利于秦军与敌人正面对抗，也能迅速、轻而易举地调整队形为“V”字形。例如，为了包围敌人，或变换成倒“V”字阵，就可以很快地通过中心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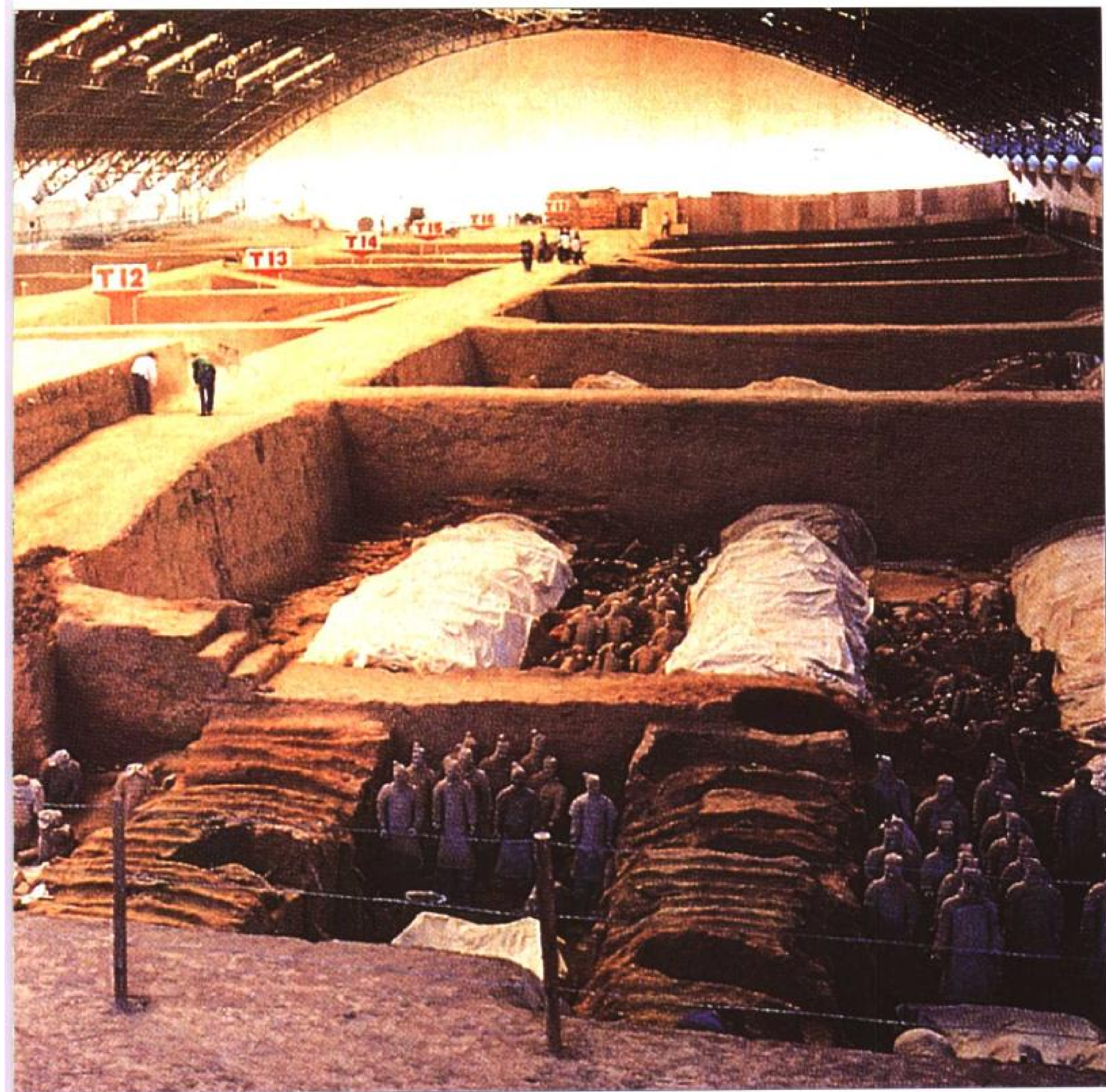
初步抽样调查表明，二号坑紧邻一号坑的东北面，坑内也集结了令人称奇的“军队”。

有80位射手均呈右膝跪姿，并自信地凝视东方。他们位于寝陵东北角的正方形坑内，四周被未着盔甲、成跨立姿势的步兵包围着。



射手西侧立着的是混和军事力量——战车、步兵和骑兵——身着盔甲的士兵左手持弩，右手握着马的缰绳。军事历史学家判断，这种混和编成的部队是长平之战的主力。他们在秦帝国诞生前一年受雇于秦国和越国。冲突的结果是，秦国一支由2.5万辆战车和步兵组成的部队追赶撤退的赵国军队。5000骑兵突破了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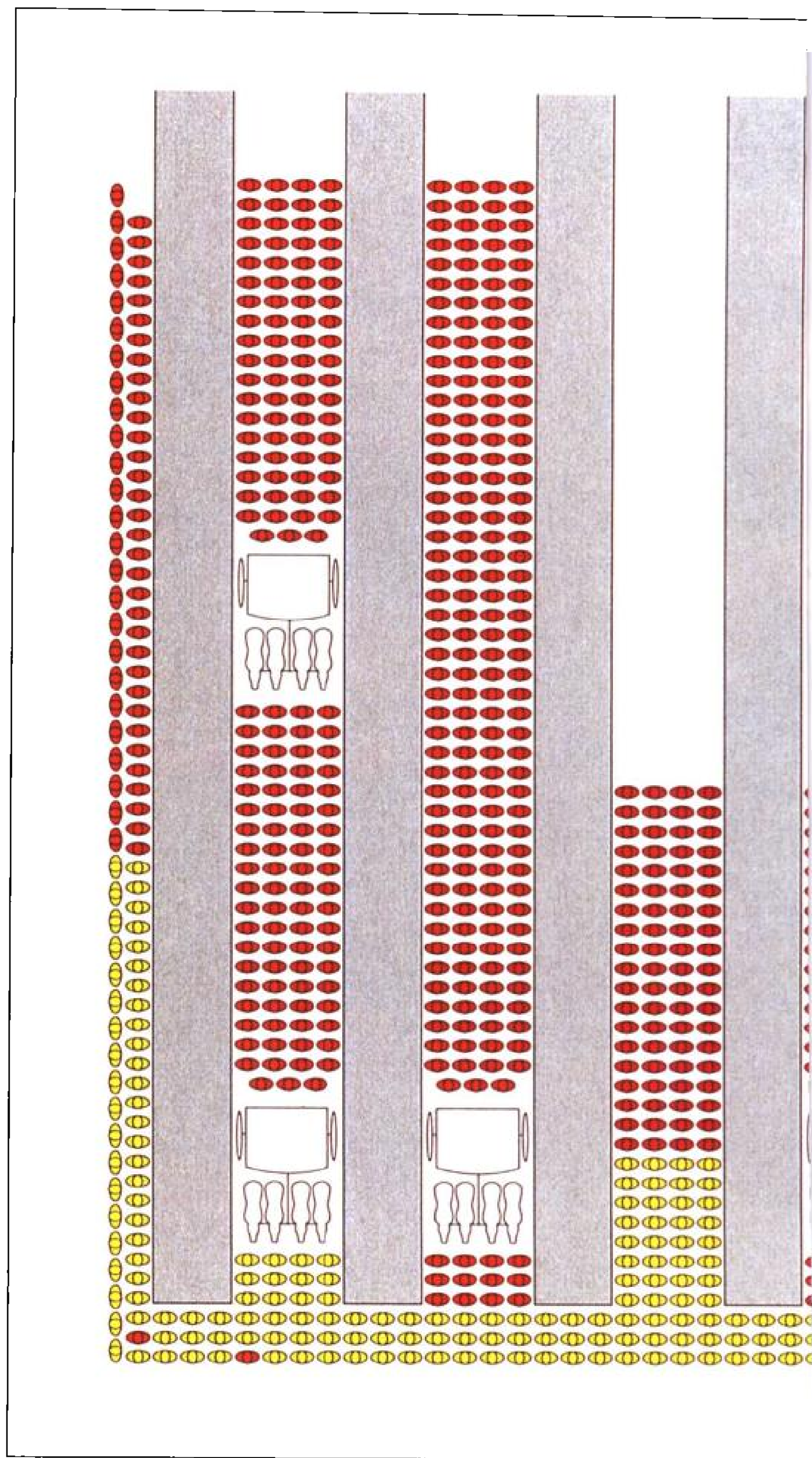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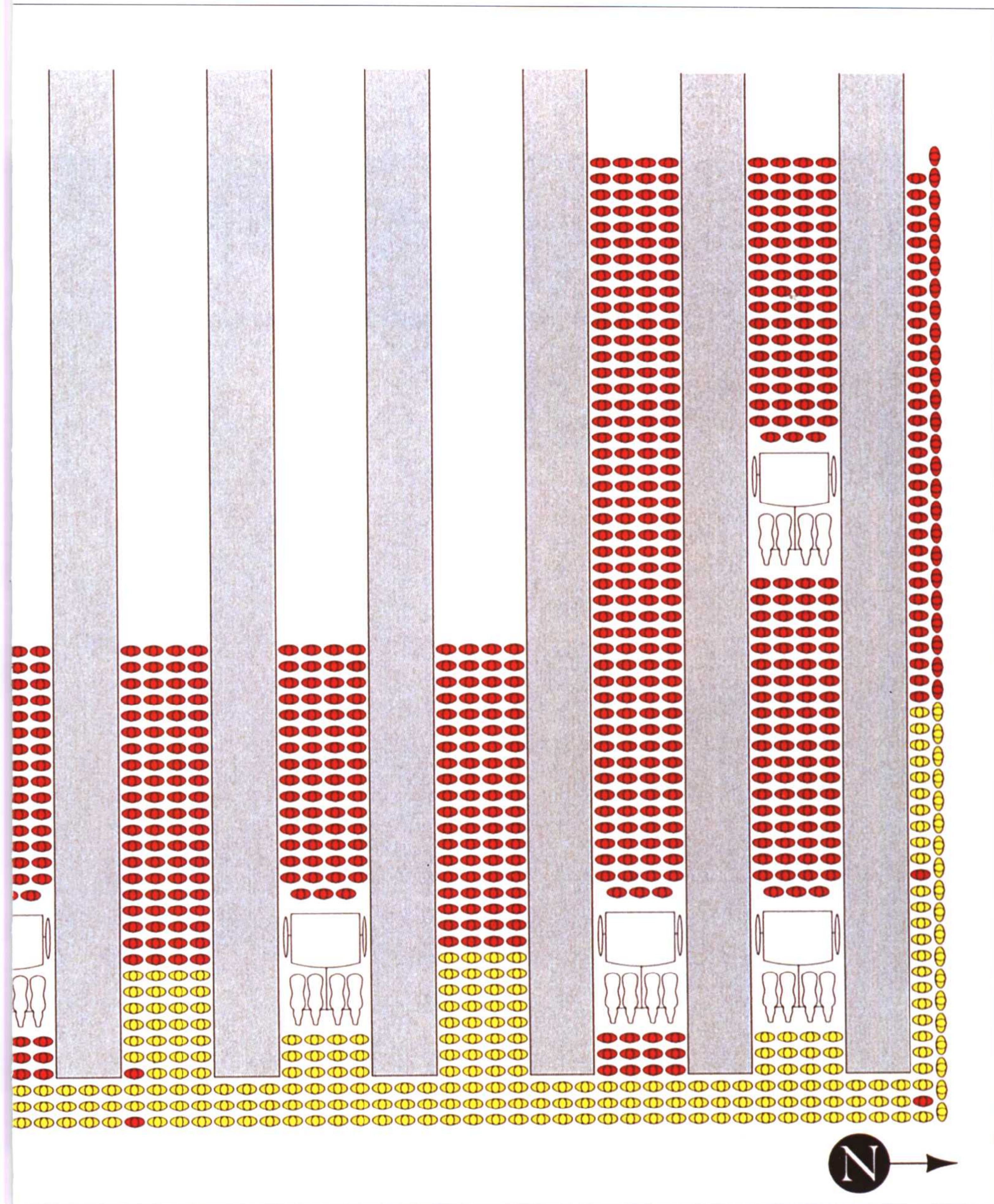
■ 1979年，秦兵马俑被巨大、永久性的保护结构与外界隔离。参观者站在接近一号坑的地面上参观，而考古工作人员则在下面坑里走廊内清理陶俑。最显著位置的围栏是游人参观平台的一部分。

人的防御阵地。这一战役给赵军以决定性的打击。赵国军队被分割，后方供给也被切断。

二号坑最南端的8个走廊是仅放置战车及驭车手的。据记载，二号坑既没有像一号坑里那样有发布命令的器具，也没有与车辆配备使用、协同作战的步兵。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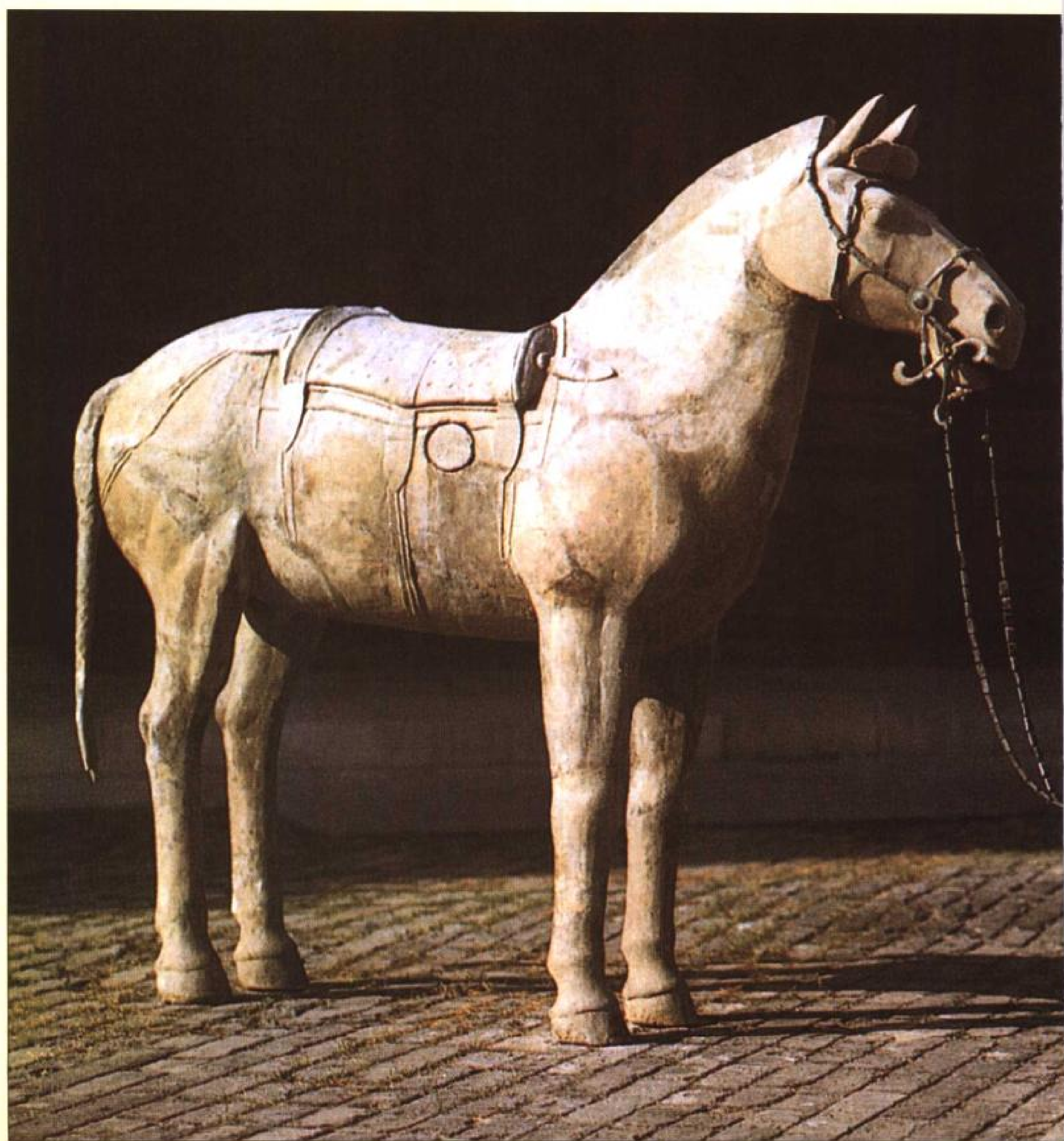
■ 到1992年，科学家们对一号坑的考古清理工作已经进行了三分之一。在坑内所挖掘出的遗迹图解示意如下：8辆两轮马车和32匹马的遗迹，还有一群着盔甲（红色）和未着盔甲（黄色）的士兵。除这些士兵外，在边缘有两行并列的士兵，每位士兵的脸都面朝东——面向被秦始皇征服的敌人的方向。





流水作业生产出的
栩栩如生的雕塑

LIFELIKE SCULPTURE ON
AN ASSEMBLY-LINE BA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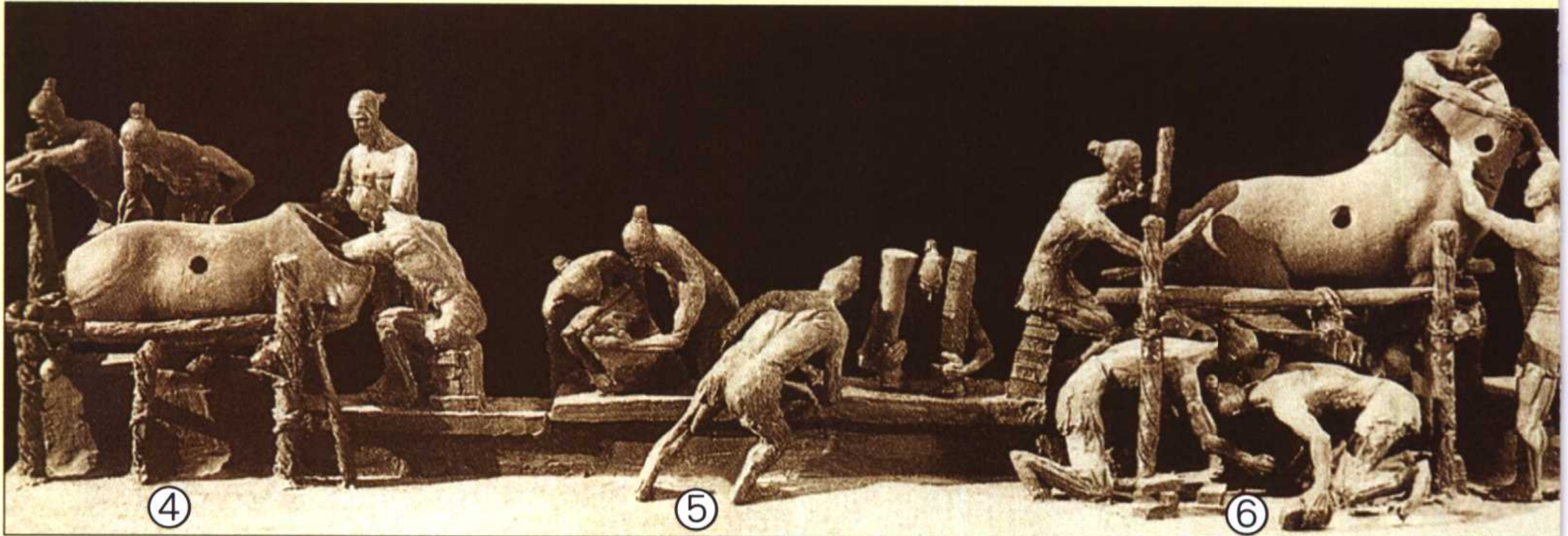
考古学家们从一、二、三号坑里发掘出来的许多陶质碎片——第一帝国兵马俑的碎片，为我们了解这支22个世纪前的非凡“军事力量”是如何被建成的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线索。例如，几乎所有的马和士兵的头部碎片都利落地一分为二。这些残破的马眼与鼻子之间的接缝，陶俑颈部两边的线，恰好从耳后穿过，穿过头顶。从内部发现的许多半边指纹，使考古学家们推测，陶俑的头是工人们用手将潮湿的粘土挤入铸模中而做成的。陶俑身体碎片也证明同样被装饰过。填充在陶马内部的稻草不免使人联想起这些动物曾以稻草作为模型。一些陶俑腿上绕着的粗绳索痕迹显示它们曾用来承担腿的重量，直到粘土在窑内变硬。后来，绳索的痕迹被陶俑的束腰给遮住了。

有487个字被不经意地镌刻在陶俑身体的各处。在这些刻字中，有230个字是数字，这些数字或许是皇帝的监工们用以监视工程进度的。余下字表示的是85位领头工匠的名字。研究人员推测，每个这样的工匠指导10到12人的助手队伍。

据史书记载，绝大多数陶工是被强迫劳役的。为了提高缺乏技艺的劳役的熟练水平，跟上严格的工期，许多作坊将富有创造性的制作工艺改为一系列流水步骤，就像现代博物馆中所模拟出来的那样。考古学家们确信，只有极少数的步骤需要技艺娴熟的工匠。

■ 一位骑兵和他的坐骑。1977年，当它们从二号坑出土时，这匹马嘴上仍套着青铜笼头。





■ 手放在肩头，5位劳力用脚和着新鲜的粘土，并且除掉粘土中的气泡①；其余的工人在捣片泥②；工人们在帮助放置稻草框架，开始做成马腹及马腿的形状③。一木头支架支撑着重量不断增加的与真马大小一样的雕塑。

■ 工匠们撤走马匹内部的稻草，并且打磨表层。但是，在马的侧面留下了一个圆洞④，在火燃起来后，促使热空气更快地流动，其余的劳工则正在装配一个中空的马颈和坚实的马腿。用薄薄的湿粘土将马颈粘在马的躯干上⑤。

■ 两个工人将马腮的手工模型加固到马头上，它由两部分手工模型组成⑥。用卷起的薄粘土片做成的耳朵被安装上去。然后直接在马的背部以手按压，做成马鞍以及鬃鬃⑦。安装完马头和马尾后，陶工的工作便大功告成⑧。

使学者们猜测，在二号坑内的马车是预备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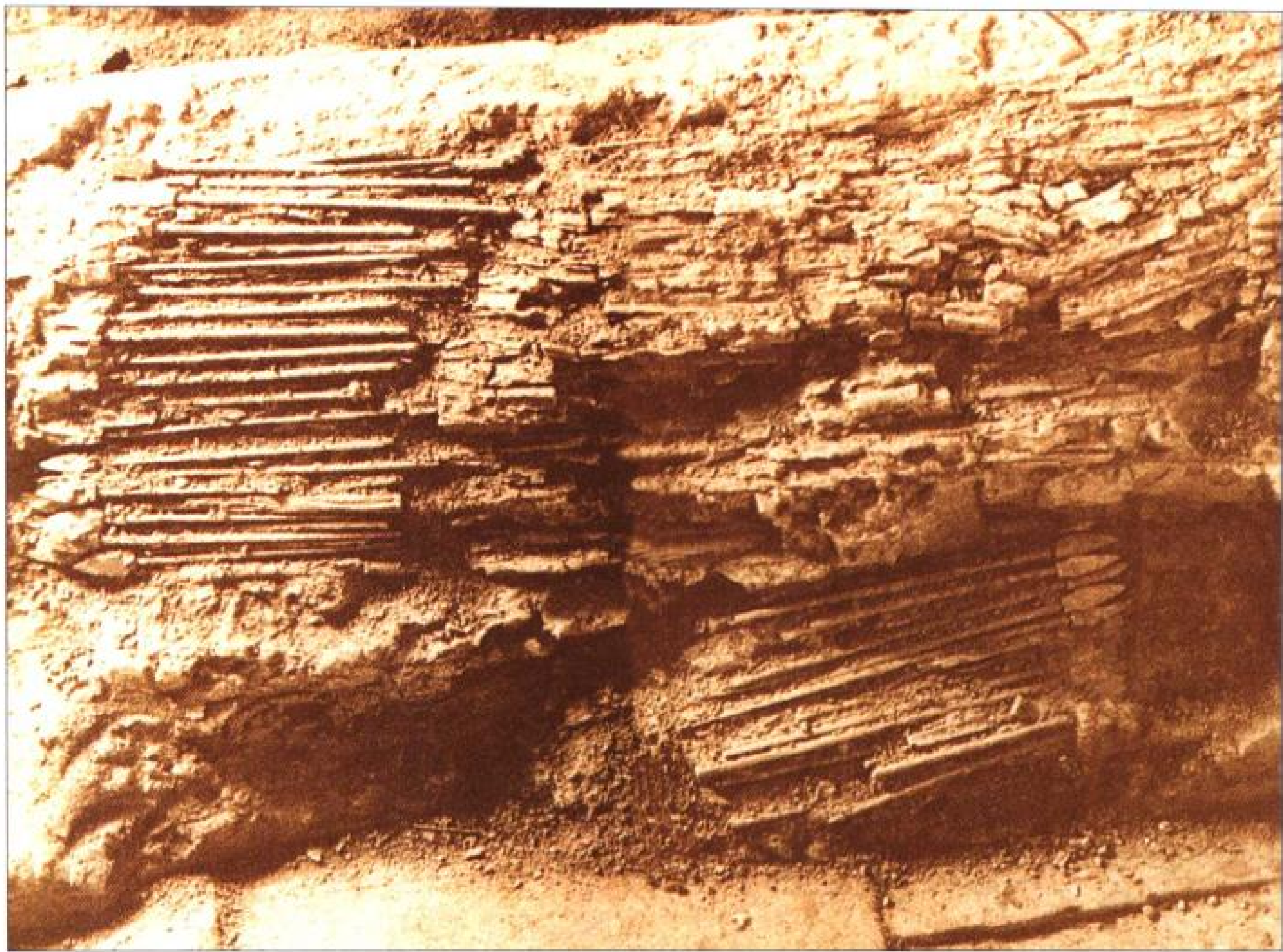
最初，大量的武装士兵——他们的脚后跟挤靠着墙，眼睛注视着前方，在三号坑的南厢房呈“V”字形立正站立。最小的3个寝室也装有陶俑。接近北边的通道候着的是两列共22位士兵。在中心墓穴附近，考古学家们发掘出一辆系着4匹陶马的战车遗迹。

军事历史学家相信，三号坑的士兵都是为所有的陶俑部队放哨值班的，而那样一辆马车是用来给战场上的部队传送紧急命令的。三号坑内的鹿角和兽骨也使考古工作人员断定，三号坑还有第二个作用，即放置祭品和用来祭祀的特殊地方，部队以此来预卜即将到来的战争的胜负。历史学家们几乎毫不怀疑秦始皇会相信这样的卜筮，但是它显示的结果未必是真的，即他刚刚建立的王朝也许将要结束。

据《史记》记载，秦朝乱政始于公元前213年的一次宴会。当时，一位来自儒家的传统中心——齐国的学者淳于越公开指责秦始皇。他说：“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秦始皇的丞相李斯愤怒地拒绝了儒士的评议。首先，他赞扬秦始皇的丰功伟绩，然后他攻击儒生们：“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也，或乱黔首。如相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

为了维护统治，防止叛乱，李斯向秦始皇建议，所有收藏诗、书、百家之言的人都必须将所藏之物



上交朝廷烧毁。如发现有藏匿不上交者，必须处以黥刑，并罚做苦役。他还建议，即使是讨论这些禁书，也应处以弃市之刑罚。只允许记录有关秦国的历史、医书、卜筮、农业及政府拥有的专业书籍留下。李斯说：“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现代的历史学家们只能依靠猜测判断，究竟有多少典籍被付之一炬。但是，一些人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认为，这一庞大的阶层——士的生活因这一命令的颁布而处于危险当中，对他们的打击远远胜过对书籍的打击。为了报复秦始皇焚书，后来的儒家学者在书写秦国历史时，都采用十分夸张的手法描述秦始皇的残暴，包括公元前212年秦国曾命令将460名儒生活埋的史实。

■ 在发现陶俑的附近，许多7英寸长的青铜箭头静静地躺在那儿，等待挖掘。在一、二、三号坑工作的考古学家们已经挖掘出了逾万件箭头、弓的扳机、剑、矛、信号钟以及其他的军事装备。

历史记载，这一史实是逆历史潮流的，而且显然将秦始皇与其治下的民众相隔离，在两者之间划下了一道鸿沟。嬴政作为秦国的国王，他侥幸地逃脱了燕国太子丹为了阻止秦不断扩张而派人对他的行刺。当上皇帝后，嬴政又曾多次成功地从袭击中逃生。其中一个行刺者是为了给第一个死去的刺客复仇；另一个刺客则是因家庭受了侮辱而行刺。尽管刺杀都未成功，但这些行刺却给秦始皇留下了后遗症：秦始皇变得越来越猜忌和寂寞。在他后来的岁月里，秦始皇热衷于寻求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和仙境。

■ 这是一件传递秦始皇命令的信物。这只老虎上一边嵌着的数字作为他的信任标志。在老虎体内尖头状的凸起与其体内另一半的凹处恰到好处地衔接起来，它是战场上的指挥官用来表示取消命令的器物。

如果发生的这一切是真的，秦始皇也许是在追寻、实践一种古老而传统的理念。那个时代的思想家认为，每个人都有两个灵魂：“魂”，提供智力；“魄”，赋予肉体生命。只要身体保持生气，魂和魄必须要有存身处，但是肉体死亡时，魂便升到天国，而魄转回到地下。为



了长生不死，必须阻止灵魂与肉体分离，这要通过生命的延续来实现。秦始皇得知这一切只有通过寻求长生不老药才能够达到。

《史记》煞费苦心叙述事实真相，可能是想捏造一个动听的故事，但是，这是一个值得复述的关于古代中国信仰的故事。历史记载说，秦始皇召集一大群方士来朝廷炼长生不老丹，他还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了8个所谓长生不老的人，希望他们能与他分享永生不死的秘

■右手举着公元前2世纪的宝石做成的拓印，这位未来的始皇帝在3个杀手之一的追杀下逃命。在左边，一位侍臣阻挡着正举起短剑朝柱子中间刺去的刺客。



诀。“秦始皇漫步东海之滨，向名山大川以及八仙人供奉牺牲，以求长生不老。”典籍称，秦始皇甚至派遣船队和3000童男童女出海，到传说中仙人居住的海上三仙山寻访神仙。尽管这支船队最后音讯杳无，但据说这些人东渡去了扶桑，即今天的日本。

方士们劝告秦始皇说，如果让臣下们知道他的行踪，那么他升仙的机会就会受到影响。于是，秦始皇决定尽可能不让下属知道自己的行踪。他命令将咸阳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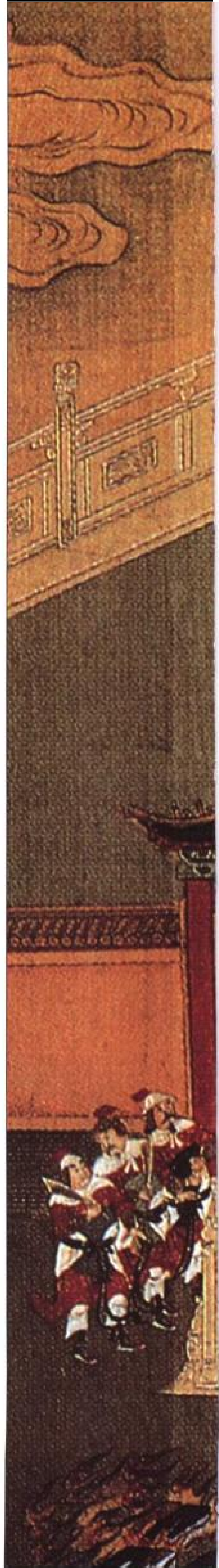
近的宫殿都以甬道相连,以使自己在各宫间的行踪不被人知晓。如果有谁敢说出皇帝巡幸所至或居住的地方,就处之以死刑。

这样,中国最高统治者秦始皇的巡游行踪就只有他身边的少数人知道。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的政权陷于危险中的迹象更为明显。就在秦始皇50岁巡游某地时,他突然病倒,随即驾崩。他的随行成员——秦始皇的儿子之一公子胡亥,曾是胡亥老师的宦官赵高和李斯三人密谋隐瞒秦始皇去世的消息。

《史记》说,这一阴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当时,帝位的合法继承人胡苏正在北方监督修筑长城的大将军蒙恬。赵高和李斯对他秘而不宣始皇帝驾崩消息,而是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他们继续巡游,照常进献饮食,并且伪造皇帝诏令,让胡亥继承了皇位。又写了一封书信给胡苏和蒙恬,在信上指责胡苏“不孝”、蒙恬“不匡正”,并且赐他俩自尽。蒙恬怀疑这是个阴谋,让胡苏再请示皇帝以求确证。但是,胡苏遵诏自杀了。在自尽前,他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

《史记》记载,到这时,因为天气炎热,皇帝的轿舆发出了恶臭。为了遮掩恶臭,李斯他们命令随从官员在各自乘坐的车中装载臭咸鱼。当胡亥最后到达咸阳后,他宣布了父亲驾崩的消息,并且自封为二世皇帝。然后,为了表示对秦始皇的尊敬和忠诚,他命

■ 这幅绢画标记的日期是17世纪。秦始皇宣判了这些蓝袍学者的命运,而在大门外,书籍正熊熊燃烧。这种场面给人以许多遐想:古籍说的焚书坑儒事件发生的时代不一,也许这件事在历史上压根儿就是子虚乌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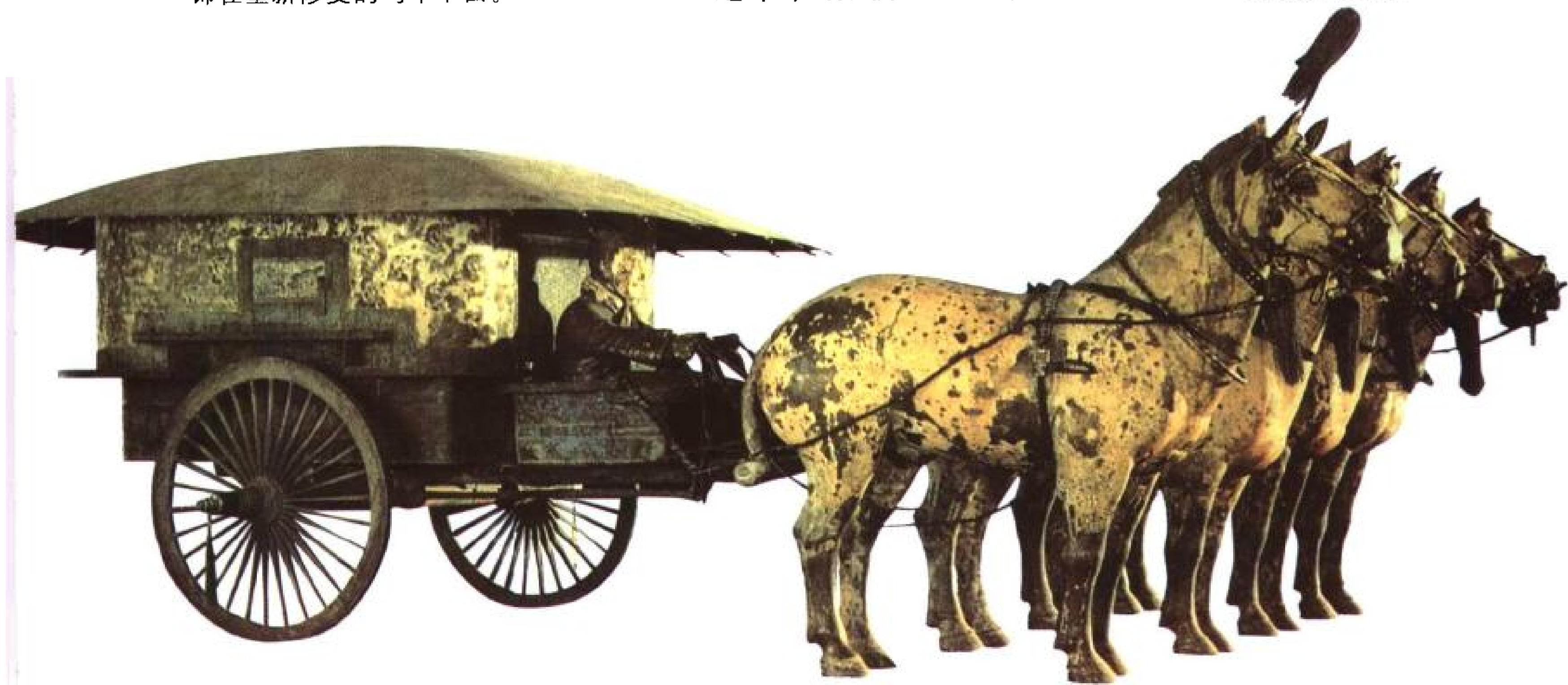
令秦始皇那些没有生子的妃嫔和修筑陵墓的工匠一起殉葬。因为工匠们知道所藏珍宝的秘密。

公元前209年盛夏，以前的楚地发生了叛乱，动荡的局势在朝廷蔓延开来。当骚乱还未波及都城咸阳时，赵高和李斯之间却产生了尖锐的权力之争。最后，太监赵高劝说二世皇帝将李斯投入监狱。在严刑逼供下，李斯承认了谋反，被判受五刑，在咸阳市上腰斩。公元前208年，李斯在咸阳市上被腰斩，他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也都被诛杀。

那一年，一支起义队伍围攻了离咸阳仅30公里远的一个小镇。仍然在秦始皇陵墓劳动的苦役积极加入义军，但是，他们还没来得及响应就被朝廷的军队包围了。公元前207年，赵高发动了夺取政权的阴谋叛乱，导演了一出假义军攻击皇宫的闹剧，胁迫皇帝退位。在随后的混乱中，二世皇帝自杀了。赵高看到自己不能称帝，就将皇位让给了秦始皇的弟弟子婴。

这年年底，朝臣和皇帝因为叛乱逃亡，都城重又陷

■ 考古学家们正在取证和保存1980年发掘的两辆青铜马车和马匹，以及完好的驭车手。它是在秦始皇墓西边22英尺长的寝陵里被发现的。尽管只有实物的一半大，每辆车和马队有8英尺长，2700磅重，车盖顶的左侧内部装饰着云形纹，它装饰在重新修复的马车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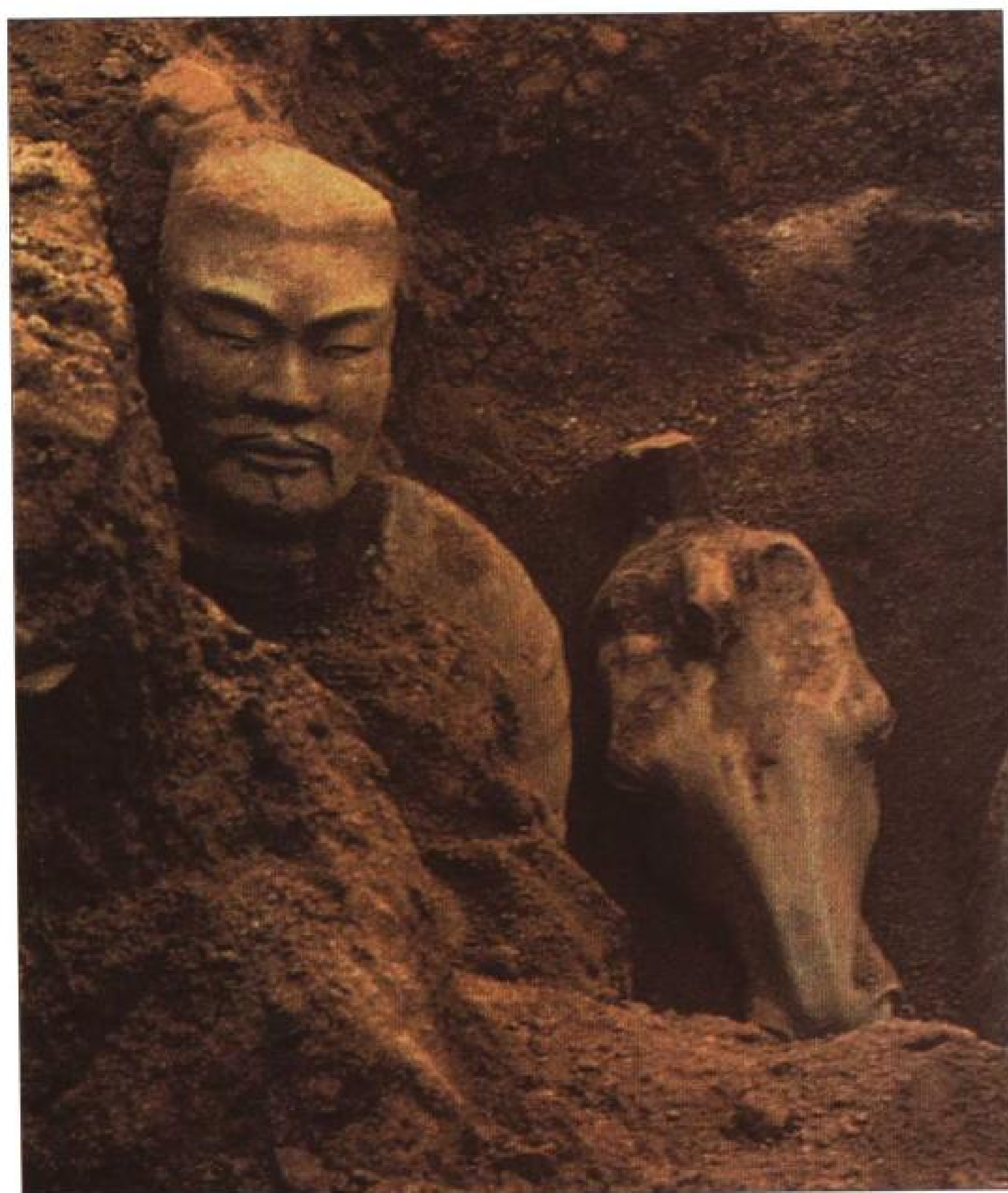
人危机之中，这支起义军是由刘邦率领的。为了避免都城被战火毁灭，子婴用绳带系着脖子，率领妻儿向刘邦投降。但是第二次，项羽率领更强大的军队开到咸阳，立即宣布了秦朝的灭亡。项羽将子婴斩首，并洗劫了咸阳，焚烧秦朝的宫殿，抢掠了秦始皇的陵墓。

经过30天的抢掠后，古代史籍这样描述项羽的军队：“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考古学家们确信，摆放陶俑的墓坑被大火烧毁，削弱了承重横梁的承受力，结果东边的墓顶坍塌了，砸碎了许多陶俑，这些陶俑的碎片也被埋葬在瓦砾中。这些碎片一直尘封在地下，直到1974年当地村民掘井时才使它们重见天日——此时已经过了22个世纪。项羽军队肆无忌惮的烧杀抢掠激起了民愤，刘邦与项羽展开了4年艰苦的战斗，最后，刘邦在垓下逼项羽自尽，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刘邦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王朝的统治者。这样，他建立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长、且光辉灿烂的朝代——汉朝。



被埋葬的军队

THE BURIED ARM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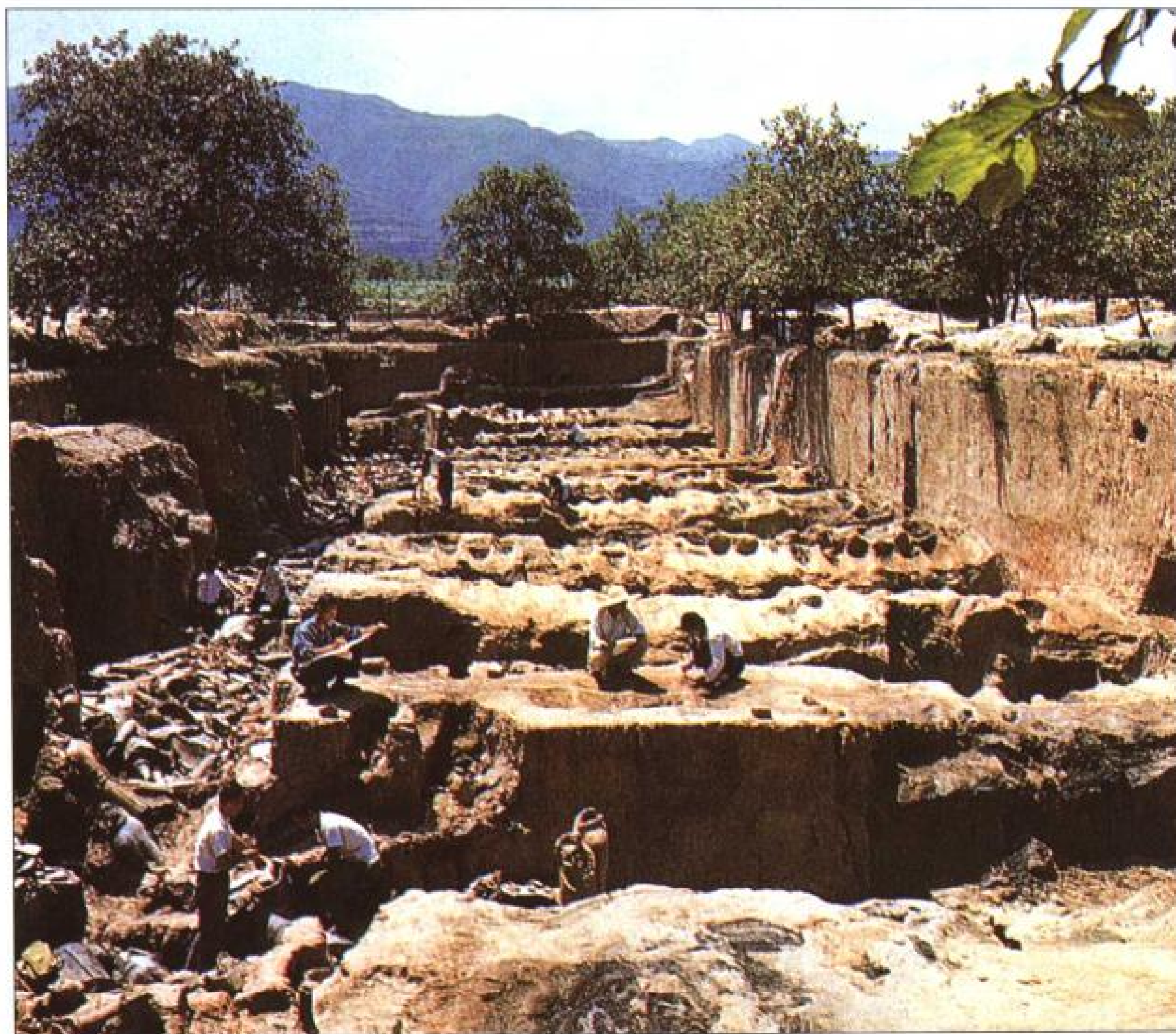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考古发现——秦始皇兵马俑，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考古挖掘。秦始皇兵马俑占地5.5公顷，其中许多地方仍在挖掘之中。出土文物最多的坑是一号坑，约16英尺深，近760英尺长，逾200英尺宽。为了建造一号坑和其他两个装兵马俑的墓坑，秦始皇共动用了几十万劳役，搬运了350万立方米沙土，这些沙土足以用来填平36座奥林匹克游泳池。

在挖掘这些墓坑以后，工人们将挖出的泥土填入坑内，将它们筑成2英尺厚、10英尺长、底层坚固的墙。有的墙有8英尺长，并且搭有用来支撑泥浆的框架。工人们也建造了宽宽的内墙作为隔墙，将一、二号坑隔成长长的、东西向的廊道。分隔工作完成后，砖瓦匠将地面铺上25万块砖。他们辛勤劳作以确保铺在廊道中央的砖比两边的高，这样水蒸汽就能从站立的陶俑身上蒸发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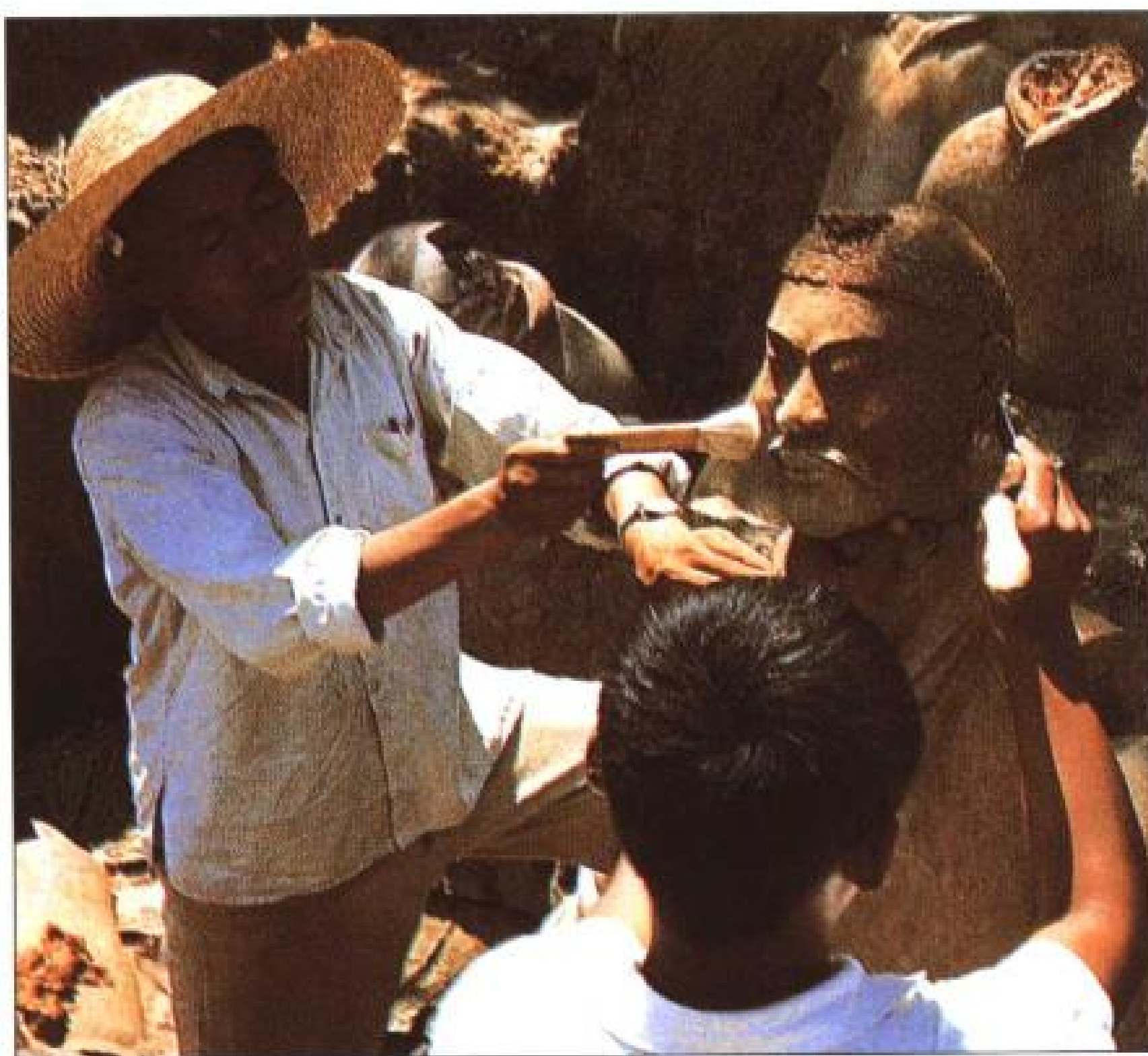
为了保护这些兵马俑，木匠们将沉重的松木或西洋杉柱子架在隔墙底部挖的洞上，并在顶部放上水平的横木，组成栅栏。在这些木头上面，交叉着40英尺长的横梁，然后再用竹子或稻草编的席子盖上，11英寸厚的陶土层现在透出了红色——这或许是2200多年前那场大火留下的痕迹。

从坡道上慢慢引向地平线的轮子，表明上面的兵马俑在顶部被封闭以前是被滚进去的。后来，斜坡被柱子、席子及夯实的泥堵住了。所有的兵马俑都被埋葬在近10英尺的地下——或许当时的建造者确信这支部队能够永远被埋藏在地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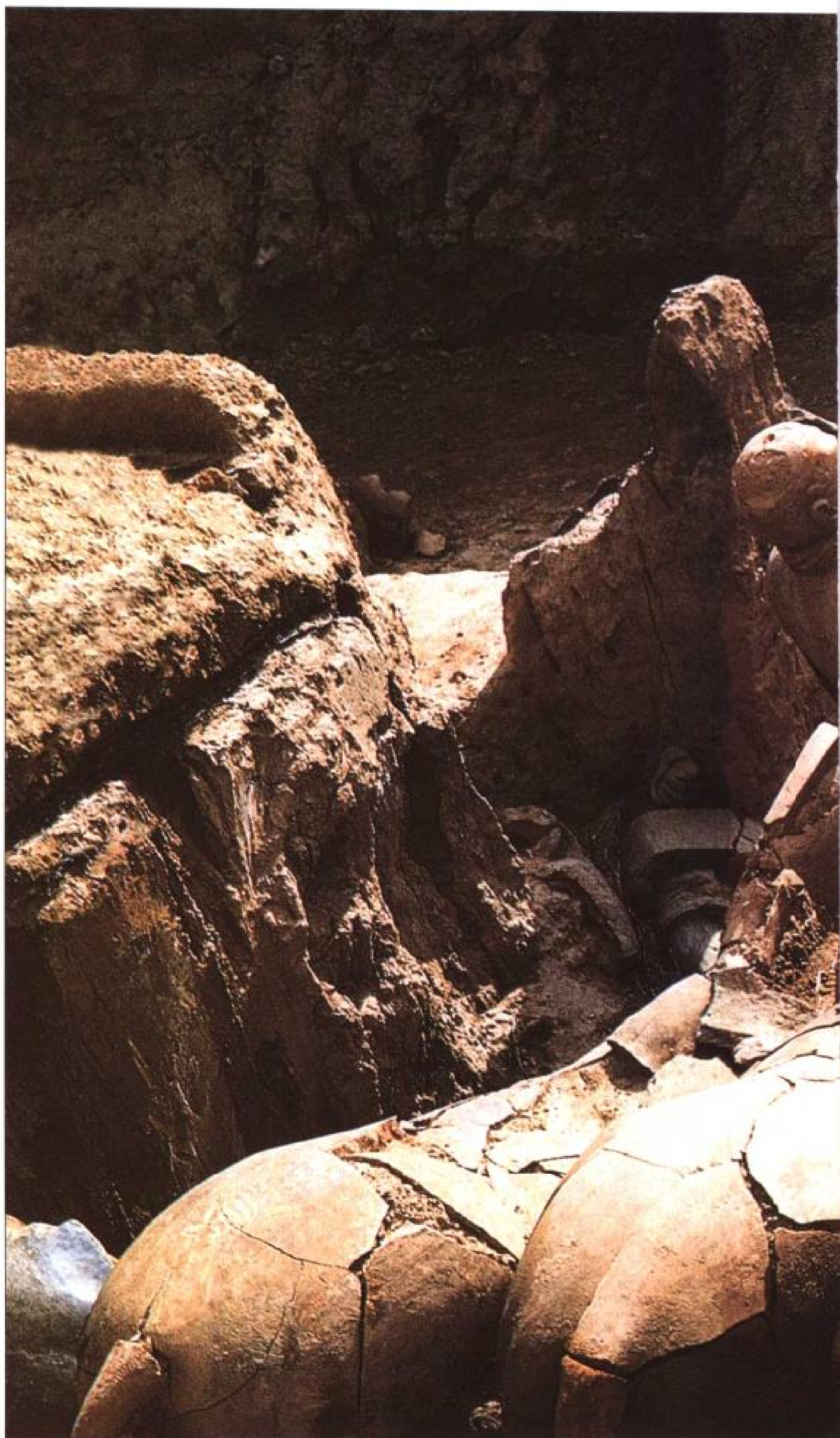


■ 1975年，考古学家考察了一号坑东边廊道的地下兵俑碎片（左），其余的工人在测量东西索道顶部的分隔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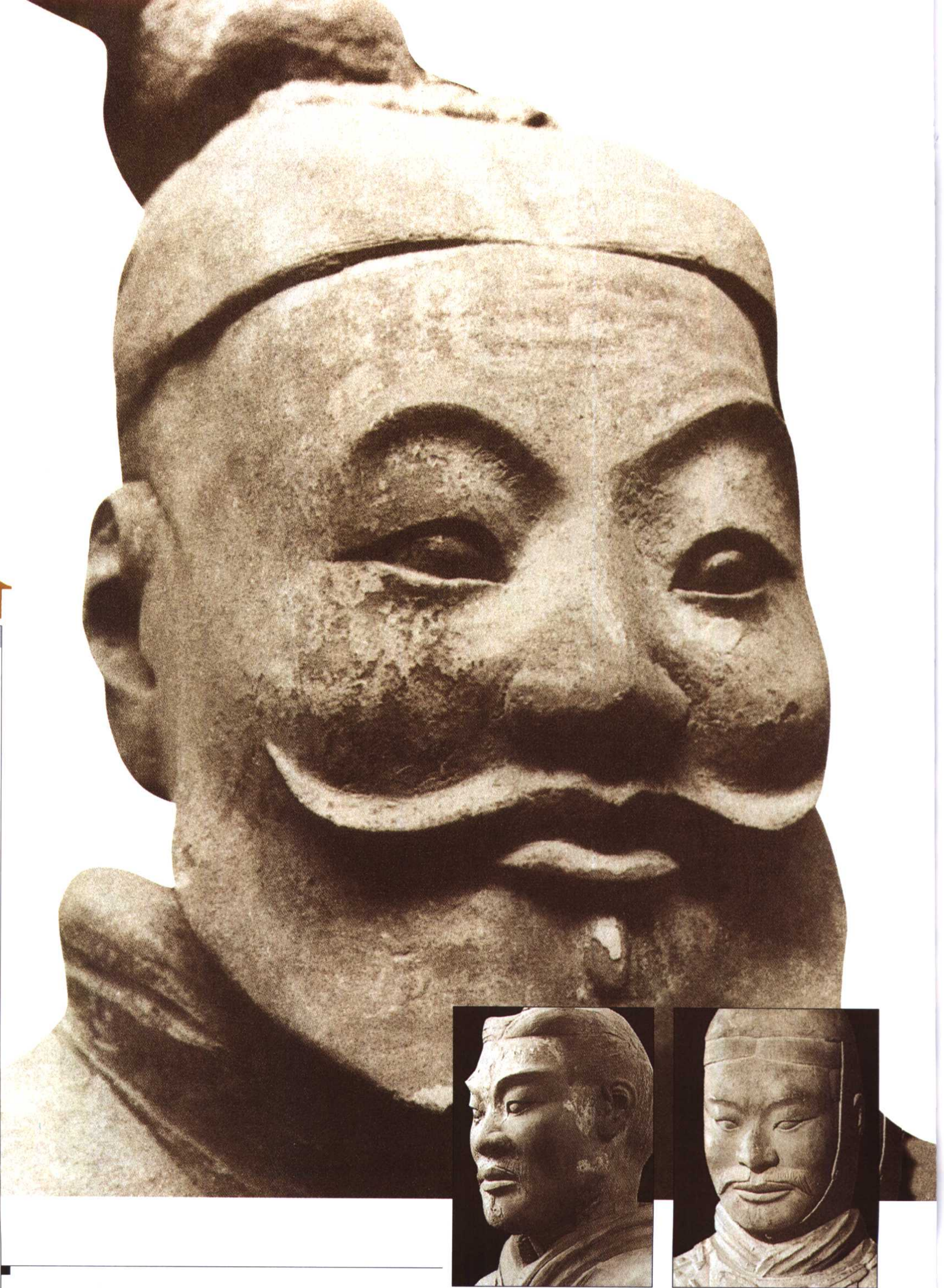


■ 考古学家轻轻地支撑着一位断臂站立的兵俑，他也许是持矛的士兵，也许是弓箭手。考古人员用刷子和泥刀清理兵俑的头部。

■ 一号坑内，4匹陶马躺在杂乱、破碎和直立的陶俑之中。这支马队最初套在一辆木制的马车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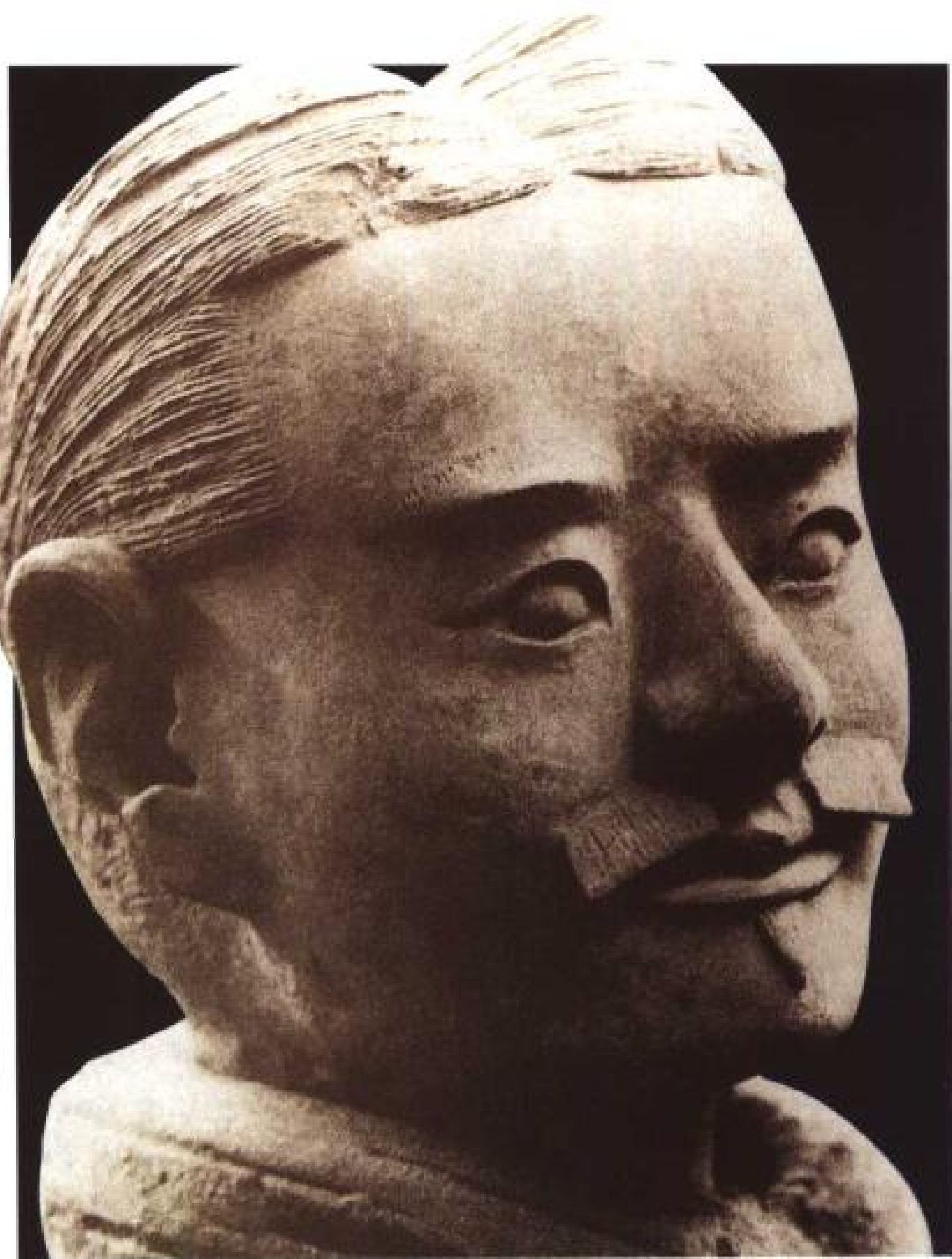


栩栩如生的陶俑

VARIED FACES OF FIGHTING MEN

尽管每一名陶俑都是独一无二的，但陶俑身体的许多部分是大批量生产的。例如，头部由前面的中空部分和后部的时髦造型构成，它们至少由8个标准铸模铸成。兵俑的耳朵、鼻子、嘴唇、眉毛及其他部分，包括几缕典型的胡须，都是预先建造的。陶工用手和铸模悉心制作各个部位，并且用薄薄的粘土和水，将它们粘到陶俑的脸上。他们也直接将模压在未经焙烤的头部做成头发，甚至发型。

学者们相信，雕刻家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创作陶俑的五官，用小刀将头部整形，并且用削尖的工具琢磨细微处。陶俑表情各异的面部在本页和下页显示出来，因此，当考古学家们第一眼见到这些兵俑时，感到非常惊讶，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思忖，这些兵俑就是一些坐着的肖像画——也许他们就是在此地被活埋的。



■ 这些不朽的兵俑们的容貌显示出不同的年龄层次、地域、栩栩如生的个性，他们组成了秦帝国强大的军队。



■ 将军俑：这位军官曾手持35英寸长的青铜剑柄，该剑在其附近出土。他翘起的食指似乎在指挥他的千军万马。他胸前及肩上的帽子流苏，做工精致的盔甲，以及雕塑的大小，都说明他是一名高级军官。他身高6英尺5英寸，是最高的陶俑之一。



■ 驭车手俑：为了驾驭4匹马拉的战车，这位驾车士兵的每只手中紧握一副缰绳，第一副缰绳在拇指和食指之间，第二副穿过食指和中指之间的缝隙。像指挥官一样，他戴的帽子上有一个精巧的冠。



■ 步兵俑：这位未着盔甲的士兵和成群像他一样的步兵，在二号坑内成排地站在跪着的射手们前面。他抬起手臂，指向左边，就像在练太极拳。这是一种与假想敌进行搏斗的武术。但是，在他附近发现的青铜箭头和长弓，使人不由得产生些许疑问：也许他的使命是防御。



■ 射手俑：轻柔、折叠起来的织物围在这个跪着的士兵脖子上。这是1977年在二号坑出土的24名步兵之一，他的盔甲上仍然有磨擦过的痕迹。学者们不能断定射手是用左手持弓，还是将武器挂在胸前发射。射手身上的颜色是根据他塑像上原来的颜色加上去的。所有的这些兵马俑塑像最初都染有鲜艳的颜色。





汉朝历史的考古发掘

THE HAN: FLESH ON THE
BONES OF HISTORY

灵山，位于北京西南约100英里处(今位于河北省境内——译者注)。1968年5月，一支特遣部队正在攀越灵山。就在这时候，战士们注意到，在石灰岩中有一条大裂缝。这条大裂缝有些异常，很不同于一般。他们停下来，作仔细检查。有个战士从裂缝的开口进到里面，他发现原来这是人工开凿的一个岩洞。在有关部门获得通知以后，河北省负责考古的单位，以及北京市考古研究所，派出专家组前来进行调查。当地的群众同考古学专家，还有战士们一起，把两面用砖砌成的墙卸开。在这两面砖墙之间，有熔化的铁浇铸成的封口。砖墙被开通后，向纵深的里面，则是一条隧道。隧道直通山体内部。这条隧道由人工开凿而成，里面一片黑暗。在隧道的另一头，有石块堵塞着，不能再深入。在一条交叉通道里，考古学家发现，这里面有16具马骨，以及6辆两个轮子的马车。正前方是中央墓室，长50英尺，宽40英尺，墓室内曾有木结构的建筑物，如今已经坍塌。明显可以看出，这个木结构建筑是模仿皇宫的样子而建造的。

■ 此图为陶制宝塔，高51英寸，属汉代豪绅的典型随葬品，由此可以看到，汉代贵族财富不断增多，社会地位不断巩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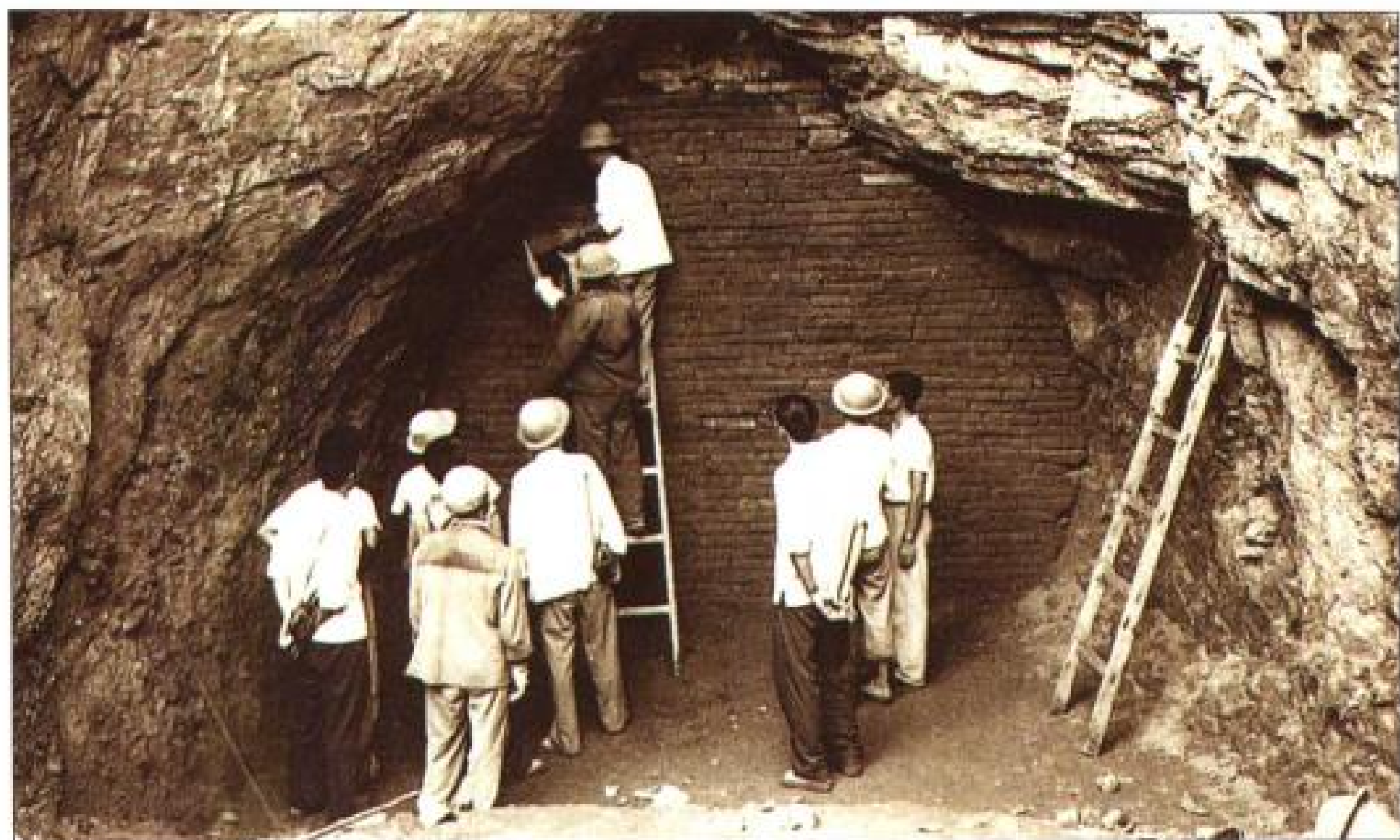
在这个墓室的后面，有单独的一个墓室。就是在这个墓室里面，负责调查的人员发现了震惊世界的墓葬。此墓室安葬的不是旁人，正是汉景帝之子刘胜的石棺。中国史学家早就知道，汉景帝是汉朝的第四代皇帝，刘胜是汉景帝的一个儿子。汉朝是秦朝之后统治中国的又一个朝代，由公元前206年开始，到公元220年结束。

汉景帝之子刘胜，在公元前154年时已被封为中山靖王。中山靖王刘胜的寿衣是由2000多块玉片用金线编缀而成。玉衣精工细作，经历数个世纪，仍然保存完好。刘胜的尸体早已腐朽。人工开凿的岩洞里面，在尘土和碎石底下，埋藏着大量珍宝，既有刀、剑等器具，还有豪华的漆器遗迹。在精致的青铜器皿上，还镶嵌着金色的龙纹。

在附近的地方，还有一个岩穴，洞口也是被砖墙和铸铁封堵着。在岩穴里面，挖掘人员找到8枚牙齿碎块，这是刘胜之妻窦绾的遗骨。窦绾的寿衣也是玉衣，在她的墓葬中，还有随葬的汉代艺术精品。窦绾墓中出土的酒器，上面镶嵌着金子和银子。有一只镀金的青铜凤凰，身体表面覆有绿宝石，在其喙内，衔有玉环。最具有独创性的，是一只青铜灯台，为跪姿的侍女造型，在侍女手上，提着圆柱形的提灯，提灯可调整方向，还可调节亮度。

研究人员经过推算认为，要建造这两个墓室，以及制作墓室内随葬的2800件器物，至少需要100人共同来完成。当代的学者经过计算认为，每件玉衣大约需要10年制作才能完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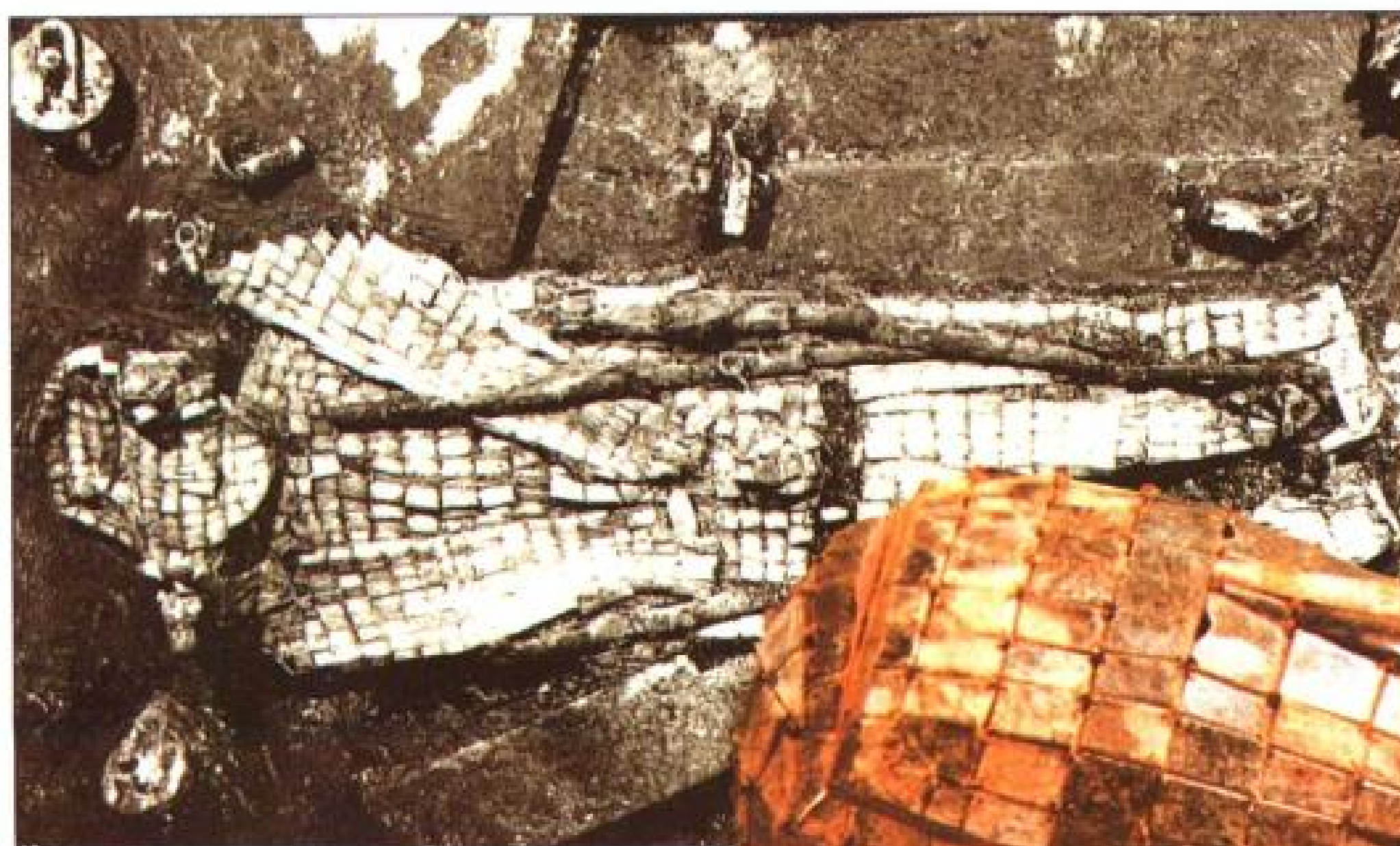
据汉代史学家司马迁记载，“刘胜嗜酒且好色”。在刘胜看来，好饮好色，不为恶行。他对他的胞兄赵王，极其鄙薄。刘胜认为，赵王整天忙于政事，不得偷闲。刘胜曾说：“我兄身虽为王，而所务尽是役吏之劳。身即为王，打发时日，理应乐于幽声美色。”胞兄赵王，拒绝接受刘胜的意见，反而答复说：“中山靖王以耳目之娱，消遣时光，未助天子以成治理百姓之功。”



■ 此照片摄于1968年。考古学家正准备卸开砖墙。第一面砖墙的后面有熔铁固封。这就是窦绾墓，窦绾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妻，这个墓穴已有2000年的历史。



■ 考古学家正在中山靖王刘胜墓里做考古工作。更深处有一扇门，是通往墓室的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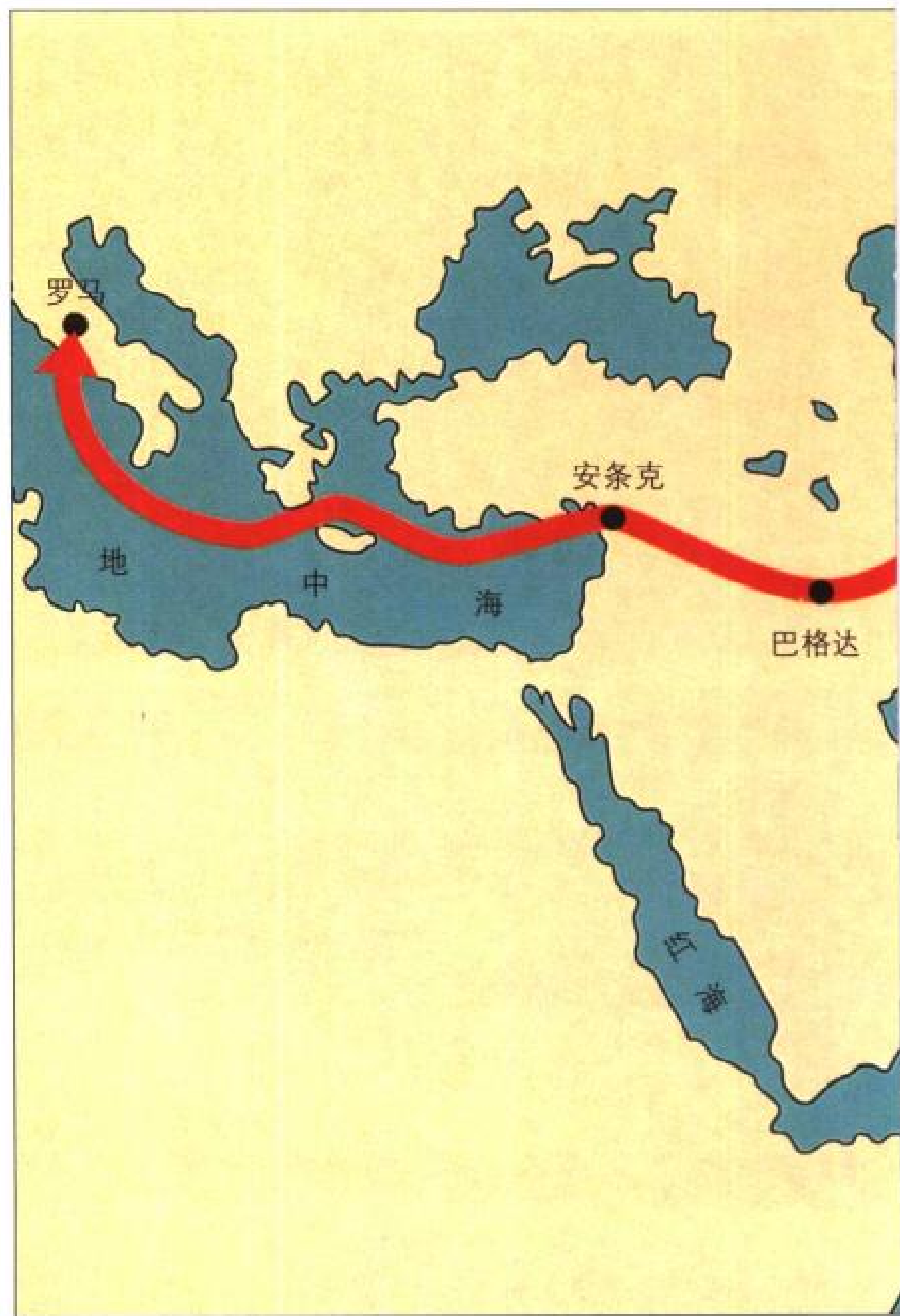


■ 此照片在墓室内拍摄。墓室内放置着刘胜的石棺，还有他所穿着的玉衣。

正如考古学家罗伯特·索普所指出的那样，中山靖王与其胞兄两人之间的争辩，不简单只是他们在见解上的分歧，而更反映出他们生活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汉朝的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汉朝历时400年，达到空前的鼎盛繁荣。艺术家和工匠，包括刘胜所谓“幽声美色”的那些创造者，在此期间，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同时，经济的增长，知识的发展，地理学和哲学的探索，以及技术的提高，标志着汉朝社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汉朝发展到顶峰的时候，汉朝的综合国力，及其辉煌的成就，堪与远在西方的罗马帝国相比。同是在这个时期，罗马帝国获得繁荣发展。经过以前数代人的不断努力，汉朝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稳定的国家。汉朝的历代皇帝，不断巩固了前人所取得的成绩，并向外扩张疆土，他们决心要把汉帝国发展成东亚的惟一强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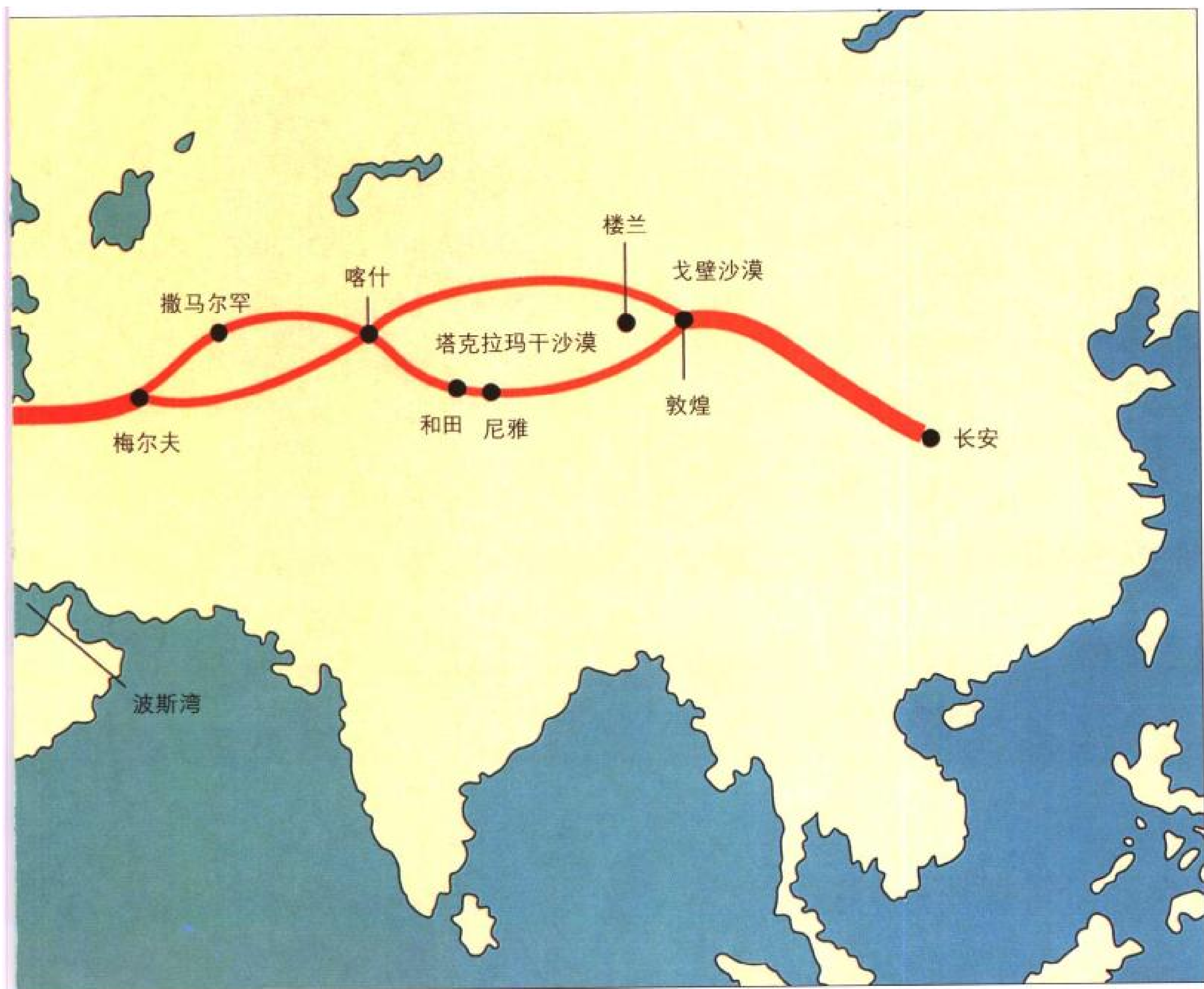
这也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在边疆地区，敌视汉朝的部落侵扰不断，需要加强边疆的防御。而在国内，汉朝的统治也经历了变故。汉朝中期时，统治者的继承顺序被打破，汉朝的贵戚摄政王王莽篡夺王位。王莽的统治维持了14年(从公元9年到公元23年)，到汉朝重掌政权时，王莽的统治才宣告结束。尽管新莽的统治为时短暂，但是史学家通常把王莽的统治作为汉朝的分界点，以前的汉



朝称前汉，或西汉，以后的汉朝称后汉，或东汉。

汉朝尽管存在动荡因素，但是，汉朝人和与其同时代的罗马人一样，开创了一种生活方式，在后来的2000年里，这种生活方式却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汉朝的皇帝贤愚不等，既有暴君，也有明君。汉朝杰出的官吏不断涌现，法家辈出，既有工程师，在千里边疆修筑交通道路，建造防御工事，又有商人，浩浩荡荡的商队来往于通向西方的贸易通道上，这些贸易通道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

■ 此图显示的是汉朝的贸易运输大动脉，即丝绸之路。有数条小路绕行广袤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绵延直抵地中海。丝绸之路横跨4000英里，在这条贸易通道上，骆驼商队把中国的丝绸运到西方，又把西方的黄金和玻璃运到东方。并没有哪个商人横穿整个的丝绸之路，商人们都只在沿途不同地段做商品买卖。





汉朝还涌现出一大批诗人，他们工于词句，善达心声。而最著名的，当属汉朝的史学家。其中，司马迁撰写了《史记》，而班固则完成了《汉书》。这两部史学巨著，不断有人抄录，得以流传至今，可供学者仔细查阅。近年来，汉朝历史的考古发掘越来越多，史书古籍所记载的大事，可通过考古发现而予以证实。

汉朝和以前的朝代一样，推崇这样一种信仰，即“事死如事生”。因此，汉代的殡葬习俗给后世留下了大量历史遗产。人死之后，他们的随葬物品可反映出其生前的社会地位。关于随葬物品，等级规定非常严格。

穷人的随葬品很少。1955年，在河南省洛阳市挖掘出土了汉代农民的墓葬，墓葬中仅有一些粗陶，以及最简单的一具棺材，吊亡者所能给予死者的赠物仅此而已。但是，对于富豪或身份较高的人，其墓葬情况则完全不同。为了确保富人或贵族的灵魂，在阴间也能生活得愉快，墓葬中的随葬物品相当丰富。跟过去的数百年一样，吊亡者在安葬父母时，在棺墓中放置各种实用器物，以及各种奢侈品，其中包括青铜器、漆器、食物和饮品、家具、服装、铜镜和化妆品、官印、法律文书，以及帛书和竹简书。

随葬品还随着年代的变化而变化。宝贵的器物不再作为随葬品。有些家族因为过度用珍宝作随葬品，而变得贫穷落魄。在这时的随葬品中，吊亡者更多地使用小型的陶器雕塑、陶马，以及农场和房屋的陶制品，再配上小型的陶器人物和动物形象。

另外，在砖头瓦片和门柱上，以及支撑墓室的立柱上，保留有汉代的生活景象。在有些墓葬中，壁画生动地再现了死者生前所熟悉的生活场景。

精美的玉衣

REVERENCE
FOR JADE
OF HEAVEN,
GUARDIAN
AGAINST DECAY

在中国，玉石与象牙和黄金相比，以其质地坚硬而透明，经过琢磨备显精美温润，故而更受青睐。在南越王赵默的墓葬中(1983年发现)，发现有用玉片编缀成的精致的玉衣。在中国，玉石含有珍贵和纯洁之意。玉石是中亚软玉，白色质地而有红色纹理或棕色纹理。(而绿玉则属于硬玉，在公元17世纪以前，中国没有绿玉。)

玉石用于宫廷礼仪中，有“天国的宝石”之美称，是王侯和贵族的象征物品。在殡葬仪式上，玉石可献于上苍。富人以玉石为装饰品，而且在孔夫子看来，玉石尽显“君子之德”，在玉中，包含着智慧、仁慈、忠诚和真理。(孔子曰：“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屈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礼记·聘义》——译者注。)

从公元前第五千纪开始,玉石已经作为墓葬中的随葬物品。后来,以玉石有防腐之效,被放进尸体的各个孔道,以防止尸体腐烂。玉蝉通常放在尸体的口腔里,因为蝉这种昆虫,在地底下生长时间很长,它们慢慢钻出到地面上来,仿佛在死亡后又复活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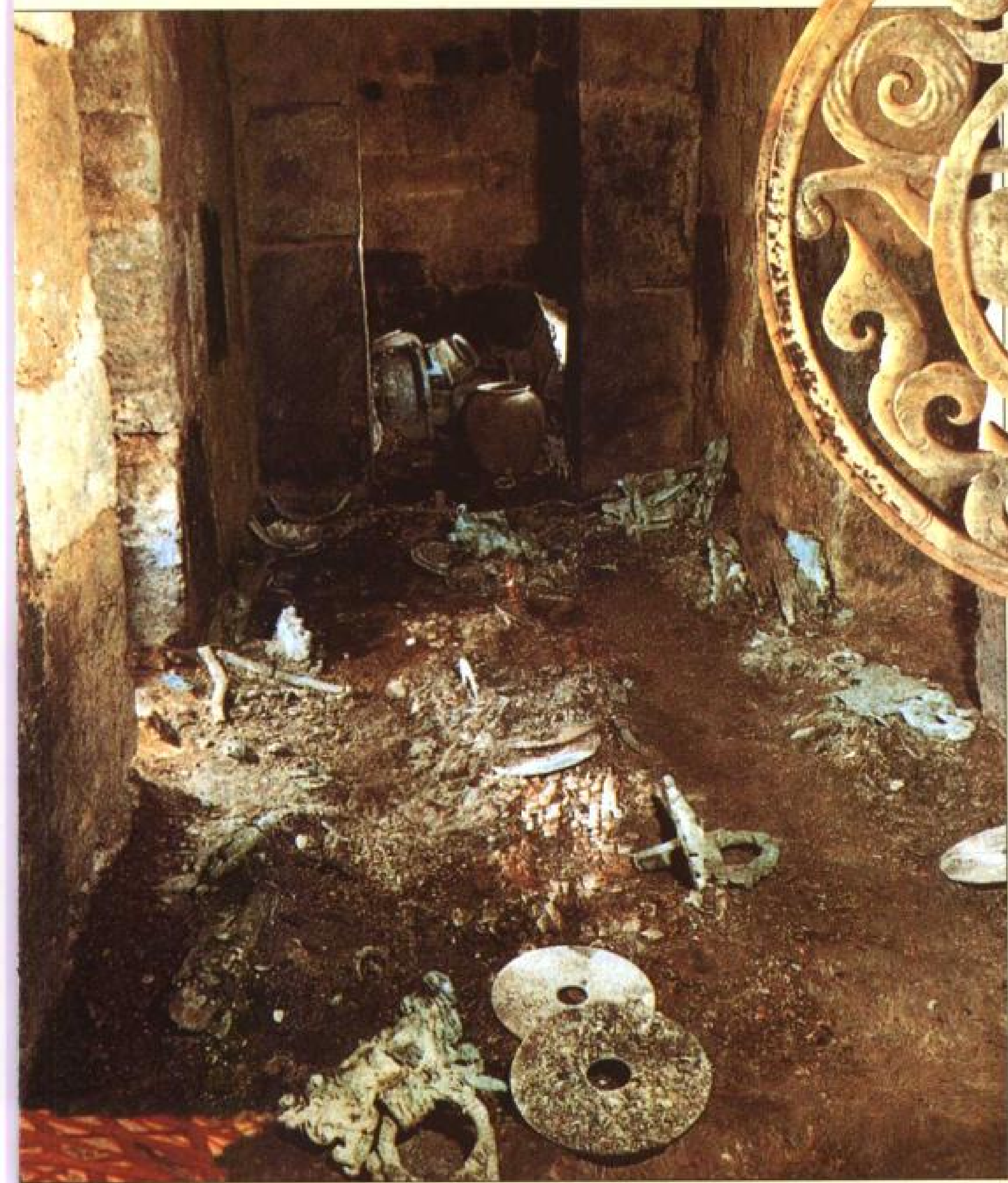
从商朝开始,用玉器作为随

葬品已经成为一种习俗。但是,直到东周和汉朝的时候,玉石雕刻技术才发展到高峰,玉石被雕刻成完美的工艺品。在公元前122年,自称南越王的赵默被安葬,墓地在今天的广州一带,他身着玉衣,墓葬中的随葬品还有其他的玉器200多件。这位赵默

公然违抗汉朝禁令,以活人作陪葬,为赵默陪葬的有他的四个妻妾,五个厨师,还有一个工匠。这件华贵的玉衣长存于世,而刘胜的尸体仅剩下一具骸骨,万世不朽的奢望未能实现。



■ 在1983年,赵默墓被打开。在此之前,这座石墓已经安静地等待了2100年。在照片中,赵默的棺木已经不存在了,仅剩棺材上的青铜把手,玉衣也已经散碎,上、下分别有数只玉盘。在玉衣的头部旁边,考古学家发现一块玉片,如图所示,玉片雕刻成龙凤形象,龙在内环,龙爪下边有一只鸣凤,凤头和凤尾均很夸张,占满外环。





■ 此图显示的是一只玉碗，碗盖及其盖顶环饰由完整的一块玉石雕刻而成，可称得上是一项绝技。碗盖早已破碎，现已经过仔细修复。玉碗外表面上，布满搭勾的罗纹，以及突状点式装饰。

■ 这件玉衣为南越王赵默所穿。类似的玉衣已经发现数件。经过修复以后，玉衣共用2291块玉片，以红丝绳编缀，再将玉片粘在布料表面。



■ 此图为赵默墓的一部分，图中的玉器更加精美。一只角状酒器，雕刻着龙形，龙头上长角，龙尾形成底座。



汉朝的工匠通常以日常生活为表现的对象。因此，皇宫里的王子王孙，正在巡逻的武士，作坊里的工匠师傅，田里的农民，百姓家中喂养的猪和禽类，这些事物，我们现代人都可以在汉代的墓葬中发现。借着这些艺术品，加上汉朝社会对死者的虔诚祭祀，史籍中所描述的历史骨架便有了鲜活的血肉，与此同时，汉朝的繁荣景象也向我们敞开了一扇门窗，让我们透视到里面丰富的内容。

汉朝的第一位皇帝是刘邦。刘邦出身行伍，家境贫寒。在后世的史官笔下，刘邦被描写成一位勇士。他长着尖挺的鼻子，有龙象，他还是一位美髯公，而且在左腿上，有72块黑痣。这是一个吉祥的数字。他在公元前第三世纪晚期，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此时的秦王朝已经摇摇欲坠，叛军和匪帮四起，要推翻秦朝的残暴统治。刘邦是天生将才，他作了叛军的一位军事将领。他精通谋略，在战场上大胆指挥作战。但是，他缺少知识。确实如此，据记载，他极其鄙薄做学问之人。在叛乱期间，有头戴方帽身着长袍的儒家弟子组团前来助战，他们希望运用自己的知识来帮助刘邦，然而刘邦却大发雷霆，夺过一位学士的方帽，溲溺其内。

刘邦粗鄙无礼，尽管如此，他却有一些实用的能耐作为弥补。刘邦不仅打败秦军，还战胜了竞争对手。刘邦曾在竞争对手的麾下听命。接着，他定都于长安，即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近郊。在长安，刘邦自立皇帝，称为天子。

刘邦所建立的王朝尚不稳固，仍然面临着艰巨的挑战。国家尚未完全统一。推翻秦朝而带来的政治动荡，必须加以平复。刘邦登基作皇帝以后，给自己所信任的追随者分封领地，各路诸侯的子嗣和亲族在边远地区割据称王。

为了把各自独立的封地统一起来，中央政府采取官吏等级制



度。通过对官吏的能力进行考核，然后再加以委派和任用，这就打破了以社会或家族关系为基础的官吏制度。有前途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进行选拔。各郡官员挑选出有才能的人，供中央任用。一经委任，各级官吏都可以从这种精英领导体制中获得益处，他们可以定期获得升迁，并有金、银或铜质官印，加上紫、蓝、黄或黑色印绶，以显明官爵和薪水。刘胜的父皇于公元前144年颁布一项圣谕，宣称“如今，众官员应百姓之导师，其坐辇、朝服和袍带应当与其身份相匹配”。这些官员在去世之后，其身份标志也被带到他们的墓葬中。在墓葬的挖掘过程中，官吏升迁及其任职履历，以及各种官印，还有用帛绢和竹简写成的书籍均有发现。

在各种专职人员的管理之下，政府可以承担大型的公用工程，这些公用工程可用于防御或开展经济活动，或抵御洪旱灾害。在人口过于稠密的地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要向较为空旷而可耕种的地区进行移居。曾经有多达两百万的移民，在北部边界地区重新定居，以加强边疆地区的安全。

这些影响深远的计划，在汉朝都城长安得以制定，长安是汉朝的中心城市。（在公元1世纪里，汉朝发生政变，此后，汉朝皇帝迁都洛阳，洛阳城位于邙山脚下。）在长安遗址的挖掘中，发现在长安城四周，有横跨护城河的木桥。长安城有12座城门，每一面城墙都有三座城门。城墙高40英尺，用泥土筑成。长安城内，占地13平方英里，建有皇宫、仓库、政殿、兵工厂以及平民住房和富豪楼宇。贵戚居住在皇宫附近，平民居住在城北较远的地方。在皇宫里面，汉朝皇帝起居其间，和世俗世界相互隔绝，以保持其帝王身份。陪伴皇帝的是奴仆和崇信的宦官，还有宫里的女子，包括皇后、妃嫔和皇太后。

在长安城内，最活跃的地方是集市，当然，集市也是最喧嚣的地方。当时的史官记载，长安城里有数个集市，每个集市都有政务官，对商业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公元1世纪时的某文学家曾

经写到，在长安城中，果蔬小贩、算命先生、治病郎中以及牵着鹰隼的猎户，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在人群之中，连转身都困难，更别说满载货物的车辆了。商家客户们，偶然也可以为之一振，因为集市也是公开处决犯人的地方，以获训诫百姓之功。在集市上，被判处死刑的犯人由行刑官将其梟首和斩为两截。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发掘长安城遗址过程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钱币铸模，这表明在西汉时期，使用现金的经济活动已经开始，而且加速商品交易的这种金属货币，其铸造工作就在商业中心附近完成，这样可以方便货币的流通。

在富人家里，拥有大量的金属货币，这使他们的生活可以充满无穷的乐趣。现代考古学家通过挖掘富人墓葬，发现了大量的此类证据。在富人的生活中，有各种娱乐形式，陶制艺人玩各种杂耍，腾跃，击鼓，表演杂技，或和着小型乐队的音乐而轻歌曼舞，乐队的乐器有笛、铃和箏。在一幅壁画上，数名厨师正在厨房中准备晚宴，精美的菜肴包括很多种。在浮雕花园里，灌木和鲜花散发着香气，池塘里还有色彩缤纷的鲤鱼，鸟儿们在歌唱，珍禽异兽在游荡。

通过对汉朝都城长安的挖掘，加上在墓葬中发现的各种建筑复制品，学者可以拼凑出一幅古代都城的画面。皇宫使用木材建造而成，有高高的门廊，墙壁涂成白色或红色。在皇宫的遗址上，考古学家发现了半圆形的屋顶瓦。有些瓦片是屋檐边上的，其边缘还有圆形的装饰。这些建筑遗迹和陶制人像，以及墓葬中的壁画，都显示出其最初的生活景象。其中有些瓦片装饰简单，仅仅是云彩图形，而有些则附有祈求万世幸福的祝文，或政治色彩浓厚的宣言。在动荡的北部边疆地区，发现一块瓦片，上面有这样的宣言：“苍天使外族人臣服。”还有一块瓦片，向所有的入侵者发出警告：“所有外族人都应当顺服。”

从乡村院落，到雕梁画阁，富人和贵族所居住的房屋非常宽

敞。房间里的家具均为雕刻精致的木器，地面上铺设着用羊毛织成的地毯。生活在其间的人们，有选择地保留着他们的个人财产。尽管那些房屋已经消失了，然而他们舒适的生活方式却通过其墓葬显露无遗。

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在马王堆发现了三个墓葬。马王堆汉墓遗址距湖南省长沙市不远。这三个墓葬是汉朝的软侯家族墓。软侯死于约公元前186年，墓穴中安葬着他的妻子、儿子和软侯本人。由于水分的侵蚀，软侯墓损坏严重。其他两个墓葬则较为完整，为研

■ 出土于湖北省某墓葬。此黏土模型高28英寸，中有庭院、门房和瞭望塔。属于典型的庄园结构，为富人所有。这种庄园成为汉朝的社会与经济中心。



究汉朝社会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软侯死后18年，软侯夫人及她的儿子于数月间相继去世。随葬的日用品有很多。软侯夫人墓中的随葬物品保存异常完好。尽管墓穴中相当潮湿，但是，在软侯之子的墓穴中，仍有大量手稿抄本帛书，帛书被保存在竹篮里。这些帛书手稿有汉字12万多个，为当代学者研究两千年前撰写的史籍、地理、医学、天文和哲学著作，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在帛书手稿中，有最早版本的《道德经》。《道德经》是道家的一部经典著作。在这个版本中载有其他版本遗漏的章节。《道德经》是一部哲学著作，完成于战国时期。在一部天文学论著中，记载着关于宇宙星座的知识，还有关于至少五大行星的认识理论，其中包括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还有一部关于身体锻炼的养生法著作，有40幅动作插图，并有文字说明，指出这些动作是根据各种动物的动态发展变化而来的，书中还说明了调节呼吸的正确方法。

软侯夫人在她儿子死后不久即去世，并安葬在她儿子的墓葬旁边。在软侯夫人墓中，出土了上千件随葬物品。不仅如此，软侯夫人的尸体保存异常完好，经过2100年的时间之后，其体肤仍然保持柔软和润滑。吊唁者为保证软侯夫人在死亡以后，仍然能够生活得幸福美满，还提供了各种食物和菜单，甚至食谱，放在她的墓葬中。

汉朝的富豪们之所以能够生活舒适，食而甘味，是因为有数百万的民众在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付出着辛苦的劳动，他们为汉帝国辛勤耕种。西汉有位皇帝曾经说过，“农业是全社会之根本”。在制定农业税收政策的时候，他说：“农业是天底下最伟大的职业。”

汉朝的皇帝们知道，国家的富有依靠的是农业的丰收。国民人口多以四口或五口之家为单位，在小块的农田上耕种劳动。农田有时也属于自家所有，但是在通常情况下，属于地主所有。地



主收取地租，多达收成的一半。地主的身份不同一般。在汉朝，有些地主还要求在他们的墓葬中放入租约的抄本，以确保他们能够永世拥有地主的权力。

谷物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也是中国最基本的粮食产品，包括在北方中部地区种植的小麦、粟、大麦和大豆，在南方种植的水稻，还有大麻。大麻的纤维可用来织布做衣服。在可能的情况下，农民尽可能地养头猪，或养些鸡。但在普通农民的食谱中，肉类仅占一小部分，只是偶然食用而已。

在经常动荡不安的边疆地区，农民有时还充当士兵。边疆地区的房产和农田，有的要作为军屯，有军队驻扎在那里，专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1972年，在内蒙古的河林格尔地区，挖掘出公元2世纪时的一位军事长官的墓葬。墓葬分为六个墓室。墓室中排列着50多幅壁画，大多数表现的是在农场上劳动的农民。在色彩斑斓的壁画中，显示出这位长官已经认识到，有必要构筑城堡和瞭望塔，作为庄园的防御工事。然而河林格尔一直保持着和平，至少在壁画绘制的时候尚未发生战事。在壁画中，这位长官为他的客人们提供各种娱乐活动，他安排杂耍者、乐师和舞者为客人们表演技艺，其他的侍者在一旁侍候。在庄园住所附近，农民在菜园里锄草，菜园的四周有围栏，防止猪和鸡进入菜园，别处还有羊圈和牛圈。

因为庄园建在富饶的北方草原上，所以这位长官可以进行多种经营。在饲养牲畜的同时，可以种植各种谷物。有的壁画显示，男子正在广阔的农田里使用耕牛犁地。牛车等候在一旁，准备把收获的谷物运回谷仓，其他的农民正在簸扬谷粒。在另一幅壁画中，劳动者正在池塘里，用大麻纤维编网，在水中，大麻纤维可以脱去上面附着的外皮，这样就能够用其纤维自由地编织绳索。这位长官还尝试桑蚕养殖。四名妇女手持绳索和钩具，站在桑树底下，把桑叶采集下来，然后再放到身边的竹篮里。

对于这些农桑活动，五原太守崔寔应该是相当熟悉的。他生活在公元前2世纪时期。他的家庭已经败落，他把继承的遗产全都用在父亲的葬礼仪式中，他希望借助酒业贸易来弥补自己的财产损失。在当时，从事商业活动受到上流社会的鄙视。为了重新恢复家庭的荣耀，崔寔接受了乏味的官职，做了五原太守，五原现在位于内蒙古境内。

崔寔希望能够通过建立纺织工业，以缓解农民的

■ 在奔驰的马车上，汉朝的一位军事长官正在视察其财产和禽畜。在一个有六室的墓葬中发现此彩绘。庄园的房屋四周筑有围墙，表明有警戒之需。庄园中的农户充当家兵使用。





■ 此汉砖于1974年在四川发现。一位农民躬着背，正在交地租，税吏手中有记帐用的竹筒。华丽的官服和农民瘦单的长袍对照形成鲜明的贫富差别。

沉重负担。崔太守惊诧地发现，这里的农民几乎不懂得纺织技术。这里的农民只有粗布衣服，用以遮挡来自蒙古的寒风，他们只会用当地所生长的草来编织衣服，而寒风是刺骨的。

崔寔还想出其他的办法，来帮助当地的农民。他编纂了一部农书，现在只剩下残缺的部分内容。书中记载了庆祝宗教节日的情况，还说明了简单机械的制作、年轻人的教育、家畜的饲养、家庭用具以及一些农具的制作等情况。他还制定了年度农业生产计划，详细说明了恰当的耕种季节，以及锄草、播种和收获草药等农业活动时节。

崔寔教导农妇，要严格遵守生产季节时间。在书中，崔寔详细说明了养蚕、抽丝、纺织以及缝制和换洗衣服的正确时节，他教导农妇最恰当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还说明了草鞋制作、酿酒以及为冬季保存新鲜食品等技术。另外，在男女之事上，崔还特别指出，因宇

宙所造成的影响，有一个月份是不宜同房的。在这个月份中，夫妻分房而眠，有利于保证他们身体健康，生活美满。

在崔寔之前，还有另外一位西汉时的农学家，名叫赵过，他在朝廷里任职，有机会接近汉朝皇帝。他提倡使用新型农机具，以便更加有效地耕种农田。他提倡使用更加有效的双铁制犁，而不是木制的单犁，可使用两头牛拉犁，必要时也可使用双人拉犁。为避免种籽的大量浪费，他要求农民放弃使用原来的播种方法，原来的播种方法是在6英尺宽的田畦中撒播种籽。他鼓励农民把田畦分成三块，农民可沿田埂按行进行点种，这样可以节省宝贵的籽粒。他还发明了耕种用的耒，对提高农业产量非常有效率。耒头为铁制，有数只。牛可用来拉耒播种，播种的间隔和下种深度正好适于种籽生长。

大量使用铁器工具，是汉代农业的一项重要革新。在公元前2世纪时，私人经营的铁器铸造厂大量出现，到公元前100年的时候，政府已在大部分郡县都设立了铸造厂。汉朝最终把铁器的生产以及其他重要物资如盐的生产，都控制在政府手中。有48家国有铸造厂开始生产农具、煮饭用的锅具、兵器、牛车组件以及其他

■ 此陶制模型发现于公元2世纪时的墓葬中，长22英寸，船头有舵，船尾有锚，船上载满货物。中国人使用船舵，比欧洲人早很多年。



专用产品。汉朝的铸造厂所使用的设施是庞大的,也是新型的,他们使用鼓风熔炉,熔炉用耐火砖砌筑而成,使用煤作为燃料。其中,最著名的一座铸造厂是河南省巩县(1991年改为巩义市——译者注)的铁胜沟(音译)铸造厂。在这个遗址上,考古学家挖掘了21527平方英尺,发现18个炼铁炉,另外还有高温浇铸炉,以及炼钢炉等。在引进活塞式双功风箱以后,汉代的炼铁炉每天可以炼铁达1吨多重,这种风箱可为炼铁炉连续鼓风。到东汉时期,人工鼓风已经改用水力能源,风箱被做成水车形状,由河水的湍流提供动力。

在数百个墓葬中发现的工具,或各种工具图形,表明汉朝人使用了节省劳动力的种种发明,与同时代的欧洲人相比,汉朝的这些发明要提早1000多年。从这些发明中获益最多的是农民。

独轮手推车,直到公元11世纪或12世纪时才传播到西方,而早在公元前100年开始,汉朝人已经使用独轮手推车,以节省人力。当时的史官记载道有位圣人,他在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境内,建造了所谓的木羊,他乘坐这种木羊进山。公元100年前后时的某墓葬中,发现了这种独轮手推车,车上还坐着一个男子。在稍晚时期的墓葬中,还发现有另一种独轮车图形,图中有人正在推着这种车前进。到汉朝结束时,这种独轮手推车已相当普遍,人们称之为“木牛”、“流马”。

使用脚踏锤脱去谷壳,以及使用曲柄吹风机分离谷粒和糠秕,均使农业生产变得更加容易。1800年后,东印度群岛上的荷兰航海者才开始使用这种机械装置,法国耶稣会的教士在访问中国时才把这种脱粒机械带到西方去。水车是中国的另一项重要发明。这种水车原来用于提水或提泥。中国有位哲人,在公元80年首次提到这种水车,到公元2世纪时,才有工程人员使用这种水车,向东汉的都城洛阳进行输水。大约在1400年之后,欧洲才出现水车,很明显是模仿汉朝的水车建造的。



在汉朝的墓葬中，还有其他的一些发明创造，但已经和农业生产没有直接关系了。中国的船舶最先使用了舵，舵比船桨更加实用，可帮助船只准确地进行行驶。在公元1世纪时的墓葬中，发现舵的陶制模型，可用绳索或链条将舵升起来，以防止船舵在浅滩受到损坏。在西方，直到中世纪初期，舵才开始出现。

记载这些发明的文献史料，最初写在帛书上或竹简上。当时的著作者没有意识到，纸的发明将对后世产生多么重要的影响。1957年，在陕西省的一个墓葬中发现最早的纸张，其原材料是大麻纤维。考古学家推断，其生产年代为公元前140年到公元前87年之间。

最早发现的纸张是空白的。大约100年之后，中国人开始在纸上书写。最早发现的纸又粗又厚，相信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纸是用来做衣服的，这种纸几乎可以绝缘。当时的纸张或许偶然还有卫生用途。公元前93年的文献记载，有位宫廷卫士曾建议一位王子，用纸捂住鼻子，也许当时有刺鼻的气味，以防止打喷嚏。公元前12年时的法律文书记载，有一桩谋杀案，用来包裹毒药的就是一个小红纸包。

在接下来的世纪里，纸张才被用作书写文字的介质。在一次部族起义之后，汉帝国的兵士放弃他们守卫的哨所，并把一张纸条留在哨所里面。在哨所坍塌以后，纸条被埋在下面。在这张纸条上面，有二十几个汉字，字迹虽然模糊，但仍可辨认。1942年，在一次大规模的战争期间，有人在这个古代遗址上进行搜查，结果发现了这张保存了近两千年的纸条。

新材料、新工具、新技术和新发明的受益者，不是那些产品制造者，而是那些贸易者。那些商人和企业家才是最大的受益者。司马迁曾引用当时的古话说，“小人适其力，富者用其智。钱财多了，就进行投机，以获得更多的钱财。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这个道理对于其他时代以及其他文明同样适用。

司马迁借用一则故事，加以说明。在秦朝灭亡以后，汉朝确立统治以前，在这段混乱的年代期间，有个职位卑微的官吏，名叫任，他看到兵荒马乱，使农民无法安心生产，觉得不久以后，人们的日子会因粮食奇缺而非常艰苦。于是，他将自家谷仓中的粮食挖窖深埋，等待发财的机会。果然，不久以后，粮价飞升，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之外，而且伴有发生饥荒的危险。任因此而大发横财。他把窖里的粮食拿出来卖，换得大量金银珠宝，可谓财源滚滚。任与其他奸商不同，他和他的家人生活俭朴，省吃简用，一点也不铺张。他花钱买下当地最好的农田，为后世子孙积累了不尽的财富。

商人争相模仿任的做法，把钱财换成土地田产。到这时候，商人已经成为一种力量，需要社会予以重视。然而，借助智慧和机敏谋生的商人，没有获得社会的特别尊敬，尽管人们需要排队来购买商人所提供的种种货物。在贵族、学士以及朝廷官员的眼里，在市场上兜售食盐的那些小商贩，以及正在崛起的指挥数千个奴隶开采铁矿的那些工业界人士，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同。在社会精英的心目中，商人没有什么崇高的地位。

从汉朝早期开始，有法律条文对商人新贵族的奢华加以限制，使他们保持原有的地位不变。在公元前199年，皇帝颁布一项圣谕，宣布：“商人不得穿着锦缎、刺绣、花绸、绉绸、麻布或羊毛衣服，不得携带兵器，不得乘坐四轮马车，或者骑马。”

有钱而不能花，对于商人来说，是件痛苦的事情。同其祖先一样，商人也爱好所有的美好事物，而且，他们对艺术品有很高的要求。一般来说，他们要求工匠提供艺术产品时，要把工匠师傅的姓名雕刻在器物上，以对产品质量负责。例如，公元2世纪时的一只漆器茶杯，在茶杯底部刻有铭文，标明了茶杯的制造厂、茶杯的容量，以及参与制作的工匠姓名——“定制，金；漆工，纪；上釉，秦；柄部镀金，毛；彩绘，李；雕刻，义；磨光，郑；

■ 此陶制舞台，长27英寸，有杂技表演者、舞者和乐师，正在为身穿朝服的官员表演和弹奏。出土于山东省境内，属公元前第一或第二世纪时的随葬品。这件陶器制品表现了宴饮狂欢的热闹场面。





检验，义；作坊卫士长，张；监制，梁；副监制，冯；助理，龙；缮写，鲍。”

然而，汉朝的许多发明创造，大部分都已无法考证其发明者是谁。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即使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也做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但是，富人追求的，是能够享受由穷人创造的成果，至于那些穷人的生活，他们漠不关心。幸好我们有考古学家，这些创造者以及他们的劳动，不会被完全淹没在历史的尘封中。

在20世纪前半叶期间，河南省偃师县的农民在西大角村劳动，他们把西大角村称作“尸骨沟”。很多年以来，情况一直如此。黄土地上，骸骨嶙峋，农民们就在这片农田里耕种和收割庄稼。有时，也可发现带有铭文的一些碎砖块，铭文没有人读得懂。学者能够解读一些铭文，内容和镣铐、刑罚以及监狱有关。

1964年，考古学家开始调查骸骨的来源。他们发掘出属于公元2世纪早期的一些墓地，墓葬是很简陋的，里面埋葬的是服苦役的囚犯。当时，这些囚犯在洛阳城的建筑工地上正在服苦役。建筑工程的遗址距考古发掘现场一英里远。墓地占地约41800平方米，被挖掘的仅有1672平方米。但是就在已挖掘的墓地里，就发现500多个墓穴。挖掘壕沟呈长方形，比较狭窄，并向四处延伸开去。

在每一具骸骨旁边，考古学家发现都有一块或两块砖头，砖头上面记载着囚犯所属的工程队名称，囚犯曾被关押的监狱，以及他们所犯罪行的刑罚。囚犯或戴着镣铐服刑，或免于行动限制。苦役囚犯所拥有的技术也被记录在上面。从有些墓葬可以看出，参加葬礼的人有的很大方，他们把一些钱币抛撒在墓穴里。

精美的中国漆器

LUSTROUS
TREASURES
MADE OF SAP

精美的古代漆器是中国对世界手工艺技术的一项重要贡献。墓葬中多有出土。这种漆器保存最为完好。此图是软侯夫人墓中出土的漆器，上有黑色和红色，有流苏，已有2100年的历史。1972年挖掘出土。除夫人的棺木以外，盘、碗以及其他容器都是典型的漆器艺术品。其制作工艺可上溯到中国的新石器时代。

漆树原生于东亚地区，树液可从树干中提取，经加热和提纯，再用到基础造型上面。基础造型可由木材、皮革、陶器或金属制成。漆有数层，但是每层都非常薄。在古代，甚至剑鞘、盾牌和马车部件均作成漆器，以发挥树漆的保护作用。经过恰当的烘干和撒沙，树脂层使器物表面平滑而有光泽，而且耐用。漆器可以防水防酸，隔热，还可以防止白蚁等昆虫的蠹蚀。树脂本身为暗灰色，无光泽。初用朱红色或炭黑色，至汉代已有蓝、绿、黄、银色和金色，此时的漆器光彩夺目。为增加效果，可在漆器表面进行雕刻，在商朝，漆器表面镶嵌有贝壳和骨类，在东周和汉代则用金银镶嵌。



漆器工艺虽然简单，但在中国，制作这样的漆器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每一个漆层都需要精工细作，而且要用数日将其晒干。如需在漆器表面进行雕刻，则需要涂200层。在粘着的漆层表面绘制复杂的装饰图画，更需要深厚的用笔功力。漆器因其制作工序较多，工期较长，所以价格非常昂贵。在汉代，其价格可抵类似青铜器的10倍。漆器的价格虽高，但它具有很强的实用性，非常耐用，而且外观精美，所以漆器依然备受欢迎。最后，政府开始从事漆器生产，到公元1或2世纪时，由政府开办的漆器加工厂已经至少有三家了。

遗骨多属男性，也有数具女性遗骨被挖掘出来。在死亡时，无论男女，他们大多都还很年轻。他们的遗骨有严重的磨损，中国的学者相信，监工曾使囚犯们承担超负荷的繁重劳动。在建筑工地上，死亡是常有的事情，像家常便饭一样。有些墓葬在几年以后又被重新挖过，为的是给埋葬其他人挤出点地方。囚犯们在死后也休想获得安宁。

八年后，在公元前2世纪的汉景帝陵附近，挖掘出另一个囚犯大墓地。当时，景帝陵尚未进行发掘。1990年，在景帝陵旁边，挖掘出数百具赤陶兵俑，兵俑个个栩栩如生。兵俑是纪念军队用的，可谓用心良苦，然而，对于挖掘壕沟和地下墓室以埋葬兵俑的那些囚犯来说，其痛苦的灵魂却没有人来安慰。兵俑成排摆放在壕沟之内，囚犯在挖掘过程中相继死去。因为在景帝陵的附近，有一个墓葬遗址，占地66880平方英尺，遗址下面埋葬着那些不幸的遗骨，估计有多达一万具。多数遗骨的头上或脚上还戴着锁镣。遗骨或单葬，或合葬。

通过这个考古发现，史官关于役囚在景帝陵服刑的记载获得证实。班固撰写的《汉书》记载，“修建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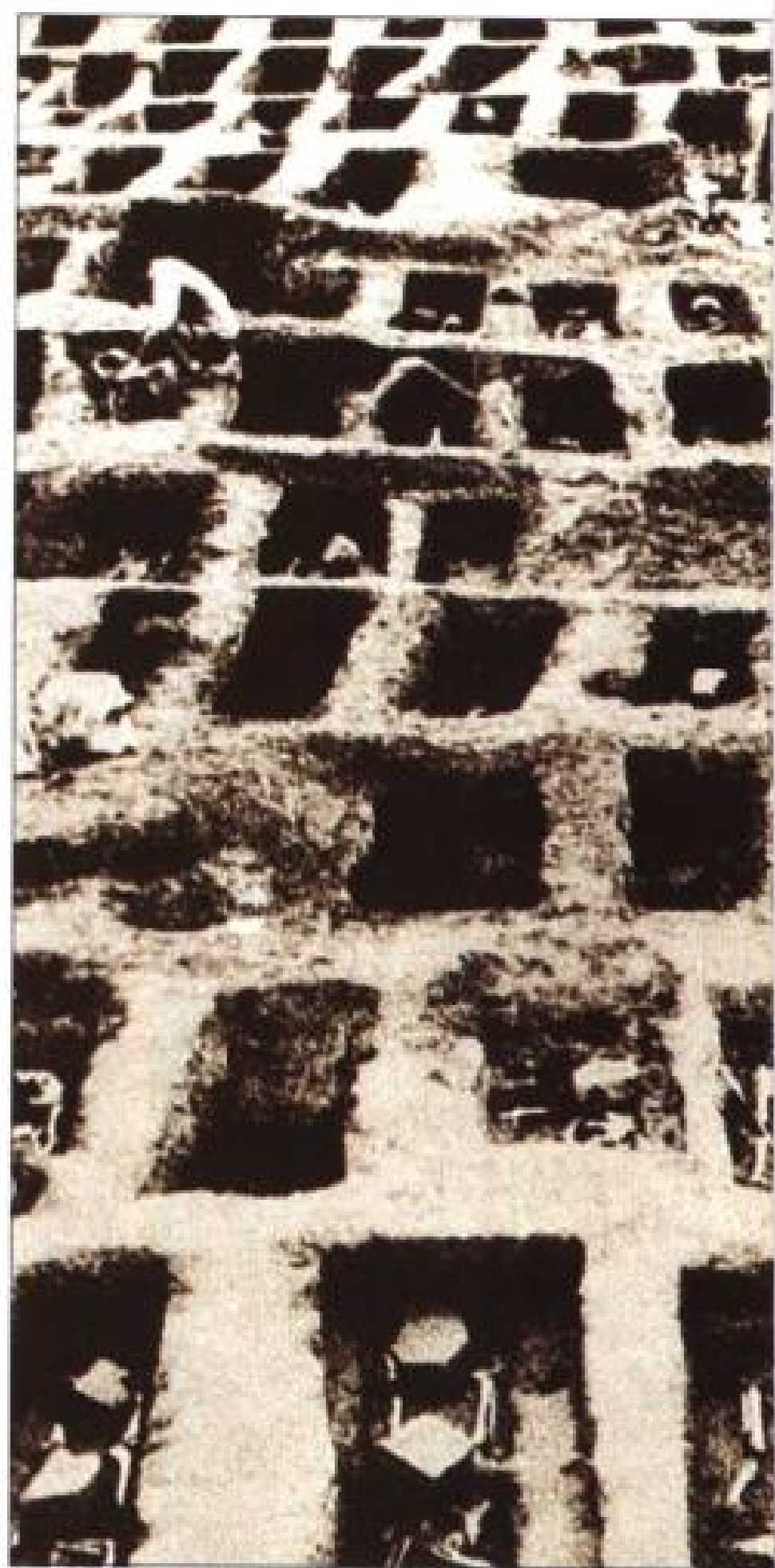
墓的囚徒已经免除死罪”。然而，在景帝陵附近挖掘出的役囚墓穴，里面不单有囚犯，还有无辜的百姓。他们有的是由官方招集的民工，为公用工程服五年劳役；有的则是贫苦的农民，在歉收或被地主残酷剥削之后破产，把自己卖作了包身工。

这些苦役是汉朝的劳动力。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苦役，他们永远被埋葬在地底下。帝王生活的宫殿，以及帝王死后的陵墓，均由苦役建造。北部边界地区绵延数百英里的防御性城墙，金属矿藏的开采，不断扩张的帝国各地修建交通道路，筑造防洪堤坝以保护社区，这些工程都凝结着劳动者的血汗。

现存的汉代文献记载，记录下使用人力颇多的一项防洪工程。公元前109年，根据汉武帝的命令，数万民工开始修补黄河大堤，他们进行挖掘、拖拉和提升泥土。为了鼓励民工的劳动热情，汉武帝亲自赶到施工现场，根据当时的劳动场面即兴赋诗一首，并朗诵给大家欣赏。诗作水平如何姑且不论，但是这位汉武帝却被认为是汉朝最伟大的皇帝，也是汉朝最精干的捍卫者。

公元前141年到公元前87年，汉武帝统治中国。汉武帝在位期间，军队征战频繁。汉朝的军队继续向南出征，不断进行安抚和开拓殖民地，打开了向南的贸易通道。商人和军队一起，将当时的广州纳入汉朝的统治之下。汉朝的疆域逐渐扩张到越南。贸易商品远达东南亚地区。在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等地，有的遗址发现了汉朝的陶器。

在北部和西部地区，游牧部落经常入侵，这曾迫使秦朝修建防御性的“长城”。这些宿敌对黄河流域的肥沃农田觊觎若渴。其中，统治蒙古的匈奴人是最难对付的一个少数民族。匈奴人骁勇善战。当代的学者认为，他们是今天匈奴人的祖先。为抵御匈奴人的入侵，汉武帝招集大批民工，修建新的城墙和关隘，以及许多哨所，并对原有的防御工事进行重建。由10万多人组成的远征军开赴蒙古大草原。





在战场上，匈奴人骑马作战，无疑占有优势。然而汉人虽不善骑马打仗，但是有射手和弓弩的支援，雇佣军和官军不断加强增援，又有善于作战的将领，以及充足的军粮。汉朝有位思想家曾建议，在边界地区开设酒馆饭店，就坐落在敌人的营地附近，以便使匈奴人品尝并逐渐适应汉朝人的菜肴，通过这样做，“令其甘味于汉人之酒饭，此其致命之弱点也”。这位思想家的建议被采纳与否，史书中没有再提到。

汉武帝通过不断扩张，使汉朝的统治疆域达到亚洲大部分地区，深入朝鲜和满洲里，并建立了通向前苏联中亚各国的通道。但是，汉朝统治期间，在北部和西部边疆地区，匈奴的威胁始终存在。

在同匈奴的长期斗争中，汉武帝在外交政策上做过尝试。汉武帝得到汇报，在遥远的西部，生活着某些部落，他们对匈奴没有好感，对汉朝也没有多少兴趣。汉武帝根据“吾敌之敌可

■ 此图为在西大角村挖掘出土的公元2世纪时的墓地。这里埋葬着众多的年轻的苦役囚犯，有的还戴着镣铐，大多因劳累而死。墓葬中偶然可见一两枚钱币。在多数墓穴中，随葬品仅为一块砖头，砖头上面载有死者的姓名、原籍及其所受的刑罚。上图砖上的文字显示的是这名死者被判四年苦役。



汉景帝墓的随葬陶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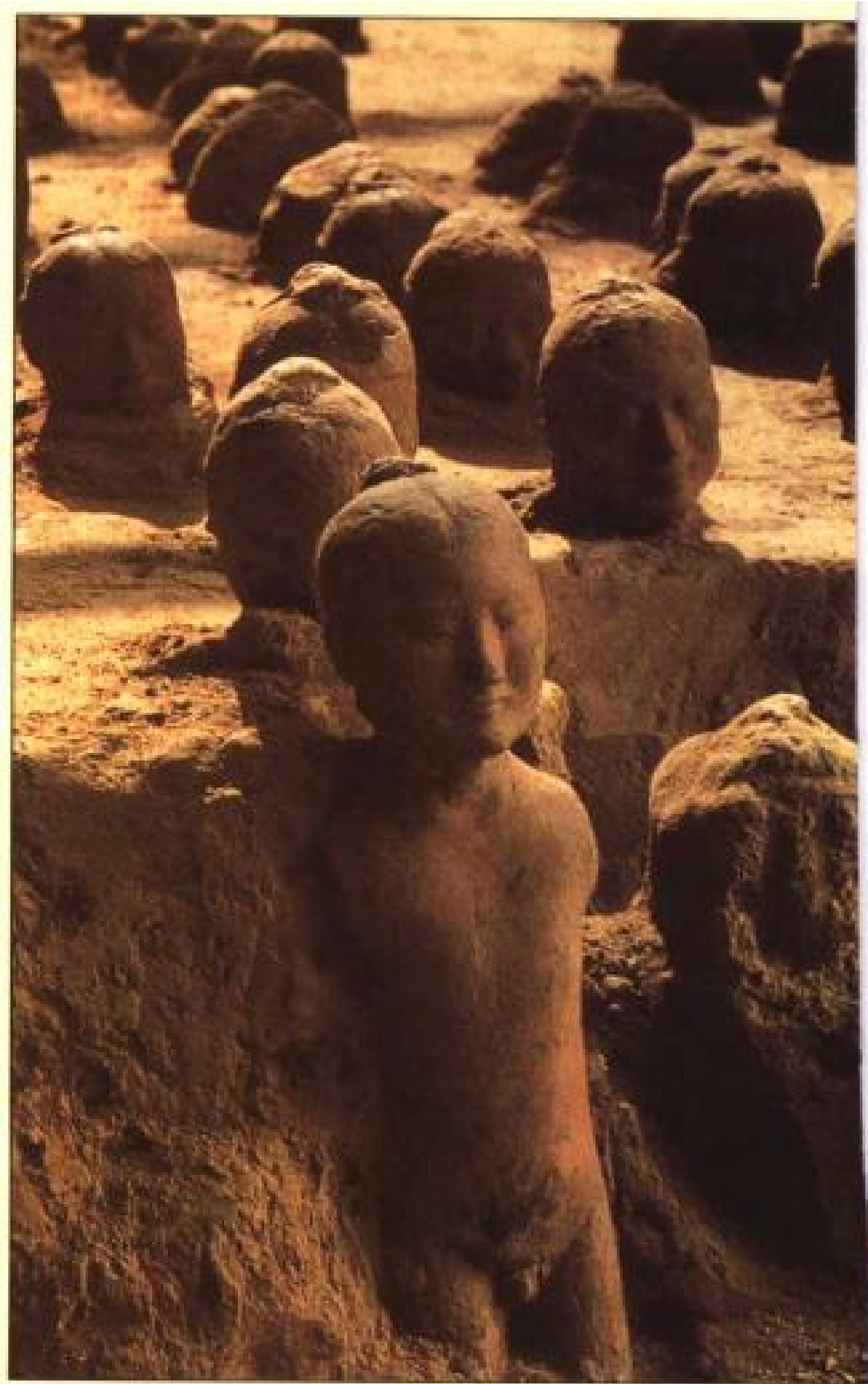
THE EMPEROR JING'S MINIATURE RETINUE

汉景帝陵是一座土墩，距离汉朝都城长安不远。现在，有一条高速公路经过这里。1990年春，考古学家开始在景帝陵附近挖掘，在地下墓室中，考古学家发现有成排的赤土陶人物造型。这些陶俑是景帝在位15年间(公元前156年到公元前141年)，被埋放在地下的。

汉景帝墓的随葬陶俑，仅有秦始皇陵的兵马俑三分之一大小。秦始皇的兵马俑和真人一样

大小，于公元前210年埋入地下。景帝的随葬陶俑和汉高祖的也不相同。90个人物造型，无论男女，都没有手臂，而且是裸体的。如左右两侧照片所示。从泥土中发现的丝绸和麻布表明，这些陶俑最初穿着衣服。其手臂和衣服，经过两千多年后，已经腐烂掉了。

汉景帝的随葬陶俑由四块铸型铸成，有15种不同的面容表情。而秦始皇的兵马俑，具有多



■ 图中的陶俑已被埋在地下两千余年，泥土将他们几乎淹没了。有些已挖掘出土，有些尚待挖掘。由于未遭任何破坏，陶俑的排列阵形仍保持原来的模样。



种神态和发型，景帝的随葬陶俑只有一部分排列成军队阵形。其正规军的陶俑尚未发现，也未可知，但是迄今为止，所出土的兵俑均属后卫职能。在其中一个墓葬里，兵俑都排列在马车后面，出土的谷物遗迹表明，他们是守卫粮仓的一支部队。在另一个挖掘壕沟里，挖掘出土的厨具和动物遗骨，表明那里是一间厨房。

这些随葬陶俑明显暗示出，这个时期的汉朝社会，与秦始皇统治时期有所不同，安抚活动多

于战争。然而，1972年发现的安葬苦役囚犯的大墓地，说明当时的社会压迫是沉重的，数千名苦役被迫从事繁重的劳动，为景帝的身后事而抛洒血汗。

盗贼的破坏和不断的掠夺，致使大量陶俑已经破碎，这让考古学家很难对陶俑进行研究说明。汉景帝陵遗址上所建立的博物馆里，可以看到未经损坏的陶俑，以及考古学家们耐心拼凑起来的陶俑人物造型。



■ 此图是当地的文物保管人员正在拼接汉景帝的随葬陶俑。工作人员都是特别招集来的，并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加以监督。图中的男子正将一个陶俑的头与躯干对接，他是这个工作组的负责人。





以为吾友”这个原则，派特使张骞出使西域，去和那些部落取得联系。当时的史学家记载，张骞意志坚定，胸襟开阔(《史记·大宛列传第六十三》：“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译者注)，他和蛮夷之人相处很有一套本领。

13年后，娶匈奴女子为妻的张骞携家眷返回汉朝。此间，因久无音信，汉武帝以为张骞已死。张骞回到汉朝，报告了他出使西域的非凡经历。他曾被匈奴人抓获，行动受到监视，但匈奴人并未恶待他。10年后他从匈奴人的监视下溜走，继续西行，到达巴克特里亚，游牧部落大月氏控制着巴克特里亚地区。大月氏确实以匈奴为患，因为匈奴人曾谋杀了当时大月氏酋长的父王。然而，大月氏认为和汉朝相距太远，没有理由听命于汉朝皇帝，去和匈奴作战。

张骞虽然没有成功联合大月氏与匈奴开战，其个人荣辱姑且不论，但是他出使西域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汉武帝的这位特使发现，在他到达那里以前，中国的商品已经到达西域。在阿富汗北部的一个集市上，张骞惊奇地发现了竹制品和丝绸服装。他知道，这些东西来自汉朝的西南部诸郡。那里的商人告诉张骞，那些产品都是由商人从一条大河湿热的沿岸地区运输去的，在那里，勇士们正在骑着战象打仗。后来，汉武帝得知，在遥远的西南部的四川境内，确实有勇敢的商人已经掌握了一条商路，可以从缅甸通往印度。

不久以后，在张骞出行的路线上，有魄力的中国人就发现了一条通往西方的贸易通道。沿着这条道路，商队穿越中亚地区，抵达波斯。在波斯暂停之后，商人们继续前行，把中国货物运输到地中海沿岸的朱迪亚(古巴勒斯坦的南部地区——译者注)。到公元前1世纪时，中国的丝绸已经远销到罗马。

司马迁曾说，如今“西方蛮夷都伸长了脖子，渴望对中国有所了解”。如果西方人尚未到达中国，那么西方人的钱财却已经逐

渐落入中国人手中。到公元23年的时候，罗马帝国的黄金大量流入中国，以至于罗马的皇帝提比略下令，禁止男人穿着丝绸服装，以避免罗马帝国的黄金储备大量流失到中国商人手中。中国商人赚足了罗马人的钱财，带着钱袋子返回到东方。

张骞因付出创造性的努力而获得升迁。汉武帝派往西域的使者并不都像张骞一样，结局美好。公元前107年，在另一次外交努力中，汉武帝把一位公主嫁给某游牧部落的首长作为妻子，汉武帝希望通过和亲，结成军事同盟。作为人质的公主，生活一点也不幸福。她在流离之所写了悲伤的诗句，寄回汉朝。诗中写道：“帐篷是我屋，四壁伴寂寥。腐肉是我餐，马奶是我饮。常思故国兮，女怀空悲切。”

作为汉朝的公主，她希望自己能够居住在皇宫里，有豪华的装饰，有众多的奴仆，随时听候使唤，生活用不着自己操心。然而，作为女性，无论是公主，还是农家女子，她们的地位都一样卑贱。常有农家女子，刚出生就被失望的父母残害。上等阶级的妇女，其生活目标也不过是寻觅门第相当者，嫁为人妇，生儿育女，替男家传宗接代，仅此而已。

公元2世纪时，在宫廷中确实有一位女子，不甘卑贱。她就是班昭。班昭生于公元1世纪中期的一个贵族家庭。她禀赋深厚，非常聪慧。她的父亲是一位颇受尊敬的史学家，她从小就受到家庭气氛的熏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在年轻时班昭就成为寡妇。她在皇宫里担任皇后和妃嫔的教师，教授文学、史学、天文以及数学。教学之余，她还担任宫廷诗人，为各种纪念活动谱写诗篇。班昭还是汉和帝的皇家史学家，只是未授官爵罢了。

班昭的代表作是《女诫》。这部著作成就了她不朽的历史地位。此书系班昭为其二女而著。在书中，她教诲道：“男子可以为自己的生活进行谋划，而妇女在结婚时就没有了接受教育和训练

的机会。我对此感到痛心。”

这部书指出首先的一个前提是，女子应有权与其兄长一样享受到初等教育。为了充分履行作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女子有权接受教育。班昭承认中国的二元论哲学，即男性属阳，居主动，女性属阴，居被动，但是，班昭指出：“只教育男性，而不教育女性，这就忽视了二者间的均衡。”

古人的观念是，男性之阳刚，宜有女性之阴柔相配，故而夫唱妇随，有主有从。班昭并不争辩。但是，班昭坚持她自己的观点，认为应当承认妇女具有和男子同等的价值，在婚姻中，应当互相忍让。班昭宣称：“夫妻关系的基础是和谐和亲密，和谐的关系才能产生夫妻恩爱。”

朝中群臣，无论男女，都受到班昭的启发。班昭的同事纷纷抄录她的这部著作，用书中提到的原则来指导自己的家庭生活。

在汉帝国的图书馆里，班昭有更重要的工作。班昭之兄班固，正忙着编纂《汉书》。这部书不仅按年代顺序记载历史事件，还是当时的一部科学知识提纲，包罗的学科有数学和天文学。班固死后，由班昭继续编纂完成了这部著作。

公元106年，汉和帝崩，班昭作了皇后的政治顾问。邓皇后是班昭最著名的学生。邓皇后成功地掌握了大权。汉和帝生前未能确立皇位继承人，所以，邓皇后有权决定哪位皇子将来继承皇位。邓皇后自己无嗣，她指定一个仅四个月大小的婴儿为皇太子，此婴儿是汉和帝与某妃所生。数月后，婴儿死，邓皇后又择一12岁男童为皇太子。此男童有长兄数人。三年后，童已成年。邓皇后仍然执掌政权。邓皇后任用其兄掌管军事，并拒绝设辅政王一职。其兄间或任之，为时短暂。邓皇后执掌政权，直到公元121年去世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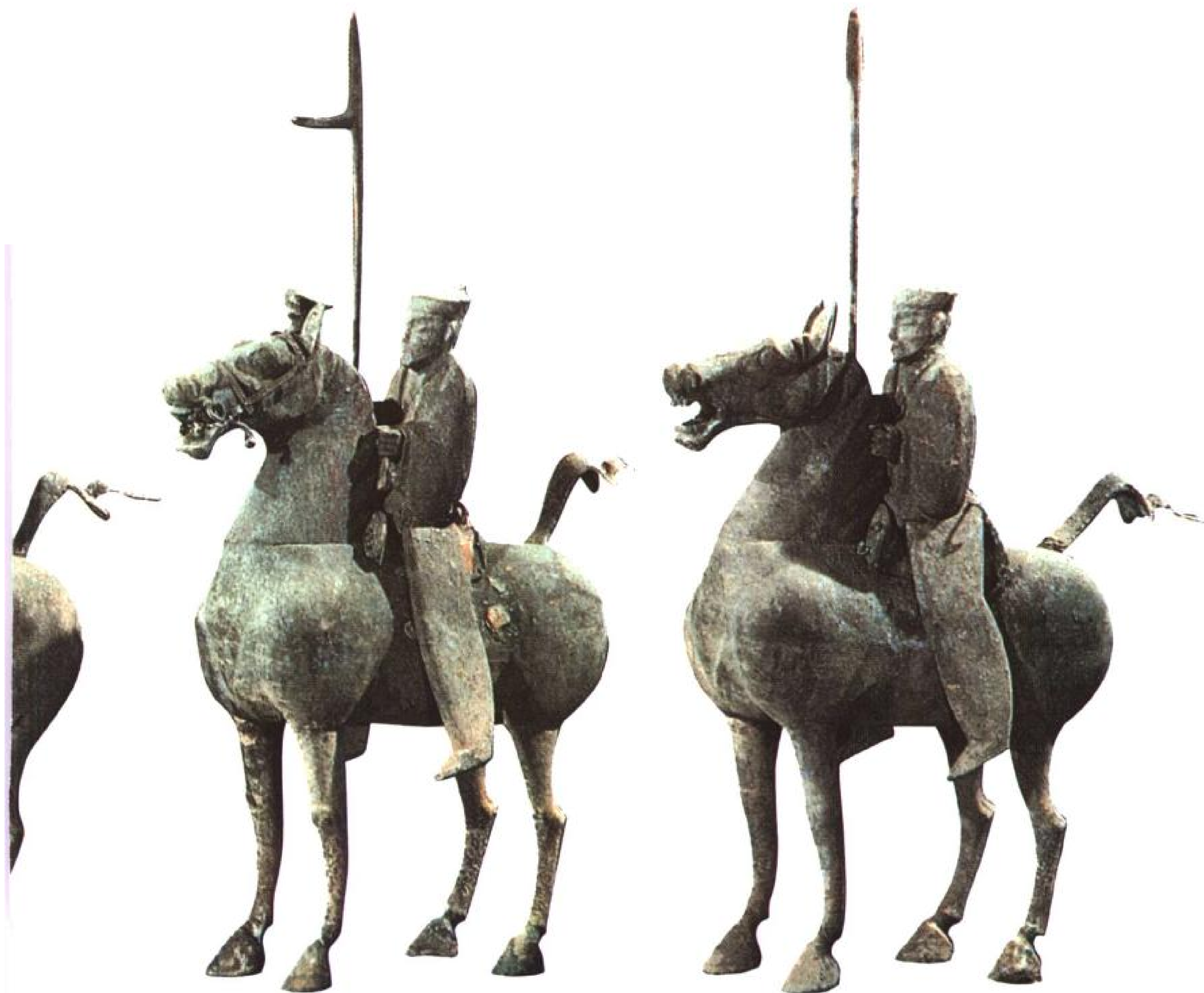
与汉高祖不同，邓皇后和后来的汉朝皇帝都鼓励儒生研究学问。在汉朝的最后几十年里，学士们创造了伟大的学术成就。公



元175年，有关孔子及其教海的著作编辑完成。此书著文精确，知识丰富，将古人的智慧完整地留给后人。前后历时8年，雕刻用的石头有50余块，雕刻汉字20余万个，书中的文字都经过仔细斟酌和推敲。史官记载，数千名学士纷纷云集都城洛阳，前来拜读这部堂皇之作。

文章刻于石兮，可传世久，王朝之永逝兮，则其奈何。到公元2世纪晚期，动乱此伏彼起。年弱而未经世的汉室皇帝，让皇室亲族有机可乘，在背后操纵政权的

■ 此图为三名骑士，从左到右，其兵器依次为斧、戟和矛。出土于东汉时期的张将军墓，墓中还有青铜兵俑，这三骑士位于兵俑中间。汉武帝对中亚地区的战马印象非常好，以至于他引进了这种马，并将它们投入作战。三位骑士所骑的战马即是。



势力与日俱增。汉武帝引以为豪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如今已土崩瓦解。宫廷内部和各郡府都腐败不堪。

玩于宦官股掌之间，汉朝的几位末代皇帝都成了顺民。被宠信的宦官开始把持政权。这些宦官不断聚敛钱财，购置田产，招募家兵，营谋私企，收养子嗣，并赐其家族姓氏。他们鄙视那些商人暴发户，又因其诡计而狂怒，他们知道，这些暴发户会威胁他们的政权。在公元189年，贵族和军队联合起来，杀戮暴发户2000余人。朝政陷入一片混乱。

在乡村地区，洪水和饥荒等自然灾害肆虐，使社会秩序乱上加乱。在黄河下游地区，张氏兄弟利用宗教集结流离失所的农民，并联合数十万军兵，组成黄巾军。公元184年，黄巾军攻占山东省和河南省交界地区的城市，并把势力发展到其他地区。

汉朝的帝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垮台。公元189年，在针对宦官的政变中，政权落到政变将领手中。他们同起义军展开激战。董卓将军率军开赴洛阳，辅立汉献帝。董卓以残暴闻名，而汉献帝则成为汉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数月后，在公元190年，董卓所部洗劫洛阳，将洛阳付之一炬。

军兵焚烧了汉朝的帝国图书馆，价值连城的馆藏物品全部被烧毁。学士无不为之挥泪。诗人王粲吊古伤怀。在《七哀诗》中，王粲写道：“西京乱无象，豺虎方构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汉献帝于公元220年被迫退位。汉朝宣告结束。其后400年，中国四分五裂，未得一统。然而，汉朝的辉煌历史遗产将永存。汉朝灭亡以后，国家分分合合不断，在此期间，对汉朝的文化遗产，学士们予以继承和光大。艺术家们也不断求索完美的艺术境界。王朝可兴起，亦可衰败，但帝国本身不断自强图存。在后来的近两千年里，中国的历代天子都创造着伟大和辉煌，然而他们或是或不是那位讲粗话的老兵汉高祖刘邦的后世子孙。



历史上的一位女性

A WOMAN OUT OF THE PAST





辛夫人是一个幸运的女人，她生于汉朝初年，此时正是汉朝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时期。她的丈夫、长沙王利仓统治着一个包括今天湖南大部分地区的庞大王国。作为西汉新兴贵族的一员，利仓聚敛了大量财富，他的夫人也过着极为安逸的生活。

辛夫人的身体长期有病，但她呼吸的是清香的空气，听的是优美的琴声，仆人则随时恭候，为她准备精美的食物，她穿的也都是丝织品。她死时大约50岁，家人不遗余力地给她购置了大量陪葬品，供她在另一个世界享用。她的墓中放满了食物、衣物、化妆品、漆器和大量丝织品。为了服侍她，人们还在她身旁放置了162个用木头雕刻的仆人和乐师。

整整2100多年，辛夫人和她的陪葬品便一直被埋在临湘，即今天长沙郊区一个鞍形土堆下面。这个土堆名叫马王堆，因为人们一直误认为它是公元10世纪一位王侯的墓地。1972年，考古学家受命发掘这座墓地，因为这里将要修建一座医院。直到这时，人们才发现这是一座软氏家族的墓地，其中埋葬着利仓、辛夫人和他们的儿子。

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史上最令人振奋的发现之一，对于了解汉朝的文化和追求享乐的上层阶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辛夫人的尸体已经干枯，但不可思议的是，它保存得却相当好，从时髦的发式到穿着丝鞋(见上页图)的双脚都完好无损，似乎是那个逝去已久的时代献给20世纪的一件神奇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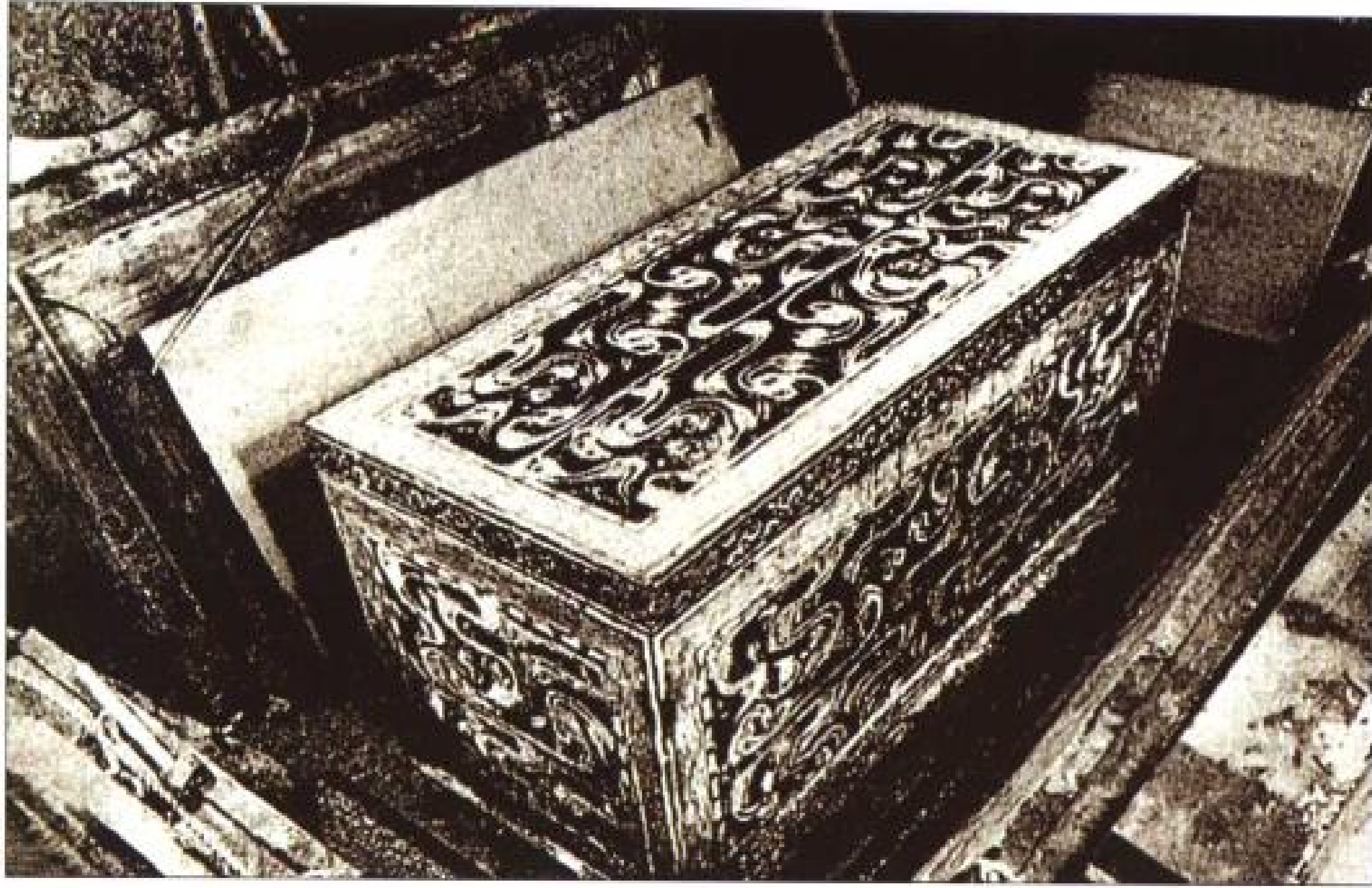
进入密封的墓室

DESCENT INTO A WELL-SEALED TOM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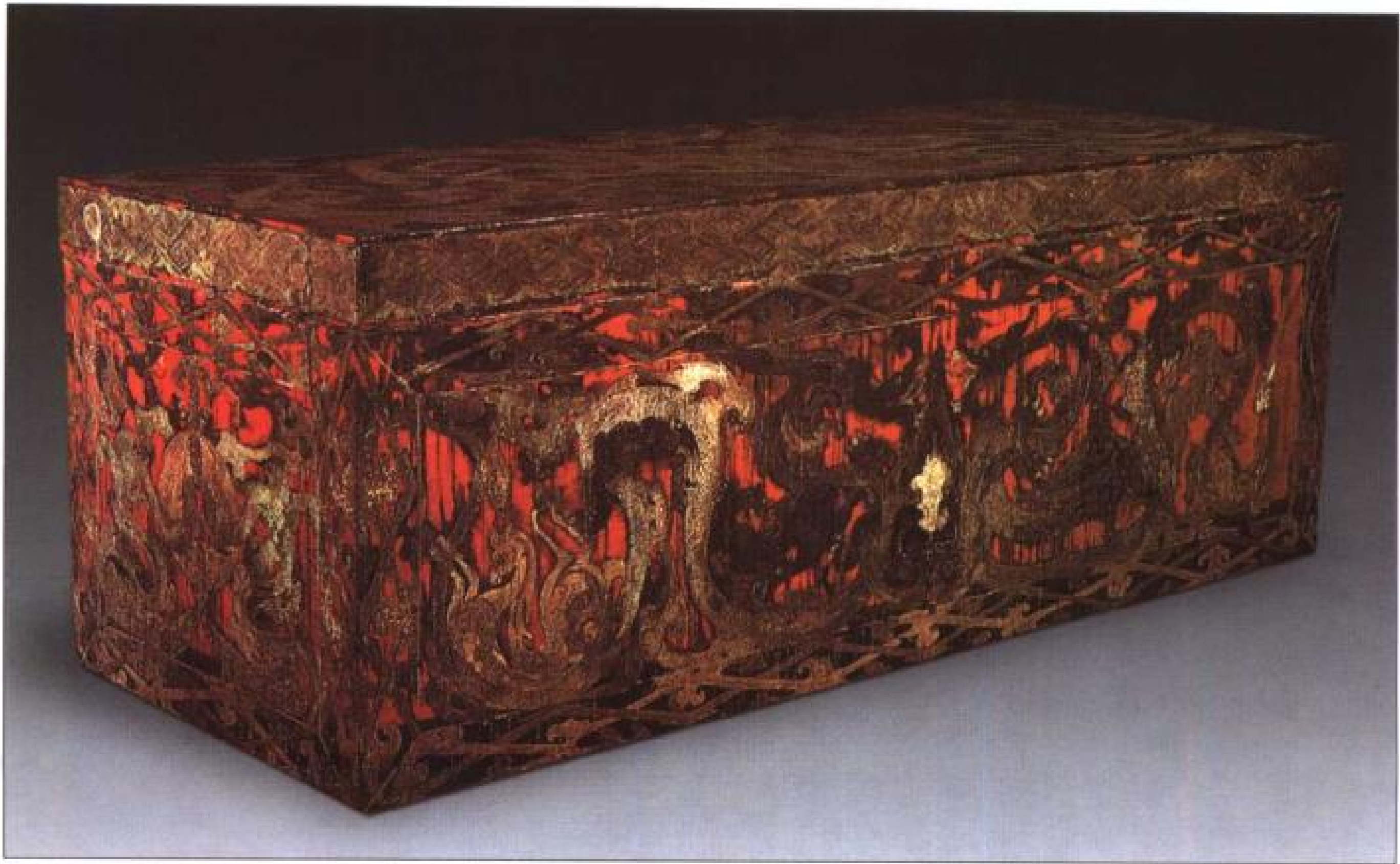
辛夫人死时已是寡妇，公元前186年，她的丈夫就早已去世；她死时大约是公元前168年，即她儿子去世的那一年之后的某一年。她的尸体放在一只包有刺绣丝织品并嵌有羽毛的棺槨之中。举行葬礼时，“灵车”载着她的尸体来到临湘以东2英里的地方，车前是一面用竹棍举在空中的大旗，长6.5英尺，色彩鲜艳，并缀有流苏。她的墓地在她丈夫和儿子的墓地旁边，此时人们已经挖好一座深52英尺的井状墓穴。悼念者必须站在墓穴周围，墓穴四壁挖成阶梯状，底部是一个漏斗状、四周围有黏土的土坑，里面是一个用柏木搭成的大型墓室。

盖有丝绸的棺木用灵旗包裹，放在第二只棺木中，第二只棺木又放在第三只当中。三只套在一起的棺木放在墓穴中心的一间墓室里，另外4间墓室则放置陪葬品，并在312片竹简上详细列出了物品清单。5吨用于吸潮的木炭堆在墓穴周围，顶部则用3英尺厚的黏土封住，上面用土覆盖并夯实。

显然，由于黏土层异常厚实，木炭又可以吸潮，加之地层深处的温度变化非常小，墓穴的保存状况非常好，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进出墓穴。墓室内导致尸体腐烂的细菌很快就由于缺氧而死亡，具有破坏作用的地下水也不能入侵墓室；同时，墓室中新鲜食物和尸体所散发的潮气也不能从墓室中泄露出去。结果，墓室里非常凉爽，空气也极为湿润，几乎没有任何细菌，因此，精致的丝织品、易碎的漆器和辛夫人的尸体既没有腐烂，也没有变为尘土。



■ 拿掉将墓穴分成几间墓室的柏木，就会看到最外面的3层棺木：棺木长8.5英尺，表面绘有云纹和神话人物，以驱赶鬼魅。中间一层棺木(见下图)长7.5英尺，表面涂有红漆，并绘有吉祥动物，如鹿、虎、龙和凤凰等等，它们会帮助死者的灵魂进入天堂。打开棺木，里面是一只放有辛夫人尸体、外面裹着丝绸的棺槨。



■ 墓室物品清单中有一件“飞衣”，这是一面T形丝织彩绘灵旗，面朝下盖在最里面的棺木之上，属同类物品中首次发现，被认为是该墓室中最为珍贵的物品。在精美的彩绘图案中央画有一个弯着腰的老妇人（详见第177页），这很可能就是辛夫人的画像。关于这面灵旗图案的象征意义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大家都同意图案代表了古代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地狱在下，天堂在上，都在打开大门迎接死者进入神灵的世界。

■ 墓地上方有一座13英尺高的平顶人工土堆，墓坑四周是厚3—4英尺的白黏土，墓穴四周则有一层15—19英寸厚的木炭。墓穴高9英尺，长22英尺，宽16英尺，内有1间放置棺木的墓室和4间放置陪葬品的墓室。



20 世纪一次尸体解剖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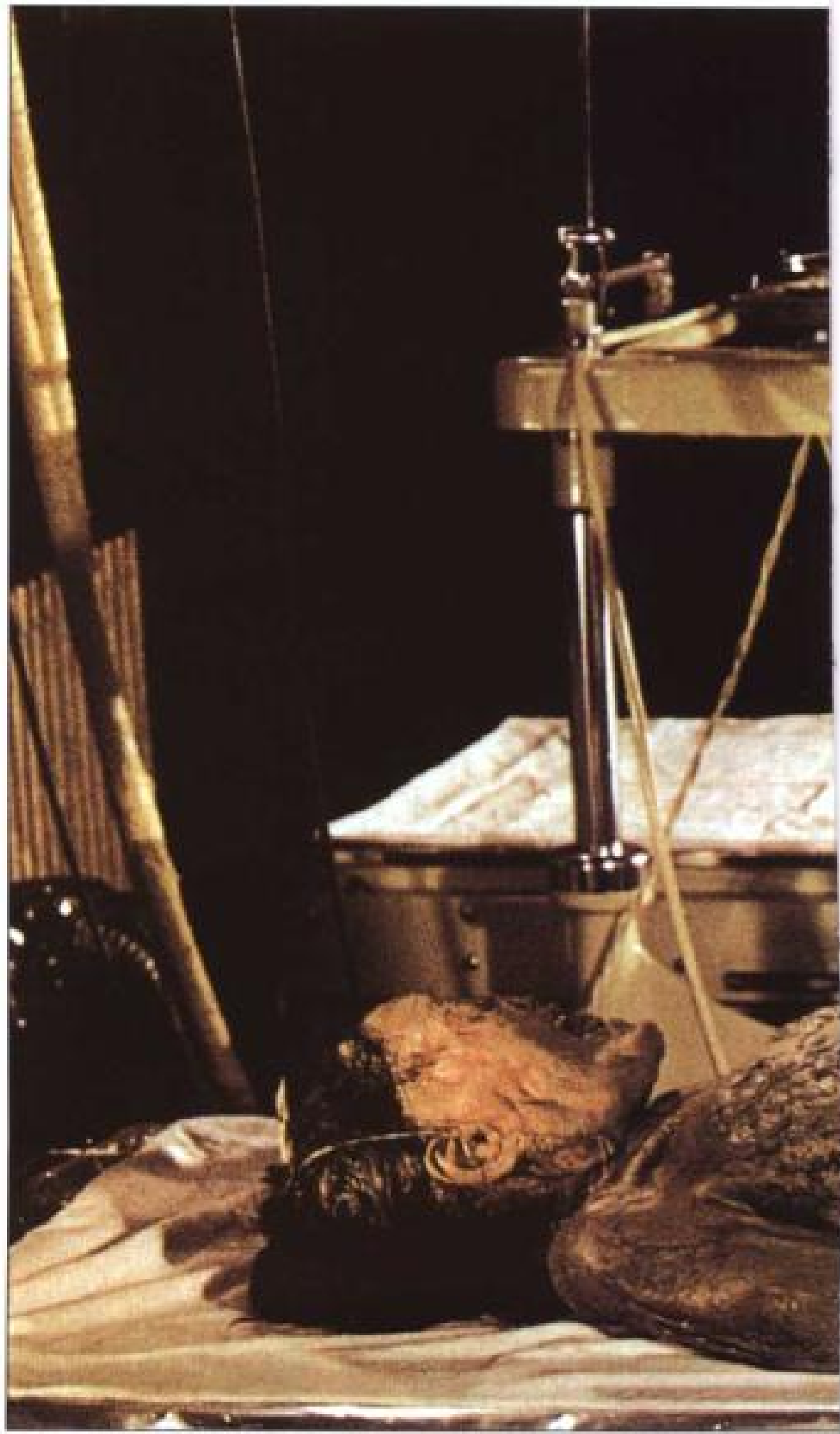
RESULTS OF A TWENTIETH-CENTURY AUTOPSY

辛夫人的尸体在墓室里埋葬了近 21 个世纪而没有一丝腐烂的迹象，她的皮肤光滑而柔软，关节活动自如，头发牢牢地固定在头皮之中，甚至内脏也完好无损，医学家通过尸体解剖得出了详细的健康医学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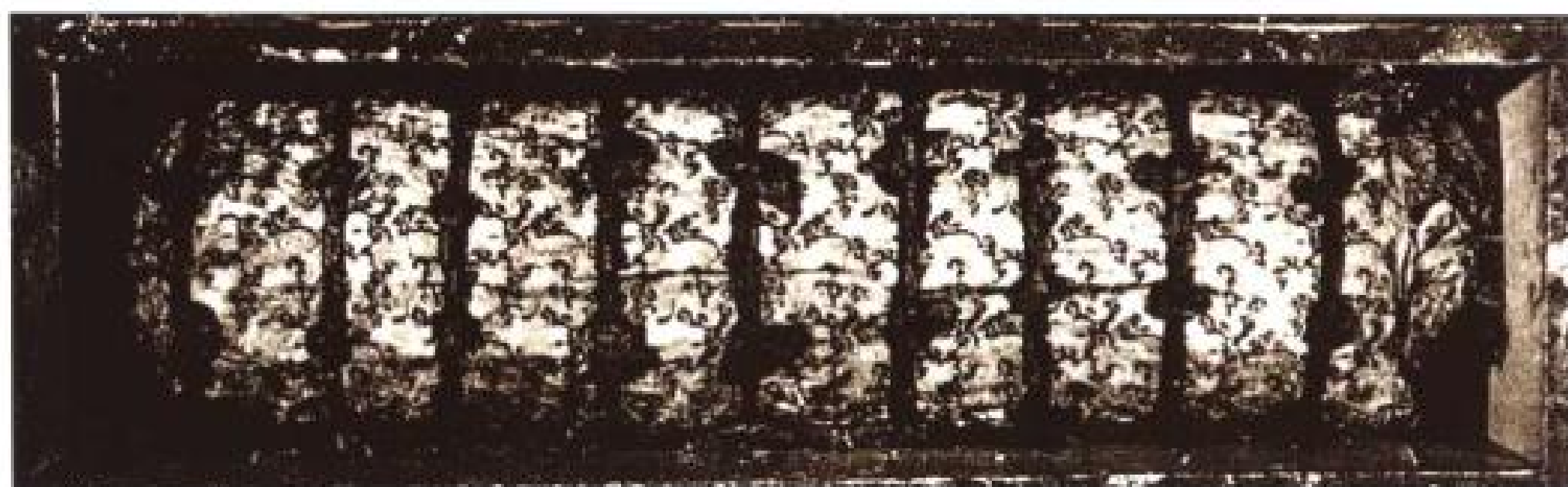
辛夫人身高仅 5 英尺，体重过重，年纪 50 上下，A 型血，生孩子时年纪很轻。她曾患过肺结核，肺上留下了疤痕；她还患有胆结石、肠道寄生虫和右臂骨折等疾病。腰间盘变性使她的脊柱变形，走起路来无疑会使她痛苦不堪。最严重的是，她还患有动脉粥样硬化，即动脉变窄，今天的医学总是将这种疾病与脂肪摄入过多和 20 世纪工业化社会久坐不活动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

辛夫人似乎与今天大腹便便的管理人员一样，吃得太好而活动得又太少。她的左心脏冠状动脉——为心脏提供氧气的主要血管——几乎完全堵塞。墓中发现的几包草药说明她的大夫为这种危及生命的疾病开了桂皮、木兰皮和胡椒粒等药物，但这些用于治疗心脏病的传统中药——现在中医仍然在使用——显然没有什么疗效。“毫无疑问”，1973 年，一位研究过辛夫人尸解报告的美国考古学家认为“这位夫人死于心脏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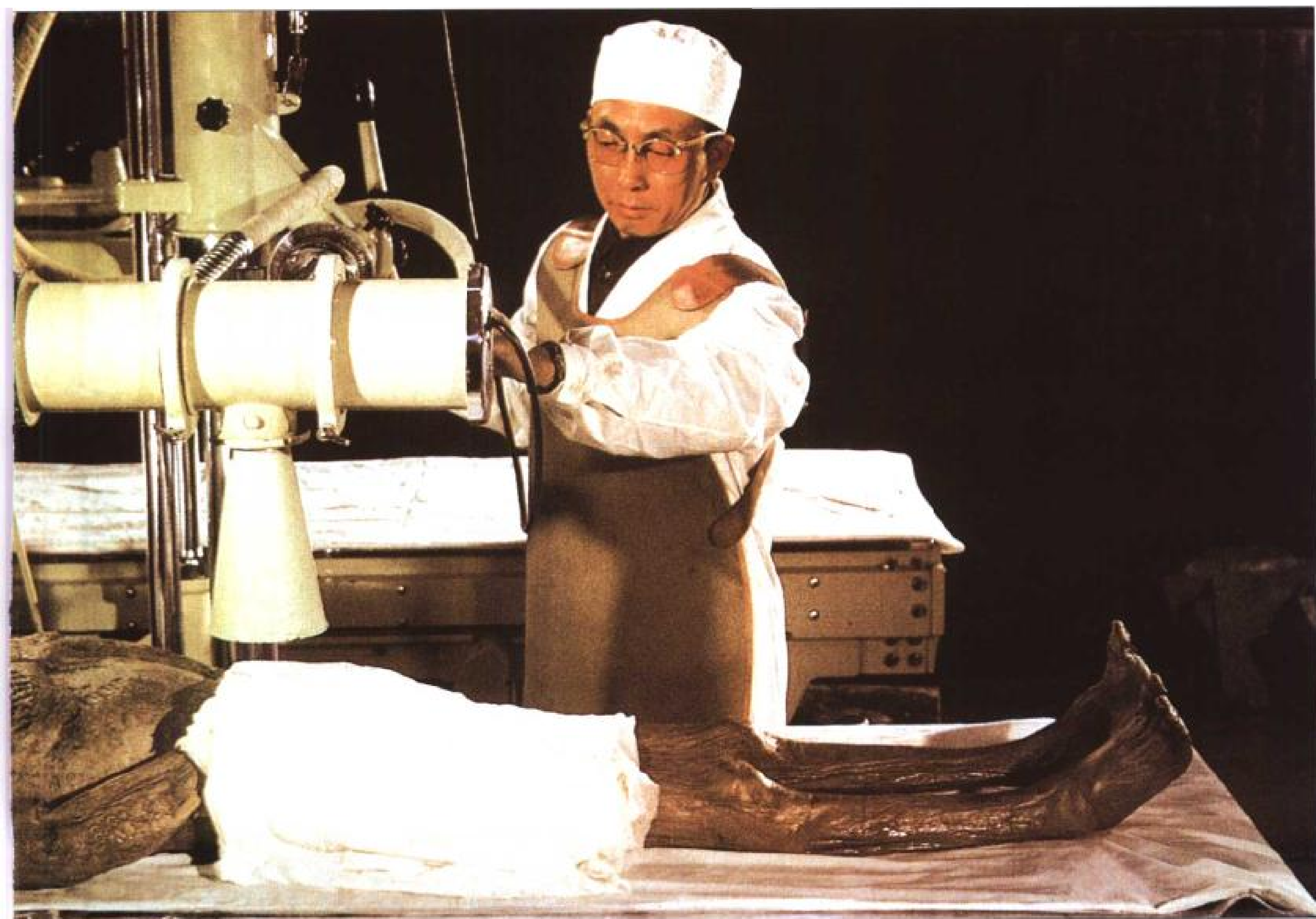
■ 这具仰卧着的尸体正在湖南医学院接受 X 光检查，来自中国各地的专家纷纷赶来，对这具有 2100 年历史的尸体进行研究。在辛夫人的食管、胃和肠道内，专家发现了 138 粒香瓜子，这说明她是在吃了一大块香瓜后猝死的。



■ 辛夫人的尸体用20层丝织物包裹，并用9条丝带捆扎(见右图)，放在一只棺槨内，上面还盖有两条被子，一条为黄纱罗被，一条为深红丝被，其上还绣有象征着长寿的图案。



■ 在辛夫人的灵旗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几名跪着的仆人正在向年老的辛夫人进献食物，另外3名仆人则恭候在旁。她弯曲的后背与医学上年老脊柱变形的迹象极为一致。人们还在墓中发现了辛夫人走路用的拐杖。



乘云绢做成的衣服

GARMENTS MADE FROM FLOATING MIST

提倡节俭的汉文帝曾经下令不准用金、银或铜器作为陪葬品，因此辛夫人的墓中并没有贵金属，但其中的丝织品——更不用说漆器——足以表明软氏家族的财富与地位。

到公元前2世纪，中国养蚕和纺织的历史已经有1000多年。中国垄断了丝织品的制造，蚕丝成了交换媒介，可以用于支付税款、贡赋和军饷。有钱人对蚕丝非常钟爱，身上穿的衣服从里到外都是用蚕丝做的，睡的也是丝被，家里挂着织锦，从草药到乐器的所有物品也都用丝绸包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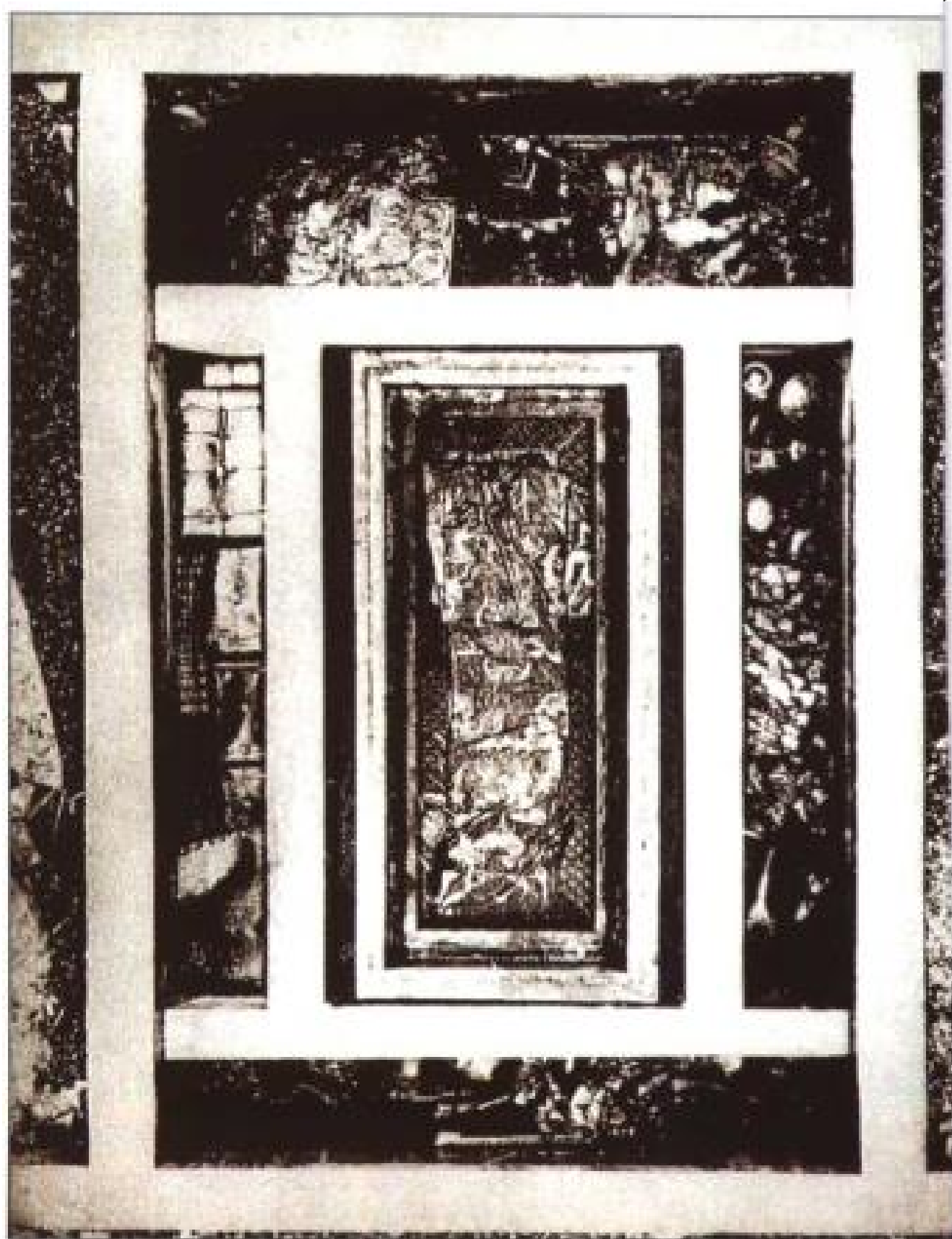
贵族对丝织品的渴求导致了大量纺织工人的产生，其中包括乡村的单个织工和政府组织的纺织工厂。他们生产出来的大量丝织品意味着需要花费大量的劳动力，一件绣有像本页样品中长寿回纹图案的衣服需要花费一个熟练绣工数月的时间才能完成。

辛夫人墓中100多件保存完好的丝织品标志着中国古代丝织艺术达到了又一高峰，是汉代丝织技术的杰出代表，显示出了精湛的纺织、染色、缝制和刺绣水平。这些织物有薄如蝉翼的“乘云”纱罗，也有分量较重的彩色织锦，另外还有绉绸、锦缎、塔夫绸和斜纹布等种类。

在辛夫人的墓中，一个人的全套服装一应俱全，其中包括内衣、睡衣、外套、礼服、裙子、手套、拖鞋和短袜。此外，还有46卷未裁剪的丝绸，这足够裁缝为她在另一个世界做许多新衣服了。



■ 辛夫人墓中的物品仍如墓室刚打开时放置的顺序摆放，此时三层棺木中的外面两层也已打开，最里面的棺木上盖着灵旗。棺木左边的墓室中放着一些竹盒，其中的6盒内盛有丝织衣物。竹盒用绳子捆扎，绳上有一泥印，上刻有“侯总管”四字(见上图)。



■ 辛夫人的陪葬衣物中有一件带衬垫的长袍和一对绣有云纹的手套。这些衣服是首次发现的汉朝完整服饰；此前，汉朝服饰只能从绘画中看到。



举办筵席的食物

FOOD FOR SUMPTUOUS FEAS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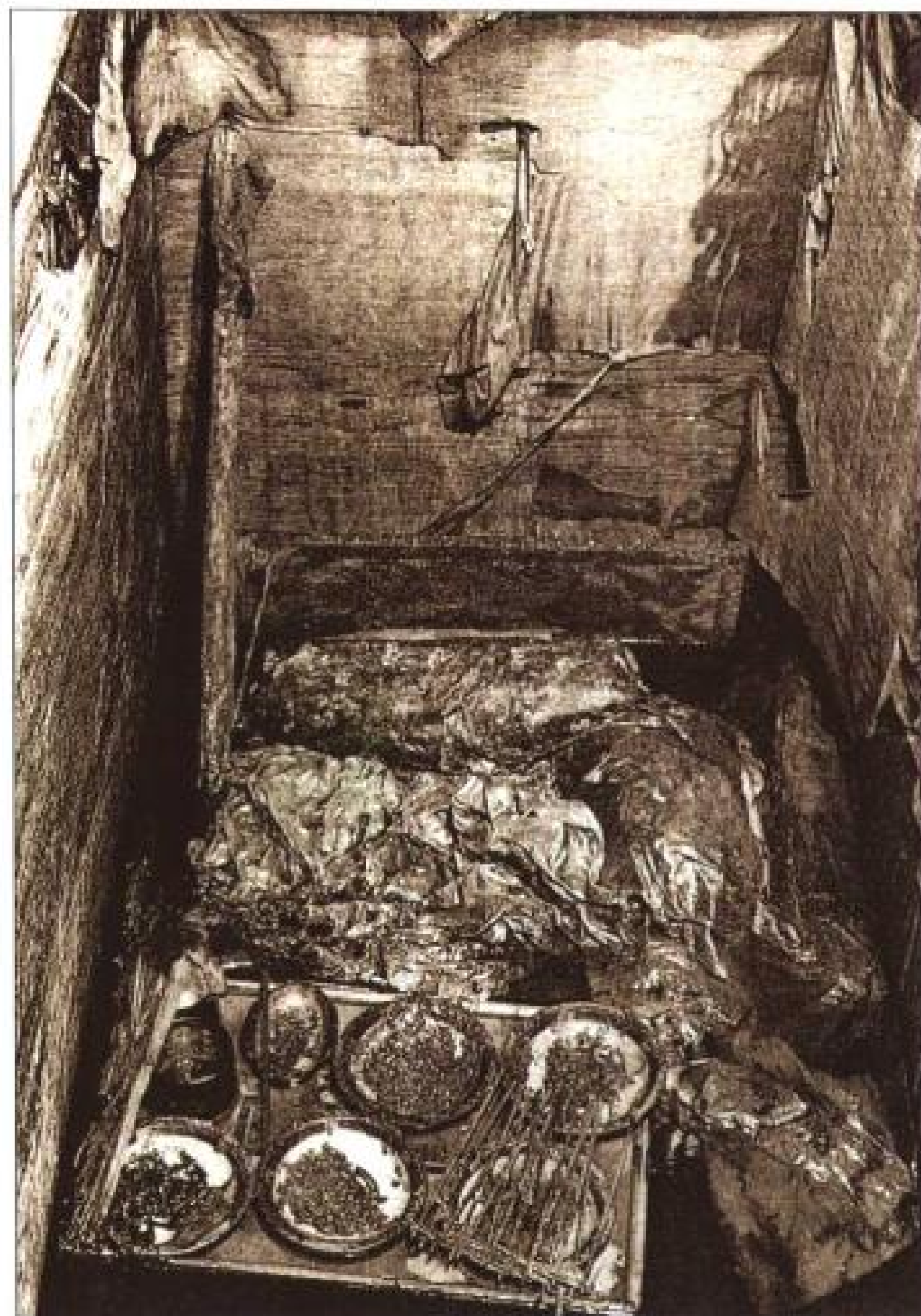
辛 夫人的饮食极为精致。30个竹盒和几十个陶罐中放有豪华筵席所需要的全部原料：大米、小麦和扁豆；猪肉、鹿肉、牛肉、羊肉、兔肉和狗肉；鸡、鸭、鹅、野鸡、斑鸠、麻雀、鹤和猫头鹰；鲤鱼、鳊鱼、鲈鱼——可能都是从轹家的鱼塘里现抓的。此外还有几包调料和香料，几只可能是用来盛酒的罐子。这些并不是全部，列有陪葬物品清单的312片竹简上还记有关于烹饪原则的详细说明，可口的原料，诸如酱油、蜂蜜和盐之类的调料，著名的烹饪方法以及与今天还在使用的完全相同的烹饪和保存技术。食物可以烤、炒、炸、蒸或烫，肉类和鱼类可以通过加盐、腌制和晒干等方法长久保存。竹简上甚至还提到了各种可口部位的肉类，如鹿和狗的肋腹肉、牛唇以及牛舌等等。虽然一支竹简上提到了马肉（这是汉朝人非常喜爱吃的肉类），但专家并没有在墓中找到。

这些发现为现代学者深入了解汉代统治阶层的饮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些统治阶层丰富多样的饮食与普通民众的食物，如小麦、小米、大麦或大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上层阶级在饮食上的铺张浪费即使在当时也是一种丑闻，汉朝保守派人士曾谴责过这种挥霍浪费的做法，称贵族阶级为了尝到新鲜美味而不惜在不合适的季节狩猎，不惜抓捕小鱼和猫头鹰的幼鸟。许多人都不赞成举办豪华筵席，而支持早先提倡的仅在过节时吃肉和喝酒、甚至连贵族也极少屠宰动物的节俭做法。



■ 墓室北部挂有丝织品的隔间内放着一只盛有各种食物的漆盘。漆盘内盛有鸡爪、排骨和几条鱼，这些食物虽然已干枯，但在2100年之后仍可辨认。细长的筷子整齐地摆在一旁，等候着死者的灵魂使用。



■ 一只19英寸长的竹盒内放着40颗鸡蛋，经过2100多年后仍可辨认(见下图)，其他容器内放着诸如李子和干梨等水果(见右图)。墓中共有48只竹盒，其中的30只盛有食物，其余的盛放丝织品、草药和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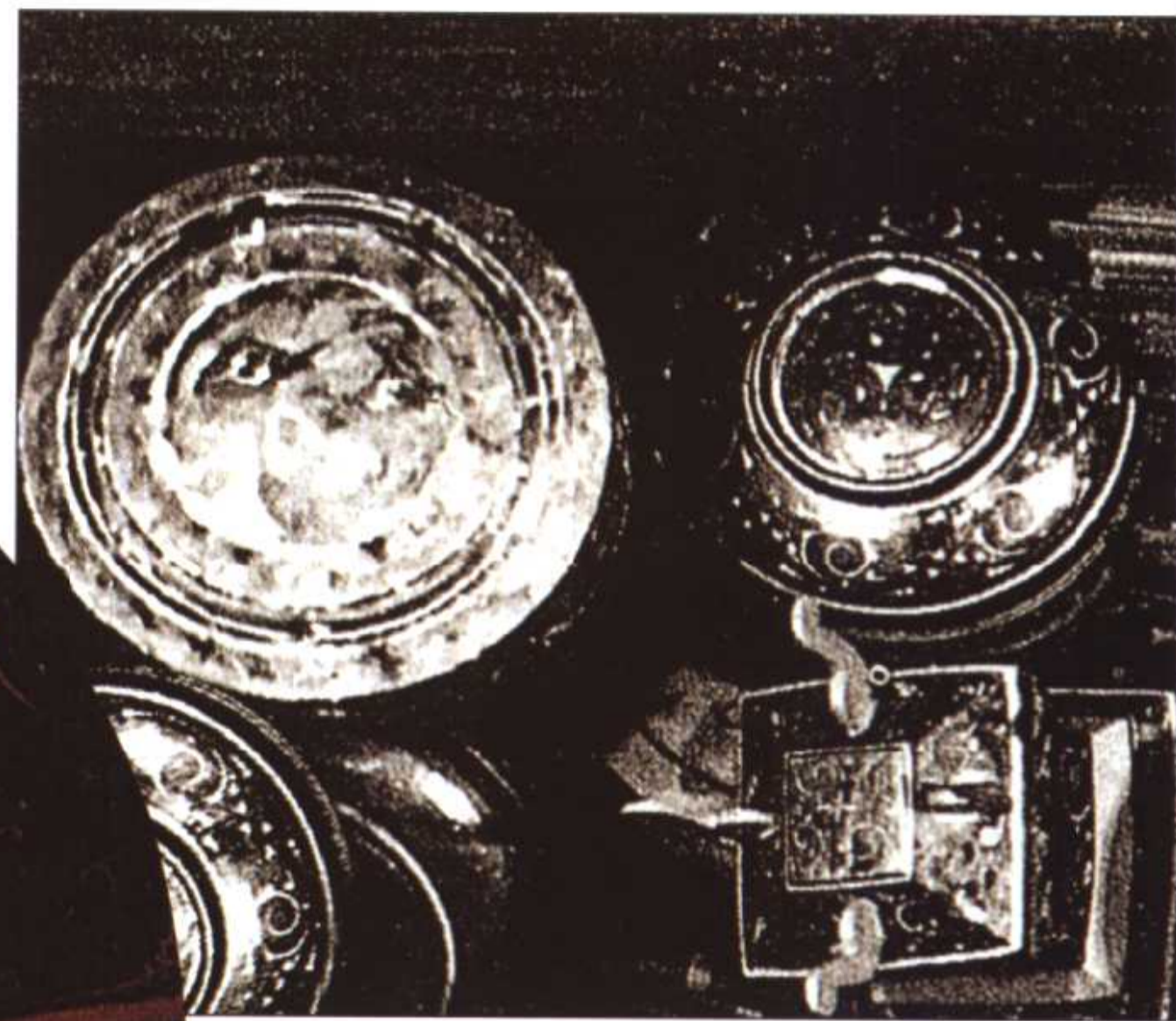
■ 在辛夫人墓中发现的这套漆盘是当时上层阶级所使用的最好的餐具。这些漆盘由漆木制成，外黑内红，涂有装饰性花纹。一只只有两个半月形手柄的圆形茶杯里刻着意为“君幸酒”的字样。此外还有一只长25英寸的勺子，是专门用来从酒罐中舀酒的。







■ 这只高 20.25 英寸的方形酒罐是墓中侧室(见下图)中存放的众多漆器中的一件，其中许多器物上均刻有“软侯家”字样。



漆器中蕴藏的财富

A FORTUNE IN LACQUERWARE

与华丽的丝织品和精美的食物一样，在辛夫人墓中发现的182件漆器表明了西汉统治阶层对贵重奢侈品的钟爱。漆器被认为是所有人工制造品中最为贵重的，其价值在当时比青铜器还要大。据一份当代资料显示，仅制作一件汉代漆杯就需要100个艺人制作木座和上漆。

辛夫人墓中的这些漆器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种类最丰富的贵重用品。除了辛夫人进餐用的盘子、碗和碟子外，还有花瓶、盆、座椅扶手、梳妆盒以及装饰和挡风用的围屏。

正是由于墓中独特的湿润空气，这些物品才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而且是迄今为止出土漆器中保存状况最好的。一般来说，古代漆器最终都会由于干燥而变成尘土，而辛夫人墓中的这些漆器却历经2000多年而没有失掉一丝水分，与当初密封时一样光可鉴人。





■ 汉代贵妇人使用的一些化妆品放在一只直径14英寸、内有分隔层的化妆盒里，其中上层的9个小盒内放有香粉、胭脂、头饰、梳子、刷子和一条装饰性假发。

■ 对于保持端庄仪容至关重要的木制梳妆品包括(从左至右):一只用猪鬃做的、化妆用的刷子,一只装饰性发夹,一只镊子和一把细齿梳子。



■ 三足漆鼎是用来盛食物或举行宗教仪式时使用的，盛放的也许是汉代的主要食物“羹”。容器的形状来源于用于加热食物的铜鼎的传统造型。



无尽欢乐的源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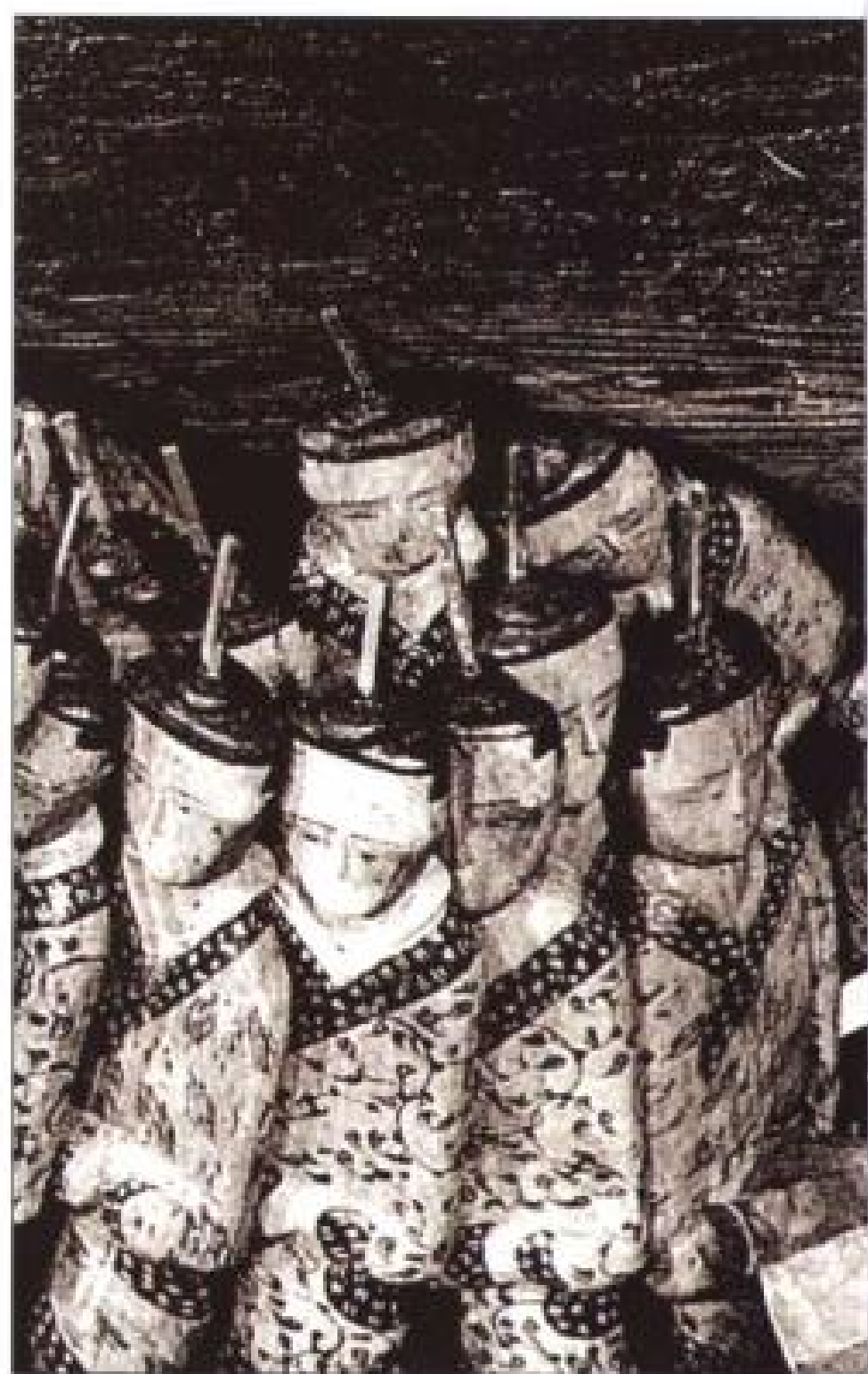
PROVIDERS OF PLEASURES UNTO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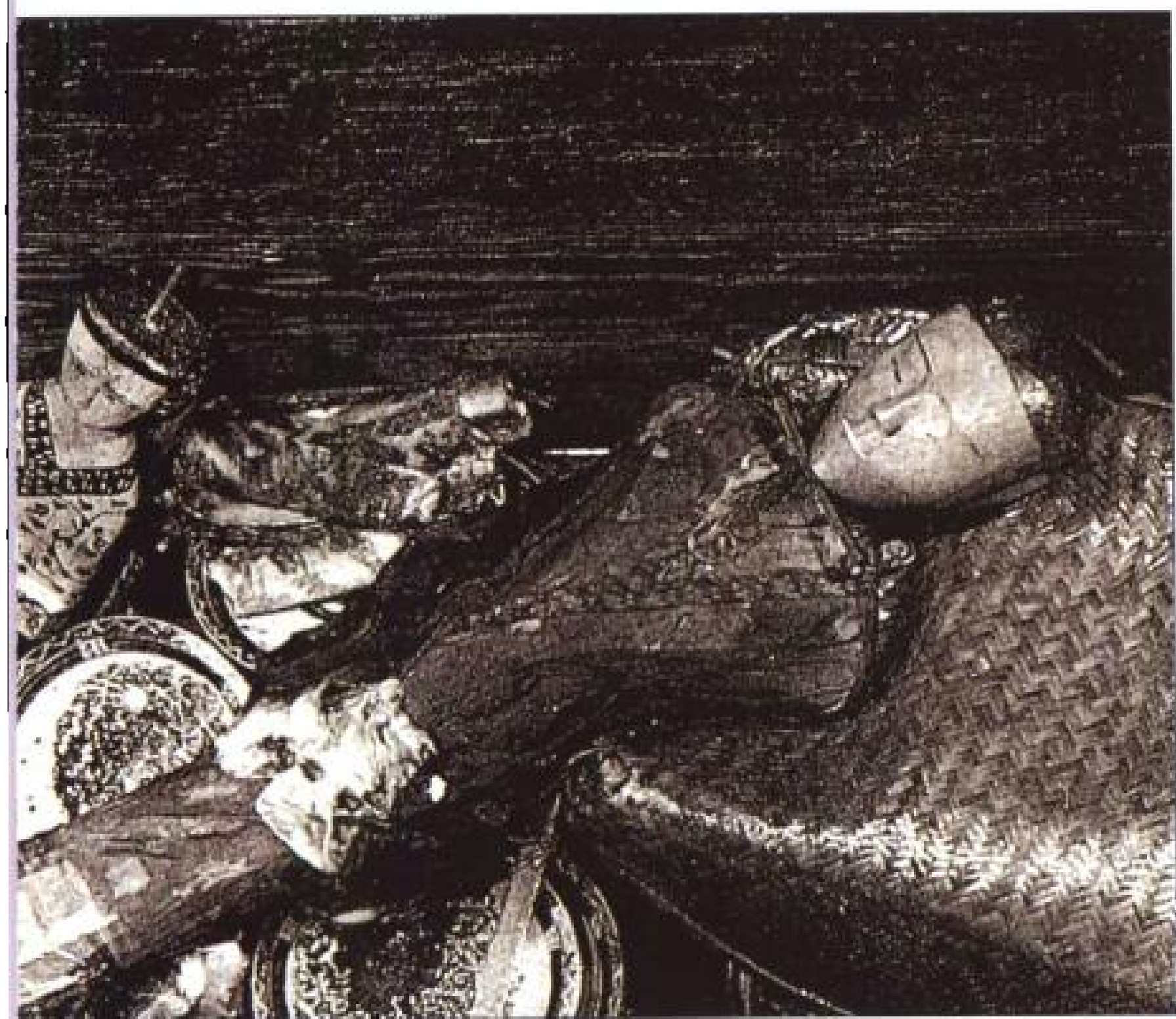
与辛夫人豪华服饰埋在一起的还有162个木刻小人，代表着一大批侍候她的仆人。大部分人像都非常小，并涂有颜色，高18—20英寸，可能代表那些看家、种地、做饭和从事其他活动的工人。

其中有18个稍大一些的人像，有的高30英寸，外面还穿着全套丝织服饰，显然是代表地位较高的仆人。2个衣着较好的男仆可能是管家，10个穿丝织服饰的女仆显然是贴身女仆或女官。另外还有8个较大的人像是乐师和舞女，这反映出辛夫人对音乐的喜爱以及汉代贵族对音乐这一娱乐形式的重视。

长沙国的贵族们显然是希望能够在这些仆人的陪伴下在另一个世界里得到些许安慰，然而在该地区丰富的文学篇章中出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在古代的《楚辞》中，阴间并不是一个仆人如云、官员执法如山、乐师相伴的世界，而是一个由嗜血成性、“头上长角”的魔鬼统治着的地方，这个魔鬼专门抓捕死人的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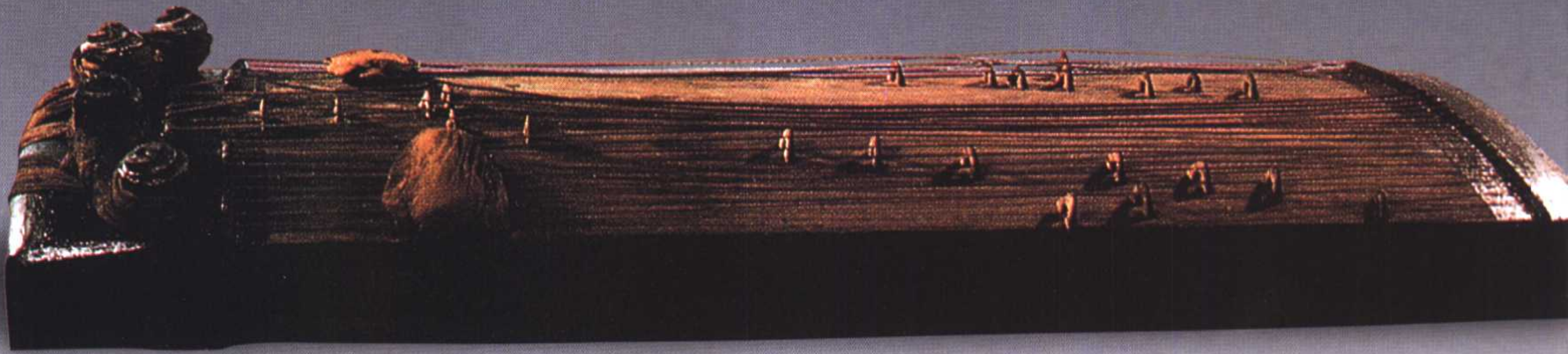
这篇古诗还对死者表示哀悼，呼唤死者的灵魂回归肉体，并描绘了现世生活的幸福：“魂魄归来！闲以静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穷身永乐，年寿延只。魂兮归来！乐不可言只。”这就是辛夫人所熟知的幸福生活，一片充满了快乐的土地，一个她永远也不能再回来的地方。豪华坟墓以及墓中所有的奢侈品都仅仅是一厢情愿而已。





■ 这尊身穿丝织服饰、高31英寸的人像(见右图)是一个地位较高的男仆，与其他小一些的、涂有彩色衣服的人像(见上图)放在一起。与较早时期流行的仆人为主人陪葬的习俗不同，这些人像代替活人作为主人的陪葬品。





■一支由1英尺高的木刻乐师组成的“乐队”正在用微型乐器演奏乐曲，这些乐器是按照软氏家庭乐师演奏用的实物乐器复制而成的。“乐队”中有3人弹琴，2人吹排箫。乐器实物，如上图中的琴和左图中的排箫也放在了墓中。琴有25根琴弦，均绕于弦轴之上，并绷紧在琴马上。排箫由22根竹管做成，都固定在一根木制吹管内。



年表：中国历代文物

AN UNBROKEN CHINA OF
TRADITION AND INVENTION

地域辽阔的中国——从西部沙漠区至北边森林和河谷平原区至南部的森林——在约两百万年前就适于人类及其祖先居住。其中，富饶的平原是蓝田人的家园，蓝田人的化石经证明，已有150万年历史，而随后的河姆渡人、北京人，他们的遗迹也有50万年历史。另外的发现表明，河姆渡人是20万年前中国人类的代表。在旧石器时代，狩猎用石器，留下了被杀死的老虎、大象及其他野兽牙齿的化石。

新石器时代，自公元前5000年起，开始兴起农业、家畜饲养、陶器—青铜器制作的基础，并且留下了大量新石器时代人类定居点的遗迹。甚至独立的部落定居点——商朝的一些——在商代统治者的控制下。它们之间经过近2000年的战争，组成了统一的秦帝国，这为以后的技术和社会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 公元前1700年 - 公元前1050年

SHANG c.1700-c.1050BC

公元前3000年后期，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部落开始生产青铜。随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走向了青铜器时代。部落王国开始有了国王的统治，并且青铜时期的王国——商，开始统治别的部落。20世纪30年代，中国考古学家开始挖掘河南安阳附近的商都城，在那儿发现了大量皇族墓室。当商迁都到这个城市时，他们铸造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

这些青铜器上镌刻的文字奠定了中国文字的基础。这种雕刻亦见于商代国王用来占卜的龟甲和兽骨上。这些宗教和政治上的首领，世袭的国王举行采用牺牲祭祀的仪式，在重要的庆典和皇室出葬时，经常带有人牲殉葬。商朝人信奉最高的神——商帝。

商朝时，中国人改进了丝织技术，创造了高温制陶技术，及制作精美的玉器，如上图所示武丁妻子妇好墓中发现的、跪着的玉制小塑像，妇好曾代表武丁率军出战。



玉塑像

西周 公元前 1050 年 - 公元前 771 年

WESTERN ZHOU c.1050-771BC

在商朝疆域的西面边境，周部族的军队在其国王的率领下，对商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周文王死于约 1050 年的一次战争中。其子周武王征服了安阳，使商朝最后一个帝王纣自杀而死。在随后的 279 年里，周武王及其继任者建立了西周，因为他们的都城是他们第一个重要的统治地，在今陕西西安附近，故称西周。

征服商朝后，周武王将土地分封给臣下，标志着封建统治体系的建立和封建社会的开始，这个体系在以后不断发展。诸侯们在赐给他们的土地上拥兵抵抗野蛮人的进攻，给周王朝贡，使自己分封的领地维持正常的统治秩序。礼乐教化也被用于周朝的统治。在周王朝的疆域内，兴起了新的城市。

玉器变得更纯净。如右图所示的青铜祭器被继续冶炼出来，并在许多祭器上刻有记载王国和皇室重大事件的文字。



青铜器

东周 公元前 771 年 - 公元前 221 年

EASTERN ZHOU 711-211BC

公元前 771 年，游牧民族击败了周朝的军队，并且攻陷了周朝的都城。新的统治者周平王向东边撤退，将都城迁往今河南洛阳，这就是东周。这时，周王早期分封的诸侯国各自称雄，周王室成为有名无实的傀儡政权。

东周纪元传统上分为两个连续的时期：首先是春秋时期，于公元前 481 年结束；接下来是战国时期。两个时期都以大的诸侯国和封建地主之间的争霸作为划分标志。战事频仍，尽管各诸侯国之间为争夺盟主地位而战，各城市人口仍有增长。哲学、文化、手工艺蓬勃发展，技术达到了新的高度。如左图的漆绘鹿之类的装饰品激增，因为失蜡法的诞生，生产精美细致的金属制品成为可能。

刚进入东周时期时，有 170 个诸侯国。当这一时代终结之时，许多小诸侯国被 7 个大诸侯国吞并。当战争的尘埃落定之时，一切归于平静。



漆绘鹿

秦 公元前 221 年 - 公元前 206 年

QIN 221-206BC

在公元前3世纪存在的7个诸侯国中，在有雄才伟略的秦王嬴政和谋士李斯的带领下，位于西边的秦国征服了其余的6个诸侯国。公元前221年，嬴政自封始皇帝，而他通过征服其他诸侯国建立起来的统一的国家，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的新纪元。至此，他统治的国家疆域辽阔，从东边海滨至喜马拉雅山麓，北至今天内蒙古边境，南至今越南边境。其都城咸阳位于今西安附近。

秦始皇移风易俗，他用中央集权统治着王国。为了规范贸易，他统一了币制、度量衡和文字。他的许多大型工程，包括广修栈道和北边的防御工事——长城。他为自己修筑了大量宫殿和充斥着珍宝的陵墓。如右图所示的、与真人大小相似的兵马俑在他陵墓附近的坑中被发现，揭示了秦帝国军事力量的强盛。公元前210年，他的逝世导致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公元前206年战争结束，宣告了汉朝的建立。



陶俑中的射手

汉 公元前 206 年 - 公元 220 年

HAN 206BC-AD220

起义军领袖刘邦建立了汉朝，汉朝中央集权的统治加强，并以论功行赏的方式建立了新的统治阶层。

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开辟了往西的由政府控制的陆路贸易，即著名的丝绸之路。中国丝绸被输送到东亚和欧洲，并以贸易往来交换回了黄金、马匹、骆驼、香料和其他称心如意的商品。

铸造厂大量生产铁器，代替了青铜武器和工具，但大量装饰品仍由青铜制成，如左图所示的优雅奔驰的马匹。这一时期出现了色彩绚丽的漆绘艺术品，陶器的制作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公元105年，发明了纸。

因为内讧，汉的统治在公元9年被中断了，并被皇太后的外甥王莽夺取了政权，但是王莽的统治在公元23年告终。汉朝统治者重新执政。汉朝都城由长安(今西安)向东迁往河南省洛阳，这段时期被称为东汉，或后汉。公元220年，汉朝宣告结束，这时的中国已成为亚洲强盛繁荣的主要国家。



青铜马

失
落
的
文
明

- 1 辉煌、瑰丽的玛雅
- 2 波斯人——帝国的主人
- 3 古印度——神秘的土地
- 4 罗马——帝国荣耀的回声
- 5 希腊——庙宇、陵墓和珍宝
- 6 拉美西斯二世——尼罗河上的辉煌
- 7 圣地——耶路撒冷
- 8 北欧海盗——来自北方的入侵者
- 9 东南亚——重新找回的历史
- 10 埃及——法老的领地
- 11 伊特鲁里亚人——意大利一支热爱生活的民族
- 12 凯尔特人——铁器时代的欧洲人
- 13 非洲——辉煌的历史遗产
- 14 安第斯之谜——寻找黄金国
- 15 早期欧洲——凝固在巨石中的神秘
- 16 古代中国——尘封的王朝
- 17 安纳托利亚——文化繁盛之地
- 18 美索不达米亚——强有力的国王
- 19 印加人——黄金和荣耀的主人
- 20 北美洲——筑丘人和崖居者
- 21 苏美尔——伊甸园的城市
- 22 庞贝——倏然消失了的都市
- 23 灿烂而血腥的阿兹特克文明
- 24 爱琴海沿岸的奇异王国

ISBN 7-5080-2616-0



9 787508 026169 >

ISBN 7 5080-2616-0 G · 1198 定价: 65.00 元